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华夏文明延伸之链



引 言

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向全世界呼吁: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2000年前孔子的智慧,必须重新认识东亚文明。一石激起千层浪,被视若全球人类未来希望的西方文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被指责为20世纪诸多社会危机的罪魁祸首。

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后期的两大奇迹:

一是东亚崛起的奇迹。战后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引人注目。继日本成长为经济大国之后,“四小龙”又再领风骚。当8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之时,“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率却达到了7%,其中有的国家还达到了11.5%,香港则经历了近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美国人预测,到2000年,东亚经济——从日本到印尼——几乎肯定会和美国持平,相当于欧共体的五分之四。人们不禁会问:这一地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在诸多答案中,对于经济奇迹背后之文化底蕴的挖掘最具挑战性,因为以东亚文化为共同特征的“筷子地区”(美国人对东亚地区的称谓)构成了对以西方文化为特征的“刀叉地区”的文化威胁,它意味着非西方文化模式同样可以推动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创造经济奇迹。

二是海外华人创造的奇迹。自远古始,华人就开始涉足海外、开拓蛮荒,到17世纪末,华人的足迹已遍布全球,远迄欧美非,近至东南亚。这些同属一脉相承的炎黄子孙,虽星星点点,却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形成了一个没有封口的世界华族文化圈和既流动而又有中心的世界人数最多、最为庞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他们虽历经艰辛、屈辱,被人视为“劣等民族”,却坚韧自强,一代又一代地生存下来,成长为强劲的华夏子系。他们之中有桂冠加顶的科学家,如李远哲、杨振宁、李政道等,还有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如王安、李嘉诚、陈嘉庚等。在美国著名杂志《福布斯》一年一度的全球富豪大排行中,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名列其中,其经商致富之名声已远超犹太人。他们为什么会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功?智慧,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得到了举世公认。

这一切都使人体验到了延伸于海外的华夏文明之风采,也使人感受到了华夏文明的生命力之无穷。而这一风采之源在何方?这一生命力之根在哪里?请尊敬的读者与笔者一起到华夏文明延伸的历史中去追根溯源吧!

华夏文明延伸之谜

第一章华夏文明寻根：龙·凤·狮

华夏文明之根在哪里？

有人说，华夏文明植根于涵纳宇宙的阴阳五行说；有人说，华夏文明源于缤纷五彩的神话传奇；而我们说，华夏文明是龙的延伸、凤的遗传、狮的聚合。

1. 龙之精神：华夏文明的内核

龙，是华夏民族自上古以来一直崇奉的一种神异动物，是神灵和权威的象征。在传说中，龙与我们的始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帝王世纪》云，神农氏母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故神农氏即神龙氏。据载，庖牺氏中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及黄龙氏。现代中国人仍有以龙为姓者。在一些重大的庆典中，往往有龙的形象出现，如年节舞龙等。龙在中国政治、文学、艺术、习俗及信仰中都有鲜明的印迹，成为华夏民族的标志。1984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油饰最高规格的“金龙和玺”具有深远意义。封建时代“金龙和玺”彩画只有在皇家宫殿等极为神圣的地方，即代表皇权和真龙天子之处才可以使用。其法式为：（1）箍头（梁枋的两边）画有坐龙；（2）藻头（箍头和枋心中间的部分）画有升龙和降龙；（3）枋心画有走龙，多为二龙戏珠。依次为“龙凤和玺”、“龙草和玺”和“金凤和玺”等。天安门旧时按制只能绘“龙草和玺”，以龙和蔓草缠枝、牡丹花等交连组织构成。但自1949年10月，天安门成了新中国的象征。在百废待兴、重振中华之际，天安门城楼上的“龙草和玺”升格为“金龙和玺”，不仅意味着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确立、巨龙的飞腾，而且确认了中华民族过去、现在及未来的一体性，即龙的子裔的永远延续。

龙，为什么会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观念究竟是怎样演变的？龙，在华夏文明中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首先要我们弄清：龙究竟是怎样一种形象。历代文人骚客对此描述颇多。定型后的形象大体是牛头，豕鼻，鹿角，马鬣，蛇躯，鳞身，鳄棘，鱼尾，鹰爪，鼉足，能水中游，云中飞，陆上行，能呼风唤雨，行云播雾，司掌旱涝。

这样一种神异之物，在自然界中当然从未有过，也绝不可能实有。但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不注意到，在商周甲骨之中不仅有见龙、祭龙，甚至有狩猎获龙的卜辞。至于先秦文献中，更不稀少关于见龙、养龙，以至屠龙的记载。《左传》中曾写道：鲁昭公29（公元前513年）年秋，龙出现于晋国都城近郊（今山西侯马），引起了人们的恐慌。有人想猎捕它，但又害怕它，于是去请教博学多知的太史官蔡墨。蔡墨说：“如果不能活捉龙，那只是由于现在人们的无能。而在古代，不但能活捉龙，甚至专有养龙官、杀龙官和驯龙官。只是由于后来大地上的水泽少了，所以龙才成为稀奇之物。”这段记载表明，史官蔡墨不仅明确肯定了“龙”作为一种生物的实在性，而且还证实了春秋时代的北方还偶尔可见到“龙”的踪迹。

那么，“龙”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长期以来，人们对此曾作过种种考证和拟测。主要的说法不外如下几种：

蛇：“龙是以蛇为基础的。而发展变化了的蛇图腾像就是龙的形象……”

马：“马八尺以上为龙。”

蜥蜴：龙像蜥蜴戴角的形状；“其实所谓龙”就是古人眼中鳄鱼和蜥蜴

徐乃湘等：《说龙》，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周礼·夏官·佻人》。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

类动物的共名。”

河马：“充任龙的模特儿之一的马，最初不是一般的陆马，而是河马……河马不仅把自己的部分形体贡献给了龙，而且把自己的部分性能——善于御水，也贡献给了龙。”

鳄鱼：“在中国古代，确实曾存在过这样一种……令人敬畏的巨型爬行动物，这就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中称作‘湾鳄’的那种巨型鳄鱼。”

恐龙：“龙，被古人公认为最原始的祖型，可能还是恐龙。古人以具有四足、细颈、长尾，类蛇、牛、虎头的爬行动物为龙，这可能是古代当时见到并描绘下来的某种恐龙形象。”

云：“最初的龙形不过是抽象的旋卷状的云纹。”

虹：“虹是龙的最直接的原型，因为虹有美丽、具体的可视形象。”

闪电：“幻想龙这一动物神的契机或起点，可能不是因为古人看到了与龙相类似的动物，而是看到天空中闪电的现象引起的。因为，如果把闪电做为基础来把它幻想成一种动物的话，它很容易被幻想是一条细长的、有四个脚的动物。”

合并了的图腾：“它（龙）是一种图腾，并且是……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

松树：“龙，原是树神的化身。中国人对龙的崇拜，是树神的曲折反映，龙是树神，是植物之神。龙的原型是四季常青的松、柏（主要是松）一类乔木。”

以上诸说中，以闻一多先生提出的“图腾合并说”影响最大，至今国内学术界多依此说。然而，各家之言，除个别明显有背于现代科学常识（如恐龙说）外，似乎都有其可取之处，尽管这些说法仍然只能满足对龙的某一部分特点的解释。史籍中记叙的龙有时出现于人间被人所目睹，有时则飞升于天空变化莫测，这是以上诸说均无法全面解释的。实际上，我们很难将龙比拟为自然界的任何一种动物。龙是一种信仰观念，是由多种动物经过人们的加工而成的。人们为什么要把一种或几种动物加工为龙？这只能从信仰观念中寻找答案。

公元前 5000 年，今陕西渭河流域出现了似龙的长身鱼纹，这种鱼纹与鸟纹的组合形式出现在北首岭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出土的蒜头瓶上。我们知道，半坡陶盆上多绘有各种鱼纹，这类鱼纹可能具有某种魔术证验的意义，是借以表达获取更大量的生产物的宗教画。在今河南濮阳漳水流域，这一时期出现了蚌塑的龙，为陪葬品。此墓之北，还可见到人乘于龙背的蚌塑。考古队的专家们描述道：“图案中有人骑龙，……龙头朝东，背朝北，昂首，长颈，舒身，高足，背上骑上一人，也是用蚌壳摆成，两足跨在龙背上，一

何新：《神龙之谜》，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 年。

刘城淮：《略谈龙的始作者和模特儿》，《学术研究》1964 年第 3 期。

何新：《神龙之谜》。

王大有：《龙凤文化源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8 年。

胡昌健：《论中国龙神的起源》，《中国文物报》总第 25 期。

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开明书店，1948 年。

尹荣方：《龙为树神说》，《学术月刊》1989 年 7 月号。

手在后，面部微侧，好像在回首观望，……另外在这一层位上，还有许许多多零星的贝壳，似乎也并非随便乱扔的，从整体看，这条灰沟好像一条空中的银河，灰沟中零星的蚌壳，犹如银河系中无数的繁星，……人骑龙……如在空中奔驰，非常形象，非常壮观。”看来，这里的龙具有负人升天的作用。此后，在公元前3000年初期，分布于燕山南北的红山文化、今甘肃渭水流域的庙底沟文化晚期、今浙江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今山西襄汾一带的陶寺文化遗存中，均可见到不同的龙的纹象。这些龙的形象时代参差、形态各异、所属考古学文化谱系有别，但都是从一般动物中抽象出来的，都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表记。随着诸考古学文化的不断交流，先民对龙的信仰意识及对龙形象的艺术表现日趋融合，构建了统一的龙的概念。显然，龙的起源与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起源相伴相融，难以分离。

综而言之，上古时期，龙的文化含义大体有三：一是人神通天的助手和坐骑。龙纹是从原龙纹演化而来的。原龙纹虽有多种，但充当沟通天地的媒介和人神通天的助手是诸多原龙纹所共有的、也是最主要的含义。商鼎上的龙纹就是最富时代特色的通天纹饰。于是产生了《史记·封禅书》所载齐国术士公孙卿所言的神话。“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官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墮，墮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为什么鼎成而龙下？这是因为铸鼎是沟通天地的一种手段，而龙是沟通天地的使者。鼎上的龙纹即是能接统治者上天的神龙。在许多古籍传说中，一些天神人主索性以龙为坐骑，乘龙往来于天地间。《韩非子·十过》载：“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大戴礼记》载：“颡顛……乘龙而至四海。”帝尝则“春夏乘龙，秋冬乘马……”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九歌》中描写神人乘龙在天空飞行的瑰丽诗句更是比比皆是，如“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驾飞龙兮北征，桐吾道兮洞庭”等等。汉画像石（砖）中多有仙人乘龙及驭龙驾车行空的图画，其含义明显源自先秦的神人乘龙观念。二是掌握云雨河泽的神兽。新石器时代原龙纹原型中的鱼、鲵、鳄、蛇均与水相关，它们长期生活于水中，其生态还因天气的阴晴云雨而有所变化。如鳄，在下雨之前，有用胸腔排气，发出类似吼声巨响的习性，可以起到预告阴雨的作用。专家们推想，新石器时代原龙纹多带有水中神兽的含义，这一含义为龙所继承，于是龙不仅具有天神助手的身份、飞升于天的能力，还有行云布雨的神通。商代甲骨文中向龙卜问未来天气晴雨状况的内容即是这一观念的反映。这种观念在《周易·乾卦·文言》中被总结为“云从龙，风从虎”。在神话传说中，有条名叫应龙的龙不仅依恃自身行云布雨、掌握河泽的本事帮助黄帝击败蚩尤，还成为大禹治水的得力先锋。在古人的心目中，龙一直居于神的助手地位，一旦犯下错误，便会受到神的惩罚。《巫山县志》载：“斩龙台，（巫山县）治西南八十里错开峡，一石特立。相传禹王导水至此，一龙错开水道，遂斩之。故峡名错开，台名斩龙。”三是显示吉祥灾变的灵物。在远古的动物崇拜中，代神赐福降祸是崇拜性动物的基本功能，作为动物崇拜观念产物的原龙纹自然也不例外。这一功能由龙继承，故而龙也具有显示吉祥与灾变的作用。古人认为，凡统治者的作为顺乎天意，就能导致年景风调雨顺、社会安定，就会有奇禽异兽出现来显示祥瑞。这类奇禽异兽可有多种，其中主要为龙、麟、凤、龟四灵。《管子·小匡》载有“昔人之受命，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

乘黄”

的神话。汉代是动物显示灾祥观念盛行的时代。据载，距泉陵城七里的湘江水深难测，曾有两条黄龙出现，长约十六七丈，大于马，举头顾望，状如画中之龙，当地居民都亲眼目睹。距龙数十步远的地方，又有状如马驹的小龙六条，出水游戏于岸上，人们猜测，这必是六龙子也。王充认为：“黄为土色，位于中央，故轩辕德优，以黄为号。皇帝宽惠，德侔黄帝，故龙色黄，示德不异。东方曰仁，龙，东方之兽也，皇帝圣仁，故仁瑞见。”专家们认为，这一“龙出”事件描述具体而生动，不像是完全出自杜撰，大概是鳄类两栖动物。汉时湘江一带鳄已罕见，世人见之引以为奇，官员们借此机会向朝廷报称祥瑞，粉饰太平。

由此可见，龙在各类神兽中地位最高，因而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视为最聪灵的动物，进而被视为华夏民族的始祖，神农氏母感神龙而生炎帝的传说由此而来。后来，人们开始将龙喻为杰出之人。最典型的当是孔子以龙来比喻老子，所谓“吾今见老子，其犹龙乎？”而主动将自己称为龙种的第一人为汉高祖刘邦。这位以亭长起事的农民军领袖，缺乏项羽那“世世为楚将”的显赫身世。出于政治的需要，刘邦编造了先天不凡的经历神化自己，以提高自身的威信与号召力，与陈胜的鱼腹之作和狐鸣呼“大楚兴，陈胜王”同出一辙，都是当时巫风炽烈这一历史宗教背景下的产物。只不过刘邦的文化层次较陈胜略高一筹，他神化自己的手段也更巧妙一些而已。且看《史记·高祖本纪》的记述：“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三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常从王媪、武负贡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鸿门宴前夕，范增对项羽说：“吾令人望其（指刘邦）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西汉以降，由于刘邦的作俑，人们相继编造了无数将历史名人与龙，尤其是将开国帝王与龙联系起来的神话。

总之，龙的起源与演化过程反映了中国先民原始宗教信仰的发展、演进和民族意识的融合、变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内核。尽管龙到汉代以后逐渐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但人们对龙仍旧表现出极大兴趣，在许多重大习俗中保存了龙的形象，并始终将龙视为尊贵的神异之物，称自身为龙的子孙，赋予龙一个民族象征的地位。从古人对龙之形象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据古书记载：龙的宽阔前额表示聪明智慧，鹿角表示社稷和长寿，牛耳寓意魁首，虎眼表示威严，鹰爪表示勇猛，剑眉象征英武，豕鼻象征富贵，鱼尾象征灵活，马齿象征勤劳善良，等等。可见，龙的形象代表了人类诸多美好品质，集中反映了华夏民族的深层心理和审美意识，更反映了华夏文明对世界和人生的信念。

对世界的看法，最核心的是“天人合一观”，认为人与天下万事万物同出于自然，人与自然处于平等地位，甚至自然比人还重要。龙，不但始终同大自然中的云、水、山、兽等处于全景式的整体中，是人神合一的媒体，而且吸收了生物界一切美好的象征，体现了华夏人对真、善、美统一的热切追求。这就是，龙的精神，可具体化为：

一是万物一体，兼容并蓄的精神境界。

龙的精神之髓便是人与自然合一的思维，海纳百川的气魄。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现存的事物都是阴阳交感，五行相荡的产物，

对立的两极同时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孤阴或孤阳都不可能存在下去，更不能产生新的事物。唯有“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才能“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长期以来，这种万物一体、阴阳交感的整体思维方式浸润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

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指出，在上古世界里有两套传统：一种是人与自然是分开的，对立的，上帝惩罚亚当、夏娃，人类以血祭偿还，付出代价，才能得回失去的乐园，人要通过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使自然界服侍人类，中东、欧美的精神传统就是如此；另一套是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传统，认为人与宇宙是联系的，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人与宇宙随时可以重合，人类生存其间，不是征服宇宙，而是与宇宙精神同一。

正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的驱动下，华夏文明显示了海纳百川的胸怀：

宗教，在很多的文化现象中，是最具排他性的，因宗教而起的战争、冲突自古至今连绵不断，而华夏文明却对此采取了一视同仁、兼收并蓄的态度，印度的佛教，波斯的祆教、摩尼教，西方的基督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犹太人的犹太教都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相互交触。尤其是强盛的大唐王朝更是显示了龙的广博胸襟。当时的诗人杜甫有诗曰：“南朝四万八千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一座城市竟有如此之多的寺院，说明古代宗教生活的活跃，而且各地众多的寺院并不是清一色的。它既有中国传统的孔庙、道观，又有来自域外的祆祠、摩尼教寺、大秦寺等。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外侨不仅有信教的自由，而且可以参加科考作官。德国学者赫尔德对此感慨不止。他说，在中国，“宗教信仰，不受强迫，无损国家利益的宗教也不遭迫害。儒家、道家、佛家的信徒，甚至与该国接受的犹太人和耶稣会士生活在一起，彼此相安无事”。

除此之外，华夏文明（主要是清中叶以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还包括物产科技领域。远古时代，炎黄子孙大量引进域外物产，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西域各国的物产更是源源不断传入中国，出现了“殊方异物，四面而至”的盛况，先后有上万种动物、植物汇合于华夏文明之中。明代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物品就有100多种。与此并行不悖的是，秦汉以后，外国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也渐渐传入。玻璃制造、制糖方法、织锦等都是中外交流的结晶。当然，由于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始终居世界前列，因而，先进的科技传出去的多，传进来的相对少，但反映了健康自信的华夏民族心理。清中叶以后，华夏文明已处于停滞状态，尽管出现了一些好学之士，但已无法促成广泛交流之风。

正是由于这种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精神和态度，使华夏文明不断获得生命力的补充，以至旺盛发达、延续几千年，尽管历史上有过“焚书坑儒”和“文字狱”，但就思想界主传统而言，不是绝对地排斥异端，而是相互影响，殊途同归。长达三个世纪的百家争鸣，其结果是定于儒学独尊。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近千年的与儒、道的冲突、弥合，最后形成了三教既鼎立、又合一的局面。就科学技术而言，古代中国也展示了同样的心态，许多流传于古代的技术、科学常识，都是交流的产物。

二是追求和谐、群体本位的人生态度。

《易·卜辞》。

转引自[德]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83—8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由万物一体的态度出发，华夏文明对人生的态度便是对于和谐的追求，和对于群体义务的强调。

“仁”是儒家推崇，并为中国人首要接受的道德准则。孔子曾用“爱人”两个字解释“仁”的含义，并用“克己复礼”为“仁”来说明如何达到“仁”的境界。“和”同样是儒学典型的处世原则，“和”即追求和谐、中和。孔子的学生有若将“礼”的作用概括为“礼之用，和为贵”。庄子也说，与人和，可谓“人乐”，与天和，可称“天乐”，和即是乐。可见，“和”与“仁”在传统观念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孔子说：“仁者人也”，在他看来，自然界并不是与人为敌的可怕对立面，而是在统一、和谐的宇宙生命大循环中与人相通，为人而存在的世界，所以“地灵”才会“人杰”，社会也不是排斥人的异己力量，而是由个人组成的人的社会，所以“仁”字从二从人，人与人和谐相处，即是“仁”。古人把“天”、“地”、“人”并列为“三灵”，同时又强调人是“万物之灵”是天地之“心”，无疑这是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和主宰，他们相信，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遵循宇宙的法则，改造自然，创造美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就是说，人不必幻想在人世之外寻求天堂，而应在现世中建立合乎“人道”的理想生活。为此，孔子为人类构想了未来美好的“大同世界”。如此以“人”为“本”的思想比当时西方的以神为本的观念进步了整整一个时代，直至近代文艺复兴之后，“人”才在西方世界的观念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无论先秦哲人在人本观念上有多少非理性的偏差，也不论汉之后儒学对人本思想演化成人性的压抑，但是，正由于先秦圣贤对“人”的发现和执著，才使华夏子孙从未有过以神为本的痛苦，拒绝了天堂的诱惑，从而勇敢地面对现世，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

“和”作为人的行为准则，《中庸》将其解释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所谓“中节”即“适当”，也就是说话办事恰到好处，注意避免“过”与“不及”，以便保持各类矛盾和关系的和谐统一。但这并非要求人们作无原则的调和，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观点，“和”就是“和谐”，“同”即“等同”，是积极寻求矛盾的解决而使其和谐统一，不是消极地满足于苟同而产生的和谐，是君子和小人的试金石。毛泽东对此感叹不已，认为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他说：“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路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由此，引伸出了“厥允执中”。“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崇尚和平，反对暴力的华夏品质。

这种以群体、环境和谐为最高行动原则的观念使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家庭义务感，并从这一义务感放大为对更大的人类群体——国家的义务感。尽管由此而产生了对君权的认同，但无论君主还是臣民都把国家整体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是在告诫君主官吏不可忽视民众的呼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在告诫君主不可将一己私利置于国家民众整体利益之上。唐太宗李世民所说的“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则是一个亲身经历了王朝更迭巨变的君主的大

《毛泽东书信选集》145—146页。

《尚书·泰誓》。

《贞观政要·论政体》。

彻大悟之言。正因如此，上千年的华夏文明史展示，中国民众在承认君主权威的同时，又不认为君主可以无条件地享受天命。是否配作君主的根本条件是其德能否“保民”，也就是能不能让绝大多数民众安居乐业，从而保持社会的和谐状态。做不到这一点的君主，人们可以反抗他，甚至取而代之，这就是为什么儒家一方面大讲君权神圣、一面大讲诛杀暴君有理的原因，正是在这种民本思想的熏陶下，我国历史上有勤政廉明、爱民如子的传统，也有不避斧钺、为民请命的传统，更有揭竿而起、替天行道的反抗暴政的传统。

三是中华大一统的情结。

“天人合一，万邦协和”在民族观上的体现便是中华大一统的情结。

华夏文明是夏商以来多民族、诸文化融汇而成的产儿，作为主体的汉文化也是在历史上融合、同化了许多其它文化而成形的。在华夏历史上，如何处理境内以及与周边民族、文化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文化课题，他们之间有冲突，有战争，但又有交融，有依存，终于在漫长的历史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内聚力，造就了“华夏大一统情结”、这种“大一统”观念，三千年来浸润着华夏子孙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向心力，是一种回归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源泉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一种内容丰富，包括政治、经济和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往往更占重要地位。当然，这种“大一统”观念还源于人们对“治”的追求。

先秦时期，“祸乱辄应，杀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三，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也”。战国时代，天下四分五裂，干戈不息，无论是诸侯还是民众亟望“天下共主”、“太平无事”。有一次，魏襄王问孟子：“天下恶定乎？”（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答道：“定于一”。儒学是如此，其它各家也大体如此。秦始皇平定六国，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完成了统一大业，使海内“神灵一统”“令出于一”。汉代秦后，一统局面更趋巩固、扩大，民众也得以安居乐业，儒家也将“大一统”观念推向定格，以至汉代以后虽有动乱、分裂，但要求统一观念已深深地印在国人心中。“华夏文明”也由此而成为中华大地的统称，这一称号带来了华夏子孙的认同感，也使华夏子孙具有了无比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成为强大的精神支柱，使中华民族具有了难以比拟的民族凝聚力。

晋代的祖逖，宋代的岳飞、陆游，明代的郑成功都是因为祖国统一奋斗不息而永垂青史。陆游一生磋跎，在85岁高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示儿》：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清朝时期，土尔扈特部落跋涉万里，历尽千险，回归祖国，体现了千万身处异地他乡的华夏子孙的“归乡”情结，李鸿章、袁世凯等辈也因签订割地赔款之条约而遗臭万年。

不难设想，假如华夏文明没有“大一统”观念的情结，中国早就支离破碎，变成不知多少个国家了。华夏尽管遭受了无数苦难，乱世迭出，屡屡陷于分裂之境，然而，却没有土崩瓦解，这是华夏文明的骄傲。反观欧洲，分

《汉书·楚元王传》。

《资治通鉴》卷三。

裂的现状使其面临超级大国的控制而常如履薄冰，数代人杰呼吁统一，并为此奔走不怠，结果屡屡遭挫，《马斯特里赫条约》的签订总是险关重重。与此相比，华夏文明中的“统一”情结更值得珍惜了。

2. 凤之道德：华夏文明的品质

生潮涨了，生潮涨了，

死了的凤凰更生了。

我们生动，我们自由。

我们雄浑，我们悠久。

一切的一，悠久。

一的一切，悠久。

郭沫若先生的一首《凤凰涅槃》道出了中华民族的火凤凰品质，她在烈火与血的洗礼中新生、奋起，发出震耳欲聋的鸣声。

凤凰，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及文化肇端的象征出现在远古时代的传说和史书中。

有的学者认为，凤凰，就其初义而言，是一种自然物的生命化景象。凤鸟即风神，并非真实鸟类的化身。凰本字作皇，即太阳鸟。

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凤凰乃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由火、太阳和各种鸟复合成的部族图腾。所以，古书称：凤凰，火之精，生丹穴，状如鸡，五彩备举（又称五彩鸟），鸟中之王，雄曰凤，雌曰凰，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于四海之外，见则天下大安宁，故为“仁鸟”，祥瑞之禽。其形象大体是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鹳颈鸳思，燕颌鸡喙，人目鸭耳，鹤足鹰爪，龙文龟身。

据载，光武年间，辛缮隐居华阴，有大鸟至，高五尺，鸡头燕颌，蛇颈鱼尾，五色备举而多青。弘农太守听说后，召集百寮而问之，都以为是凤。太史令蔡衡道：“凡像凤者有五，多赤色者凤，多青色者鸾，多黄色者鹓，多紫色者牺，多白色者鹄。今此鸟多青，乃鸾。非凤也。”可见，只有红色的五彩鸟才是真正的凤鸟，俗称丹凤。

上述所言丹凤具有鸿雁、麒麟、蛇、鱼、龙、龟、燕、鸡等虫、鸟、兽等类图腾的复合特征，但其基本特征为两点：（1）凤鸟与太阳（火）不可分，俗谓“丹凤朝阳”；（2）凤鸟冠羽，多作三羽，古称“三毛”、“三苗”，尾羽拖地舒卷，多作三五羽，雉翎状或孔雀眼斑翎状。这两大特征，近 8000 年来始终保持，是凤鸟的最恒定的特征。

中国凤鸟的早期形象广泛见于远古文化，远比龙的形象具体、明确、丰富。有的学者将远古中国的凤鸟划分为三大区

南系凤鸟主要指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凤鸟，包括崧泽文化、大溪文化和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所遗存的原始凤鸟形象，为鹑鸡类。例如，在余姚河姆渡一期（距今 7000 年前）遗址中出土的骨匕柄上左右对称地各饰相连双鸟纹，鸟头上有细长的冠羽，状似凤鸟。双鸟头共连着一个身子，身子上载着光焰的太阳。该遗址还出土一件鸟形象牙雕，这只鸟有一个长长的近似扇形的肥大尾巴，双翅之间的鸟背上和尾巴的近根部刻着翎羽纹。更有趣的是，专家们在遗址中的另一象牙雕刻上面发现了异常精美的双凤朝阳纹。器中间为一个复线同心圆构成的火焰状的光芒四射的太阳，两边各刻一个相向昂首、拖着长长的带有眼斑翎羽尾的鸟纹。显然，这两件象牙雕刻上的凤鸟纹是同一鸟类的真实描绘，很可能原本就是长尾鸡或驯化后的家鸡。古文献所载之凤，或称鸡，或具有鸡的属性。《拾遗记》：“尧在位七十年，有抵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能博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孝子传》：“舜父夜卧，梦见一凤皇，

自名为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专家们据此断定，河姆渡一期遗址中的“凤鸣朝阳图”，当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丹凤朝阳图”，实际为“鸡鸣朝阳”。

东系凤鸟主要指以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凤鸟，包括连云港云台山一带的原始崖画，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所遗存的原始凤鸟形象，为鹰鸱类。例如，在连云港市郊的将军崖岩画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发现的凤鸟图像特征十分鲜明：两只毛角（耳），圆目，锐利的嘴，赫然是一只鸱鸟。与其成组排列的还有成三角形的三个太阳。此外还有大量高度抽象的凤鸟形象，或鸟喙与目构成或人凤合一，或为“𠂔”形符号。这是一个以鸱鹰为主的图腾崇拜王国。鹰鸱类猛禽古称鸱鸟，今天的云台山还能常常见到长耳鸱一类的鹰，极为凶猛，善于搏击。专家们认定，人凤合一中的人即太昊、少昊民族的祖先和领袖。古书记载：“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处璇官而夜织，或乘桴木而昼游……时有神童，容貌绝俗，称为白帝之子……降乎水际，与皇娥燕戏，奏便娟之乐，游漾忘归……帝子与皇娥泛于海上，……刻玉为鸱，置于表端，言鸱知四时之候。故《春秋传》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风，此之遗象也……及皇娥生少昊，号曰穷桑氏，一号金天氏。时有五凤，随五方之色，集于帝庭，因曰凤鸟氏。”而鸱古人认为与鹰是互变的，这就是说，鸱之子表端，具有图腾柱的性质。太白金星（白帝）自然不会以鸱为图腾，那么就当是皇娥为鸱图腾。看来历史的本相可能是以金星为图腾的氏族和以鸱为图腾的氏族联姻，诞生了少昊族，因此少昊族才兼有金星族和鸱鸟族的双重特征。据有关学者研究，当时鸱即布谷鸟，此鸟谷雨鸣，夏至止，民间以为候鸟。皇娥族将知四时之候的鸱鸟立于表端相风正是为了掌握物候节令的变化，以便农耕。

西系凤鸟主要是指黄河上游、中游地区为中心的凤鸟，并包括川、藏、云贵地区，包括大地湾一期文化（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巴蜀文化、滇越铜鼓文化等遗存的原始凤鸟形象，为骏鸟类天翟类。西系凤鸟的典型都是以太阳和黑色鸟类相复合，成为华夏文化中著名的“阳鸟”、“日中有鸟”、“骏鸟”。陕西华县柳子钰泉护村遗址中发现了清晰的阳鸟图：或太阳在鸟的双翅上方，鸟很像燕子，三足，剪式分尾；或鸟在日中，河南陕县庙底沟的凤鸟为骏鸟。骏鸟者，三足鸟，其形象为圆头、双翅、三足，正面飞翔形，位于日中。这是炎帝族的图腾。《山海经》曾载：“发鸱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鸟，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炎帝之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太石以埋于东海。”此即精卫填海的传说。专家们据此断定，炎帝族曾以一种类似乌鸦或即乌鸦的黑色鸟为原生图腾，当发明人工取火后，即以这种鸟为火或太阳的象征。图腾时代某一图腾族人死后，要回归祖先那里。女娃死后灵魂化作鸟状的精卫鸟，说明灵魂回归到了祖先——三足鸟那里。鸟而居日，自当不同于一般的鸟，故三足。看来，当初炎帝族人见到的可能是一只三足的乌鸦。因为此鸟颇异于其它鸟，因而有更大的神秘感，唤起了他们的崇拜感。正如蛇可能是一身二首，人可能是四臂二足或联体那样，鸟也完全可能生出三条腿。

至于北系——红山文化及东北地区诸远古文化中的凤鸟，因资料较少，暂不讨论。

除此之外，中国的古文字中也可见到大量的“凤”字。古文字所记之“凤”

有四种：一种以“风”为“凤”或以“凤”为“风”，像鹰鸟形；一种是凤为鹏；一种是凤为孔雀；一种是凤为雄鸡。为何古文字中的凤鸟形象多变呢？据专家推断，原因有二：（1）在古文字汇集过程中，不同区域里的以五彩鸟为主图腾崇拜的民族的标志逐渐融合成一个文化系统；（2）凤家族扩大后，按类组合的方式，相近者都被归为一体或归为一个大系了。

随着历史的演进，华夏大地诸部族交往与冲突的扩大，上述几大区系的凤鸟形象逐渐汇合成相近或统一的形象。东夷族尚黑，炎帝族尚赤，两大部族文化交流的结果便是尚黑与尚红二者的互渗，黑色鸟形中出现了“赤喙”、“朱目”、“赤足”、“赤尾”等。到商周时期，形成了以玄鸟为主体的凤鸟形象，其形象大体是“鹰头鸮耳，鹖喙鹖爪，弋状高冠，剪式分尾或雉羽三分孔雀翎状透地长尾，经汉唐、宋元的发展，到明清时代，凤的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并趋于定型，在商周的鹖鸟和汉唐的朱雀基础上，以鸡为原型，加以变化。嘴明显地鹰化，目光锐利，头爪更有力，长足蛇颈，肉状雄鸡冠，孔雀状三翎巨尾或五、七、九条雉状翎尾，或缠枝交连状尾，同时，鸳鸯雄者翼侧耸立状羽毛也附丽于凤的同等部位，成为我们今天所确认的凤凰形象。

可见，凤凰形象的演进贯穿于整个华夏文明的演进过程，是中国大地诸文化共同创造的象征。那么，为什么太阳与凤总是形影不离，甚至合为一体呢？在古人看来，火与太阳相通，炎帝以火烧荒开辟山野，在原始农业时代备享殊荣，而炎帝之所以称“炎”，乃因其发明人工取火，炎为火焰升腾状，故又称“燧人氏”（钻木取火之名），并形成了该族对火与太阳的崇拜。《山海经》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可见日与三足鸟的关系非常密切。有关专家根据古书的记载和传说认为，凤鸟见日而鸣，先民认为太阳引来了鸡，或鸡唤来了太阳，由此在先民心目中产生了凤与太阳不可分的联想，故构建了二者复合的图腾。流传至今的“丹凤朝阳”之最原始含义可能就是这样。

看来，凤在远古时代是阳性的象征，故谓之“阳鸟”，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成熟和天子与龙关系的固定化，凤由此而成了龙的配偶和附属品。晚清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欲把凤从属于龙的关系颠倒，有以凤代龙的意向，所以在龙凤布局上曾出现了凤引龙的现象（慈禧陵石雕有此布局）。不过，凤凰的喻义绝不止于此。对于广大民众来讲，更重要的是，凤鸟还象征着灵魂，不仅意味着灵魂可以升天，而且还意味着再生。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楚人物夔龙舟帛画，表现的就是灵魂在凤凰的导引下乘魂舟登天的情景。在古代，灵魂本身也属于阳性，《说文》曰：“魂，阳气也；魄，阴气也”，因此以凤来象征灵魂和再生。无独有偶，在古老的文明古国埃及也有着同样的传说。在一块彩陶版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只神鸟（我们且称为凤凰）正在将一根吸管插入被征服者的鼻子中，为他导引灵魂。而更为著名的则是“凤凰涅槃”的传说：神鸟菲尼克司（Phoenix，今译为凤凰），每隔五百年后便飞到一座神庙前在那里用芬芳的树枝和香料筑巢，然后点火自焚。熊熊烈火中，神鸟化为灰烬，而一只新凤凰很快从灰烬中复生飞出。郭沫若先生正是借此而写出了不朽名篇——《凤凰涅槃》：

在一片荒寂、阴晦凄凉的世界里，一对飞来飞去的凤凰为求得光明和新生而选择了火葬，并发出问天、问地、问海的吼声：“宇宙呀，宇宙，你为什么存在？你自从哪儿来？……那拥抱你的空间从哪儿来？……你的当中为

什么又有生命存在？”表现出与旧世界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和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凤凰燃起的熊熊烈火将把腐朽的旧世界连根焚毁，为了新世界、新生命的诞生，凤凰展示了坚定果敢的无畏精神。在诗人的心目中，中华民族就是火凤凰。《凤凰涅槃》是光明和新生的颂歌，象征着古老中华民族的觉醒，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品质。

可以说，无论是在先民的心目中还是在现代炎黄子孙的灵魂深处，凤凰都是华夏文明品质的象征。古人云：此鸟，首戴德，颈揭义，背负仁，心入信，翼挟义，足履正，尾系武。集德、义、信、仁、正、武于一身，映照出了华夏文明的品质精髓：

一是集民众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于一身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即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自觉意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居安思危的态度，其核心便是那种以民族利益为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和“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深邃眼光。它是一种深沉的民族感情，激励着华夏民族几千年来寻求幸福之路，始终贯穿在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之中。

春秋乱世，孔子以一介书生，驾车周游列国，劝说各国君主采取他的治国方略，屡败而不悔，最后不得不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慨叹，充分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君子忧道”的意识。屈原报国无门，眼看楚国的前途日趋暗淡，舍身投江，并发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悲叹。晋代刘琨的“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之语规劝晋元帝发愤图强。明朝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句更是妇孺皆知。近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的困难频频，无数的仁人志士更是以“天下为公”为信条，前赴后继，为华夏文明的复兴而抗争不息。

华夏文明的忧患意识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溯及远古神话之中：古神大禹与阿娇结婚的第四天便离家而去率领大家讨共工，治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经过13年，禹疏通了九川，平息了水患，实现了让民众安居乐业的志愿，可是自己的阿娇却因思夫心切，终日站在嵩高山下眺望，最后竟化为一块岩石。另一古神女蜗为了让子孙摆脱水难，生活幸福，苦心炼石补天，补呀，补呀，终于天补好了，地填平了，女蜗却因劳累过度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这种忧患意识集中体现了华夏文明中可贵的理性精神。它绝不是一种悲观主义的体现，而是积极进取的警钟。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进取，居安思危，国家、民族、个人的生命才会延续，贪图安逸，醉生梦死，只会自取灭亡，故唐代名臣魏征断言：“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

二是自强不息、舍身弘道的理想主义。

曾几何时，一些人声言：中国人没有奋发精神，只有奴隶性和保守性。他们眼中的中国人，一个个面黄肌瘦，目光呆滞，冷漠无情，心中死水一潭。其实，说这种话才是奴性的流露，是自卑的情结，是对国人精神的无知和对华夏传统的歪曲。

早在两千余年前，儒家的重要典籍《周易》就已道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名言。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健意味着主动性、能动性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努力向上。星移斗转，朝代变迁，而这一观点却始终是一切奋发有为之士的座右铭。唐朝有名的诗人才子骆宾王曾放言“终徇己以效能，靡因人而成事”，强调依靠自己的力

量，不能处处依赖他人。李白更是一派诗仙气势，写下了“青云当自致，何必求知音”的千古绝句。宋代欧阳修纵览历代人物沉浮，国事变幻，感慨万端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强者不自勉，或死而泯灭于无闻；弱者能自力，则必有称于后世”。

自强不息的精神突出反映在那些身处逆境而不坠青云之志的人物身上。苏秦头悬梁，锥刺骨，食不进，夜不寐，发奋苦读，终成一代谋士的形象，至今令人记忆犹新。越王勾践国破家亡，为死敌吴王养马扫圈，十年不忘国耻，刻骨铭心地牢记贬居石宅的情景，苦身劳心地“累薪而卧，悬胆而尝”，以磨练意志，终于灭掉了强敌。齐国孙臆虽肢体残毁，但坚韧不拔，策划的马陵道一战，不仅杀死了宿敌庞涓，而且使强大的魏国一蹶不振。西汉司马迁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宫刑，仍发愤著述，写下了千古名著《史记》。因参加“永祚革新”而遭放逐的刘禹锡写下了铮铮诗句：“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表达了真金不怕烈火的顽强精神。

而比自强不息精神更高一个境界的是舍身弘道的理想主义。

既然“仁”是中国传统中的最高道德准则，“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便成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内涵之一。华夏文明历来推崇那些“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尤其是赞美那些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人间正义，为了民众幸福而舍弃一切的仁人志士。例如，西汉之时，苏武奉命出使，被拘后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北海牧羊 19 年，“受尽难中难，心比铁石坚”，始终不忘报国，不辱使命，赢得了千秋之功。宋代名将岳飞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为信条，以“精忠报国”为己任，留下爱妻娇子，奋战沙场，“笑谈渴饮匈奴血，壮士饥餐胡虏肉”，抱定“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宏志，苦撑局面，慷慨赴义。明末文天祥不肯甘做“识时务”之俊杰，独力奋争，直至洒尽最后一滴血，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回肠荡气之句。还有遣散家人、自备棺木、冒死进谏的海瑞，等等。这些被鲁迅先生称为“中国脊梁”的人杰为华夏文明增添了耀目的光彩。

近代以来，舍身弘道的精神体现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甲午战争中，运送兵员的高升号战舰，不幸中途遭日舰偷袭下沉，舰上官兵宁愿葬身大海，也无一人喊降，令日军刮目而观。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悲愤异常，决心以自己的鲜血唤起千万民众的觉醒而拒绝出逃，毅然走上断头台。李大钊、方志敏、瞿秋白、杨靖宇、江雪琴、狼牙山五壮士为了心中的信念，董存瑞、黄继光，为了千万民众的幸福，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我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身为中文系主任，病体虚弱，极度清贫，却在一份《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毫不迟疑地署了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风亮节。及至当代，身患重症仍不忘民众饥苦的焦裕禄、体有绝症仍孜孜不倦追求的蒋筑英、面对歹徒而毫无惧色的徐洪刚，无不是华夏民族宝贵传统的杰出代表。正因如此，华夏民族才不像一些国家一旦失去民族独立，遇强敌入侵，便一溃千里，一蹶不振，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复兴起来，从而延续几千年。

从经典《周易大传》中，我们发现，传统中的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思想还含有“刚中”、“及时”、“通变”等引申的原则。《周易大传》中提出：

“能止健，大正也。”即强健而不妄行，不走极端，所谓“刚中”是也。“及时”即“与时偕行”，即自强不息与永恒变化的外在世界相一致，人的生活行动也随时间环境的变化而调整。“通变”则是“革新”。《周易大传》中有句名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不能再发展地步，是为“穷”，事物发展到极盛向反面变化，即为“变”。通过变革或革命，原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就会一变而为“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叫“通”。“通”则使事物永恒地发展下去，达到“久”的目的。正因如此，《周易大传》把“通天下之变”视为一条重要原则，它说：“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由于《周易大传》在古代一直被认为是孔子所作，其思想影响甚大，在铸造中华文明的基本品质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勿庸讳言，因种种原因，中国在近代未能充分发挥上述华夏文明的品质优势，致使国势积弱，如爱因斯坦所言：“真理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为强有力的性格的人重新刻勒，而且总是使之适应于雕塑家为之工作的那个时代的需要，如果这种真理不总是不断地重新创造出来，它就会完全被我们遗忘掉。”

三是勤劳俭朴、艰苦奋斗的谋生态度。

在不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下劳作的中华民族，以夙之精神为信条，形成了特有的勤劳俭朴、艰苦奋斗的谋生态度。

两千多年前，荀子用“良农不为水旱而不耕”之句说明了“身劳而必安，为之”的道理。勤劳被视为一切社会阶层均需培育的美德。儒家一直要求帝王官吏“无傲从康”，“无戏怠”，把沉溺于享乐比作吸食毒药，认为“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要求文人学子勤奋读书，称“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要求农民、工匠、商人日作不辍、勤于本业。“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勤有功，戏无益”等训诫早已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谋生态度了。

与勤劳同时备受赞扬的是节俭。《易经》曰：“甘节，吉。”“苦节，贞凶。”把乐于节俭当作避凶趋吉的一条重要原则。《左传》则把节俭还是奢侈当作判断君子与小人界线的重要标志，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司马迁在《史记》虽说过：“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也就是说，追求富裕，是人之本性，但反对因富而侈。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的《咏史》名句，则是对秦代以来诸帝治国实践的精辟总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时至今日，华夏文明中勤劳俭朴的奋斗精神仍在建设大庆、研制“两弹”等共和国的建设者身上得以弘扬，仍在海外华侨、华商的创业中得到光大。

3. 狮之力量：华夏文明的尊严

19世纪初，远在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对登门拜访的英国人说：“你们说可以用舰队来吓唬中国人，接着强迫中国官员遵守欧洲的礼节？真是疯了！如果你们想刺激一个具有两亿人口的民族拿起武器，你们真是考虑不周。”他对英国欲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喧嚣感到恼怒：“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它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将中国喻为“沉睡的雄狮”，并预言：“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从此，“睡狮”成为旧中国的代名词。拿破仑之所以将中国喻为“睡狮”是慑于中国的地大物博和千年文明积蓄起来的能量。

无独有偶，近代华夏的民族斗志也将中国视为“雄狮”，为其觉醒而不惜生命。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家陈天华将他的革命小说取名《狮子吼》，大声疾呼“扬狮旗，扫狼穴”，为共和而奋斗。1934年民族危亡时刻，满腔悲愤的画家徐悲鸿挥笔画了一幅《雄狮图》，题辞是：

新生命活跃起来！

实际上，威严的狮像早已成为中华文明中的一个重要表征，那衙门口的石狮和重要建筑前的狮雕处处可见。有趣的是，华夏大地并未有狮子产生。

《说文》无“狮”字。古代汉语中的两个狮子名称都是外来语：一个叫狼貌，公元前已出现，由梵文“僧伽”（Simha，狮子）转译而来；另一个是从古波斯语借入的 Ser，其汉语转写形式广泛通行，成为“狮”的通称。

专家们认定，出现于中国人视野中的狮子来自西域，因为古代西域是狮崇拜的流行区。在那里，狮子被涂上浓厚的神话色彩，享誉僧俗两界，成为神力和王权的象征。在印度，佛经赋予狮子以动物界至高无上的地位。《大集经》卷十说：“过去世有一狮子王，在深山窟常作是念：我是一切兽中之王，力能视护一切诸兽。”作为“兽中之王”，狮子一开始就成为护法之物。佛经中写道：“佛初生时，有五百狮子从雪山来，侍列门侧。”从此，佛陀说法坐狮子座，演法作狮子吼，成了“人中狮子”。波斯的狮崇拜也源远流长。据《隋书》卷83《波斯传》“王著金花冠，坐金狮子座。”古波斯的长篇史诗《王书》中的英雄们大多冠以“狮子”的雅号，如“狮子达斯坦”、“狮子苏赫拉布”之类。

反观中国文献，学者们却找不到中国产狮的确切记载。他们几乎众口一词，称狮从西域而来。唐代高僧慧琳说：“狻猊即狮子也，出西域”。明代科学家李时珍也说：“狮子出自西域诸国。”晚清学者文廷式论证更详：“狻猊即狮子，非中国兽也。三代之前若果有之，则诗、书记载必不称犀象而转遗狮子。”从历史上看，狮子是作为西域贡品被引入中国的。《后汉书》有最早的记录：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月氏国献狮子；二年，安息国献狮子。随后历代均有贡狮记录，直到清康熙17年（1678）葡萄牙人献非洲狮为止。因此，狮子虽非华夏之兽，但中国人却有不少直接观察的机会。历代文人都对狮子的形象有所描述，如《东观汉记》载曰：“狮子形如虎，正黄，有鬃髯，尾端茸毛大如斗。”马欢在《瀛涯胜览》中写道：“其狮子形如虎，黑黄无斑，头大口阔，尾尖毛多，黑长如纓，声吼如雷，诸兽见之，伏不敢起，乃兽中之王也。”等等。可见，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来自西域的狮子只是“异兽”或“奇兽”，并未将它作为“瑞兽”看待，甚至视为“狰狞之

兽”，所以在历代贡狮行为中多有遣返和却贡事件。北魏孝明帝正光末年，波斯国献来一头狮子，6年后广陵王即位，诏曰：“禽兽囚之，则违其性，宜放还山林。”狮子亦令送还本国。送狮子者以波斯道远，不可送达，遂在路上杀狮子而返。明朝年间，撒马儿罕苏丹两进狮子，都遭到拒绝。当时的礼部尚书倪岳言道：“臣观撒马儿罕所进狮子，乃夷狄之野兽，非中国之所宜蓄。留之于内，既非殿廷之美观；置之于外，亦非军伍之可用。且不免以彼无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财。”明孝宗嘉其言而却贡。李东阳为此奉诗一道：

万里狻猊初却贡，一时台省共腾欢。

极知圣学从心始，谁道忠言逆耳难！

汉代谩夸龙是马，隋家空信鸟为鸾。

非才敢作清朝颂，独和新诗写寸丹。

从物种的角度看，狮子在古代已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动物。然而，狮的形象却成为华夏文明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志。其因何在？这还要从佛教的影响谈起。佛教徒用佛画和佛像把佛经中的“狮子王”形象化。据《涅槃经》卷25的描述，佛教中的狮相如下：

方颊巨骨，身肉肥满，头大眼长，眉高而广，口鼻稷方，齿齐而利，吐赤白舌，双耳高上，修脊细腰，其腹不现，六牙长尾，鬃发光润，自知气力，牙爪锋芒，四足据地，安住岩穴，振尾出声。若有能具如是相者，当知真狮子王。文殊菩萨骑狮子，是佛教美术中常见的题材，它在唐代的两处胜迹中获得鲜明的表现。其一是五台山的菩萨堂院，“骑狮子像，满五间殿在，其狮子精灵，生骨俨然，有动步之势”。其二是甘肃榆林第25窟的壁画，绘文殊以威武雄壮的青狮为坐骑，旁有昆仑奴御卫。

佛像中的画狮与现实中的贡狮之间巨大的差异令古代中国人困惑不已。有的人指责画狮失真，有的人则怀疑贡狮为假狮。不过，最终随着佛教与中国文化的长期融汇，狮子的形象也日益中国化并形成了独特的风貌。首先，狮成为仅次于龙的灵兽。古代中国人以麟、凤、龟、龙为四灵，外来的狮子（主要是佛教中的狮子）被纳入龙之下的地位。如，唐代武则天登基后，铸造“颂德天枢”，即八棱铜柱。这座巨型“圣器”的灵物位置，龙居中，狮居侧。唐代官服的绣袍，“诸王则饰以盘龙及鹿”，“左右监门卫饰以对狮子”。这种尊卑分明的龙、狮袍文，一直沿用到清代：皇子、亲王用“团龙”图案，武官一、二品才穿狮子袍。其次，狮成为威而不怒的镇邪之兽。在佛教昌盛的南朝，印度风格的狮子形象，曾一度风行于华夏的造型艺术中，其代表作为吐舌石狮。按华夏文化的传统观念，舌是“灵根”，宜藏忌露。到了唐代，“吐赤白舌”的狮相越来越罕见，常见的造型只是张口露齿而已。这表明，狮子形象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化，并变为镇邪之兽。盛唐时代，威而不怒的镇邪狮雕十分流行，文士阎随侯为此作《镇座狮子赋》一首：

威慑百城，褰帷见之而增惧。

坐镇千里，伏猛无劳于武张。

有足不攫，若知其豢扰；

有齿不噬，更表于循良。

威狮由此而成为护卫之列。帝陵墓道、官府衙门、巨富门口，甚至河桥古道上都有石狮以镇之。到了清代，狮相已完成定型。郑绩在《梦幻居画学简明》一书中总结道：“狮为百兽长，故谓之狮。毛色有黄有青，头大尾长，钩爪锯牙，弭耳昂鼻，目光闪电，巨口须髯，蓬发冒面。尾上茸毛斗大如球，

周身毛发松猱如狗”。

中国化的狮子是芸芸众生喜闻乐见的形象，妇孺皆知，极大地丰富了华夏民俗的文化内容。举其要者，则有舞狮、糖狮和雪狮三项。狮子舞自唐代以来盛行于民间，遍及南北各省。当然，南北风俗各异，舞法也不尽相同。在清代粤东地区，“舞”与“武”结合，可说是中国舞狮艺术的奇葩。糖狮即狮子糖，北宋时已出现，到清代已风靡江南各地，造型精美、活灵活现。孔尚任有诗赞曰：“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朱桔黄橙香者椽，蔗仙糖狮如茨比”。雪狮即以雪塑狮，属北国一大奇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载：“是月（十二月）虽无节序，而豪贵之家，遇雪即开筵，塑雪狮，装雪灯。”

狮子形象的中国化，从移植、归化到创新，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既保存了狮子威武的气派，又赋予它祥和的面貌，到了近代，威狮便成了中华民族觉醒的象征，这既源自仁人志士对华夏文明力量的自信又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镇邪之灵，还由于对佛教“狮子吼”的借用。据说，狮子的吼声能够震撼天地，扫荡邪恶，具有无比的威力。陈天华的《狮子吼》和徐悲鸿的《雄狮图》都是凄风苦雨年代的救亡之作，表达了炎黄子孙的拳拳之心。

总的看来，狮，在华夏文明中已逐渐演化为力量的象征、仪表的尊严，体现了一种不畏邪恶、勇于进取的精神和无穷无尽的潜能。

一个文明的魅力和生命力不仅在于它有多么丰富的精神境界，也不仅在于它具有多么高尚的道德品性，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是否具有驾驭自然和社会的智慧，是否具有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力量。华夏文明正因具有狮之气魄、狮之力量，才被拿破仑喻为“睡狮”，也才为中国仁人志士视为“雄狮”。

这种气魄和力量主要体现在华夏文明在与自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成就上：

一是沉思人文与社会诸相的性灵之光。

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是中华智慧的深层激流。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意味着，肯定现实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要求个性自由，相信人力的伟大，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主张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生。而正当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处于宗教迷雾笼罩下的时候，中国成为唯一的例外；它没有把宗教意识奉为民族的意识形态，非宗教的具有浓厚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儒家文化占据着无与伦比的地位。尽管殷商时代，用人谋事多依龟筮，但两周之后，风气大变，“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一语道出殷周在宗教方面的差异。孔子更是把人们的活动领域集中干人文方面，而把鬼神生死之类的宗教问题置之度外。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后来许多思想家，也大都采取了与此相类似的立场，十分看重现世之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们看来，“天地之性人为贵”，是域中“四大”之一，“三才”之一。人有道德，是“天地之德”，人有知觉，是“天地之心”，人能凭借道德和智慧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并发出“人定胜天”的千古狮子吼。对此，西方思想家给予极高的肯定和评论。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称赞孔子“卓然不以先知自诩，绝不认为自己受神的启

《礼记·丧礼》。

《论语·雍也》。

示，他根本不传播新的宗教，不求助于魔力”。他的书房中挂着孔子画像，下题诗一首：

子所言者唯理性，实乃贤者非先知，天下不惑心则明，国人世人皆笃信。

另一杰出启蒙人士孟德斯鸠深有同感，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称，“孔教否认灵魂不死”。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则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理性”。

唯物而辩证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智慧的深沉底蕴。可以说，华夏文明中的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之基础便是中国文化中的唯物而辩证的传统。先有《管子》的“天不变其常”，荀子的“天行有常”；后有王充的“天道自然”，张载的“凡有皆象，凡象皆气”，“理皆在物”；再后有工夫之“天下惟器”，王充的《论死》、范缜的《神灭论》。值得注意的是，该传统并不是中华智慧大河中的涓涓细流，而是有着惊天动地之势的巨浪。先秦时期，“天行有常”的唯物主义是推毁殷周宗教观念的巨斧，汉代王充的“天道自然”之论是清算西汉儒学中有神论的烈药。范缜的“神灭论”则把皇帝麾下的御用神论者驳得丢盔卸甲。有趣的是与西方唯心主义与有神论相结论的传统相反，中国学者中往往是唯心主义中也具有无神论思想。从孔子到老庄，从杨雄到两程，从朱熹到王守仁都是这两种观念的执著者。这样的唯心主义属于观念论，与将精神视为宇宙本原的西方唯心主义有显著不同，这主要是由于受“天道自然”观念的影响所致。而辩证的思维则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传统。《周易大传》、《老子》、杨雄、朱熹、王夫之都相继提出了精湛而丰富的辩证思维命题，而孔、孟、荀、庄等诸子的思想中更是具有大量的辩证因素：整体、过程的观点和对立统一的思维、内在矛盾运行的首要位置、本质与现象的统一，等等，无不成为世界哲学史上的精辟之论。

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是中华智慧的情感结晶，前有神奇瑰丽的远古神话，并从中孕育出浪漫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发端于《楚辞》，奠基于《诗经》。后有像《左传》、《史记》这样传神肖物、文辞优美的历史散文，又有像《庄子》这样汪洋恣肆、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哲理散文：既有豪达奔放的“诗仙”李白，又有深沉凝重的“诗圣”杜甫；既有《西游记》这样神幻迷奇的神话小说，又有《三国演义》这样构思宏伟的历史小说，还有《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登摹人情世态之极的世情小说。就特点而言，华夏之文学艺术，既有讲究“风骨”、“追求阳刚之美”的雄健之美，又有气韵生动、温柔平和的阴柔之美，中国人审美意识的这种二元心态正是支配华夏文明创造、追求、奋斗的潜意识。

二是培栽科学技术的智慧之果。

华夏文明绵延数千年，决不仅仅是靠高尚的品质、优美的诗文而博取世人的赞誉，而是还具有使世界文明获得动力的科学技术发明等物质力，这也是中华狮之力量的所在。

坦普尔在《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中声言：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发明创造，一半以上源于中国。中国在现代农业、航运、石油、气象、音乐、十进制数学、纸币、高级火箭、枪炮、载人飞行、蒸汽机设计等领域

《伏尔泰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31页。

《伏尔泰全集》7卷，第330—331页。

创造了 100 个世界第一。可见，华夏民族绝不是一个只沉溺于遐思，观宇宙天象而不务正业的神秘主义者，而是一个注重于现实，深知技术于社会之利的现实主义者。

中华民族改造自然的气魄，令许多人赞叹不已。以农业为本的古代中国创造了首屈一指的农业生产技术，成为世界上栽培植物起源最早和最大的中心之一，在世界 666 种栽培作物中有 136 种是中国人民培育成功的。人们利用江河湖泊、地面水、井泉地下水以及降雨降雪，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不同的自然形势，兴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设施，其中，既有储水的塘、堰，又有防水的堤、坝，排水的沟、渠。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仍为当今世界水利灌溉工程的奇迹。据专家研究，就整个技术水平而言，西方 18 世纪以后就超过中国，而其中水利工程技术却是 19 世纪后期甚至是 20 世纪才领先中国的。³⁵

华夏民族在长期与疾病创伤的斗争实践中，创造了光彩夺目的中医治疗经验与理论著作。《黄帝内经》、《神农本草》、《金匱要略》等经典名著成为人类医学宝库的精华。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全身麻醉手术并取得成功的华佗，发明了“五禽之戏”体育健身法，很有实用价值。晋代葛洪在他的著作中有关恙虫病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于 1878 年的记载早 1000 多年。宋代钱乙撰《小儿药证直诀》为世界现有最早的儿科专著，比意大利医生巴格拉儿德的《儿科集》早 351 年。

此外，18 世纪以前的中国，自然科学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说，中华民族的“才能肯定不逊于其它民族”，他们在历史上的发明创造，“令人眼花缭乱”，人们熟知的四大发明，以其杰出的贡献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东汉张衡创制了世界上第一个地震测量仪，他所做的“水运浑天仪”也是世界最早的机械计时器。公元 31 年，中国在传统的金属冶炼、铸造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由杜诗创制的冶炼“水排”鼓风技术，比欧洲早 1200 年。两汉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固体脱碳钢、炒钢、百炼钢、灌钢等新炼钢法，也是世界冶金史上的辉煌篇章。此间，最著名的科学家祖冲之，算得圆周率为： $3.1415926 < \pi < 3.1415927$ ，并以 $\frac{355}{113}$ 为圆周“密率”，比

德国的奥托取得这个值早 1100 多年。他精干历法，创大明历，引用虞喜发现的岁差现象，定出交点月日为 27.21223 日，同现代技术测定的相比只差十万分之一。唐代天文学家张遂率领的科学考察队，于 725 年开始到河南地区观测天文自然现象，实测滑县、开封、许昌、汝南一线纬度，得出子午线一度长度，是中国天文学上的创举。西方最早实测子午线是在 814 年伊斯兰教徒阿尔曼孟在美索不达米亚地方举行，比中国晚了 90 年。宋代数学家秦九韶的“正负形术”（即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比英国数学家霍纳所创造的类似方法早 500 年。元代科学家郭守敬于 1280 年制成举世闻名的《授时历》，精确推算出每年为 365.2425 日，这个历法在华夏大地使用 364 年，成为世界古历法中使用最长的一部，比罗马教皇十三世在 1582 年颁行的《格里高历》早 301 年。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其精心记录的游记中，对中国西南地区石炭岩地貌考察，比欧洲学者爱李倍尔早 130 年，对碳岩地貌分类比欧洲早 200 多年。

如果这些仍不足以说明古代中华技术文明的辉煌，那么就再请看一看中国科学技术历史之最吧！

长城是世界建筑之最，公元前 7 世纪始建，全长 6000 多公里。

汉字汉语是世界语言之最，已有 8000 多年的历史，约有全球四分之一强的人使用。

公元前 725 年制成的机械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钟表。

宋代苏颂发明的天文钟，能自动报告昼夜的时刻和日出日落，是世界最早的天文钟。

公元前 770 年流通的西周“铲形”钱币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硬币。

公元前 119 年出现，公元 7 世纪在唐代发行，公元 910 年在宋代广为流通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纸币。

公元 6 世纪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世界上最早、最系统的农书。

海上指南针在战国时已成型，领先欧洲 1000 年。

西汉造纸术领先欧洲 1300 年。

公元 7 世纪雕版印刷术比 1450 年德国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领先 400 年。

唐代浆轮船，宋代的水密隔舱海船分别领先西方 800、1000 年。

西周铸铁技术比 14 世纪欧洲领先 2000 年。

战国炼钢技术、6 世纪的灌钢法比 18 世纪欧洲柑锅炼钢法早 1200—2000 年。

《周礼·考工记》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合金规模，首创胆水炼铜法，开创世界水法冶金技术。

公元前 5 世纪墨子的光学实验、几何学和光学理论体系早于欧几里得 100 多年。

世界最早的炼丹术、人工合成化合物见于公元 2 世纪的《周易参同契》。

明代朱载堉十二平均律比欧洲的梅尔早 50 年。

世界最早的古天象记录是春秋时的日食记录、哈雷彗星记录、战国时的恒星表。

张衡相风铜鸟风仪比 12 世纪欧洲的侯风鸡早 800 年。

公元前 2 世纪天平式湿度计测仪比欧洲早 1600 年。2000 年前的《汜胜之书》提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遗传、育种学。

公元 9 世纪的西夏铜炮，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

世界上最早的音乐体系和乐器体系，是湖北出土的战国编钟。

公元 11 世纪出现于北宋的钻探技术比欧美早 800 年。

北宋时代沈括的地磁理论体系比西方早 400 年。

如此不厌其烦的罗列并非阿 Q 式的自我陶醉，而是向世人说明，近代以前的中国确实是世界文明的骄子，在科技领域领先同时代的西方 500 年，甚至 1000 年，华夏文明是世界上第一次产业革命科技革命的杰出代表，是黄土文明、大河文明、太平洋文明的结合体，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明中心，这就是古代中国之所以扬威世界的真正力量之源。如果说欧美文明是由于技术的先进而取得了全球性的优势，古代华夏文明同样也是由于其技术知识的丰富和杰出而放射出强烈的光芒。

三是求实创新和勤奋开放的科技意识。

就知识的追求、技术的创新而言，古代中国显示了泱泱大国、宏大文明的心态。孔子始终反对学生对知识的死记硬背，比较重“行”，即学以致用，因而，华夏智慧的一大特点在于始终贴近生活，善于围绕国计民生，提出和解决社会生产和生活面临的现实的科学技术问题。所以，中国古代虽然也关心世界的本原问题，但终不像古希腊人那样保持长久的玄想，而是在现实生

产领域内执著不已。农业是中国国民的主要生计，古代农书达 376 种，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多得多，天文学是与农业最为密切的学科，从而造就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达，特别是历法的发达。水是农业的生命之脉，中国水利工程建设显示了高超的科学性和创造性，留下了令世人赞叹不已的治水遗迹。20 年代初，一位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曾声称，中国没有科学，他说：“中国的哲学家们没有科学的确实性的需要，所以所要知道的是他们自己。同样的情形下，哲学家们也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所要征服的也是他们自己”，这一论断，对古代中国来说，不免显得独断和无知，因为华夏文明中除了极少数以先哲自称的哲学家漠视社会之外，许多有志之士，有眼光之人，都以征服自然为己任、潜心发掘着自己的智慧。

华夏文明的科技智慧之所以震烁古今，还在于古代科学家的创新意识，他们不满足于现成的结论和现实的束缚，永无止境地奋争着、钻研着，天文学家张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以前，张衡对古代的天文学曾苦心钻研，但他不满足千古人已有的结论，并决心创造一套更完善的浑天学说。历时数载，力排众议，终于获得成功，写下了《灵宪》、《浑天仪图》两部重要的天文著作，提出了天圆说和宇宙无限论，从而实现了对前人的超越。蔡伦造纸也是如此，蔡氏前 100 年，中国就有了造纸术，但较粗糙，蔡伦细心观察，苦心沉思，反复实践，终于造成了较为定型实用的纸张。此后 2000 年中，中国人并未停留在蔡伦的功绩上，而是不断创新，不断求善，纸的质量也就随之持续提高。

不畏劳苦、勇于开拓是中国科技精英的又一宝贵品质。张衡为追求成功，花去了一生的时间，天天不间断。明代李时珍为修《本草纲目》，肩背药箱，跋涉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历时 27 年，终成巨著。徐霞客 22 岁时便离家远行、别妻离子去考察地势地貌，以罕见的勇气和意识征服了荒无人烟的孤独之苦，恶劣地势的启然之险，迫盗绝粮的生命之难，疾病缠身的肉体之痛，三十年如一日，直至积劳成疾，溘然去世，年仅 56 岁。这样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中国的科学家之所以能奋进不止，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信念：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容不得半点虚假与取巧，而且是不应受世俗功名所累的清苦学问。

值得注意的是，华夏文明不像某些人渲染的那样，是一个全然封闭型的文明，它的科学技术成就往往与开放程度有关，它注重引进“技术”，并将其与中国本土科技成果相融汇，从而结成璀璨之花。华夏文明首先从最近的邻邦吸收养分，从魏晋南北朝时起，我国就开始翻译印度的科学著作，据《隋书》记载，翻译印度的数学、天文学、医学书名著达 19 种，约 150 卷之多。到了唐代则有更多的印度医学家和天文学家来华，当时的司天监中就有印度天文学家。开元 6 年翻译的印度“九执历”把正弦函数表介绍到我国来。印度的医学如金针挑白内障的技术，也是唐代传到我国的。宋元时期，一些阿拉伯文的数学著作传入我国。1267 年，阿拉伯人扎马鲁丁带来了数学、天文学书籍共 23 种，其中包括托勒密的天文著作，他还创造了一些天文仪器，其中包括地球仪。及至 17—18 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敏感地觉察到了世界发展新潮流的涌动，不仅强烈欢迎西学西法，而且身体力行，希望能融合中西，推动科学发展，其代表人物便是徐光启、李之藻、冯应京、张燾等。那时的中国统治者，心态也远比后世的官僚正常，见到外国的先进事物，首先不是疑惧，不是用“古已有之”一类循辞安慰自

己，而是采取“拿来主义”。明成祖派兵镇压安南叛乱，交锋中发现安南造的神机枪性能比明军的射击火器优越，便立即拿来仿制，装备出一支“神机营”。也许因为祖宗开例，明朝一代都不怕引进外国的兵工技术。16世纪晚期，荷兰战舰闯入我国海域，这批海盗的红头发、红胡须引人惊异，于是他们获得了“红毛番”或“红毛夷”的雅号，但明朝文武官员对于红毛大船上装备的新型重炮更感兴趣，天启二年，明朝政府从战场上捡回一门，开始仿制，命名“红夷大炮”，还封之为“大将军”。

人类生存的规律是：越是强壮越自信，越不怕对外开放，不怕引进技术。古代的“拿来主义”向近世的“封闭主义”过渡是种种原因所致，但其中最重要的是随着华夏文明向顶峰发展，其中的情急因素越来越起到了重要作用，猛狮变成了睡狮，这将在以后章节中加以探讨。于此，笔者只是力图说明，封闭心态并不是华夏文明的固有心态，中国曾经有过广博的胸怀和开放的意识。

龙凤是炎黄子孙始祖的图腾，它的形成高度概括了华夏文明形成、融合的历史，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血肉联系的整体性和凝聚力，代表着华夏文明的核心和品质。狮，尽管是域外文化的象征，但历经两千多年的演化已成为华夏文明之力量和威仪的标志。正是从上述意义讲，龙、凤、狮是华夏文明的三条根。以龙的精神为风帆，以凤的品质为动力，以狮的力量为载体的华夏文明，自诞生之日起便以雄阔之势向四周、向远方延伸着它的光芒，从而为人类大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二章延伸的缘起：梦幻与现实

一个文明的生命力之体现在于它向外延伸的力度和深度，华夏文明在古代世界中以其强劲的气势，持久的力度向外延伸着、延伸着，不断地与延伸之处的文明相融合，影响着环球文明的风貌。

1. 蛮荒与天堂：延伸的双重梦幻

几千年来，在古代中国人眼中，华夏文明被视为最伟大、最杰出的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外在的世界只不过是夷狄之国，蛮荒之界。与此并行不悖的是，古代中国人又把周围的海天远方视为神仙之境，天堂之地，东有蓬莱仙阁，西有极乐世界。形成如此二元心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华地大物博，地理位置独特。自远古以来，中国文化始终是东亚大陆最先进的文化。周围的民族或是远远落后于华夏文明或是华夏文明的附属体，不能不使中国人存有文化上的优越感，而且由于地理位置的独特性更加深了这一观念。华夏文明的西北被一种复杂的高山网所围住，东部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因此中华文明很难与其他各地的文明中心相互直接交往，对遥远的外界知之甚少，从而使“我族中心，他为夷狄”的观念特别根深蒂固。另一方面，由于古代技术条件的制约，华夏人很少或很难经常远涉重洋，西跃群山，于是对遥远的外层世界抱有一种神秘感，各种神话与传说因此而产生。

就在这种双重梦幻的心理意识引导下，中国人开始了华夏文明的向外延伸之行。

蛮荒意识和延伸蛮荒意识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自认为中国属于世界中心，是世界上最重要最伟大的国家，这集中体现在中国这个国家称号的取名上。中华祖先建国于黄河流域，其四方均为蛮、夷、戎、狄，以为自己的国家居于中央，中天下而立，故称中国，亦谓中华。这显然是因位势孤立而地理知识贫乏使然。今天，即使小学生也知道世界有四大洋、七大洲，中国只是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中的一个，位于东方。而在古代，我们的祖先根本不可能懂得世界上还有其他许多国家，更不可能懂得地球是圆的。加之地势闭塞，我们的祖先便不切实际地自以为位居世界之中，产生了君临意识，深信自己的国家比其他国家都重要，都伟大，尤其是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后，形成了广土众民的泱泱大国。版图之辽阔，人口之众多，为周围邻国望尘莫及，更使中国人认为日月所照，皆为臣妾。为此，中华帝国通过种种措施建立起对外关系中的纳贡体系。要求他国君主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进而按约朝贡并与中国互市。尽管汉宋时期曾出现了多次和约现象，但未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人的“中国”观念。中世纪时，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把世界地图带到中国来，中国的士大夫看到自己的国家位于该图稍为偏西之处，不在正中，且只占上面一点小面积，便大为恼火，斥之为诞妄。

第二层含义是自认为中华文化优于四邻。当时中国人自称华夏，异民族则被称为蛮、夷、戎、狄，而华夏文化也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所谓“蛮”，是南方的一种蛇，属禽兽类。所谓“夷”，古字即今之“尸”，与“死”相通。以“夷”称外族，即称他们为鬼。事实上，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的心目中，四周文化比较落后，简贱礼义，无有上下，怀鸟鲁之心，难养易败，尚未进入“人之道”，因而不是视之为鬼，就是视之为禽兽。著名史学家费正清先生指出：“中国人的坚定信念是天子大智大德的神奇影响不仅恩泽海内，而且超越国界，进而惠及天下万民（天下万民被视为中华帝国体系的组成部分），给予他们秩序与和平。”因此，自秦汉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便以地大物博炫耀于四夷。汉武帝时，“天子每巡狩海上，悉从外国客，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又厚富焉……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

遍观各包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以中国地大物博征服四夷之心，从此成为历代统治者的一种外交手段。

在“我族中心，万邦蛮荒”的意识驱动下，中国人把古典文明的触须延伸到了尽可能远的地方，展开了推动文化传播的行动。

行动一：开拓海上事业。

长期以来，人们有一个误解，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宇航海民族，是黄土文明的集大成者，但远见卓识的李约瑟先生指出：“中国人一直被称为非航海民族，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们的独创性本身表现在航海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发现的中国内河船只的数目几乎难以令人置信；中国的海军在1100—1450年间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实际上，华夏文明微露曙光之时，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创造东方的海洋文化了。

我国东南沿海的各民族，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在近海活动并相互交往。历史上著名的大禹治水，说明当时中国人对海洋对水的认识及控制能力已有提高，《吕氏春秋》一书记载“禹敷至交趾之国”（今越南北部）。到夏朝建立之时，中国的航海事业已有较大发展，海上航行的重要工具如篷、桅、帆等已然具备，并有文字记载。《竹书纪年》记夏朝国王后芒“东狩于海，获大鱼”，表现了我国南方民族海上捕鱼事业的发达。

殷商代夏以后，华夏海上事业有了惊人的进步。现代从河南殷墟中挖掘出了一些东海和南太平洋的海贝、海螺和鲸骨，说明殷人已有大规模的海上活动。《诗经·商颂》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汤的祖先，“截”是治理的意思。这句话合起来是说相土在海外治理着一块土地。这里的“海外”大概是指近海的岛屿。到了商代后期，商船已能运行。今天文莱海礁发现了大批商代文物，而且有诸多证据表明，殷人曾远航至美洲。1977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拉斯维德半岛附近的浅海里，发现了两只圆柱形、一只三角形的石制船锚。后又在该州麦德西诺岬附近发现了一只有孔的圆形石锚。几年之间，先后发现了11块石锚等大石块。美国的一些考古学家断言，这是中国商朝海船到达美洲留下的遗物。据美国科学机构和我国北京大学地质系对石锚岩样标本的鉴定，石锚灰岩石与南中国海及台湾中东部灰岩一致，而不存在于北美太平洋沿岸。

到西周、春秋战国之时，中国人的海上行动更趋活跃。齐国于公元前567年征服莱夷，统一掌握了山东半岛周围的海上事业。春秋后期南方的吴、越、楚都有水军，海战已成为争霸的重要手段，越王勾践凭借海军，北上大会诸侯于徐（今山东滕州市）成为东部沿海的霸主。战国期间，北方的燕国曾出兵日本。《海内北径》一书言“南倭、北倭属燕”，可作为燕人东征的字据。

秦汉以后，华夏中国的海上事业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期。西汉自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统治时期，国力空前强盛，公元前138年，汉王朝派兵援助东瓯（今温州一带）抗击闽越，公元前111—公元前110年，武帝又以大规模的海上行动灭掉了东越、百越，在今越南北部设高趾、九真、日南三郡，公元前109年、公元前108年，武帝又派陆海军剪灭卫氏朝鲜，在朝鲜北部设郡，并迫使日本朝贡。《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米献见云。”此后至公元57年，“倭奴国”遣使向东汉

光武帝朝贡。光武帝赐刻文为“汉倭奴国王”的金印。在西南方面，汉代船只已航行至印度、斯里兰卡，东南航至新加坡、马六甲海峡、苏门答腊岛。可以说，汉代中国人已远涉重洋，建立了自己的海上事业。三国时代，魏军东征，占领乐浪（平壤一带）、带方（今汉城一带）、袭吴国（今宁波以西一带）；吴军东渡海峡，进台湾，占海南，远航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印尼、印度、阿富汗等国，华夏文明一时声名远播。

随后的唐宋元三朝，中国的海上事业步入了历史新阶段。618年唐朝建立后，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力发展航海事业和对外贸易，与亚、非许多国家的港口有航海联系。唐朝船只大规模地遨游于印度洋、阿拉伯海和非洲东海岸。由于海上往来事务繁忙，唐朝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专门处理涉外事务。隋唐跨海远征，虽不成功，却未动摇其海上王国的地位。唐船被认为是最强大、最强劲的先进海上运输工具。李约瑟为此惊叹不已：“中国人在海上称雄。”

继之而起的宋代远洋航海事业达到了古典文明之顶峰，印度洋、太平洋，东起日本，南到印尼，西至东非，到处都可见到庞大的中国船队。而当时中国人对世界航海史的最大贡献是将指南针作为导航仪器，应用在航海事业中。宋人朱或在《萍洲可谈》一书中谈到1099—1102年间的海船航行情形时，曾有“一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的记载。至此，中国的远航及航海技术已位居世界之冠。李约瑟对此的评价是，它把“原始航海时代推到终点”、“预示着计量航海时代的来临”。到元代，中国的航海船只已遍及亚、非、澳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明代发展成为中国航海事业的鼎盛时代。李约瑟博士指出：“在它的黄金时代，约西元1420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它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都出色，乃至所有欧洲国家民族合起来，都可能不是他的对手，在永乐皇朝时代，它有3800艘船，其中包括1350艘巡船，1350艘属于卫、所或寨的战船，以南京附近新江口为基地的主力船队的400艘大船，以及400艘运粮的漕船。此外，还有250艘远洋宝船，每艘宝船上的人数，平均由西元1403年的450人，增至西元1431年的690人以上。在最大的大船上，必然超过了1000人。另外还有300艘商船作为辅助队，及一大堆小船作为传令船及警船”。

而这一黄金时代的标志便是郑和下西洋。

郑和，原姓马，为云南昆阳州回族世家，信奉伊斯兰教，也曾皈依佛教，因朱棣夺权时从政有功，永乐初赐姓郑，并擢升为“内宫监大监”，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因其又名三保，世传为“三保太监”。从1405年（永乐三年）至1433年（宣德8年），郑和先后七次奉旨远航西洋，写下了人类航海史上光辉的一页，显示了中国航海技术的高超水平。

从郑和船队的规模和船舶的性能看，在当时世界上名列前茅。郑和船队通常拥有60余艘大型宝船，人员27000余人，大型宝船长44尺，宽18丈，载重量在千吨以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巨舶。而且郑和船队是由多种不同用途的船只组成的。如：宝船、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另外，郑和船队复杂而严密的组织，也反映了中国当时非凡的航海水平。七次远航的官兵大体分成指挥、航海技术、军事和后勤四个系统，这使下西洋的船队有

了组织保证，从而克服了远洋航行中的千难万险，圆满地完成了航行。

从郑和航队的航海技术看，该船队因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的利用风帆航行的技术，把利用东南亚以至印度洋北部、阿拉伯海季风区的季风作为航行的主要动力，航行中，船队还综合使用了物标导航、罗经指向、天文定位、计程、计时等技术，把世界航海技术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

从郑和船队的航行距离和所经国家看，该船队前后航行数万里，横渡两洋，跨越两洲，先后到达今天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六甲、马来西亚、苏门答腊、爪哇、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波斯湾口、阿拉伯半岛、索马里、肯尼亚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开辟了由中国横渡印度洋到达波斯湾、阿拉伯海湾、红海以及东南非洲的新航路，而且在各个海域和内海分别开辟了许多新航线，从而把亚、非广大海域联成一气，对亚非多层次文明的沟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郑和远航之后，亚非诸国纷纷派使节来华，有时一次达 1000 多人，增进了彼此的友谊，在历史上留下佳话。

在 15 世纪那个时代，郑和同他所率领的数万华夏儿女，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洋中拼搏，“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前后近 30 年，把自己的青春、精力甚至生命，都献给了浩瀚无际的海洋，献给了华夏民族的航海事业，他们的活动，创造了人类征服海洋历史上的空前壮举，但因西方新航线的开辟，欧洲殖民者时代即将到来，再加上中国特定制度的局限，郑和远航竟成为东方封建制度威武雄壮的绝唱，在我国和整个东方航海史上后无来者。

由此可见，龙的子孙曾经创始了人类海洋文明，将自身的文明之光远播海外。

行动二：建树武功，确立大陆强国地位：

相比之下，近世以前的中华历代帝王十分重视陆上武功的拓展、极力维护大陆强国的地位，从而使华夏文明不仅形成了文明统一体，而且将文明之光远播大陆四隅及近邻。

回顾华夏文明晨曦微露之时，夏朝只是一个范围有限的星星之火，殷人以青铜武器和灵活战车的技术优势，替代了夏朝，华夏文明从此步入全面创建时期。正是在殷商时代，华夏文明的星星之火开始燎原，举世闻名的华夏文明初具形态。

西周、春秋、战国时代虽是华夏文明的百花争艳、社会出现剧烈变革之时，但因分散的诸侯林立状态，华夏文明不具有整合、外延的特点。

秦始皇以其强劲的武功，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领主封建制，创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及社会变革，使华夏文明完成了空前的整合并重新开始了向外延伸的态势。

秦帝首先凭借其地势之优和武力之强，利用华夏大地诸侯之分，不断地扩大其属地，并于前 221 年灭掉所有诸侯，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后又统一度量衡和货币，修筑了驿道，将统治伸展到大部分边远地区，将地域向南扩展到现在的中越边界，西北则击退游牧部落。西汉初期，汉帝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无为之策，但到了武帝时，中国又以强国的姿态出现在大陆上。平定了南方蛮族地区的骚乱，遣张骞两通西域，并为了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史称“河西四镇”。

公元前 60 年，汉宣帝又在地处西域中心的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和任命了西域都护，统辖乌孙、康居等 36 国。从此，中国对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的主权得以巩固。

西汉末年，匈奴势力重新崛起，通往西域的道路一度受阻，东汉政府经过长时间的力量积蓄后，在班超的主持下，出兵打败匈奴，重新确立了汉朝在西域的宗主权，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同时，班超作为西域都护，还派出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力图与闻名已久的西方大帝国建立陆上联系。甘英到达叙利亚一带，欲渡海西进，但安息（今伊朗一带）西界船人劝阻道：大海辽阔，顺风须三个月才能到达彼岸，如果遇上逆风，往往需要两年的时间。甘英一时犹豫不决，当他得知属下思乡心切便决定返回中土，致使此次横跨欧亚大陆的长征中途夭折。当时最重要的两大帝国的直接接触从此中断。今天，史学家们发现，安息人之所以谎骗甘英，是因为担心中国和罗马帝国一旦直接取得联系，会舍弃以安息商人作中介的贸易桥梁。

匈奴是我国北方一支强悍的游牧民族，它的游荡给世界历史的发展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冲垮了罗马帝国，导致了西欧混乱之世的到来，但却为汉朝所败并被远远赶走。除了物力丰富之外，汉朝人还拥有一种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式武器，那就是他们发明的弩。弩上装有钩了弦的机，一扳扳机，矢便飞射而出。比起普通的弓，弩的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由于这种武器和汉朝积极向外发展的政策，致使汉朝时的中国已开始成为欧亚大陆东部的强大国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已陷于战乱，中国同外界来往虽未中断，但显得散乱、无力，蛮族进入中原北部。

取隋王朝而代之的唐王朝建立后，华夏文明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时期。

大唐帝国通过一系列的斗争，它的疆域已超过了汉朝。唐朝在中亚建立中国的宗主权，控制了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以及今天的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区。南部的西藏，西北的蒙古，东北的蛮族，东方的朝鲜，也相继承认了中国的宗主权。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认为，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中东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帝国能与之匹敌，他还断言，中国人的胜利并不能完全归于其优越的物质力量，而且还与中国人的策略密切相关，一个东突厥人以其自身的体会阐述了他们与大唐帝国的关系特点，他说：

“送来黄金、白银、小米和丝绸的中国人，总喜欢使用奉承话，随意处置其日渐减少的财富。他们用奉承话和……财富来引诱住在遥远地区的民族，使这些民族更接近他们……由于显要人物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融洽，由于中国人阴险、狡猾，诡计多端，由于兄弟们乐意接受于他们彼此问不利的劝告，引起显要人物和人民之间的冲突，中国人使突厥人古老的王国土崩瓦解，使守法的可汗灭亡。贵族的儿子成为中国人的农奴，纯洁的女儿变成了奴隶。”

尽管言论中极尽诬蔑之词，却反映了中国人在同异族斗争过程中的智慧与计谋。

由于对外政策的积极，国力的强盛，唐太宗的态度也显得比较开明。他说：“从远古以来，人们总是以中华为尊贵，以外国、外族为卑贱，我却一

视同仁。”所以，他尤其热心于中外文化交流，唐使足迹因此而遍及欧亚大陆的中东部和太平洋西岸诸国。

宋代虽极重对外交往，但文明的延展能力衰弱，在与异族的争锋中屡屡战败，最后终为蒙古人所灭，入主中原的元帝国空前庞大，东起太平洋，西至多瑙河、波罗的海、地中海，南至印度洋，北达北冰洋，都归入元帝国的势力范围。明朝代之后，中国的政治势力虽趋强盛，但在外延方面显得软弱，在与北方蛮族的交往中一度丢掉了皇帝。

清朝早期，中国的文明延展之力得以重建，清政府以强劲的实力和万民望归的心愿，重开统一大业，华夏疆土空前扩大。向南，通过削藩、战争，完全控制了云南蛮地；向东，统一了台湾；向东南，控制了南海诸岛；西北征服了新疆与蒙古族上层，巩固了对天山北路的统治；向西南，制服西藏分裂势力，确立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权，结果使中华地域西达葱岭和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至太平洋，南到南沙群岛。当时生活在疆域辽阔的、统一国家内部的民族成员有汉、满、蒙、回、藏、维吾尔、壮、苗、彝、布依、黎、高山、侗、土家、白、纳西、哈尼、佤、拉祜、水、景颇、土、达斡尔、羌、布朗、瑶、哈萨克、傣、塔吉克、乌兹别克、怒、鄂伦春、赫哲、朝鲜等共计五十几个民族。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相互交往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构建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

地域扩张，国家统一的同时，清初统治者也实行了比较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乾隆 22 年（1757 年）前，清政府开放厦门、宁波、云台山和广州四口岸为通商口岸。明末以汤若望、龙华民为首的西方耶稣会士，也得到皇帝的信任。但雍正之后，清政府开始推行闭关政策，其原因有种种，但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封建制度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到清初已是衰落之极，气息奄奄，民族的创新能力大受限制，再加上传统的“夷夏大防”观念的偏见，清政府自是色厉内荏，反对挑战，只好消极待之，以致酿成千古之罪。

纵观华夏文明几千年的延伸史，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华夏文明决不是一种封闭型的文明，清政府的闭关政策绝不是华夏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天堂观念与延伸有趣的是，中国人在视四邻为蛮荒之地的同时，又往往把难以到达的域外看作仙岛环绕的神秘之境，摆脱人间枷锁的世外桃源。在他们的心目中，茫茫的东海大洋中有着神秘的存在，有着鲜花永存的自由天地，险崖重重的西山丛岭中孕含着神圣之域，富庶之源。所以，中国人的域外天堂观念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种含意：

第一种含意是神秘的圣仙境界。在古人眼里，那遥远而神秘的远方似乎存在着另一个世界——仙人之界。《海外西经》记载：“诸天之野，沃民是处，鸾鸟是歌，凤凰自舞。凤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战国末期，燕齐滨海地区出现了海上三仙山的传说，称：蓬莱仙山“物禽尽白，黄金银为宫阙。”《列子·汤问》又载：“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中有五山焉……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汉末形成的仙界“十洲三岛”无一不是遥远的四方之地。“十洲”即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分别位于东海、北海、南海、西海中。三岛即三仙山：蓬莱、方丈、瀛洲，尽在离岸数十万里的东海之中。佛教传入华夏之后，西方便成了芸芸佛信徒想往的圣地，激起了人们无限的遐思、幻想，因而也流传下了许许多多的传说，在他们的心目中，西方是无病无痛的极乐世界，是无灾无难的丰庶之乡，是如来佛居住的

圣贤之地。

第二种含意是自由的世外桃源。尽管国人有恋土恋乡之深情，有地大丰饶的自豪感，而每当中原战乱迭起，灾难蔓延之机，便把遥远的茫茫四野，尤其是大洋深处的远方大陆视为可以重寻幸福的世外桃源。在他们的心目中，在那里，他们可以获得自由，摆脱专制帝国贪官的盘剥。据说，殷末军事统帅攸侯喜和徐方领袖摩且王，率大批殷民东渡逃亡美洲，在墨西哥湾创建奥尔梅克文明。秦末数以万计的民众越岭北逃，以躲避秦王苛政，以致引出了建造长城之举。公元前1世纪，众多的汉民奔往亚美尼亚，等等，都表明了如此心态。当然，自汉代以降，随着中外交通的日趋便利，人们对外界有了一定的认识，许多有识之士已然意识到了外界世界的丰富性，由此引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化经济交流活动。

正是在以上两种心态的驱使下，中国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海外探险之举，将华夏文明之光延伸至中土之外。此类海外探险，择其要者，有以下五类行动：

行动一：夸父族远涉重洋，创业美洲。

“夸父逐日”的传说已流传三千年，妇孺皆知。《山海经·大荒北经》载称：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经几代专家研究后认为，这是炎帝子孙东迁美洲寻找汤谷扶桑的探险过程的记录。

据有关专家研究，夸父族，是华夏文明史早期的一个部落，因族人身材较大，称大人、大汉、夸父（取大于父之意）。夸父人曾是东夷蚩尤的联盟者，参与了蚩尤与黄帝的大战，与蚩尤具有相同的崇拜信仰。

大约在迄今6000—5500年间，炎黄蚩尤战争以蚩尤战败而告终，夸父族首领阵亡，其族人不得不四处流浪，有的逃向中原。有的退往西北，正是后一支退到了所谓“成都载天”之地，专家认为，“成都载天”之山即在大泽之南，而大泽就是贝加尔湖，这里因靠近北极，气候寒冷，冬天日短，夸父人难以忍受。他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远离了祖先和太阳神炎帝之故，为了求得祖先的庇护，为了寻求阳光的普照，他们便逐日而行，不断南行，准备直达炎帝居住地——禺谷。当他们到达河渭地区后，冬季已然过去，天渐渐变暖，该地水少干热，他们又无法忍受缺水的折磨，便又退至今贝加尔湖一带，即所谓《山海经》所载的“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一部分族人死于途中，也即是《山海经》中的“未致，道渴而死”，几百年后，他们已渐渐适应了北方地区的生活条件，不再南北流徙，而且他们也终于确信太阳升起的东方才是真正的乐土，从此便踏上了东迁美洲的征程。依据古书记载和大量的考古材料，专家们认定，夸父族最初的路线可能是一部人沿着黑龙江东行，到出海口，登库页岛，大部分人则沿海岸线向东北进发，直到堪察加半岛，因此地气候适宜，且有温泉，便定居下来。但有少数人认为，这里并不是他们心目中的汤谷，而在更远的东方，于是在冬季越过冰封的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然后又顺大陆西岸南行，至中美洲。在这里，他们发现，此地之势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汤谷，于是便定居

下来，名“夏洲之国”，从此，珥蛇、操蛇、舞蛇、践蛇等炎帝族习俗便在美洲传播开来，成为“印地安人”的习俗。华夏文明由此成为开发美洲的最古老文明。

行动二：徐福东海求仙，创始扶桑文明。

徐福东渡扶桑，既是历史悠久的民间传说，又明明确确地见诸于《史记》、《后汉书》之中。

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驾临渤海之滨，齐人徐福上书，称东海中有三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洲，有仙人居之，可求长生不老之药。他说：“臣在海中遇到一位神仙，神仙问他：‘你是始皇帝的使者吗’，臣答道：‘是’，‘你有什么要求？’臣道：‘希望能赐予延年益寿之药’，神仙道：‘你们秦王的礼太薄，只能让你观看而不能给你’，然后带臣南行至蓬莱山，看到了灵芝砌成的宫殿，有使者肤如青铜，身为龙形，光芒照人，于是，臣忙再次问道：‘应该用多少礼来献给神仙呢？’海神道：‘需要童男童女及百工之事才能得到。’”秦始皇信以为真，大为高兴，立刻拨给徐福 3000 童男童女，还带走五谷、百工及大批生产工具，一行共 6000 人，结果，徐福一去不归，在日本岛居住下来，至死未见什么仙丹灵药，却无意中把华夏文明延伸到了东洋之上。据有关人士推测，日本人古称“倭人”，即小个子，但是，日本的相扑选手却异常高大威猛，很可能是西秦人之后。到 1982 年，在我国江苏省发现了徐福村，证明徐福东渡日本确有其事。1991 年 8 月 3 日，日本政府为纪念徐福这位带来先进文明的先人，在佐贺县诸畜町建立了“徐福之路乡园”还成立了“徐福会”。后又在日本九州佐贺县境内发现了大量公元前 3 世纪直至公元后 3 世纪的文物遗迹，日本学者确定：这是中国人带去的华夏文明遗物。

行动三：玄奘西天取经，将华夏文明传入西南。

玄奘（596—664 年），姓陈名缙，河南缙氏（偃师）人，自幼立志精研佛学，对佛家圣地天竺向往已久，627 年 8 月，决定西去取经，以求深研瑜伽经典，洞悉佛学底蕴，一瞻佛祖风采，西出玉门关，只身长征。他取道伊吾、高昌，出葱岭后沿热海（伊塞克湖）南行，历尽艰险，饱尽风霜，虽无《西游记》中的各类妖魔缠绕，但却经受了数不尽的狮虎威胁，恶劣气候、野蛮部落惊扰之难，最后终于到达印度和巴基斯坦。他游学 19 年，走遍了五天竺 30 多国。

玄奘在中天竺先后巡访了佛教六大圣地，先到室罗代悉国看望了释迦常住的逝多林给孤独园，又到尼泊尔境内塔雷的释迦诞生地迦毗罗卫国拜谒，然后回到印度、尼泊尔交界处的释迦涅槃之地拘尸那揭罗国瞻仰圣迹。如此心愿了结之后，玄奘沿恒河东行来到佛教史上非常著名的古国摩揭陀国首都华氏城（今巴特那），接着，又南渡恒河去看望伽耶城释迦成道的菩提树，菩提树依然枝壮叶茂，而金刚座早已无存。玄奘在菩提树下巡礼 10 天，被当时的佛教艺术中心那烂陀寺长老慕名迎去，从此便在该寺潜心于深研佛经，师从戒贤学习《瑜伽师地论》、《大乘起信论》，因慧识过人，戒贤使其主持那烂陀寺的讲座，给全寺僧众讲授《摄大乘论》和《唯识决择论》。玄奘用印度语讲述经义，言论精辟，逻辑明晰，听者踊跃，名扬全印。与此同时，他发表了重要论文《会宗论》，融瑜伽、中观两派于一体，旁征博引，立论新颖而深刻，受到中天竺国戒日王的重视。玄奘还向戒日王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别提到唐乐大典《秦王破阵乐》，称颂唐太宗的帝风，宣

扬了华夏文明的精神。642年，戒日王为宣扬大乘佛教，特为玄奘在曲女城召开第六次无遮大会，参加者有印度十八国的国王和各派僧侣六、七千人，玄奘作主讲人，并把所著的《破恶见论》按印度习惯挂在会场门口，征求答辩，大会持续了18天，该文竟无人敢予驳难，玄奘获胜，受到僧众拥戴，获得了极高的荣誉。

645年，玄奘启程回国，带回了梵文佛经657个，他在长安慈恩寺安顿下来，一面创教，一面译经，20年间译出佛经75部，共计1335卷，这些佛经后来在印度大部分失传，中文译文成了研究古代印度哲学、文学及科学的重要文献。此外，玄奘还把老子的《道德经》译成梵文送往印度。646年7月，根据李世民的旨意，玄奘还将这次经历的各国各地区的风土、人情、物产、信仰和历史传说等，撰写成《大唐西域记》12卷，成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印度半岛等国的历史、地理和中西交通的宝贵资料。

在尽心翻译佛经的同时，玄奘还创立了法相宗，又称唯识宗，该宗所奉经典是玄奘依据天竺十大论师的著作融会贯通而成的《成唯识论》，宣扬“万法唯识”、“心外无法”，在长安、洛阳风行三四十年。

值得一提的是，继玄奘之后，我国另一位佛教大师义净，于671年搭波斯船从广州出发，由海路赴印度，先在那烂陀寺钻研佛学10年，后又到室利佛逝、末罗瑜搜罗并抄写佛经，滞留南洋又十年。先后周游30余国，历时25年，共带回梵文经书400部。回国后，义净在洛阳翻译佛经12年，译出佛经230卷，还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了南亚很多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状况。这些记载成为研究7世纪时印度、巴基斯坦和南洋各国的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

行动四：向域外派使团、旅行家，加强文明间的了解和交往。

域外究竟是什么样子，如何同域外之人打交道是使团出国、旅行家远游的深层动机。从汉代到清代，究竟有多少人到国外考察旅行，已无法统计，但仅据史籍记载的情况看，到海外出使、旅行的人员可谓多矣。

从汉王朝开始，西汉有张骞、甘父使团的两次西域之行，第一次有100多人，经过天水、陇西、临洮、焉支山，越过葱岭，到达大宛、大月氏一带；第二次有300多人，到过乌孙地区。在乌孙，张骞曾派员到了大夏、安息、身毒等地，张骞的两次西行，开辟了中外文明交流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东汉时，汉王朝又派班超等再到西域，且班超还派随员甘英出使大秦。甘英虽未到大秦，但他也在条支、安息等地留下了历史的足印。

魏晋时期到海外旅行的典型人物是法显等高僧。法显等沿丝绸之路旅行，14年游历了中亚、印度等30余国。此后，智猛、昙纂、竺道等15人，法勇、僧猛、昙朗等25人，宋云、惠生等人相继西游，作探险之行。

到唐代，中国人更是源源不断地赴向域外，探求外在世界的文明之迹。除了著名的玄奘、义净因佛而游者，唐朝还派出了一个官方外交使团，由王玄策率领，经尼泊尔到达印度。这一使团所走的路不是丝绸之路，而是通称为“吐蕃道”的西行陆路，该线使到达中南亚的路程缩短了许多。高僧鉴真为传佛学，六渡日本，终获成功。唐代著名学者杜佑之侄杜环在恒逻斯战役中被俘，后游历了西亚、北非，了解到了许多特有的异国风情。

元代是华夏疆域最为宽广的朝代，也是古代华夏人由注重陆路旅行转为注重海陆旅行的一个转折期。元初有周达观的印度支那半岛之行，元末有汪大渊的非洲、澳洲之行。后者一行自泉州出发，经海南岛、越南、马六甲、

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横渡地中海至西北非的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折向西南直到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再到澳洲，从澳洲到加里曼丹岛，最后经菲律宾群岛回到泉州。

此类旅行到明清后，虽有郑和下西洋的声势，但私人旅行已基本中断，直到 19 世纪中叶以后才重新开始。

行动五：华人移民域外，寻求自由、富庶的梦想。

为了摆脱恶劣的环境、为了寻求富庶的乐园、为了逃避暴君的苛政，从远古以来，华夏人便不间断地向域外迁移，正是这种迁移将华夏文明延伸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太平洋诸岛和太平洋的彼岸。

因地形之势，中国大陆的移民最早多是向东、东南流动。远古时期，一支部落开始由大陆北方向东方漂移，据专家推测，这很可能是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后裔，他们经过黄海平原，到达今天日本的九州地区，并由此而分散开来。这些移民集团当中的一部分，停留在广阔的黄海平原上。随着今后海底探查工作的发展，我们将会从黄海海底找回那一片失去的世界。

考古学证据表明，日本的旧石器文化，在发展序列、类型和加工技术等 方面同中国颇有共性。日本最早的旧石器加工技术与类型均类同于周口店第 15 地点。

与此同时，一支中国大陆南部的部落经过当时的陆桥南下菲律宾群岛，抵达印尼群岛，后有一部分南迁澳大利亚，成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祖先。

原始社会末期，部落之间的争夺战争加剧，一些部族为避免战祸纷纷外迁，或移向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然后，有的经千岛群岛、堪察加半岛、阿留申群岛登上美洲大陆，或顺黑潮暖流和北太平洋群岛，直接越海东航，抵达美洲。考古学家已就此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们发现，最早起源于我国华北地区，以楔形与锥形石核为主要特征的“华北细石器传统”，从东亚、东北亚经白令陆桥，到达北美西北部，然后向南一直分布到美国的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大约北纬 46 地带。这一分布区域构成了一个马蹄形的文化带。有的学者称之为“北太平洋地区马蹄形文化带”。

而越海南下的远古移民是经台湾或印度支那半岛、马来群岛、南下菲律宾和印尼，甚或向更遥远的太平洋诸岛挺进。目前，考古学界发现了大量的可以佐证这一思路的材料。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大陆远古时代的先民，以大无畏的精神，披风斗浪，向太平洋深处延伸，逐渐蔓延及太平洋诸岛及太平洋的彼岸，形成了以华夏文明为底蕴的新文明。

汉唐以后，华人外迁的规模虽有减少之势，但却始终并未中断过，有的是沿海民族在汉族的压迫下被迫出海，有的是经商而不归者，有的则是因在国内战败而逃亡的反叛者。例如，唐末黄巢起义后，南方诸省许多人为避战乱，纷纷跨海南迁，大批华人移居印度尼西亚，一些唐代僧侣，如运期和贞固弟子僧伽提婆等因恋居印度尼西亚而未归中土。又据爪哇史料记载，公元 924 年，有一艘中国的大沙船在爪哇三宝瓏附近因事故沉没，船客们纷纷逃上岸去，献宝物于当地的直葛王，要求定居该地。一些专家认为，这是华人定居爪哇之始。宋代以后，随着中外交通的拓展，经济交往的活跃，华人向

南洋移民更是司空见惯,而且这些华人开始移植华夏文明。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一书中说:“蒲甘国有诸葛武侯庙”,蒲甘在今缅甸。该庙无疑是侨居该地的华人所造。一位学者在评论马来半岛上的三佛齐人变质而沦为海盗时说:“当时三佛齐的人民将农业和正当的工作留给中国人去做,到后来中国人也腐化了,于是这一大帝国的都城都变成海盗的渊藪。”可见,到宋代时,已有许多中国人久居印尼了。

元代周达观、汪大渊两位著名旅行家的游记更进一步证明了东南亚华侨历史的悠久:

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写道:“今亦渐有焚者,往往皆唐人之遗种也”,他还写道:“国人交易,皆妇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先纳一妇人者,兼亦利其买卖故也……往往土人最朴,见唐人颇加敬畏,呼之为佛,见则伏地顶礼。近亦有脱骗欺负唐人,由去人多故也。”也就是说,当地人曾经对中国人比较尊重,后来由于华人越来越多,良莠不一,态度才有所转变,而且华人常常与当地入通婚,成家立业,定居下来。

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同样记载了大量关于东南亚华人的行踪。在谈到马来半岛的情形时,他写道:“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捎”他还记录了婆罗洲勾栏山(今格兰岛)的所见所闻:“国初,军出征阁婆,遭风于山下,辄损舟,一舟幸免,唯存钉灰,见其山多木,故于其地造舟一十余艘……有病率百余人不能去者,遂留山中,今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之。”

明代江浙闽广等省,土地兼并渐趋激烈,赋税日重,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流离失所,一部分人只好远涉重洋,到海外去寻求立身的“世外桃源”。

明初,在三佛齐一地的闽粤人已达千余名,在爪哇的杜板、新村、苏鲁马益和美洛居、文莱、吕宋等地也有不少华人定居。1375年,黄森屏等许多中国人来到婆罗洲,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传为佳话。随着郑和七下西洋,中国人去南洋地区的日益增多,到明代后期,在南洋各地的华侨约有十万人以上。而且,自明代以来,后来去东南亚的华人已聚居成固定的村落,并且已散播到诸岛各地,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成分之一。据《瀛涯胜览·爪哇国》记载:“于杜板投东行半日许,至新村,番名曰革儿昔,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人来此创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明史·外国传》对此也有记载:“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裔,贩者至数十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即使在西方人占据这些岛屿后,越海而来的华人仍是有增无减。16世纪,葡萄牙所绘马六甲地图,到处标有“中国村”、“中国溪”、“中国山”等,把该地视为中华帝国的殖民范围。

澳大利亚大约是南洋华人所达到的最远地区。在澳大利亚北部史威司岛的一棵大树上,发现刻有许多中国文字,并有1798年(嘉庆3年)记号。

随着西方人对太平洋的征服以及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华人移民的浪潮已减弱,而且性质有所改变,许多人是被西方人掳去的。但无论如何,几千年来的华人移民运动将华夏文明的种子撒向世界各地,尤其是太平洋周围,奠定了太平洋文化圈的根基。

转引自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13—1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126页。

2. 器物传播：延伸的表层

正是在上述华夏子孙向外延伸的活动中，华夏文明的创造成果源源不断地输往域外，而最为常见的输出物便是华夏文明的器物文明。

器物文明基本上可分为三种类型：物质产品、生产技术和科学发明。

我们来看一看器物文明的传播概况：

首先是物质产品。

物质产品是文明接触过程中最容易交流的中介物。因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往往表现在物质产品的交流和影响上。

就华夏文明的物质产品而言，最早向外传播的大概可追溯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上。商文明是以青铜器的冶铸达到极盛为特征的青铜文化，以中原为中心，向四邻地区扩散，北至今日的俄罗斯地区，南抵今日中越边陲。考古学家在外贝加尔湖地区发现的卡拉苏克文化遗物中有青铜弯刀和半圆形装饰品被认为是由河套地区传播过去的。叶尼塞河流域的卡拉苏克文化遗址则出土了更多从商文化传播过来的器物产品，如青铜小刀、青铜矛等等。米努辛斯克族人随葬品中的刀和戈剑等器物，被认为是北迁的民族从文明中心带去的。

中国是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度，而丝绸也恰恰是华夏文明最早大规模的外销商品。自商代以来，华夏丝织物便成批成批地运往域外。考古学者在阿尔泰地区卡童河、伯莱利河、乌尔苏河和乌拉干河流域的贵族墓穴中，发现了一批中国早期的丝织品，采用嫩股细丝线织成的平纹织物，有小块的，也有整幅铺盖在皮肤上的。这一墓葬的时间约在公元前五世纪，正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地处西方的希腊，在公元前五世纪把中国的丝绸视为上层人物才能享用的服装面料。许多这一时期的希腊神雕像都身穿透明的长袍，衣褶雅丽，质料柔软，均系丝织面料，更为典型的是克里米亚半岛库尔·奥巴出土的公元前三世纪希腊绘画《波利斯的裁判》，将希腊女神身上穿着的纤细衣料表现得十分完美，透明的丝质罗纱将女神乳房、脐眼显露无遗。由此可以断定，这种衣料只能是中国人制造的，决非野蚕丝织成。到两汉时，中国与域外的丝绸贸易已成为举世瞩目的大宗贸易。起自敦煌、西至地中海滨安提阿克或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丝绸之路因此而得名。当时中国丝绸的最大主顾是罗马帝国。有趣的是，中国的丝绸大都由外国商人运出，很少由中国人自己出外贩运。西方史学家普林尼说：“赛里斯人（希腊人对中国的称号）并不等待售货，贸易都由外商来成交。”《史记》也曾写道，西北外国使节成批到来，络绎不绝。宋元以后，中国的丝绸织物已风行世界各地，欧洲、中亚、南亚、东南亚、东非等地区纷纷将中国丝绸视为必需之日用品。

华夏文明的外传物质产品除了以丝绸占大宗外，桃、杏、梨等果树也相继传到域外。据估计，桃、杏很可能是由丝绸商人来华经商时带出去的，时间约在公元前2—1世纪，向西先传入波斯，由波斯再传到亚美尼亚，直到希腊、罗马等国，向南则传入印度，印度人称桃为“中国果”，称梨为“中国王子”。

中医在华夏文明中历史悠久，所以，中国的药材也早已传到了波斯和阿拉伯诸国，其中主要有大黄、黄连、无患子、玫瑰、土茯苓、生姜、肉桂等。此外，中国的不少矿产品也传到国外。比如，波斯人就把从中国传入的白铜称为“中国铜”，称由中国传入的磁土为“中国土”。

唐代以后，中国陶瓷业进入大发展时期，瓷器开始外传，并很快就被列为外销的大宗货物，以致古代西方人不仅称中国为“丝国”，还称中国为“瓷国”。古代中亚地区地理学家伊本·法基在《地理志》（903年）中将中国丝、中国武器和中国灯并列为世界三大名牌货。当时，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所经的中亚、西亚和埃及，还是太平洋、印度洋上的海上航线，都有唐瓷的踪影。日本陶瓷学者元上次男把通往西亚的海路称为“陶瓷之路”。到宋朝，华夏瓷器不但已遍布整个亚洲和非洲东部沿海，而且也进入了地中海和西欧，宋瓷碎片就曾在意大利出土。力克东征十字军的埃及阿尤布苏丹萨拉丁素以富有青瓷名噪一时，欧洲人正是在与他的作战过程中才知道了中国的瓷器，因此欧洲人称古瓷为萨拉顿（Saladan）。

郑和下西洋带出去的物品更多，不下数十种，其中主要有销金、嘍丝、刺绣、湖丝、雨伞、琉璃瓦、麝香、烧珠、樟脑、橘、米、谷、银、金、铁鼎等，使所到各国都进一步认识到华夏文明的丰富物产和智慧。

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是，在华夏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我国的物质产品更多的是由迁移到海外的华人或到域外做生意的商人带出去的。尤其以东南亚最为典型。据载，明朝时，每年都有约三四十艘船只从马尼拉开往中国，返航时带回大量的中国产品，其中常常是耕畜、耕具、铁器、铅、锡、青铜、绸缎、蓝布等。

其次是生产技术。

考古学证据表明，中亚、中东欧地区的青铜制造技术明显受到了华夏文明中心的影响。比如，公元前10—前5世纪的西方哈尔希塔文化中的青铜剑，就有双环柄首、半月形护手、或环形柄首、椭圆护手，都与当地传统产品不同，显得别具一格，无疑受到了我国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流行剑式的影响。

随着中外交通线路的拓展，华夏文明的技术成果更源源不断地向外传播开会，有力地促进了接受国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

我们先看一看蚕桑技术的传播。既然丝绸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外销产品，世界各地的人早就对蚕桑技术渴望至极。早在公元前11世纪，该项技术就传入了朝鲜，这大概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直到公元3世纪，日本人也开始养蚕。据日本史书记载，当时，一个名叫功满王的中国人，自称是秦始皇的第11世孙，从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来到日本，称可养蚕，深受当地官民欢迎。从此，日本便出现了蚕业。公元283年，功满王的儿子融通王又率大批子民从百济东渡日本并定居下来，成为日本岛上的丝织王。因为他们的优质丝品主要供日本宫廷及贵族享用，故被仁德天皇赐姓“秦公”。5世纪后期，日本天皇任命秦公家族的“秦公酒”掌管国家的蚕桑生产，致使蚕桑业得到极大发展。至于蚕丝技术的西传则显得较晚，尽管中国丝绸贸易早已开始。据说，公元6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为了学到中国的养蚕技术，专程派人到中国来学习，这些人不仅掌握了技术，而且还将一些放在桑叶上孵化的蚕卵藏在竹杖中成功地从中国偷运回国。于是叙利亚地区便出现了自己的丝绸工业，并很快就传到希腊及地中海西部地区导致了中西丝绸之路上的生意的暂时萧条。但是这并不能阻挡中国本土丝绸外销生意的扩大，因为只有中国才能织成令外国称叹不已的最上等丝品。

制瓷技术也是古代华夏传到国外的重要技术之一。制瓷技术于918年首先传入朝鲜半岛，后又传入日本，引进该项技术的日本人加藤四郎因此而被

日本人尊为“陶祖”。11世纪，制瓷技术西传到波斯、再传入阿拉伯、土耳其和埃及，15世纪中期以后又传到意大利。然而，直到18世纪欧洲才制造出真正的瓷器。

漆器制作技术是另一项最早传到国外的重要生产技术成果。漆器与瓷器一样，也是我国古代工艺中的一项重要发明。漆器的特点是坚固耐用，外表色泽光艳，体质轻巧，适合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早在夏代，我国便发明了漆器技术，到秦汉时已有相当高的水准，并开始向国外传播。朝鲜、日本、泰国、印度、波斯及阿拉伯等国都先后成为中国漆器创作技术的继承者。16世纪，该项技术传入欧洲，引起一股仿制中国漆器热潮。

此外，中国的冶铁和穿井技术也在古代的外部世界得以广泛传播。据载，铸铁技术是由汉代一行逃亡的士兵传给了大宛、康居和安息，后自此传入俄国。公元前2世纪，现在乌兹别克境内的费尔干纳人从中国那里学会了铸铁技术，后西传至俄国。中国的穿井开渠的技术在当时的古典文明中当属先进之列。公元前103年，李广利率军攻打大宛时发现，穿井引水的技术早已传入大宛。当时，李广利对他的部下说：“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他所说秦人，自然是来自内地的汉人，而且很可能这些汉人就是当年赵破奴出击匈奴而不得班师的20000名骑兵中的战士。与此同时，苏联境内伊塞克湖东岸的古遗址中，也发现了汉代灌溉渠道。

纵观华夏文明历史，古代中国不愧是文明的中心，它的文明成果哺育了许许多多与华夏文明相互交往的文明。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在公元后的14世纪中，中国则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向欧亚大陆其它地区传播了许多发明”。

我们可以看一看近代以前中西方技术交流的具体成果。

我们先看由中国传入西方的技术：

方板链泵	距今15世纪
轮式碾磨机	距今13世纪
水力轮式碾磨机	距今9世纪
水力冶金鼓风机械	距今11世纪
叶片式旋转风机	距今14世纪
活塞风箱	距今14世纪
拉式纺机	距今4世纪
独轮小车	距今9—10世纪
车式碾磨机	距今12世纪有
效耕畜、胸章、轭	距今6—8世纪
石弓	距今13世纪
风筝	距今12世纪
直升飞机螺旋桨	距今14世纪
活动连环画转筒	距今10世纪
深钻孔法	距今11世纪
铸铁	距今10—12世纪
卡丹式悬架	距今8—9世纪
平圆拱桥	距今7世纪

铁索桥	距今 10—13 世纪
运河河闸闸门	距今 7—17 世纪
航海制图法	距今 10 世纪
船尾舵	距今 4 世纪
瓷器	距今 11—13 世纪
等等.....	

而西方传入中国的技术仅有 4 种：

螺钉	距今 14 世纪
流体压力泵	距今 18 世纪
曲轴	距今 3 世纪
钟表装置	距今 3 世纪

（以上资料参见《全球通史：1500 以前的世界》第 336—338 页）

可见，古代华夏文明确实不愧为古代的技术革新中心，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第三是科学发明。

作为古代（特别是中世纪）世界技术发明的中心，中国不仅以先进的技术领导着环球文明的潮流，而且更重要的是华夏文化中科学发明的外传，对人类社会历史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其中造纸术、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四大发明的外传更是意义重大。世界知名哲学家、启蒙思想家培根断言，这些发明产生的影响，“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发明中的重大成果，1957 年，在西安郊外灞桥西汉墓出土的灞桥纸，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该墓年代不晚于公元前 87 年。到公元 105 年，蔡伦在总结前人造纸工艺的基础上，确立了植物纤维纸制作的新工艺，增加了树皮、渔网等新原料，创造性的生产出了便于书写的麻类纤维纸和皮纸。造纸术首先传到了近邻朝鲜，然后由一个名叫昙菴的朝鲜和尚，在公元 610 年传到了日本。与此同时，西亚一带也开始接受了这一新发明，公元 3 世纪，当纸张在楼兰一带使用时，大约由于波斯商人或粟特商人的传播，伊拉克早已知道中国造纸术了。印度次大陆是最早知晓中国造纸术的国家之一，当唐僧义净访印时，印度各地早已普遍使用故纸揩便，那么造纸术从哪条路线最早传入印度次大陆呢？学者们认为，克什米尔是这种技术传播的中心，该地靠近和阗，处于中印古代交通线的要冲。克什米尔得以拥有自己的造纸业，很可能是从和阗学习到了技术。公元 75 年，唐王朝和大食在恒逻斯发生了一次战争，唐军大败，两万唐军成了俘虏，而俘虏中有不少懂得造纸之术，这些人把造纸术传入撒马子罕，成了阿拉伯帝国造纸业的开山鼻祖，从此中亚、西亚各地开始普遍使用中国纸，阿拉伯帝国因此而更有很高的声誉，因为阿拉伯将造纸术学到手后，加以改进，大规模地投入生产，成为中西亚甚至欧洲一些国家所用纸张的主要供应商。后来，造纸术由此继续向西传播，公元 900 年前后传入埃及，1100 年后传入摩洛哥，1150 年传入西班牙，1154 年传入意大利，1228 年传入法国，1309 年传入美国，直到 1690 年南美洲也出现了造纸业。

指南针在 2000 年前的战国时代就已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不

过，当时的人们一般是将磁石做成汤匙的形状，称之为“司南”。唐代以后，中国的航海事业发展迅速，一种新的更加有效的指南针便应运而生了，这种指南针将缝纫用的钢针，经过人工传磁，用磁石磨针锋而制成。为了使指针有固定的装置，以便在航行中定向，就出现了罗盘。到了宋代，中国船只已普遍配有罗盘指南，效率极高。阿拉伯、波斯的商人都乐于乘坐中国船只，指南针因而也在此时开始外传。据载，阿拉伯文献中出现罗盘的确实记载，是13世纪的阿布·菲达的《地理志》。书中说，1180年，罗盘就被称为“水手之友”。1281年，贝拉·基布吉奇所著《商人宝鉴》称亚历山大里亚到印度洋的水手都已熟知磁针在航海中的应用。至于欧洲，文献记载认为到12世纪末已开始使用罗盘，而首先使用罗盘的是意大利商船。

雕版印刷发祥于华夏并由华夏传入世界诸国已在定论。至于雕版印刷产生的时间尚留有争议，但一般认为是在唐代。远古时代，华夏先人是在龟甲、兽骨、石、金、木、竹等材料上雕刻文字，以此作为传播和保存知识的工具。缣帛和纸用于书写后，在保存和传播方面仍有严重的不足，雕刻印刷因此而应运而生。但是这种雕版印刷，每印一本新书都需重新刻版，不很方便，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完成了世界印刷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毕昇的方法是：用胶泥刻字，每字一印，用火烧硬。另设一铁板，板上均敷以松脂、蜡、纸灰等合制而成的粘胶物品。印刷时，把铁制的柜子放在铁板上，在柜子中排列胶泥活字，制成一版，再用火烤版，使胶粘物品熔化，随即用另一平板把字面压平，冷却后，就可以上墨印书，用毕，再以火烧版，即可将字型拆下。为了提高印刷效率，毕昇采用两版交替使用的办法，一版印刷，另一版就可排字。后来又经过不断的改进，先后出现了木、铜、铝等活字，使活字印刷术日趋精良。

最早自中国传出的是雕板印刷术，首先向东传入日本、朝鲜及越南，到21世纪西传入埃及。从发掘的材料看，埃及早期的印刷品的印刷水平参差不齐，反映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接受传播的技术之不同。早在8—10世纪，雕版印刷分别由海陆两道传入美索不达米亚，进而传入埃及，而这种传播的中介仍可能是在怛逻斯战役中被俘的中国士兵，当然，侨居扬州的阿拉伯商人也很有可能是这一技术的传播使者。因为扬州是我国最早从事印刷的地方之一。13世纪，由于元帝国的扩张，雕版印刷再度形成了一股向西传播的浪潮，正是这一浪潮将中国的印刷术推入欧洲，意大利、德国、荷兰诸国先后成为欧洲雕版印刷的奠基者。而中国的木刻活字印刷技术也于14世纪中传入朝鲜、日本，然后又由新疆传入波斯、埃及以及欧洲。到1454年，德国谷登堡首先由活字印刷术制成第一个拉丁字母的《圣经》，从此，活字印刷便成为文化传播的世界性工具了。

我国的火药发明源自古代炼丹家，时间约在唐朝。据说，火药是炼丹家在炼制丹药时控制火候时而意外发明的。当时称黑火药，是由硝酸钾、硫黄、木炭三种粉末的混合物组成。火药问世后，首先被用来作为战争的工具。《新唐书·李希烈传》称德宗年间，李希烈称帝，刘洽在宋州（商丘）死守，李希烈采用“方士策”，烧毁了刘洽所部的战棚和城上防御物。所谓“方士策”即指李希烈曾采用炼丹家所发明的火药攻城法。到宋代时，火药在军事上的使用已相当广泛，宋人发明了威力强大的火箭和火炮。周边国家对此十分灵敏，尤其是伊斯兰诸国。据阿拉伯文献记载，1249年，埃及阿尤布朝的国务大臣奥姆莱主持了伊斯兰国家第一次火药制作工程。1258年巴格达沦陷

后，各种火器大规模地由元帝国转入阿拉伯国家，欧洲从此也开始对这种新式攻击武器表示关注，他们在与使用火器的伊斯兰国家冲突中学会了火药、火器制作技术，并很快在整个欧洲大陆传播开来。

上述四大科学发明，是华夏文明的精华，是龙的子孙的骄傲，他们的传播于人类历史所作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马克思就此指出：“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

3. 精神与知识：延伸的深层

华夏文明的向外延伸一方面表现为器物文明的四下传播，另一方面则表现精神和知识的扩散，而这种无形的延伸之流，同样创造、哺育、推动了一系列域外文明的成长和发展，是世界文明中的重要遗产。

儒学：饮誉海外的华夏精神体系。

儒家学说既是华夏文明的精神核心，也是华夏文明中对域外文明影响至深的精神源泉。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政治伦理和哲学思想，儒学体现了东方大陆文明特有的风采和内涵。其经典很早就成为中华近邻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思想基础，也成为西方国家了解东方的哲学前提。因而孔子被人尊称为古代世界最著名的思想家。尽管儒学中有一些糟粕，比如宗法专制、重农轻商、等级森严、厚古薄今等，但它仍不失为一种伟大文明的代表，仍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础之一。为了纪念孔子、研究孔子思想，德国、韩国、新加坡、日本、香港、台湾、中国已相继举行了不下于 10 次的世界孔子大会，表明了孔子对于当代世界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古代东方民族来说，儒学提供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框架、一个伦理道德基础，提供了社会运行粘合剂。因而，他们广泛地接受了儒学，并把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西方民族来说，儒学似乎是中华帝国长期稳定发展的精神力量和思想基础，他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崭新的宇宙观和世界观，他们看到了这一东方精神的魅力所在，因而，西方各民族以其特有的方式将儒学纳入自己的精神体系中。孔子因而成为世界七大思想家之一。联邦德国曾出版过一本权威性的哲学辞典，开头几页是十幅世界大思想家的画像和照片，而最前面的两幅都不是洋人，而是老子和孔子。接着才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诸贤哲。可见，儒学在西方人心灵中的影响之深。1990 年，日本从我国山东泗水县订购了一尊高 4.5 米，重 200 吨的石质巨型孔子行教雕像，将其置于日本泗水町供人瞻仰，这一雕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孔子雕像，看来，中国以外的东方人并未忘记这位 2000 多年前的哲人，而且其尊崇之心之诚，决不亚于曾经将儒学引入本国的祖先们。

文学艺术：风靡域外的华夏美学意识。

华夏艺术自中国文明跃出地平线后就开始了向域外的传播。最早的艺术传播应该是青铜器花纹，汉唐以近，华夏艺术已享誉海外，尤其是亚洲诸国。14 世纪时，伊朗的陶瓷、织物、金工、绘画的风格都纷纷仿效华夏，甚至中国的服装也为西亚诸国模仿，17—18 世纪以来，随着东西方交通的日益便利，中国的艺术风格以它的新奇、精致、柔和、纤巧和幽雅，成为欧美艺术界创造的艺术源泉。当然，在艺术领域，东方的朝鲜、日本，更是得天独厚，很早把唐宋风格视为基本格调，而更能表明朝、日等东亚邻国对华夏艺术吸收之功的是对中国独特艺术——书法的学习，以致朝、日出现了不少东方历史上知名的书法家，如朝鲜的“神品四贤”、日本的“三笔”等等。

至于文学，华夏的影响主要是在东方，中国的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西厢记》等早已在朝鲜、日本等国广为流传，家喻户晓，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朝、日等国都采用汉文进行书写和创作。新罗的崔致远的诗文集《枝苑笔耕》，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中，为中国学者所看重，日本的奈良时代（708—782 年）也出现一些汉诗人。18 世纪以后，中国文学才受到西方人士的重视，这似乎有些悖乎常理，可能是由于语言不畅的原因。1732 年元曲《赵氏孤儿》被译成法文，引起欧洲轰动，而

后《今古奇观》、《好逑传》、《诗经》、《玉娇梨》等先后传入欧洲，到近代以后，《三国志》、《全唐诗》、《全宋词》、《红楼梦》、《金瓶梅》、《道德经》、《西游记》、《三字经》、《水浒传》、《菜根谭》等成为世界认识中国文学的必读经典。

易经：广泛传播的华夏智慧结晶。

易经不仅仅是华夏儒学体系的经典，而且还是中国科学技术的结晶，它在学术上揭示了宇宙万事万物阴阳对立、互补统一、相生变易的宇宙运行法则。可以说，易几乎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样悠久，先有夏易、殷易，而后演化成周易，原是作为华夏祖先用以演示宇宙变化、预测吉凶、占卜福祸的神秘工具，后成为中华文化的“圣经”。因其变化精妙、多与现代科学论证相吻合，以致有人认为公元前 2000 前后的人们是否有能力发明如此绝学，断言这是外星人送给地球人类最早的厚礼，在现代人看来，似乎化学元素排列、数学公式、天文原理、生物遗传、计算机科学等等，都可以在易经中发现神奇的偶合现象。

近年的史学证据表明，易经曾对西方文明产生过深远影响，爱琴海地区的商人从华夏大地带去了东方文明之光。17 世纪以后，西方大批传教士来华，纷纷对易经发生浓厚兴趣，将易经译成多种文字，向世界各地传播开去，法国著名思想家、数学家莱布尼兹对易经如痴如醉，他说：尽管他一时不能读懂，但肯定其中孕含着“新的数学钥匙”，为此，他与在华的传教士开始了以讨论《周易》为主题的著名通信，并对《周易》的 64 卦排列顺序进行仔细研究，结果发现它与自己在 1679 年发现的二进制算法完全相符，不由得赞叹：“中国人的智慧不可思议”。

时至今日，易学研究已成为国际性研究课程，国际易学大会先后在美国、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召开。对于睿智的人类来说，易经是一个取之不竭的文明宝藏。

武学：震撼环宇的华夏军事绝学。

当你走进前苏联克格勃办公楼的大厦时，迎面而来的赫然是一张中国武圣孙子的肖像。

当你看到拿破仑藏书展览时，其中赫然摆放着法文版的《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中的武学理论早已成为震撼世界的军事经典。

孙子，战国时代的著名军事谋略家，他根据平生所学及实战经验，写出了《孙子兵法》一书，成为东方兵学鼻祖，《孙子兵法》是中国历史军事家必读之经典。唐王朝时期，《孙子兵法》传入东海中的日本、朝鲜及南方的越南等国，并立即成为日本列岛兵家圣典。到今天，日本已有 10 万人的孙子研究专家队伍，出版著作 800 余种。17 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来华后，《孙子兵法》随之被译成欧洲各种文字，一代名将拿破仑深受其惠，成为名震世界的战神，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出奇制胜”、“不战而胜”等基本原理已成为西方军事战略的前提。英国著名战略家哈特在他的名著《战略论》中，曾引用了大量古今世界名将的名言，其中孙子名言竟占了 1/2 以上，而拿破仑的名言仅有 7 条。

值得注意的是，《孙子兵法》不仅成为世界军事名典，而且还成为商界、政界精英纵横捭阖的入门教材。

医学：名扬宇内的华夏健身养生之道。

中华医学的起源可追溯到 5000 多年前的远古时代，传说神农尝百草而创

医道。而山东龙山文化发现的 5000 多年前的石制针灸，使传说的“以玉为器”的黄帝医学和“以木为器”的神农药学得到明确的证实。

中医是华夏文明的瑰宝，也是华夏文明向外延伸的重要知识成果。中国医学著作早已成为伊朗医学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唐朝药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在元代已被译成波斯文。1313 年，《史集》作者拉施德丁还编撰了一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名叫《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书中内容包括脉学、解剖学、胚胎学、妇科学、药理学等科目，在西方影响颇深，至今仍在流传。17—18 世纪，来华的西方传教士自然也把视线投到博大精深的中华医学领域，1671 年一位法国传教士出版了法文的《中国脉诀》，这本书译自晋代名医王叔和的脉经，成为欧洲第一部中医著作。随后，《脉经》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在西方广泛流传。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则不仅译出了《脉经》而且还囊括了《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名医必录》等中医名著。与此同时，中国的草药、外科手术方法、医疗器械等也纷纷传入西方，并流传开来。

到 20 世纪，中医在西方已成为医学界的重要流派，1987 年 11 月，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在中国北京成立，参加者有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日本、法国、埃及、阿根廷、加拿大、德国、印度、波兰等国的代表，影响甚大。

宗教：传布东海的华夏文化之光。

佛教虽不是中华本土的宗教，但经印度传入后的长期演化，已逐渐中国化了，并由中国向外传播开去，传播的范围主要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公元 4 世纪，中国佛教首先传入朝鲜，6 世纪传入日本，传入的教派繁杂，主要有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禅宗等。佛学东传史上的鉴真东渡成为千古佳话。扬州大明寺律宗大师鉴真和尚双目失明，历经五次挫折，矢志不改，终于唐天宝 12 年（753 年）东渡成功，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鼻祖，至今仍受到日本佛学界的尊崇。与此同时，中国佛学各教派也传入越南、不丹、锡金、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对当地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以日本最为典型。

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亦传入过日本、朝鲜、越南，并产生了一定影响。汉武以降，道教神仙传说已在朝鲜半岛流传。唐初，高句丽荣留王在位时，大量道士东渡，为之讲授老子。道教何时传入日本，虽众说纷坛，但人们认为以魏晋时期最可靠，日本的神道，显然受到道教影响，日本三神器：剑、镜、印直接源于道教仪式。道教传越已有文献可考者，当为东汉交趾太守张津首先在越南传道教，唐朝时，道教已为大量越人接受。越南独立后，历代提倡道教，一度得势，后因重儒轻道而衰落。

数学：独具特色的东方智慧之术。

中国的数学对印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公元 6 世纪之时，中国的四则运算方法和分数表示法很可能已传入印度，到公元 7 世纪，中国的《孙子算经》也对印度数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些华夏数学精华并由此传入伊斯兰诸国。10 世纪初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巴塔尼开始在由印度传入的正弦、余弦之外，应用正切和余切，这与中国的“重差术”关联甚密。9 世纪时，阿拉伯数学家阿尔·花刺子模论著中有“盈不足”概念，而“盈不足”则早已出现在我国 1 世纪数学名著《九章算术》中，该书中的“盈不足术”共有 20 道题。到 1 世纪初，这一算法成为意大利菲波纳西的《算术书》中一个重要

课题，而 15 世纪的阿拉伯数学家卡西更是一位精通中国数学的名家，在他的《算术之钥》书中，有大量的中国算法介绍，比如，四则运算、开平方、开立方等等。

天文学：历史悠久的华夏文明瑰宝。

我国古代的天文学是在农牧业发展的需要及制定历法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我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天文历法，因此，我国的天文观测有很好的连续性，对周边文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专家研究，中国古代的许多天文学成就曾广泛向外传播，宋代苏颂建造的“水运仪象台”，使观测、表演和计时仪器结合起来，很可能是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摹本。成吉思汗占领撒马尔汗以后，中国历法传入中亚，成为马拉格天文台编制《伊利汗天文表》的重要内容。15 世纪帖木儿的后代兀鲁伯非常热衷于天文观测，他让熟知中国历法的著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阿尔·卡西主持撒马尔罕天文台。卡西于 1437 年著成《兀鲁伯星表》一书，在第一卷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历法 12 年置闰的原理，以致许多亚洲和欧洲国家都了解了中国天文学的重大成就。

史学：功在四邻的中华精神之风。

中国史学的影响主要在亚洲。随着儒家经典的向外传播，《史记》、《后汉书》等著名史学书籍也广泛外传，对周边国家的史学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就东亚而言，13 世纪，越南著名史学家黎文休所著的《大越史记》以及吴士连撰写的《大越史记全书》之体例明显是模仿司马迁的《史记》。书中明确表示，书的宗旨是“劝善惩恶”，可见其已吸收了孔子的治史原则。日本保存至今最早的史书，如《日本书记》、《续日本记》、《三代实录》等，无论是在编纂方法还是在史学思想上无疑都是中国史学的外延，甚至有时是逐字逐句的照抄中国史书。就西亚而言，中国史学的影响主要是元帝国的作用。1301—1307 年，史学家编撰《史集》时承认，他在编写过程中曾受到中国史学家的明显影响。

至此，我们可以说，近代以前 2000 多年的华夏文明曾经是发达的人类文明，曾为世界的发展、全球的进步奉献了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学识、自己的产品。当大多数文明还在荒漠中苦苦挣扎之时，华夏文明就以先进的器物、技术、典籍、知识为航行之帆向四野延伸开会，不愧是真正的“东方天国”。

第三章延伸：华夏文明的扩散

古代华夏文明的向外延伸方式是一种典型的中心辐射型文化传播模式。文明之光以华夏大地为中心投射于四方，近泽亚洲、远播欧美，形成了文明史中的奇观。

1. 东亚：近水楼台

由于地理上的联接、自身文化的悠久及不间断性，华夏文明逐步以自己为中心，形成了犹如强力磁场般的华夏文明影响范围。地处东亚的朝鲜和日本近水楼台先得月，吸收了许多华夏文明的优秀成果，并与本国传统相融合，形成了东方文明中的一片绿洲。

朝鲜

朝鲜半岛因近邻华夏大陆，其历史之演变无不与古代华夏文明密切相关。据传，朝鲜国大约是在公元前 2333 年由檀君所立，他是上帝之子与具有人形的雌熊结合而生。此外，流传最广的还有箕子建国说。据《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遗事》等文献记载：箕子乃商纣王的叔父，为太师。纣王荒淫无道，箕子力谏被囚。周武王灭掉殷商后，释放了箕子，箕子不事周朝，“走之朝鲜”，周武王于是封箕子为朝鲜侯。箕子在朝鲜教古民以礼仪，授古民以田蚕之技，还制定了成文法《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箕氏家族从此成为朝鲜半岛上最早的统治者之一。

公元前 195 年之后不久，燕国大将卫满率军东渡清川江，进入朝鲜。朝鲜王箕氏将他们安置在半岛的西部地区，卫满利用准王的软弱和信任，发动政变，夺取王位，自立为新的朝鲜王。卫氏政权一直与华夏大陆的汉王朝处于敌对状态中，后为汉武帝翦灭，在朝设立四郡。中朝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随之扩大。

汉唐之世，朝鲜半岛正处于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时代，也是华夏文化影响最大的时代。据新、旧《唐书》载，高句丽人非常喜欢汉文化，子弟未婚之前，昼夜读书，主要是五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等。公元 372 年，高句丽设立国家教育机构——太学，以汉学为主要内容进行教育。7 世纪中叶，高句丽派大批贵族子弟赴唐，直接吸收华夏文明精华，佛、道两教相继传入，昌盛一时。

百济也以吸收华夏文明为目标，引入汉学，请汉学专家向皇太子讲授《论语》，派贵族子弟赴唐，入国学，系统地学习汉文化。新罗更是吸收华夏文明的佼佼者，不仅直接采用汉式姓名，而且以儒学为立国之本。682 年，新罗建立国学。8 世纪中叶，国学改为太学监，定必修科目为《论语》、《孝经》，选修科目为《礼记》、《周易》、《左传》、《毛诗》、《尚书》等。788 年，新罗实施“读书三品科”制度，进行国家考试，优者录用为官。同时，新罗还依唐制，将全国划分为 9 省，省下设府县；以唐税制为参照，实行土地征税的丁田制。新罗统一朝鲜，华夏文明之烙印已遍及半岛，皇宫、帝陵、书法、武器、服饰、音乐等无不依唐式而兴。中国佛教也逐步进入了在朝鲜半岛上的延伸高潮，几乎所有的中国佛教教派都在朝鲜找到了皈依者：律宗、涅槃宗、华严宗、法性宗、法相宗、净土宗、天台宗、禅宗等相继风行一时。到高丽王朝时，儒学已成为国家奉行的正宗意识形态，高丽国王一般要定期到国学举行祭孔活动，还把《孝经》、《论语》等经典分赐闾巷儿童，以广教化。华夏大陆的文献典籍进一步传入，如《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神医补救方》、《册府元龟》等。宋帝徽宗对此十分欣赏，亲著诏书，使朝鲜名士权适带回。因徽宗的字画颇负名气，高丽睿宗下令设置天章阁，以珍藏宋徽宗的诏书及书画，并向百官展示。更为重要的是，程朱理学随后也传入高丽，对高丽的学术及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影响在李朝时达到鼎盛，培养了一代朝鲜著名理学家，如徐敬德、李彥、李珥等。科

举制也正式成为选拔国家官吏的主要渠道。根据这一制度，各地均建起以学习理学为核心的学校，每三年进行一次考试，每科录取 100 名，优者经过专门培训后，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最后赴京进行终试，终试后可录取 33 人，由朝廷直接分派官职。

中国清王朝时期，朝鲜仍不断地派使团来华。他们中不少敏学之士看到中国与朝鲜之间的技术差别，主张“实学”，要求向中国学习生产技术，推动朝鲜工商业的发展。但李朝统治者已现崩溃之兆，对此建议未能采纳，以致造就了一个比清王朝还落后、还保守的东方古国。

日本

日本历史学家西岛定生先生称，中国文化圈的基本特征为：（1）使用中国汉字；（2）接受中国的儒学及其思想；（3）接受从中国传去的佛教；（4）接受中国的律令制度。由此观之，古代日本可称得上是吸收华夏文明之冠，是华夏文化圈的典型成员之一。

据考古材料，华夏大陆之民可能在 10 万年以前便已移居日本列岛，与岛上的远古日本人共同创造了日本原始文化。秦汉时期，华夏文明以强劲的力道向日本列岛辐射，促使日本列岛由蒙昧走向文明。中国的农耕技术、工具制造、文明意识就是在这一时期改变了日本列岛的人文面貌，日本列岛的统治者开始以汉字作为其官方语言，承认中国大陆的宗主国地位。

就吸收华夏文明而言，当时的日本人采用的是“双轨制”，一面直接向大陆学习，一面从朝鲜半岛移植大陆文明。就在此时，自朝鲜半岛涌来一批阵容庞大的移民队伍，首领自称是秦始皇后裔，故姓秦。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访华时称，他的祖先本姓秦氏，是中国移民的后代。其源大致出于此。

隋唐时期是华夏文明的辉煌顶峰，是华夏文明向外延伸力度最强的时期。日本列岛也进入了全面吸收华夏文明的新时期，这是因为自此开始中国正式开始输出其高位文化，中国唐王朝是华夏 300 年分裂后形成的最强盛帝国，其文化辐射力增强；而日本此刻仍然是以家族和神话为基础的氏族制度，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向先进的文明学习已成必然之势。

603 年，日本圣德太子依照唐制，拟定了“冠位 12 阶”，冠位的高低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的顺序排列的。随后，他又颁布了宪法四条，作为全体贵族、官僚奉行的道德规范，其中心思想是“以和为贵”，明确提出了“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的思想。为了更系统、更深入地掌握华夏文明之精义，日本多次派出遣隋使、遣唐使。这些汉文化的沐浴者成为 645 年日本大化改新的倡导者和实施者。在改革中，日本人深深地吸取了唐朝文化精华。

改革后的日本官制为二官八省制，二官大体相当于唐之三省，而其中的太政官相当于唐朝的尚书省。八省实际上是唐三省、六部、九寺中某些部门的综合、简化形式。在地方官制方面，日本依唐朝的道、州、县三级体制，设国、郡、里三等。在土地及赋税制度方面更是唐均田制的翻版，废止贵族的私地、私民，使之归国家所有，把农民全部编织在土地上，实行班田制，令其负担赋税。班田制条文中有三分之一抄自唐均田法例，主要特点是公民无地或少地，官府按掌握的公田，平均按人口授田，人死或户绝须归官府。学制方面，日本在中央设立大学寮，内设明经、纪传、明法、算道等四道（或四科），四道中以明经为首。地方上设国学。所学课程一如唐制。而且，天

皇还以唐玄宗为榜样，“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令地方官吏推举孝子，对不孝者予以重罚。

此外，唐朝文化还在其它方面影响着日本文明的演化。且看日本的语言，约在3—5世纪时，中国汉字传入日本并成为日本官方文书及贵族的语言，但由于与原日本语脱节甚重，于是日本有人创造了“万叶假名”，即用汉字的音“写”日本语言，但因汉字难写，逐步发生简易化倾向，10世纪中期后形成以汉字草体改成的“平假名”和取汉字某一部分改写成的“片假名”。1981年10月，日本政府公布的常用汉字表，即日本国民一般社会生活中常用的汉字，仍有1945个之多。而许多日本人则以大量地使用汉字来显示其学问与教养。

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佛教，以“国教”的身分，在“镇护国家”的旗号下得以兴盛不衰，唐代佛教各主要教派纷纷移入日本：

三论宗，552年传入。

法相宗，653年传入。

华严宗，740年传入。

律宗，753年传入。

科技、艺术各领域，日本无不受到唐风浸润。在历法上，日本从推古天皇12年一直到清和天皇贞观三年（861年），先后使用了刘宋元嘉历，唐仪凤历、大衍历、宣明历等。而生产技术领域中的灌溉技术、印染技术、制瓷技术、农耕技术、造纸技术、丝织技术的传入，大大推动了日本文明风貌的改善。以往，日本长期没有固定的都城，在唐朝的影响下，第一个按长安的条坊制设计的都城藤原京建成，后相继又建起平城京、平安京。日本的绘画及工艺品设计更明显地展示了唐朝的技法与风格。

可见，盛唐文明是日本古代文明的发展之源。日本人积极主动地、全面系统地学习华夏文明、移植唐朝文化。典章、学术文字、艺术、宗教等，一一东渐。更为重要的是，唐王朝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已明显地深深扎根于日本文明之土壤中，成为日本文明的基础。

唐王朝时期华夏文明的东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本的遣唐使。630年，日本首次派出遣唐使，目的是与新建的大唐帝国建立关系，之后又连续派来19次，直到894年正式停派。正是这些遣唐使将华夏文明诸层面带回日本，在日本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慕唐”之风。遣唐使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此二人又是遣唐使中的两种类型：一个归国效力，一个终老唐土。

吉备真备22岁时便被选派出使唐朝，留学17年，专注于学问，不仅深研儒家学说中的经、史、法，还涉猎算术、音乐、天文、历法、兵法、建筑等实用之道。回国后，他被任命为大学寮助教，后升任东宫学士，为皇太子之师，最后官至右大臣（正二位），甚受器重。

阿倍仲麻吕19岁西渡来华，入国子监学习，结业后，以进士科及第，被任命为春官坊司经局校书，后升任左拾遗。733年，他请求归日，因玄宗多方挽留而继续仕唐，先后任职秘书监、卫尉少卿，753年归国遇险后不再打算归日，770年逝于长安。

唐之后，日本对华夏文明吸收的规模趋于减小，但因中日往来的持续，华夏文明对日延伸之势并未停止，而且趋于深化。

北宋王朝时期，日本走上“锁国”之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日交往，

直到平氏政权建立后，日本才重开学习华夏之门。元灭宋后，华夏的先进文明仍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在日本反响最大的佛教禅宗就在此时成为日本佛教中的一员。禅宗自南朝宋末由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与儒、道、玄等思想的融合，已形成典型的中国化佛教。日本人在唐代时虽接触过禅宗，但大规模地宣扬禅宗精义则是在镰仓时代。倡导者主张，佛只在心中，人人都有佛性，只要通过自我修养，人人都可成佛。禅宗东渐给当时日本社会许多层面带来了深远影响。禅宗式的庙宇、体现禅宗精神的绘画等风行一时。

宋代理学是影响日本文明的又一精神力量。它的兴盛也得益于禅宗在日本的盛行，因为程朱理学是在融合禅宗、道教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新儒学代表。禅宗、理学成为日本武士阶层的基本精神支柱。到江户时代，中央幕府建立了严格控制地方藩国的“幕藩体制”，以朱子理学为官学，利用它的大义名分、伦理纲常等思想强化对下层人士的精神约束。日本社会等级制从此确定下来。

华夏文明在日本列岛的延伸还可归功于大批流寓日本的华人。汉、唐、宋、元诸朝皆有为数众多的华人东渡日本，其中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除了鉴真和尚外，还有明末的朱舜水。李自成攻陷京城后，皇族出身的朱舜水知大势已去，便离华赴日，力图借海外之力助王室复明。几经遇挫后知大厦已倾，独立难支，便滞留日本，传播儒学，门人众多，成为日本儒学一代宗师，深受日人尊崇。

如果说汉唐时期华夏文明在日本的延伸主要体现于对日本国家事务（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及上层人士和知识阶层的影响，那么，宋元以后，华夏文明已逐步渗入到日本的边远地区及社会中下层。华夏文明的延伸展示了一条由上及下、由浅及深的轨迹。

因天时地利之便，东亚以中国为核心形成了华夏文明延伸的一个内圈，以共同使用汉字为鲜明特征，故许多学者称之为“汉文化圈”。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91年来华访问时对江泽民主席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属于中国文化圈，和中国的文化交流非常密切”。已故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也说过：他尊敬并热爱中国，“虔诚地认为那是一个给了我们汉字的国家”。

2. 东南亚：邻里芳草

东南亚诸国有的是华夏陆上近邻，有的是隔海相望。由于古代华夏文明的先进和强大，东南亚的文化、历史之发展无不与华夏文明密切相关。

越南

华夏文明与越南的密切联系可谓时已久矣，有信史可考者至少有 2000 年。几年前在越南出土的青铜兵器都具有秦汉时代兵器的风格，同时还发现了一些铁器和汉代钱币。中外史学界一致认为，越南文化实际上与华夏文明同为一体。早在秦汉时期，越南的生活及一切建置全部仿自中国。

中国古籍中有大量关于“交趾”的传说，既有帝尧“宅南交”之传，又有舜“南巡狩”之言。但史料所载的是，战国时期，楚国大将吴起曾逾五岭、伐百越，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蛮荒行动。秦朝统一后，在南越地区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从此，华夏文明源源南播。西汉元始元年（公元 1 年），汉政权以锡光出任交趾太守，教当地人民种植谷物、建立学校、向当地居民灌输孔儒礼义，推行汉文书写制度，建立汉式官僚体制。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认为：“公元前 2 世纪中国对越南的征服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第一，红河三角洲成了东南亚第一个依赖稻谷种植的人口稠密区和社会中心，……从而为都市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石；第二，中华帝国实际使越南文化达到了鼎盛时期。”

到了唐朝，越南文人中已有不少人能熟练地掌握汉语，并以此作为学问和地位的标志。汉语诗歌亦有很高造诣，其中的许多名句并不亚于华夏大陆的名诗。科举制度随之成为越南（时称安南）选拔官吏的主渠道。

唐末以降，华夏大地战乱纷纷，国局破碎，安南建立自主政权，于 968 年正式宣告独立，结束了 12 个世纪的中华附属国地位。然而，这并未影响它与华夏文明的继续交流。和平贸易往来，越人来华学习，华人移民南迁成为交流的新渠道。所以，自宋至清 1000 多年的时间里，华夏文明的诸种精华仍构成越南文明的重要构基之一。

13 世纪以前，汉语一直是独立后越南的国语。13 世纪，越南人根据汉字的结构、形声、会意、假借等方法，创造出越南自己的文字，称“字喃”。“字喃”仅限于人名、地名、告示及通俗文章，至于著书立说、参加考试，仍须用纯粹的汉字。由于“字喃”繁复难记，几个世纪后被淘汰，新的越南语系由法国殖民政权推行的拉丁化新文字。

作为华夏文明的同化者之一，越南人的姓，原也是从中华“百家姓”中移植过去的，越南历代开国之君和高官贵族都尽力显示其汉化的姓氏，以示荣耀。越南男性的名字更是大多仿自华夏，甚至连复名、字名、别名都吸收了过去。由于受中国“阴阳五行”学说的熏陶，越南上层人士起名异常讲究，往往在名字前加上“五行”中的“一行”作偏旁来表示“五行”中其“行”之德。比如，黎尚松，名中有“木”，象征“木德”。

中华科举制也并未被独立后的越南政权废止，反而使之进一步系统化、汉化。李朝仁宗太宁四年（1075）举行首次开科考试，“诏选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以后成为定例。到清代后，越南的乡试、会试均以八股文为主，进士分为正付榜，每一甲也称状元、榜眼、探花，不论举人进士皆有论同年拜师之礼。清朝末年，中国已废除科举之制，越南朝廷仍顽固地坚持不变，

导致了诸多恶果。

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的古代中华法系，也给越南社会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唐律疏议》既是“中华法系”的代表又是越南历代统治者拟订律例的蓝本。因而，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法律在东亚（广泛意义上的东亚）的影响正像罗马法在欧洲的影响一样。

华夏文明除了在语言、政治、法律、习俗等方面对越南影响甚大以外，经济方面的影响更不可忽视。最明显的事例就是货币。汉唐货币直接通行于越南各地。独立后，越南君主以汉、唐币制为依据，铸制自己的货币，如“绍丰通宝”、“顺天元宝”等等。其次是生产技术。到唐代，在汉人的帮助下，越南民间已普遍学会养蚕种桑，还能制出精美的瓷器。

华夏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在越南有着同样值得称赞的历史。郭守敬的《授时历》在越南一直沿用到明末，24 节气和干支纪年也为广大农村地区所采用。中国的针灸、药剂学、脉学受到越南朝野的广泛尊重，他们立庙祭祀历代有功于医学的汉人，如逊恩邈、葛洪、扁鹊等。其它如兵法、数学、建筑、绘画、音乐、文学、史学无不以汉学为基，无不带有华夏文明的烙印。

可见，越南对古代华夏文明的吸收内容庞杂、历史悠久，从远古至晚清，典章制度、生产技术、文学艺术、语言、宗教、习俗等等，几乎华夏文明的所有层面在越南都有承继者，双方有着难以割裂的文化关系。

缅甸

缅甸，自远古时期就与华夏文明结下深缘。据缅甸的民间传说，天地初始，有一个龙公主与太阳神相爱，生下了三个龙蛋：一个蛋破裂后变成了一块宝石，因此，缅甸盛产宝石；一个蛋孵长出了一个女孩，并由神仙把她送到中国，成为中国的皇后；另一蛋孵生出了一个男孩，长大后成为缅甸有名的国王——骠苴氏。因此，缅甸人自古以来就认为中国皇帝与他们的皇帝是“一母所生”，称中国人是“一奶同胞”，直至今日，许多缅甸人把中国人视为最亲近的外国亲戚。

考古学家认定，不仅缅甸历史上的青铜器技术是由中国传入的，而且现在缅甸境内的许多民族也都是由中国边境居民迁移过去的，以致于与中国一江之隔的缅甸人与中国少数民族兄弟说的是同一种语言、穿的是同一种衣服、喝的还是同一条江的水。陈毅副总理为此慨而赋诗：

我住长江头，君住江之尾，
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正因为此，缅甸始终不断吸收古代华夏文明之精华。缅甸地处中西交通古道的中介区，自秦汉以来，中国通过陆、海两路将文明之光输入缅甸。三国时代，诸葛亮的南征对缅甸的开发与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据史书载，诸葛亮曾劝缅甸各族“筑城堡，务农桑”，并将汉族的先进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传授给他们，促使其摆脱了数千年的蛮荒状态。所以，诸葛亮在缅甸境内不仅知名度极高而且还受到广泛尊敬，那里不仅有许多关于诸葛亮的传说，而且修建了不少的诸葛祠、武侯庙、孔明城。至今，缅中边境还可发现许多诸葛营、诸葛屯、诸葛堰、诸葛寨、诸葛井、诸葛粮堆、诸葛城的遗迹。

交流的频繁与深入使华夏文明以种种形式逐步渗入缅甸社会生活。除了手工业、制瓷、漆器等以外，中国儒学、佛学的典籍也流入缅甸。

清王朝时，由于清廷征缅失败，许多中国官兵流落缅甸。据《缅甸史》记载：“中国战俘有 2500 人仍羁缅京”。他们成了华夏文明的义务传播者。

华夏农产品（芹菜、韭菜、油菜、桃子等）、建筑设计、造船技术等逐步融化为缅甸文明中的重要构件。

长时期的文化浸润使缅甸人的眼饰及缝纫制作与华夏工艺相似难辨。男上衣酷似中国旧时代的马褂，女子的紧身上衣和筒裙与我国西双版纳妇女的服饰完全一样，就连缝纫用的剪刀和针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东南亚诸岛国

华夏古人在东南海疆探险的最早登陆地就是东南亚诸岛国。自远古以来，大批华人便开始移居东南亚。而且，由于东南亚是中国海上交通的枢纽，中国人往来相当频繁，华夏文明的光环持续不断地投射在这片邻近的海外地域上。

史前时代，华夏大陆居民中不少人向东南迁移，其主要路线一是从中国云南出发，经缅甸、印度支那、泰国，到达海上诸岛；一是以中国东南海滨，经台湾岛，乘舟跨海，到达东南亚。因此，这一地区的早期文明直接受到华夏大陆的影响。在印尼发现的石斧和铜鼓明显来自华夏。秦汉以后，东南亚诸岛与华夏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那里的文化中除了受到印度文明的明显影响外，更多的是受到华夏文明的熏陶。

印尼语中的中华—马来语形成于 19 世纪中叶，其中有大量的汉语（闽南方言）借词。华侨的大量到来促成了当地汉语文化的繁荣。自唐以后，印尼一地曾长期通行中国铜钱，作为经济往来的主要媒介物。华侨还带去了华夏的先进生产技术，其中主要有青铜器和铁器制造术、犁耕和种植法、制茶术、造纸术、养蚕术、纺织丝绸法、蔗糖制造法、甘蔗酿酒法、榨花生油法、造船法、锡器制造术、雕刻术、火药火器制造法、罗盘等。印尼的日常生活及风俗习惯也受到华夏文明的强烈影响，如中国的烹饪术、食品、生活用具、服饰等。此外，中国的春节、元宵节、爬船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早已成为印尼人的欢乐节日。

马来西亚、文莱的文明进程同样受到华夏文明的辐射。考古发掘说明，华夏人在秦汉时代就不远万里给那里带去了大量的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产品，加深了当地国王、贵族的慕华心理，他们模仿华夏的装束、使用华夏的器皿、采纳华夏的生产技术，与华夏往来密切。1783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长托马斯·福莱斯特在访问该地时，惊讶地发现：

“我从船只停泊地丹戎普都斯乘小船登陆拜见霹雳国王，他在一座高大的房子中很隆重地接待我，房内有冲兵 20 名，穿着黑缎上衣，胸部绣有金龙；戴着满州人的帽子，完全是中国式的打扮……”

华侨曾在马来西亚、文莱的华夏文明延伸进程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明史》卷 325《满刺加（今马六甲）传》中曾描述当地人为“男女椎髻，身体黝黑，间有白者，唐人种也”，就连 16 世纪初葡萄牙人所绘的地图中也将该地的地形标成“中国溪”、“中国村”、“中国山”、“潼州门”等。据专家研究认定，文莱王室就有中国血统。当地流行着一种传说：郑和下西洋，路过马六甲海峡时，将此地视为中国的海外属国，留下一位名叫王三品的将军镇守之。王三品于是便成了当地的国王。

华人移民的激增和华夏文明影响的加深在马来西亚地区培植了一种特殊的华夏文明变体——巴巴文化。巴巴（Baba），原意为父亲，语音来自中华，以此为表征的文化现象即称为巴巴文化。巴巴文化以巴巴马来语为特点，巴巴马来语则是由华人创造的，其中包含大量汉语借词，是社会日常生活和商

业的主要用语，到 19 世纪后半期采用拉丁字母，构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以此为基础，马来西亚的华人开展了一系列传播华夏文明的活动：创办出版社、报刊，翻译华文文学、史学著作。《诗经》、《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今古奇观》、《聊斋志异》、《水浒传》、《西游记》、《说唐》、《七侠五义》等各类作品相继传入马岛。英国学者温斯泰德在其著作《马来文学史》一书中称：“居住在马六甲这个国际性港口城市的中国人可能对马来民歌演变成现在这个形式施加过影响。因为，马来半岛出生的中国人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这种四行诗的即席创作者”。除了文学、语言之外，马岛华人在当地的文明影响还表现在医学、生产技术等方面：

中医早在马来半岛扎下了根并深受当地人喜爱。据近代学者统计，在马岛的中草药已达 456 种，由华夏传入的采矿、建筑、农耕等技术也已成为马来文明的支柱。

还能说明问题的是，马来西亚、文莱两地的日常习俗，从衣着到币制、从仪式到节日无不闪耀出华夏的风采。

菲律宾因与中国大陆最近且邻台湾，所以早在远古时期便有许多华人陆续到该地定居，成为菲律宾早期文明的创始者之一。民族学研究者认为，菲律宾民族可分为四大系：毗舍耶族、他加禄族、伊洛于诺族和比科尔族，此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共计 55 个民族，而这些民族的祖先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与华南许多民族有血缘关系。

汉唐以来，中外海路交通日益发达，更多的中国人来到菲律宾，有的是经商路过、有的躲避灾祸、有的寻金探宝，其中往往有久居不返者。移居菲律宾的华人多不携家眷，后与当地妇女通婚，成为当地民族的一员。到 18 世纪中叶，华菲混血种已占菲律宾总人口的 5%，形成了独特的中菲混合文化，首先表现在姓氏上，许、杨、林、王、唐、黄、陈等无疑起源于华夏。据调查：在当今菲律宾人口中约有 10—20% 具有中国血统，在菲律宾的国会议员中则有 75% 的人具有中国血统。菲律宾前外交部长卡洛斯·罗慕洛称：“菲律宾显要贵人中很多人公开宣布，本人身上有中国人的血统关系。并且证实每个菲律宾人，大都以中国人的血统关系为崇高荣誉”。

著名的华裔菲律宾人有：民族英雄何塞·黎萨尔、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总统艾米利奥·阿奎纳多，等等。有人曾慨叹：“何塞·黎萨尔博士的诞生，是中国人对菲律宾最伟大的贡献。”

可见，华菲混血种不仅成为菲律宾上层社会的主要种族，而且成为菲律宾历史的创造者之一，自然也就成为菲律宾文化的创造者。菲律宾社会的各个层面不可避免地显现出华夏文明的影踪，以致一位西方传教士在 1590 年这样说道：“在这个市场上（马尼拉一市场）上可以看到中国的各种行业，各种商品以及来自中国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货物”。

菲律宾农耕技术中的犁田、播种与收割的方法，农具中的马、牛、犁、耙、水车、水磨等，农产品中的白菜、莴苣、菠菜、大豆、芋头、李、香蕉、柠檬、梨、杏、花生等无一不是华夏文明延伸的结晶；造纸、纺织、冶金等行业更是华人直接传播的产物。华夏历史上的科学发明则基本改写了菲律宾社会演化进程史。罗盘开辟了菲律宾远航事业；印刷术催生了菲律宾历史上第一部书《基督教教义》。

菲律宾日常生活中的华夏文明印迹不胜枚举。菲律宾语中的他加禄语包括了大量汉字，目前该语言中的词汇里有百分之二来自汉语。菲人喜爱穿的中国衫、喜欢吃的中国菜，也是典型事例。就连菲人家族中的关系结构也映衬出华夏文明的底蕴，尊老爱幼、弟兄称呼、婚姻方式等明显是中国人的方式。

由上可知，东南亚诸岛国所受华夏文明延伸之深刻程度虽不如日、朝、越那么直接，但亦化入其社会骨髓中去了。华夏文明的潜影在那里随处可见。

3. 欧洲：强劲华风

法国学者莫里斯·罗宾曾言不由衷地叹道：“在古代欧洲和启蒙运动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是无所不在”，近代欧洲一度刮起了“中国神话”之风。华夏文明延伸的触须无疑已远远地到达了欧洲。

华夏文明在欧洲延伸的历史轨迹

华夏文明对欧洲的影响以及华夏文明在欧洲的延伸当溯至远古及殷商时代。商代青铜文化是通过中国西北草原游牧部落输入欧洲的，这直接影响了欧洲早期文明——塞伊玛文化的诞生。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丝绸已成为希腊贵族的华美衣装，因而，古希腊人称中国为塞里斯（Seres），即丝之国。最早提到赛里斯这个“丝之国”的是在公元前416年到前398年间担任波斯宫廷医生的泰西阿斯。当时，许多希腊人还认为，赛里斯人都是碧眼红发的怪物，是一个披着神秘外衣的民族。这大概是他们见过的中亚人形象。

经汉武帝的文武夹击，中欧陆上交通渐渐变得畅通无阻，西域地区形成了南北两线的“丝绸之路”，汉代丝绸从此得以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掀起了古代欧洲的第一股“中国热”。大秦（罗马帝国）的名字也渐渐为中国人所熟知，其得名是由于“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实际上，在汉语中，秦指西方之国，西海也称秦海，“大”与“秦”本相通转，大秦代表了极西的国家。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中，华夏与罗马的商贸往来空前繁荣，中国的丝品、铁器、铜器、漆器、香料大批地运往罗马。中国帆船经过海路到达罗马帝国的港口厄立特里亚的阿杜利，直接促进了该地的商业繁荣。到公元2世纪时，中国的丝绸已风行罗马帝国，为一代时尚。公元4世纪时，罗马史学家马赛里努斯宣称：“过去我国仅贵族才能穿着丝服，现在则各阶层人民都普遍穿用，连搬运夫和公差也不例外”。

作为罗马帝国继承人的拜占庭王朝也与华夏文明有着不解之缘。643年首次派使者到长安，谒见唐太宗李世民，请求加强双方合作，希望得到唐王朝的支援以平息其境内四起的反叛之声。以后又多次派基督教徒前往华夏。唐王朝与中亚阿拉伯诸国的较量反映了唐拜的联合关系。这一交往虽有极大的政治因素，但是生产技术也因此而直接输入拜占庭境内。养蚕、漆器成为拜占庭生产领域中的重要环节。

值得一提的是，华夏古代炼丹术也早在公元初年传入了欧洲，并引发了后来的欧洲化学革命。公元4世纪埃及使者来华，获得了炼丹之术，由埃及又传往欧洲。但对欧洲影响至深的还是由阿拉伯人作中介传入的炼丹术。欧洲中世纪封建贵族们嗜于炼丹术并非求长生之道，而是志在求富，希望术士能点石成金，近代化学由此演化而出。1940年，《西巴论集》正式确认了中国炼丹术的西传历史：

“中国炼丹术的基本思想，经印度、波斯、阿拉伯和伊斯兰教向西班牙推进的结果，传遍了欧洲。葛洪的理论和方法，甚至他所用的术语，在他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普遍地被这些国家的炼丹家所采用。……如果我们承认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前驱，那么，中国炼丹术原有的理论，便可看作制药化学最早的规范。”

元帝国的建立及马可·波罗的论述使更多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富庶和昌盛产生了狂热的向往，激起了欧洲的又一轮“中国热”。中国的许多产品进一步传入欧洲：茶叶、雕版印刷、典籍、建筑、医学成为华夏文明西传新浪潮的先锋。

然而，古代华夏文明在欧洲延伸的最主要成果以及对欧洲历史影响最深的当属四大发明的西传。

约在公元9世纪，中国造纸术经阿拉伯之手传入欧洲，西班牙成为欧洲最早的造纸源地，后依次传入法国、意大利等地。1109年，西西里国王罗吉尔一世用阿拉伯文和拉丁文颁布的一道写在纸上的法令，成了目前欧洲最早的纸本文件。

由造纸术传入而形成的文化盛世是西班牙科尔多瓦王朝。该王朝拥有70所图书馆，发展为西方的文明中心，变成西方吸收东方文化的枢纽。以此为契机，西班牙掀起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翻译浪潮，大量东方著作转译成拉丁文及西欧各国文字，到14世纪末，造纸业已成长为欧洲重要产业之一。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和德国南部都生产纸张。除了供富人使用外，纸张已基本取代羊皮成为广泛通用的书写材料了。从15世纪起，造纸业以德国为中心向四周延伸，波兰、奥地利、英国、俄国、丹麦、挪威纷纷建厂造纸。直到18世纪，欧洲人为提高造纸技术仍须求援于中国，尚造不出宋代已能抄造的三丈长的匹纸。一位叫杜尔哥的法国财务大臣曾于1754年要求到法国留学的北京青年高类思、杨德望回国后掌握中国造纸工艺流程。

印刷术的西传推动了纸的应用，印刷与造纸的一体化威力给欧洲历史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东方冲击波。大约在8—10世纪，雕版印刷传入中东，再由中东传入欧洲，促使意大利、德国、荷兰先后成为欧洲雕版印刷的最早基地。中国的活字印刷也在元代传入欧洲，德国、荷兰、法国相继进行活字印刷试验。1454年，德国的谷登堡用活字印刷技术成功地印制出了历史上第一部拉丁字母的《圣经》，开辟了人类信息传播史的新纪元，一举打破了以往只有上层人士才可读书受教育的技术局限，赋予广大平民读书受教育的机会，推动落后、愚昧的中世纪欧洲向活泼、强劲的近代欧洲转化。

12世纪，罗盘传入地中海。首先使用罗盘的欧洲人是意大利商船队，引发了一场欧洲航海业的大革命。罗盘用于航海导致了针路和航海地图的出现，这既可以确保船只沿着一定的航向安全行驶，又可计算船只的航行日期，从而开阔了欧洲人的眼界，强化了欧洲人的全球意识和世界观念，推动了欧洲人向海外的拓展。

13世纪，欧洲人知道了火药的功用，并将伊斯兰国家的一种火攻书《制敌燃烧火攻书》译成拉丁文。然而，火药给欧洲人留下深深印象的还是13—14世纪欧洲人与穆斯林的三次战争：

1290年，阿卡城，东征的法兰克十字军团遭到穆斯林马木鲁克人的围攻。马木鲁克人使用92座抛石机昼夜轰击，久攻不下，改为发射火球、火瓶、火罐，法兰克人死伤惨重，被迫从这座亚洲大陆的最后堡垒撤退。

1325年，西班牙巴沙城，阿拉伯人在镇压西班牙人的反抗时利用抛石机发射用火药制成的火球进行打击，几乎使该城全民覆没。

1342年，摩洛哥阿耳黑西拉斯城，葡萄牙人企图占领该城，进而入侵摩全境。摩洛哥人奋起抵抗，并利用其它穆斯林兄弟送来的大炮袭击对手，致使葡萄牙遭受重大打击，伤亡无数。

饱尝了火药苦头的欧洲人终于知晓了这种新式武器的威力，立即着手引进制药、造炮技术。1326年，意大利人终于掌握了制造火器的技术机密，造出了欧洲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随后，英国、德国、俄国、葡萄牙相继成为拥有火器的国家。

火药与火器不仅成为欧洲封建统治者手中劫掠和暴政的工具，更重要的是还成了欧洲平民阶层反抗封建贵族的锐利武器。恩格斯说，欧洲对于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也起了变革的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挡不住市民的火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统治跟身穿铠甲的贵族骑兵同归于尽了。

四大发明的西传，推动了欧洲政治、经济的历史剧变，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两位历史伟人的评论足以让我们对此有一个全景式的理解。应当注意的是，他们常常将造纸与印刷视为一体并更注重印刷术的作用。

马克思：“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培根：“印刷术、火药和磁铁……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

欧洲的“中国神话”及华夏文明对近代欧洲的冲击。

伴随着中欧交通的日渐发达，伴随着华夏文明对欧洲冲击力的加强，中世纪之末近代之初的欧洲萌生了一种持续的“中国神话”，中国被视为“唯一的文明国家”。这种神话的始作俑者为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商人之子，据说，他随父及叔一同远行来到中国，于1275年见到了元帝忽必烈，并为元廷服务17年之久，游历大半中国，对中华丰富、昌盛之情形印象甚深，1295年回到了阔别25年的家乡威尼斯，写成《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从财富、人口、生活、政治、物产、工商、交通、纸币、矿产、建筑等方面全景式的介绍了华夏文明。书的开头写道：

“皇帝、国王、公爵、侯爵、伯爵、骑士和市民们，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们，无论是谁，如果你们希望了解人类各种族的不同，了解世界各地的差异，请读一读或听人念这本书吧！你们将发现，在这本书中，正如梅塞·马可·波罗所叙述的那样，我们条理分明地记下了东方各大地区的所有伟大而又奇特的事物。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市民，聪明而又高贵，被称为‘百万先生’。他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所有读或听人念这本书的人，都应置信不疑，因为这里所记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的确，自上帝用他的手创造了我们的祖先亚当以来，直到今天，从未有任何人，基督教徒或异教徒，鞑靼人或印度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像这位梅塞·马可那样，知道并考察过世界各地如此众多、如此伟大的奇闻轶事。”

马可·波罗叙述的故事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显得无比奇特而神秘：无论是带有花园和人造湖的华丽宫廷，还是纵横有序的平坦大道；无论是璀璨光华的珠宝，还是炫丽多采的物产，都是欧洲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正因如此，马可·波罗赢得了一个“百万先生”的称号，因为他开口闭口总是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164—165页，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7卷427页。

培根《新工具》第1册，格言129条。

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

正是这个“百万先生”揭开了“中国神话”的序幕。

诚如斯诺夫里阿诺斯先生所言，“正是他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迷人景象，召唤着伟大的探险者们，在穆斯林封锁陆上道路后，直接寻找一条海上航线，继续前进。”

然而，使“中国神话”扩大化，使欧洲人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华夏文明的还是欧洲东来的传教士。

16世纪以后，带着对东方文化的憧憬，怀着对远方华夏的梦幻，西方传教士千里迢迢踏上中国大地。最早于1552年来华寻梦的传教士弗朗索瓦·扎维埃未曾如愿便病亡中途。1560年，首批教士到达澳门，从此便开始了对华夏的传教活动和对东方文化的系统了解过程。

尽管这些传教士对华夏文明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但却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深层，为欧洲本土真实地描绘了华夏文明的概貌。在语言文学方面，传教士金尼阁于1626年编撰了第一部拉丁化拼音的汉语字汇书——《西儒耳目资》，为欧洲人了解汉语、学习汉语开辟了道路。1728年，马若瑟著《中文概览》，系统介绍了汉字的结构和性质，成为西方人研究中国文字的先驱经典。在中国概况方面，1585年，西班牙门多萨出版了《大中华帝国史》，该书甫一问世，即被译成欧洲各国文字。1615年，金尼阁出版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教史》，全面介绍了中国的风俗、道德、宗教等，是当时西方人介绍华夏文明最权威的著作之一。在中国传统科学方面，宋君荣于1732年先后编撰了《中国天文学简史》、《中国天文学论文集》，后又写成大部头的《中国天文学史》。与此同时，中国的医药学、植物学等也被介绍到了欧洲。在儒学经典方面，许多主要的儒家经典都被译成欧洲各国文字，如《大学》（西文名《中国之智慧》）、《中庸》、《论语》、《礼》、《诗经》、《易经》、《孝经》，等等。而且还出现了研究中国儒学的专门著作，如刘应的《易经概说》、巴多明的《六经注释》、马若瑟的《经传议论》、钱德明的《孔子传》和《孔门弟子传略》等。

与此并行不悖的是，中国的工艺品以惊人的规模流往欧洲，以致引起了欧洲搜集和仿制中国工艺品的狂热，这一狂热竟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其代表便是欧洲历史上的“罗柯柯”运动。

“罗柯柯”一词源于法文“Rocaille”，意指一种假山石或贝壳的装饰品，在18世纪的欧洲主要指以追求和仿制中国艺术风格的“崇拜中国热”。从建筑、服饰、风俗到物品无不以“中国趣味”为目标，甚至中国的戏剧也盛极一时，伏尔泰根据元曲《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孤儿》于1755年在巴黎公演，引起整个欧洲的轰动。这一运动的高峰是泛及整个欧洲的仿造中国园林狂潮，英、法、德、荷、瑞士等国都出现了中国式的园林建筑。一位法国传教士称北京的圆明园为“人间的天堂”，一位德国学者断言：“中国的园林艺术是一切园林艺术的典范”。

华夏文明成为当时欧洲人议论的焦点，是欧洲文学艺术创作的灵感之泉。法国学者莫里斯·罗宾说：“中国模式激起了欧洲人的热情：对中国友好的人，崇拜中国的人，乃至崇拜成癖的人，犹如破堤之水，大量涌现。”

“中国趣味”、“中国风格”一时成为欧洲人的时尚，以至于中国的一

切都被美化了，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被视为“最佳政体”，中国的道德被视为世界上最完备的道德规范，中国的哲学被视为世界上最富理性的哲学。“中国神话”漫及西欧社会各领域，体现了华夏文明对欧洲社会的辐射力。

正由于此，华夏传统文化对于欧洲启蒙运动及文艺复兴起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是封建专制主义消亡而资本主义走向成熟的标志。这一时期的欧洲思想界担负着双重任务：一是从根本上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壁垒，一是建立象征资本主义的新型思想体系。而此刻的欧洲却是以宗教文化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意识占据统治地位。这种意识强调神本位和非理性本位，因而，必须以理性的哲学文化为武器冲击顽固的中世纪思想，以理性权威替代上帝权威，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新型资本主义精神体系。

于是，华夏文明中不崇神权的思辨哲学与强调理性的思想体系及伦理本位的道德意识便成为欧洲启蒙运动先哲极力推崇的精神体系。他们积极而狂热地运用华夏文化素材，守护了欧洲近代启蒙思想的摇篮，尔后以此为据形成了西方近代文化基础。他们从16世纪便已把寻求摆脱神学狂迷的目光转向中国。当时，葡萄牙著名学者乔安·巴罗劳斯在其著作《每十年史》的《第三十年史》中，第一次以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立场评论华夏文明。他说：“中国人已经注意到他们文化的优越性，他们本身是用两只眼睛来理解所有事物的。欧洲人却只是单眼为主，他们除自己之外，根本看不见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民族。”他的话既抨击了欧洲民族的狭隘性，又批评了欧洲神学主义的保守性。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讲得更明白：“我们是大诗人，大哲学家，大辩士，大建筑家，大天文学家，大地理学家，胜过（中国）这善良的百姓。但是他们比我们更懂得善意与道德的科学。如果有一天发现，这种科学是居于一切科学的第一位的，那么，他们可以确定他说，他们有两只眼睛，而我们只有一只眼。”

上述“复眼”与“单眼”之分，是当时欧洲启蒙思想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神学文化的一种比较评判，这一评判在围绕西班牙教士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史》一书的评价中表现得也十分强烈。该书盛赞中华民族是“一个沉静而有才智的民族”。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斯卡里热读到这本书后，立即写信给法国作家戴·蒙太皇，说：“和中国令人赞赏的王国比较起来，我们法国人太渺小了。法国人之间非但不能和睦相处，而且互相厮杀。中国人都安逸地生活，在法律上井井有条。单凭这一点，中国人就会指责我们，就会使基督羞愧难容”。戴·蒙太皇则在该书的法文版上加了批语说：“中华帝国的政体和艺术，在许多杰出方面都超过了我们。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

看，华夏文明为受宗教束缚日久、厮杀日深的欧洲吹进了“辽阔而变化无穷”的希望之风，华夏文明中那超越神学权威的精神美德成了欧洲启蒙思想家进行抗争、宣扬自由的意识之根。

归纳言之，华夏文明的思想体系对于欧洲启蒙运动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影响：

第一个层面是中国哲学的道或理观念对启蒙运动之尚理性、反宗教的影响。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认为，人们常说支配世界的理性有两类形式，一类是希腊哲学家所称的“Nous”（一种支配世界的无形物），一类是宗教信仰中的上帝。黑格尔断言，这两者都不是“哲学的理性观”，而只有

“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为理性（Reason）——叫做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而笛卡尔则称得上是近代欧洲第一位革命性地崇尚理性的人。他自幼深受中国文化浸润，在其名著《方法论》中热情颂扬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性。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朱谦之先生认为，笛卡尔所讲的“Reason”同中国人所讲的“理性”（“理”）“正是一个东西”。伏尔泰认为，中国人的“理”或“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的古老”和文明完美的原因。他称中国人“是在所有的民族中最有理性的人”。他还认为中国哲学中的一切都是自然的，没有任何“神奇的意味”。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华夏文明对神权批评的理性主义精神正是通过向中国传播神学的传教士传播过去的，他们介绍华夏儒学，原本想通过证明它和基督教一致而为基督教的非理性饰金。不料，后果反而赋予反宗教论者一种强有力的攻击武器。一时间，在不少欧洲哲人眼中，中国的孔子变成了18世纪欧洲思想界的偶像。中华民族也成为一个“纯粹德性的民族”。孔子哲学的理性观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之一，其影响漫及欧洲诸强。在华耶稣会教士第一任领导人利玛窦曾这样评论孔子：“他既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异教徒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意大利教士殷铎泽认为：“孔子先于耶稣降生500年之前就生活在中国了。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圣贤之一。”法国教士李明更盛赞道：“在孔子的哲学中，可以断言，理性是属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孔子的顺世随俗而不失庄重和美的态度，其严格的禁欲生活、轻视人间的富贵，尤其是在古圣贤中罕见的特质——他的礼让与谦恭，使孔子成为由理性所训练成功之纯粹的哲学家。”伏尔泰则尊敬地称赞：“孔子为天地灵气之所钟，他分辨真理与迷信而站在真理一边……实为天下唯一师表”，是“世界的智星”。

传教士对异端文化的传播激怒了罗马教廷。从1645年起，教廷多次向在华教士下达禁令，要求杜绝中国传统文化的西传。但华夏文明的诱人魅力仍冲破诸种网罗，撒向欧洲大地，去哺育那里的近代文化之胎。

与此同时，中国哲学中独特的天道观亦在当时的欧洲产生强烈反响。中国哲学中的“天”往往并不是神或上帝的代名词，而是指茫茫自然之“天”，是基督教之上帝的对立物。于是欧洲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保守教士竭力用“上帝”攻击中国的“天”；启蒙知识界则用中国的“天”去推翻上帝对西方人心灵的统治。

第二个层面是华夏文明中伦理本位的道德哲学对于启蒙运动之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性善论”是华夏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之一。18世纪的启蒙学者们热烈地称颂“性善论”，认为霍布斯所言的“恶”乃是世界之祸根、不平等之源，只有“善”才是通向人类博爱、社会大同之途。当时，欧洲流传着一首诗：

人之初，性本善。

霍布斯之叹息，欲为何？……

摩利利则进一步认为，性本善正是“18世纪之思想精神”。他指出：“人性本善，世界能成为优美可爱的处所；而目前世界之病患乃恶劣教育、恶劣

制度之结果。”

李约瑟对此有一番极为中肯的评论。他在一次讲演中说：“17世纪中叶，耶稣会教友群将中国经籍译成西文，中国儒家人性本善之哲学乃得输入欧洲……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社会进步之理想，唯有依赖人性本善之学说，方有实现之望……”

第三个层面，中国君主专制型社会政治体制成为启蒙思想家进行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变革的样板。莱布尼兹十分向往开明君主专政，反对欧洲中世纪的贵族统治和教权专制。他把中国的康熙皇帝视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认为欧洲一些知名君主，如路易、奥古斯都及腓特烈所不能实现的，“均可在康熙身上实现”，并断言中国“开明专制君主的完美的仪型，应为欧洲的君主所取法。”重农主义者魁奈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尤为推崇中国的重农传统，热心鼓动法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郑重其事地举行春耕藉田”的仪式。魁奈去世后，他的学生所致悼词中，把他在1858年发表的《经济图表的分析》一书和一生致力的目标，说成是实现孔子的教导和道德规范，以敬天爱人和节制私欲为行动准则。

第四个层面，儒学对于启蒙思想家理论本身的形成具有直接影响。德国著名学者莱布尼兹非常崇拜中国儒学的自然神论。他说：“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论是从约3000年来建立的，并且极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他从21岁起开始研究中国，先是阅读了法文版的孔子传记及研究文集，并又直接从在华传教士手中获得第一手材料，他和白晋长期通信，在欧、中两国共同探讨他的二进制算术和易卦，终成一代数学家。他还借重华夏文明无情地鞭答欧洲的基督教文明：“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鉴于此，他对欧洲社会发出了忠告：“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去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他还努力贯彻中国的实践哲学，倡导成立了柏林、维也纳、彼得堡的科学院，将对中国的研究列入柏林、彼得堡科学院的研究项目。1714年，他发表的《单子论》中充分吸收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宋儒理学的精华。

伏尔泰也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代启蒙宗师。他曾尖刻地批判莱布尼兹，却步莱氏后尘，对华夏文明倾心不已。他在《哲学辞典》中的“光荣”条目下赞颂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用中国的年代学驳倒了《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认为早在上帝创世前很久，中华民族就已创建了灿烂的文明，并毫不留情地讥讽那些以最高文明自诩的基督徒，他说，当中国文明已是昌盛、繁荣之时，“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史都肇始于中国，而且长期遥遥领先，称“中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起便写得合乎理性。”他把孔儒学说视为一种自然神论，是“理性宗教的楷模”。他指出，“孔子使人获得对神的最纯真的认识”，要求人们修身、治国，都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理性，而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伏尔泰的自然神论

李约瑟《中国文明》，见《大公报》1942年8月31日。

深深植根于这种儒学的道德规范之中，而由他创作的戏剧《中国孤儿》便是他这一思想脉络的集中体现。他借用剧中女主人公依达梅的口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有的是高尚的艺术，有的是威严的法律，还有清静的宗教。这些都是世代可以夸耀于世界的国宝。”该剧作的公演几乎轰动了整个巴黎，引爆了一股思想的激情。《中国孤儿》成为法兰西剧院的保留剧目，剧中体现的理性沉思和献身精神，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向纵深的发展。

德国大文豪歌德自小受到“汉风”熏陶，他阅读过大量有关华夏文明的书籍和中国文化典籍。据说，他在斯特拉斯堡求学时就读过中国的四书（拉丁文译本）。他曾经两度专注于中国文化的钻研，把研究古老中华帝国文化同当时德国命运结合起来，他赞赏中国哲学同现实政治家的密不可分关系，称孔子为“道德哲学家”。他还师从汉学家克拉帕洛特学习汉字，一时被称为“魏玛的孔子”、“魏玛的中国人”。有的研究者发现，在歌德的光辉巨篇《浮士德》乃至《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中都隐现出明显的华夏文明风采，以至他在《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慨然写道：

视我所窥，永是东方。

华夏传统文化对欧洲历史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尤其是对时代之交的欧洲造成了深刻的冲击。它在动荡的欧洲参与了反对神学专制和创立近代新文明的世纪之战，成为新文明演进的一面旗帜。200余年过去了，欧洲人或许已然忘却了华夏文明是怎样哺育过他们身处其中的新文明胚胎。但是，人类文明史的事实却会永远向人们昭示华夏文明所具有的这一世界历史性意义。

4. 美洲：天涯龙迹

美洲大陆曾是一个未被文明旧世界知晓的大陆。16世纪以来，它又似乎是位于遥远天际的一个落后之地，它似乎与华夏文明的延伸毫不相关。然而，旧世界的研究者发现，美洲印地安人是蒙古人种，来自远古的亚洲大陆，他们大约分四批前来美洲：

第一批是长头型人，这是最早从亚洲移来美洲的远古居民。他们的后裔主要分布在北美和南美的拉古纳桑达地区。


第二批是托尔卡特短头型人，分布在美洲各地。

第三批是阿塔帕斯科短头型人，分布在墨西哥北部。

第四批是爱斯基摩人。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印地安文明与华夏文明有着久远的血缘关系。而且，新大陆被发现后，中国的商船和移民也曾远抵美洲，带去了发达的华夏文明的物产与文化，推动了当地文明的发展。因而，我们把华夏文明在美洲的延伸分成远古时代和新大陆时代，以远古时代的延伸影响最为深远。

远古时代的延伸轨迹

一次，我国一位考古学家率团到墨西哥东南部进行考察。他的结论是：在秘鲁和墨西哥考察后没有发现中国古代文化和拉美古代文化联系的任何直接证明。他的一位随行同行则大不以为然，他说：“在考察中我们的确看到古代印第安建筑上的羽毛蛇石刻很像我国古代建筑上的汉白玉龙头。神庙的石碑上刻着象形文字‘’，与汉语的‘川’字相仿。我用西班牙语让一位印地安女孩用自己的语言说：你、我、他、花。她发出的也是单音节的‘宁、内、依、林’。我再问她：里奥（西班牙语为‘河流’）呢？她脱口而出：‘河’”。另外一些专家也认为，美洲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甚至印地安人和中国人的气质，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今天墨西哥印地安人的陶瓷器、

漆器、刺绣和编织等工艺品也如出中国艺人之手。当然，有些是明代末年起的有名的“中国楼船”通商带来的影响，并非古已有之。不过，一位墨西哥人类学家说，他发现印地安人特别容易接受和模仿中国手工艺术。看来，印地安人真有些中华血统哩！

那么，中华祖先是如何迁徙美洲大陆的呢？有没有可信的证据呢？

郭沫若先生指出：山西朔县峙峪人的石器已具有原始细石器的面貌，为亚洲和美洲细石器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安志敏先生经过多年考古研究，得出结论：内蒙古海拉尔和黑龙江顾乡屯出土的以船底形为代表的扁体石核，除我国外，在蒙古、南西伯利亚、日本、白令海峡、堪察加半岛到美洲的阿拉斯加，甚至包括加拿大的部分地区都有分布，制作工艺和形制基本一致。就目前出土的同类石器而言，无论从石器代表的时代以及数量和分布集中的情况来看，都说明它是我国华北为中心，逐步向亚洲东北部及美洲西北部扩散的。

更可喜的是，华夏文明在美洲的延伸轨迹已得到诸多学科的关注：人种学、古人类学、古地理学、文化艺术学、航海学、考古学、天文学、民俗学、语言学等纷纷提出有力证据。

究竟是华夏哪些先人前往那陌生而荒凉的远方大陆呢？民俗学家王大有先生认为，华夏早期部落轩辕族、夸父族、少昊族及殷商后裔是华人东渡美洲的四大群落，从而使远古的传说变成了历史信息的载体。

（一）最先东迁美洲的轩辕族

轩辕黄帝，华夏之宗，吾民之祖，是传说中华夏大地最早的部落联盟首领，是华夏子孙始终崇敬、尊重的创世祖先。

孙中山题祭黄帝，浩然言道：

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川轩辕自古传。

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

世界文明，唯有我先。

毛泽东祭黄帝文，崇敬之心昂然：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无论是从正史、野史的记载看，轩辕黄帝族群的存在应是无可疑异的，其族徽便是“天鼋”，图形为一只巨龟，轩辕族在未统一中原时，只称天鼋氏，征服了所有部落后才称“黄帝”。该族群主要生活在华夏大地的西部和北部，统一中原后曾以新郑为都，衰落之后便还据北方逐鹿，并继续向北扩展，逐渐漫布于蒙古高原和东北高原，一些专家认为，该部族后来延伸到东北亚和北美洲，成为今日美洲易洛魁人的祖先。其年代大约为距今 5500—5000 年间。

真的如此吗？

且看北美易洛魁人奥次顿哥村流传已久的一份古华夏《天鼋黄帝酋长礼天祈年图》：

画面正中是一位状如华夏北方大汉的男子，双臂上举，两手向天，昂头注视前方，虔诚地祈祷。头上有一轮红日，彩虹横空，其下有彗星流逝、星斗满天，太阳之上，两手之间，是一只天鼋龟，龟首对天山指西北，尾向东

南，四足定四方。环绕龟身的是 28 颗黄色星体，即 28 宿。在龟、28 宿下方，甘霖普降，洒向大地。

王大有先生认为，这幅礼天图不仅准确反映了华夏古代历法的内涵，而且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易经八卦的精华。因为该图中的龟首指的西北。

为什么天鼋龟会“头对天山、尾向东南，四足定于四方”？这里面有一段流传千载的故事：

当初，黄帝与蚩尤交战时，在太行山轩辕山被围困，此时，弥天大雾，三天三夜都未曾散去，黄帝之师迷失了方向，节节败退。蚩尤请来风伯雨师助战，又懂天时，巧妙地利用天时地利，征风召雨，吹云喷雾，令黄帝大有不可招架之势。正当黄帝一筹莫展时，风伯献上一策，说：“大雾之后，天必晴。将天鼋头对正天山，尾指向东南，四足定四方，方向自明。四更过后，五更之时，或观北斗斗柄指向，或察 28 宿南方之宿，自可调整方向”。黄帝依计而行，立军旗，调方位，果然方向明确，终于转败为胜，在冀州之野擒杀蚩尤，统一了中原。

从此，天鼋的这种特殊指向便一代代传下来。

轩辕黄帝族徽在涿鹿阪泉之战后 6000 余年的美洲发现，其意义重大：

轩辕黄帝族确实是中华民族一个强大的民族群体。

历史上确有轩辕蚩尤炎帝三大民族集团的战争与融合。

轩辕文化遗存与文物典籍、传说非后人伪妄假托，“三皇五帝”是一个辉煌的文明时代。

轩辕族有杰出的天文学贡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历法改革。

轩辕族是一个农牧渔猎兼备的多民族群体。

轩辕蚩尤炎帝后裔移民美洲，约在距今 6000—5000 年之间。

轩辕后裔不但打通了中国去北亚、北美的道路，而且拓殖北美广大土地，他们保持了离开古中华故乡时的母体文化。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对纽约州的易洛魁人进行的研究分析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材料。他写道：“他们原来可能是从达科他族分出的一支移民，从密西西比河彼岸过来，最初向圣劳伦斯河谷挺进而定居于蒙特利尔附近。后因遭到周围部落的敌视，被迫离开这个地区而迁居于纽约州的中部。他们……南下定居于沃斯威果（王大有先生认为，该地即奥次顿哥，Otstungo）河口一带……那时候，他们至少已经分成了三个不同的部落，那摩霍克部、鄂农达加部、塞内卡部。其后，一个部落迁居于卡南德瓜湖的湖头地方，是为塞内卡部。另一个部落占据鄂农达加河谷，是为鄂农达加部。第三个部落向东迁移……其主要部分迁往摩霍克（莫哈克）河谷，是为摩霍克（莫哈克）部。……鄂农达加部或塞内卡部的一部分人，分属于卡龙加湖东岸沿湖之地，是为卡尤加部。纽约州在易洛魁人占据以前，似乎曾经是阿耳贡金人诸部落的领域的一部分。据易洛魁人的传说，当他们向东往哈得孙河、向西往杰内锡河逐渐扩张其居地范围时，把当地原先的居民赶走了。”“他们于公元 1608 年始为人们所发现。1675 年左右，他们的势力臻于鼎盛时期，当时的领土范围很大，包括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安大略湖北岸一部分加拿大地方。”

可见，在今天加拿大南部、美国的北部曾经都是易洛魁人的生活地域。从他们的部落图腾：熊、狼、龟，以及他们曾经用过的丘墩、石斧、燧石簇来看，他们极有可能是中华轩辕族的海外延伸。

（二）远征美洲的夸父族

笔者在前面的章节中叙述了夸父族东迁的原因及行踪。根据在关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留住在北亚的内陆地区 and 海滨地域以及北美洲的最北部，主要分布在东北亚、阿拉斯加、加拿大及格陵兰岛，最北部达到北纬 82 度，最南延伸至北纬 55 度，自称“因纽特”，其意为人，今天的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海达人、因纽特人、夸邱人都属于该族群落。他们具有华北人的显著特征：鼻梁平直、扁长而窄或呈鹰钩状。

另有不少的夸父族人南迁到了拉丁美洲，在那里创造了辉煌的查文文化，该文化以猴图腾为核心。从其留下的遗物看，其首领作猴头饰三羽毛、人身、手执斧与箭复合的权杖物、头戴梯形帽；或猴首、人胸、人手、蛇身、披发。而查文文物中的龙、饕餮、金缕玉衣等一如华夏。透过查文人酋长的“墩”权杖王斧、梯形品字冠和翟羽，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华夏炎帝族文化的痕迹。随着查文文化的拓展，今秘鲁各地逐步都成为查文人的势力范围，以猿猴、鸱鸢、太阳为崇拜基础的夸父文化遍及秘鲁全境。汉唐之际，古秘鲁国的夸父人后裔曾向汉武帝、唐太宗贡献蜂鸟和扶桑碧玉、蚕丝等，这大概是回乡探亲，认宗寻根吧！

夸父自诩为太阳之子。“夸父逐日”族是太阳神的图腾信仰追求族，主图腾是“阳鸟扶桑”，由北美洲逐日到南美洲，仍然以太阳为宗神崇拜。所以，在南美洲，无论是查文时代，还是印加时代，太阳始终是最高的图腾信仰，印加王还自称“太阳之子”。专家们认为，由于夸父人的传播，太阳、阳鸟、鱼、鸱成为南美印地安人的核心崇拜；珥蛇、操蛇、舞蛇、践蛇等炎帝习俗也成为南美印地安人的习俗。中华仰韶文化时代的陶器、纹饰也因此而传入美洲，成为早期印地安文化的一部分。

更令人惊喜的是，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发现了举父（夸父）逐日崖图，据考证是公元 1400 年左右的作品。许多专家认为这确是今天印地安人的祖先。图像的中心是一只猴形人，他（她）手中拿着一根管状物，眼望前方，他身后是两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在太阳和猴形人的下面是一个人首猴身人，人的头上有绺长发。

一位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一幅名副其实的美洲夸父（祖父）逐日图。那人首猴身人即为夸父，在他背上站着的是举父，举父身后当是禺谷落日。举父前面是汤谷朝阳。举父手中的管状物是某种观测太阳的工具。举父的腿一前一后，说明是在奔走，面向东，逐日而行。

以上说明，夸父人可能确曾远征美洲，播殖了华夏文明的种子。

（三）在美洲建国立业的少昊族

作为远古华夏部族的一分子，少昊羲和族居住于我国的东部沿海一带，是谓东夷人，因其图腾为扶桑，少昊羲和族又称扶桑国族。

扶桑是什么树？桑树吗？

王大有先生认为，最初扶桑，只是高大的树，而后才以高大的桑树为扶桑。该族之所以以扶桑为图腾，大概是以桑蚕为业的缘故。

令人惊异的是，古代美洲印第安人有着极其强烈而持久的汤谷扶桑观念。扶桑图大量出现于美洲印地安人的玛雅、阿斯特克、密斯特克、印加、

秘鲁等文明中，其构成要素均同于华夏。

例一：玛雅人帕伦克神庙石棺图。

这幅道地的汤谷扶桑图，曾被误认为是外星人开动宇航器之图，距今约1300年，图的上方是大地女神被海神兼土地神的鬻鬻形青龙头托起，位于凹形线中，表示位于大海的怀抱中。大地女神上方是一颗硕大的扶桑树，印地安人称之为“生命树”。值得注意的是，该图中的扶桑树变化成了由五条龙构成的“十”字形，扶桑树的连理枝变化成了两条并逢龙，树干顶端为龙头形，龙唇上站着一支叫作凯察尔鸟的太阳鸟。专家们由此推断，以“十”字象征太阳，在中国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中已成定式，中国殷商时代早已把扶桑树变化成了“十”字形状。太昊青龙为相，属木，故青龙和木可以互代。印地安人的扶桑树以龙身所代，不正表明了华夏文明的影踪吗？凯察尔鸟，也就是阳鸟，与中国的凤为一体，不也正显示了华夏文明的底蕴吗？

例二：密斯特克人的扶桑图。

该图中央为红日，四周为扶桑树，每棵树有一只凤鸟。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方各一支风鸟（阳鸟），四方恰好构成“十”字形，从而组成了东南西北中五日。不仅四方扶桑树的布局与我国的楚缙书雷同，而且图中的八芒太阳纹也是典型的中国远古文化样式，即原始的八卦太阳历图，可见之于华夏的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甚至今天湖北、湖南、云贵等地的少数民族仍在沿用。

要考察少昊族东迁美洲的史实，我们还得详细研究一下凯察尔柯特尔其人。

凯察尔柯特尔是美洲印地安人公认的始祖神，是一位“可尊敬的外来人”，自西方渡海而来，他被视为启明星神、羽蛇神、风神、风吹湖面波纹之神，被称为太阳神、太阳之子。他是一位仁慈的神，是无所不能的全能之神，据印地安人传说，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自发披肩，长髯飘洒，白须白袍（有时也穿黑袍）。

这位白袍老人初到美洲时，那里是一片黑暗，混沌不分。于是，他以自己的智慧和精力创造了世界，并用石头雕刻了一群巨人，可是这些巨人不服管辖，触犯了老人。他一怒之下把巨人们都沉入了深水中，然后让太阳和月亮从的喀喀湖中升起，地球上从此有了光明。同时，他在蒂蒂亚瓦纳科用泥土塑造了人和动物并赋予它们生命，教以语言、习俗、艺术、天文，然后把他们分散到各个大陆，定居下来。接着，他带着自己的儿子曼科·卡尔帕克和女儿玛玛·沃利奥来到民间，儿子教男人以农业技术，女儿教女人纺织技术。当凯察尔柯特尔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他向人们说了声再见，便驾舟驶向金星。还有一种传说，称凯察尔柯特尔离开人们后，找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架起木柴，燃起大火，自焚而逝，完成了火中涅槃的转折，返祖为人身鸟喙戴圆锥形帽的启明星神兼风神了。

从这个广为印地安人熟知的传说中，专家们断定，凯氏应确有其人，他的事迹经过千古流传而演绎成了神话。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事迹极为雷同于华夏的太昊、少昊、女娲、盘古、羲和、常羲的故事。他的形象具有典型的中国道教、佛教贤哲的个性，以至于不少研究者认为他很可能是慧深等与中国佛教有关的东方之神。王大有先生认为：“据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凯察尔柯特尔的初始形象就是东迁美洲的少昊族领袖，所以他才具有如此强烈的中

国东夷集团领袖的气质。”

在华夏传说中，少昊为太白金星（启明星）与皇娥感应而生，所以他亦称“白帝”，父既为启明星神，子当然也是启明星神，其母皇娥“或乘桴木而昼游”，子也就常常操舟远渡。故运行美洲也是可能的。凤凰既生丹穴，是为“火精”，即太阳之精。所以，少昊死必入火为火精，返祖为凤（风），化为鸟形，且戴尖顶帽（典型的仰韶文化炎帝帽）。少昊族以太阳为宗神崇拜，其首领自然是太阳神、太阳之子。他们从华夏远渡美洲，世世代代面西而拜，以西为上，正乃怀念故乡之故。所以凯氏为风吹湖面之神、水神、雨神，因着黑衣，生为羽蛇神死为风神。金星神而着白衣，就是必然的。少昊宗主期，少昊集太昊少昊东夷诸族龙凤图腾于一身。凯氏东渡为“羽蛇”，已是中国应龙（鹰龙）在美洲的变异。

如此看来，凯察尔柯特尔不正是少昊吗？

根据王大有先生的考证，历史真相是这样的：

大约在公元前 3113 年左右，长者少昊带领一大批部落子民远渡美洲，寻到了心目中的汤谷，这一地区很可能是奥尔梅克一带。在新的环境中，他以超凡的睿智、旺盛的精力，帮助本族适应自然、开拓新疆；但是，他们的到来，引起了原居住者——巨人族的不满，并发生了冲突，结果，巨人族战败南迁，少昊在此建立了以五日为格局的少昊羲和国，将华夏本土文明向四方扩散开去，形成了当地印地安人的三大文化中心。

这一历史事实的确使人们揭开了又一历史之谜：玛雅文明中的金字塔。这种塔为截顶式阶坛金字塔，呈覆斗形，四角有梭线，四面有阶梯，可以队下走到最上层。最上层是一个四方形的平台，上面建有太阳神庙或月亮神庙等，这种类型的建筑源于华夏的丘墩坛台文化，供祭祀神灵、祖先，观测日月星辰之用。它还是等级观念的标志，阶坛越大越高、台阶越多，就证明越接近天父，越易获得天父太阳神昊天的神示。

（四）逃亡美洲的殷人裔民

殷人东渡是一个久远的传说，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约在公元前 1045 年左右，周武王攻破殷都朝歌，商纣王鹿台自焚。以统帅攸侯喜为首的十万殷军及林方、人方、虎方的十万人突然全部失踪，去向不明。他们究竟去了哪里呢？

此可谓中国历史上第一大疑案。

巧合的是，20 万殷军失踪不久，中美洲地区突然兴起了一种新的文明——奥尔梅克文明，这一文明具有浓烈的殷商文明特征。当然，这是在几千年后的研究中才得以发现的。

1910 年，清政府驻墨西哥特使欧阳庚先生突然接到百余家族殷地安人（Indian）的请愿。他们说：“墨西哥革命时，杀死殷地安人 750 名，这些殷地安人是中国血统，殷人后裔，叫殷福布（Infubu）族，是 3000 年前从天国经天之浮桥岛到这里的，请求天国政府保护索赔。”欧阳庚先生惊讶之余，兴奋不已。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并未就此追寻下去。

无独有偶，考古学家通过破译中美洲印（殷）地安文明遗址中的古文字发现，它们上面赫然刻着殷人的远祖、高祖、始祖、先公先王名号谱系。作为美洲土著的印（殷）地安人为何祭祀殷人的祖先呢？

答案只有一个：

他们可能是殷商后裔！

那么，他们从哪里东渡美洲的呢？天之浮桥在哪里？

经过艰辛而长期的研究，专家们认定，面临亡国之悲的殷军统帅攸侯喜和摩搯侯决心远逃，将子民分成 25 部族，分五路行动，每一路由一个王族统率，这五个王族即飞鹰族、飞虎族、飞龙族、飞蛇族、飞兔族。东渡大军带足黄金、玉器、珠宝、粮食、工具、武器等乘船自山东、安徽两地出航，一直东行，准备去遥远的海上寻求太昊少昊祖先。一部分可能由山东半岛，登朝鲜半岛，抵达东北亚，穿白令海峡，继续南下，到达中美洲；一部分经朝鲜海峡、日本海峡、千岛群岛、鞑靼海峡、阿留申群岛、阿拉斯加到北美洲，然后南下，抵达中美洲。约在公元前 1040 年左右，殷人在攸侯喜的统领下于中美重建殷文明，直到前 100 年毁于地震，再建又毁于地震。之后，殷民分散而去，一部分殷人迁到智利的安第斯山中重建殷家（Inca）帝国，也就是世界历史中有名的印加帝国。

四大部族东渡美洲的历史轨迹大体如此。古代美洲的玛雅文明、阿斯特克文明、印加文明乃华夏文明之延伸已为众多研究者所赞同。他们为此提供了诸多证据，笔者集录几则，供读者参阅：

证据一：语言学材料

既然印地安人来自华夏，那么，他们的语言应当与华夏语言有血缘关系。研究者们发现，两者的语言比较工作困难重重，一是印地安语言极其庞杂。据说，哥伦布抵达美洲时，印地安语多达 2200 多种，其中北美就有 550 种；二是华人东渡已是几千年，甚至近万年的事情，语言分离日久，各自独立发展，要找到原始的共同成分谈何容易。

然而，一些不畏艰辛的研究者还是挖掘了不少颇具说服力的语言学证据。

美国学者萨道夫斯基找到了加州印地安语同西伯利亚马戈尔语之间的一些对应词，建立了一些语音对应规则，如 k~x~h 等。

我国的学者经过辛勤劳动，发现了不少直接与汉语有关的证据。

印地安语的“Totem”一词，音译为“图腾”，是汉语的传译，他们的图腾像、始祖传说等一如华夏。至于这一说法的证据，王大有先生列举了 8 条。

此外，殷人出自东夷，东夷称人为“因”，故商又称殷。殷人东渡美洲后，称“殷地安”，即称“因地安”——家乡好，“印加”一词即为“因家”，转意为“太阳之子”——“因民”，就是炎帝、太昊的子民。

证据二：文字学材料。

寻找文字证据是破解华人东渡美洲之谜的金钥匙。功夫不负有心人，专家们终于在奥尔梅克文化遗址中梳理出不少令人振奋的文字材料。其中一座红色雕像后面的六块圭形玉版上刻的铭文透露了历史真迹。

通观六圭版形制与文字，考古学家断定：此六圭与中国龙山文化中的平首镇圭形制相同，玉圭文字阴文契刻的刻写方法与殷商甲骨文如出一辙，且六圭呈白色，玉雕呈黑色和红色，这种崇白、尚黑、贵红的习俗恰是殷人习俗。

其它殷地安文物中亦有类似新发现：

公元 162 年左右的玛雅佛像雕塑，造型尤具中国特色，上有清晰的“日”、“盾”等字。

美国密苏里州出土的一件骨雕刻物上刻有汉字“长”。

公元前 200—公元 600 年间的中美洲纳斯卡文化遗址的文物上出现了与汉字“天”复合的凤鸟太阳神。

一件早期的美洲殷地安陶器上刻着连现在中国儿童都能认识的“弓”字。

1865 年，秘鲁北部发掘出一尊银铸裸体女神像，双手各持一面银盾，上铭“武当山”。专家们认为，这是东渡美洲的武当山道家子弟或深谙武当派道教宗旨的人带来的。

证据三：天文学材料。

就宇宙观念而言，阿兹特克人把宇宙分为平面与空间两部分。平面有五个方位：东西南北中，空间分上中下三界，上方界为 9 层（或 13 层），下方界为地狱。这一观念与中国古代宇宙观十分相似。

玛雅人认为东南西北各有一棵宇宙树。在中国萨满神话中，宇宙树的存在是一个基本内容。至今在中国的满族、蒙古族、鄂温克族以及俄罗斯境内的雅库特人中仍然流行着宇宙树的传说。

如果说上述现象还属类似的话，那么，玛雅历法之秘密就更令人惊叹不已了。

玛雅历法将一年分为 18 个月，每月 20 天，岁余日 5 天，全年为 $20 \times 18 + 5 = 365$ 天，每过 104 年 25 天，该年岁余日为 $25 + 5 = 30$ 天。1 年 18 月和每月的 20 日有不同名称，均用象形文字代表，其日期还代表一定的空间、方向和颜色，即东红、南蓝、西白、北墨、中绿，且与中国的“五行”说相配。

然而，在众多天文学材料中，我们以为最具说服力的当属阿斯特克太阳石。

历石中央刻有托纳蒂乌太阳神像：椭圆眼、大鼻方口、珥环、吐舌。它的头部上方有“人”形符号，象征太阳之光。这是中国太阳纹的一种典型符号。“ ”形符号指向“13—芦苇”的方框，向人们显示该石历建于公元 1479 年。太阳神头像两侧为鹰爪形双手攫心，表示吸食人心。阿斯特克人认为，以心血祭祀太阳神，太阳才会永不陨落，血祭恰恰是远古中国的祭祀仪式。手捧心祭神灵的象形文字与我国巴蜀象形文字完全一致。阿斯特克人用四个象形文字“燧石”、“房屋”、“兔”、“芦苇”作名称，区别一年，并将四个象形文字与 1 至 13 的数字相配合，组成太阳历 52 年的周期。他们以天为 9 重和 13 重，视 13 为最神圣的数字。

在拉美地区，殷地安人以蟾蜍和玉兔代表月亮和女性。玛雅文化中，月亮竟被画为一女子抱玉兔于弯月中，与中国的嫦娥奔月一说有着惊人的相似。

传说，太昊之妻女娲烧芦苇为灰，湮塞洪水，拯救了她创造出来的人类，从此，“芦苇”便成为治水的圣物。“燧石”，乃敲击而生火花之石，为引燃之物，所以，房屋和燧石也是崇拜太阳民族的圣物。中国很古之时就已经把 9 和 13 看作阳数之极，流传着 9 重天、13 重天的观念。

由此可以断定，阿斯特克太阳石的四个象形文字与 1—13 相配合均可能源于华夏文明。

托那蒂乌太阳周围的方框中那四个象形文字，是四个祖先图腾神像，代

表在洪水时期陨落的太阳，即风日、虎日、洪水日、水日或风日、火日、水日、土日，此中央日托那蒂乌为“天脐”。而“天脐”观念流传于远古中国。中国的五方神，实亦为五日神，即东木青龙日、西金白虎日、南火朱雀日、北水龟蛇日、中土黄龙日。阿斯特克文明中的五日传说及配置方式应是源于华夏无疑。

而从羽蛇的象征、历石的中轴线左右对称设计来看，太阳石更像出自远古华人之手。

证据四：民俗学材料。

从生活习俗来看，印地安人十分节制，一般只作午饭，并把午饭当作一天中的要务对待。这非常符合华夏“民以食为天”的观念并与华北农村的习俗相同。而且，他们的房屋建筑也类似于古代华夏人的建筑。

从神话传说来看，在美洲发现的古代殷地安人祖先图极相似于我国山东发现的东汉武梁祠画像砖上的伏羲女娲图，无论从构成要素，还是结构方式都如出一辙，充分显现了美洲殷地安人起源中的华夏影迹。

从图腾崇拜看，印地安人中的羽蛇崇拜与凤鸟崇拜与华夏的龙凤图腾血缘相通。蛇，华夏称“小龙”，古称虺龙，是龙图腾的变种。美洲凤鸟则是太阳与鸟的复合，直接来源于华夏东夷及苗蛮人的图腾崇拜，因为图腾崇拜是严格的族艺术，只有同族或与之有血缘关系的部族才有可能使用相同的图腾，具有气质上一致的图腾艺术。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也发现了诸多证据并承认华夏文明与印地安文明的血亲关系。80年代，美国人声称发现了7000年前的中国古代易经。美国易经考古学会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出土了一件印地安人彩钵，上刻7个表意符号，显现出典型的中国易经卦象，与“复卦”内容相符。据此，他们断言这就是7000年前的中国古易经。它记载了万物剥复相循、否极泰来的宇宙运势以及至极则反的四季轮回现象和阴阳历法折中合一而使节气不偏不失继续进行的道理。研究者还发现，这些符号与中国仰韶文化和西安半坡遗址出土文物上的符号完全一致。所以，他们得出结论：中国半坡氏族的后人曾远涉重洋，移居美洲。

种种信息表明，我们的祖先很可能在那洪荒无际的年代，勇敢地迈向碧海那边的陌生土地，开拓出文明的新世纪。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演进、地质的变迁，华夏文明与彼岸的子裔失去了全面的联系。然而，这并不等于华夏人再也来到过那里，尤其是16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反应，华夏文明又以新方式将触角伸向美洲大陆。

新大陆时期的微弱延伸

16世纪，美洲成了世界瞩目的“新大陆”。在西方殖民者的带动下，华夏帝国也意识到了美洲的存在并开始以贸易方式推动了华夏文明的新延伸。

澳门—果阿—里斯本—巴西，这是16世纪以来中国与美洲往来的第一条渠道。后来香料贸易衰落，中美之间的往来也常常另寻他途，中美之间贸易往来的中继站则是马尼拉，中国的丝茶、瓷器等物由此横跨太平洋源源不断的输入美洲。17世纪初一位西班牙历史学家曾记录了一份经由马尼拉运往美洲的货单，其中主要有生丝及各种丝织品、棉织布、谷物、牲畜、水果、瓷器、铁、铜、珠宝、火药等，而丝货则是中国销往美洲的最大宗货物。

中国—马尼拉—美洲，被称为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船只成为美洲人最喜爱的外国船只。

墨西哥著名诗人布兰西斯·B·阿特曾为此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诗：
每年一次的中国船啊，运来沉沉的橡胶、香料，还有光滑泽润的丝绸，
堆积在阿卡普尔科港口。

中国丝织品的大量输入，不仅影响了美洲纺织工业的艺术风格和当地人的打扮，而且推动了当地丝织业的繁荣。

中美往来并不仅限于经济贸易，而且也带去了华夏文明的风范。

瓷器成为当地上层社会普遍欢迎的家庭摆设，饮茶成为许多当地人的日常习俗，中国的工艺美术技法也得以广泛传播。当地制作的瓷器上的花纹、样式、画法都唯中国式为尊。中国的纸扇、纸牌、轿式马车也逐渐成为当地人喜闻乐见的日常用具。一位当代的历史学家写道：“甚至在今天，在墨西哥许多地方，特别是在普韦布拉，还可以在雕塑品、陶器和纺织品中看到一种精致的中国影响。”

令人感兴趣的是，墨西哥民间长期流传着一个故事：17世纪初，一位中国公主被人带到墨西哥，卖给普韦布拉大商人米洛尔索萨的家里作女仆。她在作工之余，设计出了一种丝料女装，长裙、无袖、黑色底衣上加金色镶边和红、白、绿色的绣花，鲜艳夺目，招致了许多当地妇女的喜欢和模仿，以至被称为“中国村姑”女装。这位中国公主（墨西哥名叫卡塔利娜·德·圣胡安）受到广泛尊重，她的事迹被记录在墨西哥耶稣会教堂的刻壁上，她的塑像至今仍矗立在普韦布拉市的广场上。

第四章 延伸的顿挫：华夏文明的危机

古代华夏文明以其特有的辉煌、以丰富多采的轨迹，向外延伸着自己的光芒。18世纪后，延伸遇到顿挫，华夏文明出现空前危机，往日强盛的东方帝国一时竟成了新生西方列强眼中的肥肉、心中的东亚病夫。

华夏文明究竟怎么啦？

这是每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会不禁一问的问题。

迂腐的中国人认为：华夏仍是一泱泱大国，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强盛之邦。

冲动的中国人认为：完全是西方列强用炮弹和诡计摧毁了辉煌的东方文明中心。

冷静的中国人则认识到：古老的华夏文明已是病态毕呈，内在的虚弱招致了强力病菌的侵袭。

笔者认为，华夏文明的延伸之所以骤遇顿挫，华夏文明之所以危机重重，原因主要有三：内在机制的阻塞、西方文明的冲击、纷乱的国局。

1. 顿挫一：内在机制的阻塞

古代中国尽管创造了影响全球的伟大文明，但其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致命隐患。当华夏强盛之时，它们未能构成明显的威胁；当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时，它们就将华夏推向极度虚弱的境地。

第一种便是完备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既是曾把中国统一起来并将古代中国推向强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又是造成国势孱弱的根本内因之一。

大一统的绝对君主专制体制确立于秦朝。公元前 221 年秦王政统一了中国，树立了绝对皇权之威。他采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尊号，宣称自己是始皇帝，后世子孙世代相承，称二世、三世皇帝。他废除了分封贵族制，全面推行郡主制，直接隶属于皇帝。从此，至高无上的皇权诞生，皇帝的话便成为“金口玉言”，皇帝成为无人敢违其意的“天子”。秦始皇以其特有的残暴向人们昭示了绝对皇权意味着什么。

《史记·秦始皇本纪》曾载：秦始皇采纳了谋士卢生“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的建议，下令在咸阳郊外的宫殿内建起蜿蜒相连的 270 种甬道，里面置放种种豪华摆设，广纳天下美女，供秦皇随时“圣幸”，而且下令，无论何人都不准说出秦始皇在什么地方，言者立斩无赦。有一次，秦始皇驾幸梁山宫，从山下看到丞相的车马随从甚众，不禁皱眉道：“弗善也。”他身边的一名侍从听了此话立刻转告丞相，丞相当即减少了车骑。秦皇看到这一举动后，不由大怒：“竟敢有人泄露朕之私语。”于是令人追查是谁透露了他的话，结果无人肯招。秦皇下令将追随他身边的人全部杀掉。

这种无以制约的皇权专制经过汉代的巩固，到宋代已达到了非常完备的形态。汉初的郡国并列、魏晋的门阀豪强、唐代的藩镇重吏从此成了历史的遗迹。到明代，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其标志是丞相制度的废除，导火索是丞相胡惟庸的被杀。胡惟庸是一位非常能干的丞相，也是一位颇工心计的官员，他在中书省三年，培育了众多的死党，常常独断政事，不让朱元璋知道。朱元璋哪能容得，随便找了个借口便把胡惟庸杀了，还牵连杀了不少人。中书省随之被撤销，中央的一切政事一下子都推到了朱元璋的案头。他平均每天要看 200 份文件、处理 400 多件事。这怎么能长久呢？于是他建立了一个毫无实权的办事机构——内阁，协助其审阅奏章。清代继之，后设立了军机处，使内阁更是成为徒有荣誉的摆设。

华夏上千年的君主专制曾是令中世纪欧洲赞誉不止的“文明体制”，这一体制却给华夏文明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曾说过：“科学能使物尽其用，民主能使人尽其才，一个能使物和人充分发挥作用的社会，必然会有无穷的生命力。”君主专制及于顶峰的明清中国社会根本不具备人尽其才的制度，当然也就扼制了使物尽其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高度的极权使政治成为现实生活中具有特殊功能和强力功能的职业，从而导致了“官本位”社会的出现。世代知识分子几乎都以仕途为唯一前途，以“治国平天下”为唯一理想。大量精英分子为求得官职，攻读八股文，潜心八股学。1915 年，中国科学界的老前辈、科学社创办人之一的任鸿隽先生在《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的《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中指出：“秦汉以后，人心桎于时学，其察物也，取其当然而不知所以然。其择术也，鹜于空虚而引避实际。”“知识分子多钻故纸，高谈理性……书本以外的知识永远不会被发现。”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中

国的考试（指科举考试——译者）并不测试任何的技能……也不考验是否具有个人魅力，如巫师和男子集会中所实行的典型表演……中国的考试是要测试考生的心灵是否完全沉浸在典籍中，是否拥有在典籍的陶冶中才会得到的……思考方式。”尽管这些论述不免过激，但也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那么多的优秀人才奔赴政治权力的祭坛，那么多的精英分子涌向政治舞台，国家的潜力能不一天天枯竭下去吗？

中国古代的科学虽有长时期的发展，但科学的政治化倾向非常严重，尤其是在天文学领域更是如此。在儒学“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天文学同政治风云变幻有着亲密不可分的关联，因为天文学是专制帝王用以祈求龙运、愚弄众生的有力工具。所以，尽管华夏文明拥有翔实丰富的天文观测资料，却不能建立起系统的天文理论，而且更无法成为民间人士研究的课题，以免“泄露天机”。公元978年，宋太宗赵光义下令“召天下伎术有能明天文者试隶司天台，匿不闻者，罪论死。”第二年各地就送了一大批天文术上进京，朝廷通过考试选中了其中不少人进司天台，其余的人则黥配海岛。在野蛮的专制淫威下，科学家不是官僚便是罪犯，竟然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到了南宋时期，司天台的官吏不会推算历法，朝廷只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学者以备选”。结果是“卒无应者”，也不知是不敢应召，还是真无人懂。到明朝，朝廷对民间习天文者有了更为严厉的控制，明朝的沈德符在《野获编》中曾载道：“国初，学天文有历禁，司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致使民间很少有人学习或继承天文学。科学的政治化程度如此之深，象征近代文明的科学技术又怎能在这种的氛围内诞生出来！？

重农抑商的长期国策也是君主专制体制窒息文明生命力的重要方式之一。我国历代帝王都以儒家学说的“农桑为本，工商为末”为治国基策。他们认为，工商发达、农业荒废便造成国家供给的中断、经济繁荣的萎缩，甚至导致农民的暴动。专制极权体制确立之初，重农抑商对保护农业的发展起到了明显效果，但到了13世纪以后，我国的工商业逐渐昌盛，科学技术也有了较长时期的发展，专制帝王似乎从中看到了政权基础在震动，竟变本加厉地抑制工商业。结果在西方资本主义日趋强盛的同时，中国却仍维持了农业大国的地位，国家的活力逐步枯竭，华夏文明到了最危险的历史关头。

专制朝廷对于工矿企业的严格垄断限制了中国工业的发展。费正清教授在《美国与中国》一文中谈到中国专制体制对经济的制约作用时说：“国家垄断了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和生产，因此每当个人企业由于应用机器和发明而可能成为大规模的企业时，即为国家垄断所不容。”确实，古代中国盐、铁、铜、煤、贸易等企业几乎全部是官办的，科学技术也为政府所垄断。这自然有利于国家对资源的控制和集中力量发展必需的生产和科学技术，但却窒息了企业发展的活力和科学技术成果对整个社会的促进作用。官办企业管理者多为官僚政客，腐化成风，科技管理者沽名钓誉、中饱私囊、胸无点墨。如此体制怎能使科技适应近代文明的潮流？怎能使国家经济具有强劲的竞争力？

第二种便是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封闭型缺陷。

由于华夏文明曾以中心辐射的方式向九州之外输出了先进的文化，这固然是华夏文明之强盛所致，但久而久之会形成文化心理上的自我中心意识以

及对来自其他文明的文化信息的漠然态度。还由于中华地大物博、农业与手工业在古代相对发达、自足自给特征明显，中国人无形中养成了一种以尊临卑的优越感。

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明清以后的中国人漠视对外交往的封闭心理日益明显。这一心态在国势强盛时因万邦来朝而显得淡化，随着国势日衰、西方文明迅速崛起，这一心态便显得其丑无比。

这一心态在朝廷、士人、百姓三个层次上显示出了不同的特点：

朝廷心态：天朝富饶，四夷俯就。

秦汉以后，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常常以地大物博炫耀于四方。中国帝王总觉得在物质上唯有人求于我，而没有我求于人。这一倾向到了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已变得无可救药，逐渐演变成顽固的封闭意识和强烈的锁国心态。在明代，倭寇频频侵扰东南沿海地区，千百万日本沿海流民加入倭寇行列。一时倭患丛生，严重威胁了帝国的安宁。明政府不是寻求积极的制倭方略，而是在海外交往可有可无的意识作用下，消极地推行海禁政策，杜绝海上交通。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倭祸的蔓延，但形成了“因噎废食”不良后果，海外经济文化往来受到沉重打击。清顺治年间，朝廷再行海禁之策，“寸板不许下水”，连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也只准驶向澳门一地。这一政策的直接目的在于孤立据守台湾的郑成功军队，却贻害无穷。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曾一度开放海禁，并于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苏云台山等地设立海关，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但后来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肆无忌惮的非法活动，清政府又于乾隆年间下令封闭其港口，只准在广州一地与外国通商，并经由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作为中间媒介统一经营，为此而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加以严格限制。清廷的观点是：中国输往外国之货物，“外国所不可一日无”，就连力主学习西方的林则徐也认为，中国的丝茶是西方人的生活必需品，似乎西方人一旦离开中国的丝与茶，其生活就不知所措。这也是朝廷动辄以断绝贸易往来的“经济制裁”之思想源头吧！如此观念在朝廷就英商偷运鸦片进中国问题致英国的一份照会中表达得再明白不过了。该照会说：

“查该国距内地七六万里，而夷船争来贸易者，以获利之厚故耳。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中华分去。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即夷民未必有心为害，而贪利之极，不顾害人，试问天良安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定固明知鸦片之为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尚不可移害，况中国乎？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勒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勒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要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好需，何难闭关绝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恣任其贩运流通，绝不勒惜，无他，利于天下公也。该国带去内地货物，不特自资食用，且得以分售各国，获利三倍。即不卖鸦片，而其三倍之利自在。何忍更以害人之物，恣无厌之求乎？”

如此观念指导下的对外贸易无疑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作法，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也使我国先进的航海技术失去用武之地，把开辟万里海疆的优先权拱手让给了后来居上的西方殖民者。即便是最有名的明初郑和下西洋也是

从“我族中心”的意识出发，炫耀国威，希望海外各邦臣服。如此不惜财力而图虚名的怀柔行为终使国库空虚，被斥责为“弊政”而停止。

这一观念的极端表现则是敌视移居海外的华夏子孙。1740年，印尼的东印度荷兰公司以“反叛”为由屠杀了大批中国人，致使2—3万人丧生。当时，荷兰人深恐因此而得罪中国皇帝，担心中国皇帝一怒而断绝与他们的贸易往来。先是否认这次暴行，后又派使团说明事由，对这一极端措施表示歉意。岂料，一向自大的乾隆皇帝竟毫不介意地答道：“我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的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

士人心态：华夏唯大，国粹至上。

高高在上的皇帝如此，学识渊博的士人也如此，他们表现出了与朝廷同出一辙的文化偏见。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神父可以与中国士大夫及中央和地方官吏私下自由往来，他的居室中往往宾客满座，以致时时到了没有闲暇的地步。这种文化交流曾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防止华夏中心意识的畸变，但自清代康熙年间以后，闭关自守倾向渐趋强烈，中外正常文化交流几乎全部中断。例如，一名叫刘亚匾的中国人，因教习外国商人学习汉文，竟于乾隆24年被处以斩首极刑。政治上的极度封锁、传统华夏中心意识的膨胀使中国士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变得越来越幼稚荒谬，贫乏愚昧。堪称学识最渊博的乾嘉学派大师俞正燮言道：“洋人巧器，亦呼为鬼工，而罗刹安之，其自信知识在脑不在心，盖为人穷工极巧，可见心窍不开，在彼国为常，在中国则为怪也。”就连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在其最著名的进步著作《海国图志》中竟以方士炼阴补阳、取人精髓的迷信传说为基础叙述天主教的传教方式。他这样写道：

“受教者先令吞丸一枚，归则毁祖先神主，一心奉教，至死不移。有泄其术者，服下药，见厕中有物蠕动，洗视之，则女形寸许，眉目如生，诘之本师，曰：‘此乃天主圣母也’……凡入教人病将死，必报其师。师至，则妻子皆踞（长跪）室外，不许入，良久气绝，则教师以白布囊死人之首，不许解视，盖目睛已被取去矣。有伪入教者，欲试其术，乃佯病数日不食，报其师至，（师）果持小刀进前，将取睛，其人奋击之，乃踉跄循。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

当时最先进的人物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水平竟低下到了何等地步！可见当时华夏文明的封闭心态达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龚自珍以沉郁悲愤的心情抨击了当时华夏思想界的极度消沉和僵化状况。他说：“这是一个人心混混，朝廷无才相、兵营无才将、学校无才士、田野无才农、街市无才商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一旦有才者降生，那么将会有千百个庸碌无才者去扼杀他。确实，当时的华夏文明被一片愚昧、庸碌之瘟气所笼罩，对外在世界更是视而不见，视而见者也力图使之被中华圣人之教所吸引和同化，而中国人是无须问津西学的。一位儒士写道：

“近日学西方者，多糟粕程朱，士习糠孔孟，赞美夷人，以为事事胜于中国，用夷变夏，即可自强，此大误也。……今我方舍旧谋新，而彼乃广购经史，教其国人诵习，我专学彼之短，彼尽得我之长。则强弱之势愈悬，猾夏之祸愈烈，不数十年，衣冠礼义之邦，将成兽蹄鸟迹之区，此鄙人所大惧也。”

其盲目虚骄之态如是耳！

不仅如此，他们还极力否定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斥其为“机巧”、“术数”，即使是曾跨洋游历于欧美者也不乏愚昧之见。比如，中国历史上第一任驻德国柏林公使刘锡鸿虽耳濡目染西洋近代文明却视之为巨祸。他曾写道：“西洋如豪商大贾、金宝充溢、挥霍恣肆，凡其举止应酬，役使属仆，动用器具，皆为诗书世家所未经见，然终不如诗书遗泽之远”。他把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视为完美无缺的伦理体系，是宇宙中的至美至善。他就像一个书香世家的清贫子弟，来到暴发致富的巨贾家里一样，怀着那种书香世家特有的矜特和傲岸风度，冷漠地注视着豪华客厅里的富丽摆设和涂金装饰。器具固然精美，却始终缺乏诗书世家中的那种灵秀之气氛。在他们看来，粗俗不堪的富豪人家是不值得诗书世家子弟去仿效的。

在伦敦，刘锡鸿遇上了一位波斯藩王，两人都来自亚洲弱国，有一番很能体现中国士人心态的对话。

波斯王：览天下之势，俄英之强，皆未有艾，而贵国与敝国乃以弱承之，将来必为所并……

刘锡鸿：否，俄之贪噬无厌，安知天道不夺其魄，

使之骤致丧败……大清威行四裔，殆二百年……今扫平海内，渐靖西陲，武功既成，一意政教，不及数载，纲维大张，国威自可复振。

波斯王：为何西洋人前进百步，而我之前进仅数步，故觉瞠乎其后，势利远不及耳？

刘锡鸿：绝迹而奔，人喜其捷，而不知有颠陨之虞；缓步而行者，人苦其迟，而不知有倾跌之患。水雷火炮，惨杀生灵，以此为雄，他日必反受其害，何慕为？

悲哉，愚昧如斯！

刘之愚见是传统文化中以尊临卑心态的典型表现，是弥漫于正统士大夫心理中的思维定势，这一定势诱导着近代士大夫按传统的思维轨道去处理来自外界文明，主要是西方文明的种种信息刺激，这一定势还如同一道坚固的心理屏障，强有力地阻止士大夫摆脱原来的认识—思维习惯去另辟思维蹊径。换言之，在这种心理意识的支使下，即便西方文明中诸异质新事物的刺激充满了活力和生气，这帮士大夫仍会不自觉地把这种信息刺激归类到旧的范畴构架中去，并按圣人之道中投射下来的原则来否定新事物的积极意义。如此循环往复，久而久之，一种文明的活力就会被消耗殆尽！华夏文明在近代的命运即为铁证。

百姓：唯我为大，唯我为先。

学识渊博的士人如此，目不识丁的百姓亦如此。天长日久积淀下来的“我族中心”劣根性已浸润到了普通百姓的心目中。在他们的眼里，中国就是一切，圣人就是一切，中国什么也比外国好。应该说，这是千年愚民政策的后果，百姓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长期处于休眠状态。

一位农民曾经虔诚地说：孔圣人了不起。有人问：他为什么了不起。农民说：字是孔圣人造的。就连外国人的字也是孔圣人造的。孔圣人在中国造完字，就骑着马到外国去了。外国人不会磕头，因为他们的膝盖是直的，看见孔圣人来了也不磕头。孔圣人一生气，拨马朝回走。后来，外国人听说来者是圣人，赶紧追赶。没有追上孔圣人，只见路上都是马屎和马蹄子印，从

此受到启发，造出了外国文字。这位农民表达的意思很明显：外国人没什么了不起，你那儿的一切，都是从我这儿学会的，而且是我这儿最下等的东西，到你那儿成了最上等的东西。

这种与现实隔绝的观念经过长期的培育、泛滥，导致了民众的深层愚昧。当洋人用坚船利炮打破了他们的家门时，他们感到不知所措且显得极度痛苦屈辱，一贯性的心理定势促使他们从传统和宗教迷信中去寻求能引导他们完成“驱除鞑虏”的使命，保护自己的子孙。因为他们一直深信：中国自古以来的一切神灵和历史上的英雄，从玉皇大帝、孔圣人到五台山的十万神兵，都是为了保护华夏子孙的生存而受人崇拜的。他们认为：我们这等备受欺凌的苦命百姓，将在孔圣人、孙悟空等先知神灵的引导下，向洋鬼子宣战，将他们赶出国门。这种心态便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社会心理原因。然而，它显然不能成为挽救民族危机的精神支柱，却成为华夏文明在近代逐渐趋于衰落的深层致因之一。

内在机制的阻塞导致了华夏文明的近代“软骨病”，该病症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显得已入膏肓。

2. 顿挫二：西方文明的冲击

人们不禁会问：西方文明的冲击力为何强劲无比，西方近代文明究竟具有哪些击败千年东方文明的优势？

从历史上看，外来文明的冲击并非从近代才开始，古代印度佛教的传入就是一次影响十分深远的文明冲击。在冲击中，华夏古人以包容百家、兼容并纳的龙之胸怀，接受了外来文明的挑战。结果，由此丰富、发展了具有中华特色的佛教文化，促进了对中国历史影响至深的宋明理学的形成。

但是，就文明冲击的力度、广度、深度而言，古代外来的冲击要小得多、弱得多，而且华夏文明迎接挑战的力量也强劲得多。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冲击使以华夏文明为代表的世界古典文明显得毫无抵抗之力。一向以强大、富裕著称的华夏文明一再退缩，危机重重。西方近代文明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呢？

笔者以为，近代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对华夏文明形成空前冲击力、扼制华夏文明的外延之势，其源泉或优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优越的科学技术水平。

西方人是坚船、利炮闯开华夏文明大门的，令华夏人茫然而又无可奈何的是他们先进的交通工具和惊人的技术。连最保守的士人也已意识到中国在“器物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洋务派之“西学为用”中的“西学”实为技术之学。技术成为近代西方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它是西方人赖以扩张地盘、冲击文明古国的“先锋”。对此，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教授评论道：

“中世纪后期最可夸耀的不是那时的大教堂、史诗或经院哲学，而是有史以来首次建立的一种复杂文明。这种文明并非建立在挥汗苦干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是主要以非人力的动力为基础。”

在斯诺夫里阿诺斯先生看来，为辗谷、伐木、排水而发明并使用的水车和风车，为代表这种“非人力”的动力之源。这些发明的出现使西方人在减轻人类辛苦劳作方面取得的成功已远远超过长达千年的文明功绩。然而，令欧洲人毫无顾忌进行扩张的真正技术后盾是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的突进型发展。在1200—1500年间，欧洲普通船舶的吨位增加了一倍或两倍。载重量为150—200吨的狭长桨帆船让位于600—800吨的圆体帆船。船的构造和索具方面的技术得以改良的结果是：船的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便，经济效益也更高。航海术、航海图也有了相应的进步。在火炮方面更是已经令他们的东方老师望尘莫及。荷兰、德国、英国在16世纪制造出来的火炮长度约为5—12尺，能发射重达5—10磅的巨石，后来还能发射如此重量的铁丸，能击毁300码射程以内的船体。不应忘记的是，欧洲技术的飞跃很大程度是源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是科学界的一系列革命性突变使技术解放出来，成为欧洲人扩张的工具。

科学解放了欧洲人的思想，使他们的思想可以自由驰骋；科学唤醒了欧洲人的智慧，使他们可以投身于前所未有的发明创造。它不仅创造了技术，也深深地影响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科学使欧洲在技术上对世界的霸权成为可能，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霸权和性质。在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出现之前，欧洲的艺术、宗教或哲学并没有给非西方文明以多少影响。非西方文明，尤其是华夏文明已在这些领域作出了类似的贡献，甚至更

为突出的贡献。但是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欧洲却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使欧洲文明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力。

著名的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将科学技术革命的世界意义总结如下：

“古代世界在其遗产被分散以前正在朝象科学革命那样的事物发展的任何征兆似乎是不存在的；否则，拜占庭帝国不会只顾及其古典传统的连续性，老是抓住古代思想而是会以巨大变化中的力量予以改造。因此，我们必须将科学革命看作是西方的一个创造性的产物——它取决于仅存在于西欧的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还取决于大陆这一半的生活和历史中的某种能动性。因此，当时不仅在其他因素中有一新因素被引入历史，而且它是极能生长的，并在其活动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以致从一开始起它就自觉地担任了一个指挥的角色，可以说，它开始控制了其它因素——正如中世纪的基督教渗透到生活和思想的每一角落开始支配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因此，当我们谈及在最近几个世代中被传入像日本那样的东方国家的西方文明时，我们不是指希腊——罗马哲学和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也不是指日本的基督教化，而是指在 17 世纪后半叶开始改变西方面貌的科学、思想方式和文明的所有器具。”

其次是强劲的经济扩张力。

中世纪时西欧地区经济的显著发展是促使西欧向海外扩张的一个无可争辩的、显而易见的因素，而由这一因素形成的强大经济力量是西欧文明得以击败东方文明的显著优势。除了 14 世纪西欧经济一度衰退外，在中世纪早期几个世纪以后，西欧经济一直保持着相当稳定的增长。经济的增长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更促进了欧洲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由于欧洲自然环境的影响，欧洲经济的自给程度低得多，那里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已变得习惯于并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的增加、贸易量的扩大，欧洲国家和城市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强烈起来，驱使企业家和商人们去寻找新的市场、新的通商路线和新的物产。为此，欧洲人远航于各大洋，走遍地球上的每一港口。尤其古代以富饶著称的华夏帝国，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冲击目标。

最终使欧洲的经济扩张力达到鼎盛、最终使欧洲文明击败以华夏文明为代表的非西方文明的重要助推器是欧洲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导致了世界上“有史以来唯一的一种经济统治——工业文明的统治”。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逐步传播到欧洲诸国，推动了欧洲生产力的历史性发展。1770—1840 年，英国工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20 倍，资本总额从 1750 年的 5000 万英镑增至 1800 年的 150,000 万英镑，1865 年则增至 600,000 万英镑。整个欧洲的工业生产在 19 世纪后半期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参见表 4—1。

Word.Document.6 \s

经过工业革命的催化，欧洲由早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显著增加，对海外扩张的愿望也更为迫切。也正由于此，西欧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以其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向全球扩展。1763 年以前，欧洲列强仅在亚洲和非洲拥有少数立足点，它们的主要占有地在南北美洲。1763 年以后，为经济扩张力支配得疯狂不已的欧洲列强

飞鹰扑食般地冲向东方诸国，在政治上逐步控制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整个非洲，并迅速使占有地欧化，工业文明的模仿浪潮也在东方古国中兴起，尽管有些古代文明如华夏文明在“软件”方面对西方文明有抵触情绪，但作为“硬件”的工业文明成果——资金和工业却堂而皇之地流入这片古老、守旧的大地，并使这个最为封闭的帝国打开了自己的大门去接受西方列强的经济征服。

在这种新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华夏文明渐渐失去了自己的优势，最明显的莫过于经济优势，且看表 4—2。 EMBED Word.Document.6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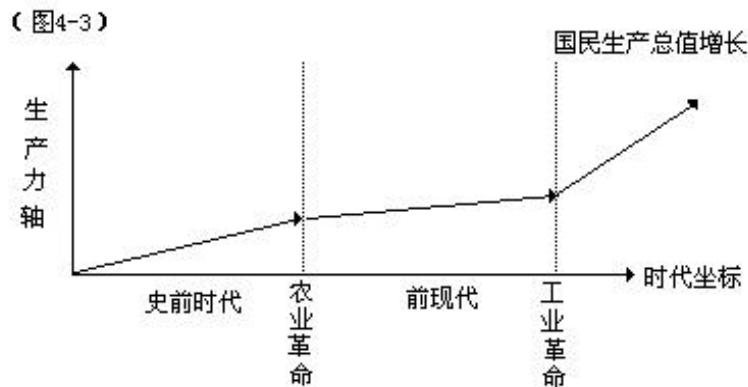
工业革命产生的经济扩张力是如此的强劲！它使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份额的三分之一经过一个世纪的时间便降为二十分之一强的地步。

对华夏文明构成挑战的还不止于此，工业革命后产生的新型西欧文明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文明，这一文明形态规范着以后非欧洲文明的演进方向。以古代华夏文明为代表的古典农业文明成为一种过时的文明形态，它必须按着新型文明所要求的目标奋进，否则便会被世界工业化浪潮吞没，这就是现代人所称的现代文明形态。毋庸讳言，现代文明诞生于西方，遍及于全球。尽管其中有政治制度的千差万别，但作为一种新

的文明形态，它仍有共同的特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这种文明的突出特征是，人类有史以来对各种自然形态的生产力（如人力、畜力、可再生的植物性能源）和简单机械力形式的本质性突破，表现为对非生物能源的支配和大型机器设备的使用，从而创造了高的经济增长率。

参见图 4—3：



资料来源：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可见，从远古一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的社会财富的增长都是异常缓慢的。工业革命后，国民生产总值出现了空前飞跃性增长，就像从马车式跃进到了火车式的经济发展。

正是工业革命造成的强劲经济扩张力予以西方文明勃勃生气，使古典农业文明的象征古代华夏文明遭到严峻挑战。

第三是积极竞争的人生态度和求实精神。

就欧洲而言，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人们的思维为神学的绳索紧紧束缚着。那个时代基本上可以看做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文艺复兴以及

启蒙运动的扩展使欧洲人获得了思想上的新生。

在思想领域，启蒙思想家们要求消灭宗教的狂热和不容异说的行为。宗教信仰自由的杰出拥护者伏尔泰说：“如果在英国仅允许有一种宗教，政府很可能会变得专横；如果只有两种宗教，人民就会互相割断对方的喉咙；但是，当有大量的宗教时，大家都能幸福地生活，和睦相处。”觉醒了的欧洲人拒绝接受上帝支配世界并任意决定人类的命运的传统信仰。他们大多推崇理性、信奉自然神论，要求人们的行为取决于自身的理性判断。虽然出于文化的基因，他们中仍不乏相信上帝者，但这些人坚决认为，上帝创世后允许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则运行而不加以干涉。他们把人的尊严和创造力视为世界的基点，强调人的自我奋斗，甚至把自我价值的实现视为社会行为的支配原则。

在政治领域，新的欧洲文明崇拜“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强调“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君主应为其人民服务”。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在《政府论》（1690年）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这一理论。他写道：如果统治者对其臣民管理不当，“他们就会因这种失职行为而丧失早先人民为着完全相反的目的而授予他们的权力，权力就会移交给人民，人民有权利恢复自己原先的自由……”也就是说，洛克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看作为一种政治契约关系。在法国思想家卢梭看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来源于人民之间的契约。他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认为，所有公民在建立一个政府的过程中，把他们的个人意志熔合成一个共同意志，同意接受这一共同意志的裁决作为最终的裁决。尽管这个所谓的共同意志显得过于抽象，但它毕竟是投向“君权神授”论的一颗重磅炸弹，其意义在于他强调了人民的主权，而统治权不过是一种“代办权”，是人民权力的代理者，用他自己的话说，“行政权的受托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办事员；它（人民）能如心所愿地使他们掌权和把他们拉下台；对受托人来说，不存在契约的问题，只有服从。”

在这一枚枚“重炮”的轰击下，中世纪以来的贵族政治、君王至上等政治观念逐渐退出了欧洲的历史舞台。人们有了一个比中世纪更民主、更完全、更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

在经济领域，由个性自由而导出的是自由放任观念。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让自然界自然地发展，是自由放任思想的核心。自由放任思想的先驱提倡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他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出色的系统阐述。他说，就个人的经济活动而论，自我利益是个人活动的动机；国家的福利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他进一步论述说，每个人，只要他不违反正义法则，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勤奋和资本与其他任何人即任何阶层的人的勤奋和资本竞争。君主就完全给免除了一种职责。在试图履行这种职责时，君主总是遭受无数的欺骗，因此，若要履行这种职责，人类的智慧或知识永远不可能是足够的——这种职责就是监督私人的勤奋，并将他引导到最适合社会利益的工作中去。

正是在这样思想的诱导下，西欧的企业家和商人们以全付精力投入到经济扩张行动中去，不仅形成了一系列庞大的企业集团，而且还组织起世界规模的贸易合股公司。他们的信条是：钱，来自于个人的勤奋、开拓；赚钱，

是人类的本能，也是人类价值实现的基本标准。中世纪那种“在上帝看来，是一种最丑恶、最可憎的罪恶”的观念让位于“钱是上帝对宠儿的一种奖赏，是对于民勤奋的一种承认”的观念。这就是马克斯·韦伯之“新教精神”的核心。

在社会领域，欧洲人逐步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将其移植于社会竞争的层面中，“适者生存”原则到19世纪末已成为欧洲人进取、开拓、殖民的基本信念。实际上，社会进化理论在欧洲早已有之。40年代马克思就曾提出了所有社会制度都处于不断变化并不断进步过程中，但就欧洲社会而言，在当时影响较大的则是赫伯特·斯宾塞。他认为，一切都在进化中。他的代表作《进步：其规律及原因》中写道：“无论是在社会的发展中还是在政治、制造业、商业、语言、文学、科学及艺术的发展中，这种由简单经过连续的变异而进入复杂的同样的进步始终保持着。”斯宾塞的进化观对许多欧洲人产生了深刻影响，也成为达尔文“自然选择论”的滋生源之一。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震惊世界的《物种起源》一书。他提出：处于现在各种不同形式中的动植物种类不是作为单独的、特殊的创造行为的结果而固定不变的，而是有共同的原始起源的、不同的、变化中的自然结果，变异借以发生的主要方式是“自然选择”。这一学说的要旨可表述如下：因为所产生的每一物种的个体比可能生存的多得多，遂各生物间便经常不断地发生生存斗争，所以，任何生物如果能以任何方式发生纵然微小但有利于自己的变异，它在复杂的而且时常变化的生活条件下，将会获得较好的生存机会，因而它就自然地选择了。由于强有力的遗传原理，任何被选择的变种，将会繁殖它的新的和变异了的类型。

人们将以上思想归纳为八个字：

自然选择，适者生存。

尽管达尔文的学说一出台便引来了众多咒骂、讽刺和侮辱，但还是在西方社会产生了“石破天惊”的震动，它塑造了近代欧洲人的个性。达尔文关注的是生物学领域，影响却扩及社会关系领域。之所以会出现令达尔文自己也为之瞠目的效果，其根本原因在于达尔文学说对最适者生存和生存斗争的强调恰好与当时的时代基调相适应。欧洲内部，政治上，俾斯麦正寻求统一德国的机遇；经济上，人们正以极端的个人主义寻求发财致富之路。欧洲外部，欧洲人正不可阻挡地去征服殖民地。达尔文主义成了上述一切行为的合理解释。在事业上成功的个人说，他们应该得到幸福和成功，因为他们已证明自己比无能的穷人更“适合”这个世界。殖民征服中获得成功的列强说，殖民地是强国的繁荣和生存之必需，强国应该成为弱国弱族的统治者，因为按着适者生存的原则，诸落后民族软弱、低劣，需要优越的、强大的西方人予以保护和指导。

这种思想的蔓延便产生了一种新思潮——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本人绝未想到他的研究成果会以这一方式被加以利用，更不用说有如此打算了。事实却是：它们被这样利用了，而且利用的意义是如此的重大，原因在于，它似乎为当时由于其它缘故而开始支配欧洲的现行政策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支持。

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下的欧洲列强在抢夺殖民地、摧毁古老文明时显得更加理直气壮、更加不可一世。他们的信条是：

有力量者应该有所获，能有所获者应该保持住。

第四是强大而富有活力的政治制度。

近代欧洲文明的冲击力，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能源，那就是欧洲在中世纪末建立起比以往强大得多的民族国家以及近代之初建起的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权。正由于新型政体的生机勃勃、经济的冲动、优越的技术、思想的骚动才得以合成一股力量冲向全球，创造了蔚为壮观的人间奇迹。

814年，查理曼去世后，欧洲进入一个四分五裂、政治混乱的时期，几种势力展开了明争暗斗：封建君主们不断地与权势炙手的封臣们发生冲突；城市国家之间结成各自的联盟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角斗；教会与君主进行着长期的较量。

几派势力较量的结果是欧洲出现了强大的民族君主国，英、法是典型，他们的君主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统治者，这是由于他们与新兴的商人阶层结成了非正式的联盟。君主保护商人、市民不受封建贵族的无端骚扰，市民、商人向君主提供财政支持。随着民族君主力量的日趋强盛，国家机构也随之趋于完备，从而使君主们可以动用广泛的人力物力去从事海外冒险事业。

17世纪以后，英、法等国相继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经过长期的流血斗争，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政府成立，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步在欧洲主要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这一制度和意识形态仍是阶级差别的反映，并不能消除剧烈的社会阶级斗争，但毕竟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把人们从神学统治的黑暗中解放出来，把人们从君权至上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大大激发了欧洲人的潜能和活力。

这一制度在国家组织形式上表现为民主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其实质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所以，我们应该承认，这一制度是历史的进步，它赋予人民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权通过普选建立体现自己意志的政府，从而将“君权神授”等级制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面对生气勃勃、咄咄逼人的西欧文明，华夏文明似乎正处于沉睡之中。君主专制制度已垂垂老矣，却仍垂死挣扎般地去束缚、绞杀人们的觉醒意识，国民经济自然陷入了空前的停滞状态。如此状态怎能抵抗先进的西方文明呢？

3. 顿挫三：国局的纷乱与动荡

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华夏文明经受了长期的痛苦，危机重重，复兴契机一再失去，致使华夏文明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无法与世界列强争雄，当然更谈不上文明的延伸。

鸦片战争既是中国重新认识世界的开端，也是华夏文明饱经苦难的开端。内忧与外患的交织是这一历史阶段的典型特征。

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一系列灾难的肇始。

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加深了中华灾难的程度。

19世纪90年代以后，华夏文明的形势更趋严峻，从1894年到1905年10年间，不算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两次国内事件，中国连续遭受四次外国列强的军事侵略和干涉：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

1897~1898年，西方列强大规模瓜分中国狂潮；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

1904~1905年，日俄满洲争夺战。

其中每一次打击对华夏文明的损害都远远超过了鸦片战争。丧权辱国条约接踵而至，大片领土被割让，数十亿两白银赔款，沿海和内河港口沦为租界，不平等条约的商埠从1870年的15个增至1900年的40个，中国沦为几乎所有西方工业国与日本共管的半殖民地。西方一位远东问题专家仅就上述数次屈辱中的一次曾作出如下评论：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拥有中国十分之一的领土和人口的国家，曾经遭受过中国1897年11月到1898年5月这六个月中所遭到的那样一连串的屈辱。我们不妨补上一句，也没有一个国家在行政上的那些公认弊病的改革方面，在具有很多优良品质的坚强民族所居住的一块极其富庶的土地上一切资源的组织方面，曾经表现出这样的无能。”

上述评论中所提到的世界历史上两个“没有”就足以说明华夏文明的灾难之深重、危机之严重。

不过，这一连串打击中最为深重、也最令人反省的当属甲午战争。那是维新只有25年的小小日本国打败了它的文明之母——千年老大的中华帝国。战争后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除要求割地赔款之外，还添加了不少新的不平等条款。日本人从此获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开办工厂和输入机器的权利，也获得了其制品免征内地税的权利。而且，根据片面最惠国条款，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欧美资本也大规模地涌入通商口岸，在中国开办工厂，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以免除税厘的特权，给中国民族工业以直接打击。这样，中国就在更完全的意义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深入渗透，导致中国经济结构的半殖民地化。这一变化使1895年继1840年之后成为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又一里程碑。

腐朽的清王朝终于在内外交困中崩溃了，帝制在中国历史上解体了，然而在帝制崩溃后的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几乎没有享有过和平与统一。据有人统计，从1912年至1928年间，发生在各省之内和各省之间的军阀大战和其他小规模战争共达140次之多。甚至在北伐战争结束之后，战乱仍持续不断。1933年《申报月刊》上有人撰文指出。

“再就内战而言，也以民国以来，迄无宁日。（民国）22年中，四川战乱四百余起，（民国）19年之内战尤为惨毒。即举较近者为例，去岁虽曰国难紧急，而内战仍极为热闹，广东有二陈之战，山东有刘韩之战，四川有二刘之战，陕西有杨马之战，贵州有毛王之战。凡此战争，直接间接无不以人民为牺牲品，乱军所至，鸡犬为罄，炮弹所及，庐墓皆墟。然而中国古朴的人民，20余年来，惟有长期困顿于水火之中，宛转于铁蹄之下，吞声饮泣敢怒而不敢言。”

百多年的内忧外患使华夏民众付出了超量的牺牲，使古老文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涂炭。回首历史，华夏文明曾遇到数次复兴契机，却因国局的纷乱与动荡而令仁人志士扼腕叹息。

契机一：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人较大范围首次主动地把视线投向西方，把向西方学习的理论变为行动。从当时的国内外局势来看，洋务运动的起步并不算太迟，因为这一时期欧洲大部分国家正忙于自己的工业化，“电工技术革命”正以新的力量推动现代化的第二次浪潮。从国内形势看，此刻正处于一次全国性大动乱的平息与恢复时期，对外贸易大都是顺差，正是华夏文明重整旗鼓的好时机，结果却因封建官僚的争权夺势、相互扯皮，政治体制的保守、僵化，甲午战争的爆发而毁于一旦。

契机二：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向西方学习而进行的一场维新运动，维新者力图以日本明治维新之道实现变法图强，使中国成为新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与此同时，国际上正掀起一阵阵政治改革浪潮：英国议会改革、美国废奴运动、普鲁士确立君主立宪制、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就国内而言，连续不断的外来冲击使中华民族正处于大觉醒的关键时分，变法图存是国内大势所趋。然而由于维新派固有的缺陷及保守势力的强大，戊戌变法不幸夭折。

契机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革命风暴摧毁了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封建帝制王朝，也创建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政权——中华民国，宣告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终结，华夏文明赢来了又一次复兴的契机，但是，随着军阀混战的日趋炽烈，人们梦寐以求的希望又一次破碎了。

契机四：1924年1月，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已呈日薄西山之势，人民再次看到了国家统一、民族振兴的曙光。哪知，以国民革命领袖自居的蒋介石却悄悄地挥起杀人屠刀，在“宁可错杀一千，决不使一人漏网”的信条指使下，疯狂镇压共产党人，拉开了中国历史又一次旷日持久的内战之序幕，把刚刚崭露生机的华夏文明重新推向绝境深渊。

契机五：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与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是历史的又一转折点，人民看到了华夏文明又将振兴的希冀。令人齿寒的是，蒋介石集团并不肯把和平轻易地还给人民，力图以反动暴力维护其独裁统治，发动了全面内战，二战胜利初期全球大复兴的机遇又在中国人民面前成了世外奇观。

上述一幕幕的景观显示：华夏文明百年巨变走过的路程是多么的艰辛、

多么的曲折。华夏文明遭遇历史上罕见的重重顿挫，危机迭现。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完全悲观的结论，因为深重的灾难与屈辱并不能压垮龙之脊梁，也不能消蚀凤之肝胆，更不能瓦解狮之力量。相反，屈辱愈深，忧患意识愈浓，复兴华夏文明的回应愈强烈，充分显示了华夏文明的深厚精神力量与内在活力，好似一个蕴藏无尽潜力的贮存库。一位西方评论家认为，任何外国都没有征服过中国；西方列强在印度或其他地方推行的殖民化经验，在中国从未收到过预期的效果。特别是在本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中国显示的巨大进步，“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在几乎毫无外援的情况下，为这样长的战争动员如此庞大的人民与物质资源。”

4. 顿挫的终结：华夏文明再现生命力

失败、屈辱、灾难，激发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推动了涣散的中国走向团结、统一和进步。

新中国的缔造者、一代伟人毛泽东早在纷乱之世就放出了铮铮豪言：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终于从百年屈辱中站起来了，华夏文明从此赢来了新的黎明，新中国的领袖们为华夏文明的早日复兴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的发展大战略。

毛泽东的复兴战略：加快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

新政权诞生之初，百废待兴。当共产党人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时，西方的某些预言家则断言：中共无法治理这个国家经济上的创伤。上海一些资本家也扬言：“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令他们失望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等杰出领袖的指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奇迹般地恢复并发展了国民经济，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

在此基础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着手拟定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计划。毛泽东在1951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设想。计划经济建设的主体是工业化。毛泽东把该设想称做“我们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1951年2月28日，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讲得更明确：“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付诸实施，它是中国自19世纪中叶走向现代化的第一个真正全国规模的发展计划，也是自19世纪中叶华夏文明危机重重以来第一个系统的复兴大战略。

第一个五年计划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确立是从当时的实际需要出发，经过反复权衡，并把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化的道路进行比较后才最终确定的。

世界历史的进程表明，最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化的时序为先轻（工业）后重（工业），相互带动，匀质发展。这是一个自然而缓慢的过程。对于后起国家而言，由于起步时的经济落后程度，以及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为了尽早赶上先进工业国，往往强调大企业和大工厂的作用。尤其对于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来说，除了经济落后的制约外，还必须随时面对来自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巨大压力，不得不一开始就把工业化的重点放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上。苏联新经济政策后期经过工业化论战，确立了从发展重工业开始实行国家工业化的战略。这一战略固然有诸多弊端，但适合当时苏联经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正是通过这一战略，苏联才在短时间内迅速而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令人瞩目的工业强国。

《毛泽东选集》第5卷68页。

《刘少奇文选》（下）60页。

中国和苏联是处在同一历史方位的国家，新中国诞生时的情形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有许多类似之处。因此，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对中国共产党人自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加之，中国工业化起步时，我国也毫无经验可循，除了学习苏联经验外几乎别无选择。毛泽东曾不无感慨地说：“在全国解放初期，我们缺乏管理全国的经验。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只能仿效苏联的做法。”尽管我国当初在学习苏联模式时不免有失误之处，在当时现代化浪潮涌起的大背景下，选择以重工业为重点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方针是正确的，取得的效果也是显著的。“一五”计划作为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个实现华夏复兴的发展大战略，取得了超乎预料的成就，奠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步基础。

“一五”计划的完成，使我国新增固定资产 492.18 亿元。一些过去未有的工业部门包括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也先后建立起来，增强了基础工业的实力。“一五”期间，我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8%，这一速度不仅远远超过旧中国的水平，也大大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期，美国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 3.4%，法国为 8.1%，西德为 10.5%，日本为 14.9%），即使正处于发展高峰的苏联在 1952—1957 年间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也只有 11.7%。与同时代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毫不逊色。同期，台湾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 11.7%，韩国为 12.2%，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曾接受了充足的美援。

“一五”计划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受到全球各界人士的称道。我们不妨看一看一些西方权威人士的评论。

美国社会学家罗兹曼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化》一书写道：“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似乎实现了许多经济发展目标。对第三世界来说，当时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典型。”该书认为，50 年代中国现代化至少取得了 5 个方面的成就：“（1）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已恢复了完全的独立自主权，并证实自己有能力很好地利用在外国（苏联）帮助下建设的大量现代企业。（2）强大的国家指导着所有部门中的社会变革，并为扩充共产党控制而继续重新组织社会。（3）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的要求，重工业正以极高的速度增长着。（4）随着这个仍处于相对未现代化的社会高度社会一体化水平的迅速达到，领导人以持续扩大的规模动员了城乡资源。（5）日益增长的人民大众已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和现代知识可用。……在奔向现代化的竞赛中一再落后于日、俄之后，中国在 50 年代终于开始比她的两个领先的邻国跑得更快了。”

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学者迈斯纳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国提供了重要和稳定的现代工业基础。”“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判断，50 年代的工业化都是杰出的经济成就。”

当时，一位来华访问的法国学者在回国后说道：“这个国家正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速度向前迈进，在这方面，这个国家作出的成就，超过了任何其他地方所能做到的一切。”

可叹的是，在巨大的胜利面前，领导者的视线被耀目的光环所迷惑，改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谈话。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 164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

转引自费里克斯·格林《觉醒了的中国》，95 页，北京出版社 1981 年。

革旧体制的探索被“左倾”思想所阻隔，党内产生了过分自豪的情绪，冒进思潮随之成为主导中共最高决策圈的力量。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追上或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显得比较谨慎，认为时间“大约在几十年内”。在1956年8月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他把“超过美国”的具体时间定在50—60年内，到了1957年底，毛泽东又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著名口号。1958年，他肯定了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7年超英、15年赶美的目标，标志着中国“大跃进”的开始。

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号召：

“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比“左”倾冒进思潮更为致命的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升温。它不仅导致了一场扩大化的反“右”运动，揪出了以彭德怀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为代表的“反党集团”，而且引发了一场更为残酷的政治风暴——文化大革命。

十年浩劫使党和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就国民收入一项就损失5000亿人民币，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的80%，超过30年来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更为严重的是使中国耽误了利用先进技术发展国民经济的黄金时间，进一步拉大了中国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

正是在60—70年代，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新技术革命导致了产业结构大转换。日本抓住机遇，创造了“世界奇迹”，其国民生产总值同中国的差距由50年代相差无几到60年代末扩大到2倍、到70年代末又扩大到4倍。亚洲“四小龙”也在6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改变昔日旧貌，拉开了与中国的经济距离，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新星”。

华夏复兴之路在哪里？

千载难逢的契机真的又会失去吗？

邓小平的复兴大战略：坚持改革开放，实现国家现代化。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党和人民又一次获得了新生。此刻的华夏已是百业俱废，冤狱遍地，民生凋蔽，问题成山。

改革，刻不容缓的历史抉择！

改革，华夏文明复兴的唯一出路！

唯有改革，中国才能走出困境！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里程碑式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不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与此相适应，全会还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制定出了新的复兴华夏大战略。这一战略与前30年的发展战略有着根本的区别。

1953—1957年的“一五”计划战略目标，是在大约15年的时间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为此而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措施。1958—1960年的“大跃进”战略则是一种带有强烈主观主义色彩的冒进战略。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曾根据形势，提出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制定出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这一战略设想因“文革”干扰而无法得到执行。

从上述三大战略中，我们可以看出前30年的发展战略具有下列明显特

征：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的作甲；片面追求高速度，忽视经济效益；注重经济增长，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盲目追求生产关系的“大”和“公”；片面理解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实行封闭或半封闭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以往发展战略经验教训基础上推出了全新的现代化战略，新的战略包括新的发展战略目标和实现战略目标的途径两个方面。

1979年12月，邓小平在接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增加3倍，每人平均1000美元，算个小康水平。”

1980年12月，邓小平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经过20年的时间，使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小康水平，然后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

这一战略设想为党和政府所采纳，1981年11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和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均以正式文件的形式阐述了这个20年规划。

中共十二大确定的发展战略目标是：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一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为了实现20年的奋斗目标，十二大提出：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

就现代化进程而言，20年战略只能达到中期目标，距现代化要求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对此，邓小平在1984年5月会见外宾时指出：到本世纪末，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1万亿美元，人均达到800美元，“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再发展30年到50年，我们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同年10月，邓小平完整地论述了远景规划：“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20年，还有第二步，需要30年至50年，恐怕要50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1986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正式提出了下世纪中叶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的指标，并在1987年4月全面阐述了“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至此，邓小平关于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最终确定下来。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报告写上了我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新的发展战略目标与以往的几个现代化战略相比，具有以下新特点：（1）强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2）明确以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中等水平”为目的，把经济增长与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邓小平文选》（1975—1982）315页。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44—45页。

同上书68页。

(3) 注重总量平衡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使国民经济协调增长。(4) 注意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的同时并进。

新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同以往单一的目标相比，包含了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内容，使现代化的目标趋于系统和完整。

在制定新的发展战略目标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1) 必须对原来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科学文化体制等进行有领导、有步骤、全面而系统的改革，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 以自力更生为基点，实行对外开放。(3) 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4) 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5) 把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新的战略掀起了新的发展浪潮。

一场为华夏文明复兴而奋斗的大决战开始了！

中华大地再次呈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壮丽景观：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

1978年秋，安徽遇上了百年罕见的大旱，肥西县山南区首先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的麦子总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增产717.5万公斤；凤阳县小岗村在1978年实行包产到户，人均收入增长6倍，粮食产量是过去7年的总和。

到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创造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纪录：全国粮食总产量高达4200亿公斤，人均粮食达到400公斤，第一次跃上世界平均水平。

更为深层的变化是，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一种新的具有现代化色彩的农业体制已显雏型，“土地公有，家庭承包，联合服务”的双层经营结构已取代了陈旧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模式；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型所有制结构也已代替了人民公社式的“一大二公”体制。农业本身也由原先的自然经济快步转向商品经济，乡镇企业迅速崛起，成为农村中的新主角。

农村改革的成功，为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积累了经验，探索了道路。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把睿智的目光又投向了城市：

“改革要从农村转向城市。”

以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改革从此拉开了帷幕。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全面阐述了中国经体制改革的基础，制定了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战略部署，确认了商品经济的地位。

从1985年起，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到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的面积已达78%，尽管自1984年下半年以后一度出现经济过热、1988年下半年全国性抢购风潮以及1989年政治风波后的西方“制裁”，改革还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到1990年底，第七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绝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七五”（1986—1990）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8%，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5%，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7%，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3.1%，是继“一五”和“六五”之后的第三个高速增长时期。更

重要的是，5年间，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实际增长4.1%，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2.4%。

90年代的到来，向世人展示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国内“左”的思潮一度抬头，姓“社”、姓“资”之争对改革开放大业构成了无形屏障。中国今后的道路究竟该如何走？

1992年春，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之时，再次以战略家的口吻宣告：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他语重心长地说：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改革开放顺乎潮流，顺乎民心。唯有改革开放，才是国富民强之路、才是华夏复兴之途。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新浪潮的到来。

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开，部署了深化改革的新战略。

十四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确定了我国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共十四大的决议精神，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的主要目标是加快建立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现代市场运行机制。

中国第二轮经济改革开始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1993年8月15日的纪念独立日的国民大会上称赞道：“中国在经济领域正在成为重量级的大国，估计中国在今后30年内能够保持年均5%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断言，由于中国实力的增加，世界经济的重心将会由西方向东方转移。”

俄罗斯《莫斯科新闻》周刊则在1994年2月6日的一篇文章中以“当睡狮醒来时”为题突出地评价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文章说：

“10亿多人口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继续高居世界第一位：199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13%。而且更能说明今日中国在上世界上所占位置的不是数字，而是北京务实的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取得的突破。”

“今天的世界至少是围绕三个极，准确地说是围绕三个经济力量中心重新组合的：美国、欧共体、亚太地区，许多国家都认为中国是该地区未来处于领袖地位的国家之一。而中国具备走上这一领袖地位的全部前提条件。”

1994年4月21日，美国《商业时报》公布了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是通过调查全球1747位经理人员而获得的。结果显示，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竞争力最强的国家。美国和日本分别居第二位和第三位。

中华民族历经坎坷、痛定思痛之后，正以前无古人的气魄，昂首阔步迈

向世界强国之林，华夏文明必将以更为强劲的力道重新向外延伸自身的光芒。

第五章再延伸：华夏文明的复兴

与东方巨龙的苏醒、崛起相辉映，域外的华夏文明之花也在争奇斗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20 世纪下半叶是华夏文明再延伸的时代，是华夏文明复兴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特征表现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海外华侨华人创造的经济与文化的奇迹；第二个层次是受儒家文化浸润至深的东亚诸国与地区相继跃入发达国家之列；第三个层次是以华夏大陆经济起飞为底基而展现的“大中华圈”。这三大层次相互交融预示了一个“东方世纪”的到来。

1. 外缘奇迹：海外华侨华人的创造

读者可以从前面的章节了解到，中国人移居海外，历史十分悠久，如果溯至夸父族东渡、箕子赴朝，约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是，到了唐代以后，正史中才有大量关于华人外迁的记载。本章所指的海外华人特指唐代以后移居海外的华人。从那时起，华侨自称“唐人”，称祖国为“唐山”，将聚居地叫做“唐人街”，称所穿中式衣服为“唐服”，讲中国话为“唐话”。这与大唐王朝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唐代中国人大量移居海外有着密切关系。鸦片战争之后，华人出国之潮迭起，并逐步形成了深具国际影响的华人社会。截至1994年，海外华侨华人约有3000万，其中90%左右聚居在东南亚地区，他们以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各地文化交汇融合成一种延伸于海外的华夏文明变体，在世界经济、国际文化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让我们来看一看这种独特的文明形式在历史中的轨迹和地位吧。

挥汗千年——海外华人的苦斗史

从公元7世纪唐代开始到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前后约1200年，既是中国历史上专制极权王朝的发展期又是华侨社会在海外逐步形成的时期。据文献记载，唐代华侨已开始在日本、南洋诸岛和西亚等地定居，但人数不多，估计只有万人左右。随着宋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人侨居海外的人数和地区也日益增多，到明代中叶，中国人移居东南亚各地人数估计达15—20万人。海禁开放后，华人出国人数更是呈明显增加趋势，仅在亚洲就已达到100万人以上，而且侨居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东起日本，西至印度东部海岸，北抵缅甸，南达菲律宾和印尼，亚洲成为华人聚居中心。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一带的贫苦群众以空前规模出国谋生，出国人数达1000万，东南亚、东北亚、南亚、美洲、欧洲、大洋洲、非洲相继出现了华人的踪迹。

辛亥革命后，华人移居海外的数量有增无减。日本的华侨史专家成田节男在《华侨史》一书中指出：“1920年到1930年的十年期间，华侨人口的增长率最高，可以看到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华侨人口的最高峰都是1930年。”他认为，这一时期华侨人口激增有三个原因：一是国内政治混乱，二是南洋产业资本主义的确立，三是交通工具的发达，再就是民族意识的觉醒，他们已不再像清王朝后期那样被都视为“猪仔”，而是按着自己的意愿到海外去开拓新天地的“自由移民”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华人海外移民出现了新浪潮。尽管在1949年至70年代中期曾出现过移民停滞现象，但此后则是数量的剧增。据统计，从1979年至1991年，公安部门批准的因私出国者达136万人，年均11万人，其中80万是移民。广东省移民国外者达44万人，仅江门市就有25万人移民海外。这一时期大陆移民的新特点是主要进入欧美澳发达国家。例如，从1976年至1986年的10年间，移民荷兰和西德的中国大陆人分别为1.2万人和1万人，1987年至1991年移民意大利者达1万人。

无论是古代漂洋过海的炎黄子孙、近代寻求生计的贫困华人，还是当代移居海外的大陆子民，绝大多数在异国他乡弘扬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精神、体现了华夏文明的卓越智慧，在恶劣、陌生而又动荡的环境下默默耕耘、勤奋地创造，以自己的血和汗开辟着海外中华文明的新天地。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1期，25页。

《华人》月刊1991年11期，14页；1991年3期，9页。

我们从以下几个景观中可以体会到海外华人的辛酸和艰难，也可以目睹炎黄子孙的铮铮铁骨。

（1）东南亚的“猪仔”华工

19世纪以来，西方殖民者争先恐后地向中国夺取廉价劳动力，“猪仔”贸易一时“繁荣”异常。他们在中国人的败类——“猪仔头”的协助下，肆无忌惮地把大批中国人劫往东南亚，从中捞取巨额利润。他们或以重利诱使轻信者上船或趁夜登岸抢人，其手段花样繁多；

其一，令人在通商口岸的僻静之处伺伏，待单行人经过时，猛然跳出，一人堵住口，数人将其强纳入麻袋中，背入“猪仔”船中。

其二，在幽静码头，见单行人过往，出其不意，指其拖欠债务，牵扯入船而去。

其三，用迷药将人迷倒，令其糊糊涂涂地随之而去。

其四，用利器强行将过往行人截住，劫持而去。

其五，择定对象后，甜言蜜语，投其所好，诱之以利，蛊之以色，软硬兼施，令其不能自拔。

这些“猪仔”被贩卖给洋人后，即用船运到南洋各地，成为那里的廉价苦力，多半是在矿场和种植园，劳作之艰，难以想象。比如，在印度尼西亚烟草种植园的华工，每天凌晨4点钟吃一点冷饭就必须出来干活，12点钟收工吃饭，吃的是咸菜或干鱼，而且经常吃不饱，直到晚上9点钟才收工，毫无人身自由，一旦染病，又缺乏药物治疗，死亡便成为必然的归宿。

华工决不甘心于奴隶般的生活，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或逃亡或暴动，不断为自己的生存权而苦斗。

随着华工的反抗加剧和西方殖民统治的相继瓦解，华工终于摆脱剥削，获得了人身自由，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他们的勤奋、俭朴、耐劳给当地留下了深刻印象。

（2）北美的淘金华工

19世纪50—80年代，美国出现大批华工，主要从事淘金，地点是加利福尼亚。当1848年初在旧金山附近的科罗马发现黄金时，加州的居民只有800个印第安土著和12000名墨西哥人和白人定居者。很多住在旧金山的人听说了黄金的消息后，纷纷赶往科罗马，头一批赶到的48人中就有好几名华人。两个华人在莫尔河边低地找到了一块重240磅的黄金，按当时价值可达3万美金，引起了一时的轰动。到1848年7月，已有2000人抵达那里，一个勤快的人每月平均可获得约400—600美元的黄金，而当时在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机械师月工资只有32美元，一个农场工人的月工资为16美元。淘金可以迅速致富，不能不使人趋之若鹜。到1849年9月，从各地赶往加利福尼亚金矿区的人已达到100,000人，其中有323名华人。

北美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入中国后，1850年有大批华人移入美国加利福尼亚。据当时的一些华工回忆说，他们在旧金山上岸后，身上背着口袋，跟着装着他们行李的马车后面步行。到达旧金山城后的第一晚睡在中华会馆中，然后进入金矿区。从1863年起，由华商集资兴办的公司开始进入加利福尼亚金矿区。据旧金山华商估计，1862年在“淘金热”商潮中，参加淘金的华工一度多达3000名。从1848—1883年，美国所生产的黄金总值约为12亿美元，其中加州生产的占2/3，而华工在金矿矿工中的比例又十分大。可见，华人金矿工不仅为加州而且为整个美国创造了巨额财富，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

荣。

(3) 拉美的契约华工

大批华工进入拉丁美洲的时候，正值拉美国家已经获得独立或正在争取独立之时，劳动力危机严重。几十万中国劳工先后踏上拉美海岸，与当地的黑人奴隶及其他劳动人民一起，洒血流汗，创下了功在后世的伟业。

19世纪中叶，古巴糖业发展很快，原来的主要劳动力——黑奴却大幅度减少。先后有8万名契约华工参加了甘蔗种植园和制糖业的辛勤劳动，保持了古巴糖业的繁荣。

在秘鲁，19世纪中叶有所谓“鸟粪时代”之称。也就是说，秘鲁沿海岛屿鸟粪资源的开发曾对秘鲁国民经济的发展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秘鲁的史学家没有忘记，“在整个进口移民的时期，这种产业（开采鸟粪）的大部分劳动都是由中国人承担的。”据统计，从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先后有大约4000多名华工被卖到钦查群岛开采鸟粪，而且几乎全部在难以忍受的强迫劳动中失去了生命。

此外，英属圭亚那、巴西、墨西哥、英属西印度群岛也都可以看到无数契约华人在炎热的日照下挥汗苦干，为拉美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华人向海外移民的特点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主要迫于生计而背井离乡变为复杂多样的动机；由文盲半文盲的主体队伍变为大批受过正规教育的出国人员，硕士、博士比比皆是，专家教授也不乏其人；由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到职业多元化；由主要奔向东南亚变为主要移居欧美澳。

更令人瞩目的是，随着中国大陆的蓬勃发展，随着海外华人的代代奋斗，海外华人终于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形成国际经济、科技、文化领域中一股强大的势力。

网络系统——海外华人经济体系的形成

到20世纪后半叶，海外华人社会历经千难万苦已发展成为全人类为之赞叹的新体系。

他们再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猪仔”！

他们再也不是忍气吞声的“病夫”！

他们是顶天立地的炎黄子孙！

他们被世人称为优秀的民族的优秀后裔！

海外华人通过自身的能力向世人展示了华夏文明的卓越不凡。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有一位阿瑟·金教授对美国的不同人种的几种专业人才进行调查，用他们的智商计算分数，所得出的结果：华裔得分最高，其次是犹太裔，再其次是日本裔，白人居第四位。1983年3月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美国青少年科学人才选拔赛中，华裔高中生宁致荣获首奖。在获奖的10人中，还有2名华裔中学生。这实际上是一次全美的智力测验。

华裔青少年在美国学术竞赛中出类拔萃的事例不胜枚举。据1985年4月12日揭晓的全美高中十项学术全能赛结果，华裔学生夏旭夺得冠军；5月2日揭晓的美国高中学生最荣耀的“总统奖”评选结果，有7名华裔子弟榜上有名；1984年春，华裔少年罗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获得数学

硕士学位，年仅 14 岁，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硕士。

据粗略统计，美国的第一流科学家和工程师大约有 12—13 万人，其中中国血统的就有 30,000 人之多。

在 1981 年出版的《美国名人录》中列入的华人约 200 名，有的已列入世界名人录，其中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和丁肇中。1986 年，李远哲又获诺贝尔奖金。

除此之外，许多美籍华人还在诸多科研及其他社会领域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如著名的女物理学家吴健雄、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著名建筑设计师贝聿铭、著名化学家丘应楠、著名新闻主持人靳羽西、著名桥牌皇后杨小燕、著名网球名将张德培，等等。

即使在种族歧视比较突出的美国政界，近年来也崛起了不少华裔政治家，如总统事务助理、纽约市副市长、加州州领导等要职都由华人子弟出任，有的还提出要参加美国总统大选。一大批华人还从事了以前不可能从事的职业，如律师等。

据统计，1971 年，在加拿大华人中，经理、科技人员、教师、社会科学人员、艺术家占 17.3%，近年来，这一比例有大幅度增加。

拉丁美洲的华裔经过百年奋争也获得了应有的人权，如今一般都受过良好教育和专门技术训练，他们除了经营企业外，还担任政府公职和从事自由职业和教授、律师、工程师、科学家、医生等工作。如巴西圣保罗航空学院有位著名的华人火箭专家，曾两次得到军事当局的授勋。巴西海军中著名的将领若奥·阿·王和民主运动党众议院议员团领袖甘迪蒂奥·桑帕霍均系华裔。著名的华裔政治家何才曾担任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最高行政职务——总督；前总理、总统威廉斯的岳父和夫人、前卫生部长、现任议员何五史部出身华裔。牙买加华裔毛鲁埃尔·邓任财政部秘书长、何生为工党议员。当选为圭亚那第一任总统的阿瑟·钟也是具有中国血统的政治家。巴拿巴、秘鲁等国均有华裔进入议会和内阁。

东南亚的华人子弟更是成绩卓然。曾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缅甸总统吴奈温、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因军事政变而下台的泰国前总理差猜、稳坐总理宝座达 31 年之久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及其继任者吴作栋总理都是华氏后人。

在欧洲，华人的地位也在稳步提高。蜚声法国政界的华裔成之凡女士曾于 1981 年参加法国总统大选，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竞选总统职位的女华人，1987 年成女士再度参加 1988 年总统大选。她说，她的两度竞选，其目标就是提高欧洲华人的地位，强化世界对华夏文明的了解。她还准备参加 1995 年的总统大选，表现出百折不挠的非凡气概。

上述种种事例无不证明了海外华人的优秀，无不显示了龙之传人的杰出。然而，让全球为之倾倒的还是海外华人的经济成就，以至于泰国一位国王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 华侨是亚洲的犹太人。 ”

东南亚是华人资本的核心，在 1987 年亚洲十大富豪中，除了位居第四的恩莱科·索布尔外，其余 9 位全是华侨华人。所以，东南亚华人经济已成为所在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1992 年 7 月美国 Fortune 杂志列出的世界 233 位拥有 10 亿美元以上的个人或家族大富豪中，有 17 位华人和华裔大企业家，除香港李嘉诚（36 亿美元）和台湾的蔡万霖（34 亿美元）外，主要是

东南亚的华人大财团，包括印尼的林绍良（28 亿美元）、马来西亚的郭鹤年（18 亿美元）、泰国的黄子明（33 亿美元）等。

根据印尼经济观察家斯蒂安托·威比梭 1981 年的调查，华人经济力量比印尼原住居民私营民族资本的经济力量更强大，二者的比例为 2.5 : 1。如从人口数量比例来看，占印尼人口 3% 的华人，其占印尼国内投资资本额的 27 %，而占人口 97% 的原住居民仅占投资额的 11.2%。最近 10 年来，印尼华人资本及其经济事业更加蒸蒸日上。海外有关方面的资料显示，印尼 25 个最大商业组织中，有 17 个由华人所控制。

马来西亚华人企业集团也是当地经济中不可忽视的一支生力军。40 多个华人企业集团所经营的行业几乎无所不包，有的甚至具有垄断地位。

泰国的盘谷银行集团、正大卜蜂集团、新加坡的华侨银行集团、大华银行集团以及菲律宾的施氏鞋业集团等华人大财团的实力亦相当雄厚，在所在国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位泰国观察家称：70 年代中叶，泰国 90 % 商业及制造业资产，为占泰国人口 8—10% 的华人所拥有，银行资金的一半亦如此。菲律宾 67 种最主要的商业用品，2/3 由华人公司供应，较小规模的公司更多为华人占有。

上述数据表明，东南亚华人确实拥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已成为东南亚各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新加坡《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说：“华资在 90 年代异军突起，声震全球，不只提高了华人的社会地位，而且正改变着世界财富分布的历史地理。”

更为引人注意的是，东南亚华人资本已开始步入国际化，展开了大规模的跨国经营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中的竞争，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一支独特力量。例如，由谢国民、谢正民等 4 兄弟领导的泰国正大（卜蜂）集团已拥有 200 多家子公司，业务遍及印尼、马来西亚、墨西哥、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菲律宾“椰油大王”吕希宗组建了椰子种植、椰油提炼与综合利用的联合体，其产品行销网络几乎遍及全球。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财团郭鹤年集团目前已控制了马来西亚面粉市场的 40%、砂矿市场的 80%、国际糖市的 10%，人称“亚洲糖王”。新加坡的杨协成有限公司及马来西亚的杨协成（马）有限公司是东南亚专营食品加工和饮料业的巨头。在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超级对手的竞争压力下，杨协成仍能独占国际市场一席之地。其分公司遍布泰国、香港、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毛里求斯等国与地区。

其它如黄亦聪的印尼金光集团、李文正的力宝集团、谢建隆的阿斯特拉集团、林绍良集团、泰国的盘谷银行体系、新加坡的发展银行集团、华侨银行集团等，都是著名的跨国经营集团。

在美国，二战后华商企业亦蓬勃发展，尤其是东南亚华人资本的涌入更是促进了美国华人金融业的勃兴，由原来寥若晨星的少数几家银行一时发展成几十家华资银行。70 年代中期，华人温孔文集团曾购买了乔治亚国家银行，1976 年又以 20% 的股份买进田纳西农民银行，轰动整个美国金融界。然而，给人印象最深、历久不衰而且蒸蒸日上的还是中餐业。据 1981 年粗略估计，在全美共有华人餐馆 15000 家，纽约市就有 5000 家左右，大约平均每 200 人就有一家。一家美国杂志曾以《哪个国家的菜最好吃？》为题进行了一次

民意测验，结果 90% 的投票者表示最欣赏中国菜。

可喜的是，在美华人经济力量之增长已居美国各少数民族裔之首。据美国商务部 1986 年 12 月 5 日公布的一项名为《亚裔、印第安裔及其他少数民族裔商业》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华裔所拥有的经济力量已跃居各少数民族裔之首，1982 年全美华裔企业有 52,839 家，其次是日裔 49,039 家。华裔企业虽比第二位的日裔企业仅多 3800 家，但总收入却是后者的 2.2 倍以上。而且，当今的华人已不仅限于小食店等小型家庭行业，他们拥有比其他族裔更多的高科技企业及金融机构，比如，曾经个人财产逾 20 亿美元的王安博士，他以王安电脑公司为基地力抗 IBM 等大计算机集团，名列全美第五大富豪，荣获全美 12 最杰出移民桂冠。金融业巨子蔡志勇孤身奋战华尔街，名震曼哈顿，成为全美闻名的“金融魔术师”。

西欧华人经济也有空前迅速的膨胀，到 90 年代初已显示出难以遏制的强劲势头。根据台湾华侨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所编的《华侨经济年鉴》1982 年版和 1992 年版提供的材料，在 1982—1992 年的 10 年间，除荷兰中餐馆总数维持原有水准外，其它国家中餐馆总数均有明显增长，其中又以原中餐业较不发达的丹麦、希腊、葡萄牙、瑞士等国增长幅度最为明显，它们的增长率分别为 14 倍、9 倍、9.7 倍、7.6 倍。西欧各国中餐业的总营业额相当可观，例如，1992 年英国中餐业的总营业额达 5—6 亿英镑。其中，张醒雄所拥有的“万富宫饮食集团”旗下就有 3 家大型中式酒楼，6 家快餐店，还有一家珠宝店和一家超级市场，年营业额在 1000 万英镑以上。此外，西欧中餐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质量和地位都有一定提高。“MICHLIN 星级餐馆奖”是一个已有百多年历史的世界性大奖，它在餐馆服务业的影响可与奥斯卡奖在电影界的地位相媲美。在餐馆如林的西欧，先后有一家英国中餐馆和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四川居”中餐馆荣获该奖标志。近年来，一些中餐馆相继获得“国际饮食业奖”、“金筷子奖”、“金海鲜奖”、“金禾奖”、“节目服务质优味美奖”等国际性大奖。

西欧华人经济的发展还反映在西欧华人经济多元化的规模显著拓展。到 1992 年，德国经营国际贸易的华人公司已有 43 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国贸易公司”，是一个多元经营的跨国集团。法国的“陈氏兄弟公司”创立于 1976 年，经过 10 多年的奋斗，该公司已集进口、批发、零售亚洲食品及日用品为一身，1987 年营业额为 2.7 亿法郎，1990 年猛增至 6.7 亿法郎，1992 年突破了 7 亿法郎，位居欧洲华人企业之冠，是法国著名大企业之一。

除了进出口业以外，西欧华人企业家已逐步向金融、保险、房地产、运输、建筑等领域进军。由华人经营并以华人为主要对象的服务性企业，如旅行社、娱乐中心、书店、珠宝店、美容店等，更是遍布英、法、荷、德等主要华人聚居国。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西欧华人的经济联合已现端倪：有的以亲明好友为纽带，集资共组经济控股公司，如荷兰华人经济控股公司；有的以共同祖籍地为纽带，联合组成投资考察团，如英侨五华商业考察团；有的则以社团为基础，在社团成员间集资建立经济实体，如“德国中华协会”组建的“经营发展委员会”等。

综上所述，全球海外华人的经济势力已构成国际经济中的一根重要柱石，形成了以东南亚为核心，以欧美为两翼的海外华人经济体系。这一体系

还处在发展中。有人预计，它将在 21 世纪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成长为重要一极。

那么，全世界华人的财产究竟有多少呢？据美国俄亥俄大学海外华侨问题中心初步计算，截止 1993 年底，以香港为中心的居住海外的华人约为 5500 万人，他们拥有的流动资产为 20000 亿美元，他们的生产总值起码有 5000 亿美元，他们的流动资产超过了中国大陆，约占日本的 2/3。海外华人世界外汇储备额也相当惊人，泰国 658 万华人，外汇储备额为 234 亿美元；马来西亚 616 万华人，为 154 亿美元；新加坡华人 236 万，437 亿美元；印尼华人 505 万，111 亿美元；台湾分别是 2090 万人和 828 亿美元；香港分别是 590 万人和 371 亿美元；菲律宾分别为 76 万人和 43 亿美元，居住其它地区的华人总数和外汇储蓄额为 321 万和约 20 亿美元。如此强大的经济潜力不仅是海外华人力量的象征，也是海外华人充分发扬华夏精神的结晶。

智慧文明——海外华人经济中的独特精神

马克思·韦伯曾强调：没有企业家阶级便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道德观上的准许，便没有企业家阶级的产生，而没有宗教的根据，便没有适当的道德观。他进而认为，儒家思想妨碍中国人的经济发展，但是海外华人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就，不能不使人怀疑韦伯的片面性。高伟定先生经过对 72 位华侨创业家的访问以及 15 年的精心研究，写成《华人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认为华侨企业家头脑中的儒学观念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企业经营方法和成功的道路。他强调，海外华侨基于儒家的道德观念，为了适应“敌视”的社会环境，因而产生了独特的华人资本主义。实际上，华夏传统文化在海外华人中的传递是持续而广泛的。“华族后裔无论在海内外，年纪无论大小，多多少少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因为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主流，由身教、言教、口传，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甚至一字不识的人，也可以引用一两句孔子或孟子的话，……儒家思想和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流传民间，已是华族生活方式的指南。”正是在这种浓重的传统文化导引下，海外华人驰骋于经济界，将华夏的智慧文明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么，有哪些传统文化基因规范、支配着海外华人的创业过程呢？

一是整体和谐运行至上的原则。视万物为一体并注重整体的和谐是华夏文明中十分强调的一个观念，这一观念在海外华人头脑中影响至深。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奠基于易经，……易经之基本观念是变以达和谐……圣人能与超感之领域——天——联系，又能与肉眼可见之领域——地——联系，以形成三才之原动力。”生意人讲求运气，但也认为，运气应该与天时、地利、人合不可分割。显然，华人社会基本是将整体和谐提升为一种宇宙观而加以重视的，并以这一观念出发去把握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

这一观念表现在种族关系上就是：华人来到异地他乡后，往往并不像西方殖民者那样与当地原住民族发生冲突而去谋求或从事原住民的传统职业，而是顺应经济开发环境，进入矿山、种植园等场所，把握契机，进入商业和服务业渠道，所以能与当地民族合作，在互利互惠原则下共同发展。而且，成功的“华族不渴望在经济上甚或在文化上支配东南亚国家，他们更没有政

吴德耀：《儒家思想与企业管理》见 [马]《星洲日报》1991 年 11 月 20 日。

陈式锐：《申述中华之灿烂文化》，《新加坡同安会馆特刊（1931—1984）》，531 页，新加坡同安会馆 1986 年 9 月出版。

治野心”，相反，正朝土著民族化方向发展。

这一观念表现在人际联系中就是：华人企业家往往把经济现象视为人际间的互动，如何编织人际网络成了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一环。难怪有人说，华侨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区别于西方“个人资本主义”的“关系资本主义”。还有人说，华侨华人经济成功的秘密即在于联系。新加坡著名银行家连赢洲即认为：“成功秘诀是人和。”印尼大企业家林绍良被称为“种树专家”，因他深知：“背靠大树好乘凉”。李文正同样认为，拓展业务“最重要的因素是人际关系”。

这一观念表现在经营操作中就是：华侨华人的经营范围大多是从流通业开始的，但他们并不停留于流通部门。他们清楚社会经济结构本身是由生产、流通、服务等各部门按一定方式组成的，各种环节联系紧密，盛衰与共。因此，早在人口就业和资金投向流通部门的同时，就有不少人力和资金投入了生产部门或服务部门，尤其是二战以后，向生产部门投资的规模更大，小企业变成大集团，当地化迈向国际化，传统产业转向现代产业，成功地构建了一条有机的产业结构链。

二是血缘家族为经营主干的意识。海外华人基于儒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强调家庭既是社会关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细胞，也是经济关系的细胞。因而在海外华人的企业中，最常见的多是些小规模的家庭公司，即使是已经扩展的大公司、大集团，其所有权和控制权也主要由某个或某几个家族所把持。这种企业家族化或家族企业化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企业对员工或家庭对成员的角色要求，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职员对家庭的忠诚会转化为对公司恪尽职守，很少跳槽别走。同时，由于企业为家族成员对企业本身及企业的发展目标有高度认同，管理阶层不需要运用“官僚控制”方法，节省了管理费用，有利于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

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的思想促使地区认同也成为海外华人企业的一个经营特色。企业中多雇佣同乡成员，雇主与员工之间的配合较为默契，不易发生像西方企业劳资尖锐对立的情况。泰国正大集团、印尼林绍良集团等都是典型的家族集团。陈嘉庚的企业中大量招收来自泉州的同乡，反映了地区认同的显意识。但这种以血缘、地缘为认同基础的企业经营一旦控制不好会有难以遏制的弊端：任人唯亲、企业划小、内讧激烈、排斥外人等，有时会酿成灭顶之灾。印尼大亨谢建隆之子谢涵实创业的惨败、美国名门王安电脑公司的衰败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反面教员。

三是勤奋而俭朴的成功之道。海外华人的勤奋是世所公认的。华侨企业家中流行着一句口头禅：“一勤天下无难事。”他们不仅视勤奋为一种工作和生活态度，而且也是劝人向善的道德品德，甚至还是获取和保持财富的重要源泉以及商场上长期致胜的条件。这种认识植根于儒家文化的“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之训。薛来洪，一位来自福建的汉子，现已在日本拥有五层楼的北京料理店阳华楼，同时还拥有一份中文新闻周刊——《阳华侨报》，并在另一个地方开设咖啡馆，但他为此不知流过多少汗水。虽然现有千万财富，他仍每天亲自打扫餐馆门口。一位打扫工具被老板拿走的员工说：“老板总比我起得更早来打扫，真使我觉得不好意思。”同一条街上的“华正楼”老板江夏良与人见面时，一定会先看手表：“对不起，五分钟后我要到别处去”，

简直就像读秒一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这些整日忙碌的华人企业家都遵守一条非正规的格言：“休息要等到死后再说。”美籍华裔金融家蔡志勇更是风趣的说：“要是有人发明一种可以替代饭食的药丸说好了。这样，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工作！”以“拚命三郎”著称的新加坡企业家李光前昼夜不懈，以“年轻时不拼命更待何时”为座右铭，竟致因劳成疾，英年早逝。他们都相信一条成功秘诀：事在人为，功到自然成！

俭朴更是华侨企业家的本性。他们坚信，勤且俭才能成大事，并常常以一句俏皮话来解嘲：“公司的兴亡就在那一块钱上。”他们说：“走到十字路口的正中央，即使看到一块钱也要捡起来。”蜚声全球的橡胶大王李光前财产逾亿，身着便装、家具简陋、一无奢象，令人赞叹。

四是诚信不欺。儒家文化尤其强调为人处事必须取信于人的道理。“信则人任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所以，海外华人在人际交往中十分注重诚信原则。反映在经营过程中，他们一方面强调以诚实为原则来谋求“正当得利”；另一方面则把信用视为商业交易的最高价值，强调“以信用为创业基点”。有一个典型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在香港，一位日本企业家H君因破产而准备回国，他带着一家老小来到机场，垂头丧气地等候班机，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姓王的华人匆忙跑来，他是一位曾与H有过交易往来的商人。他说：“我是专程送钱来的”，手里拿着的钱，大约值现在的百万元日币。姓王的华人知道H君即将离港，急忙向认识的人借账，凑齐这笔钱特意专程送来，他说：“这笔钱如果今天不还，也许一辈子都遇不到你了，这么一来，我就成了欠债不还，没有信用的人了。”一席话让H君感慨万千。从此，两人成了经常保持联系的至交。

正是靠这种成功的不二法门，海外华人企业不仅在所居地站稳了脚跟，而且成为蒸蒸日上的优胜者。

2. 次生文明：东亚经济的腾飞

如果说以儒学为核心的华夏传统文明成为海外华人个体创业的基点，那么，它同样也是曾浸润华夏文明几个世纪的东亚诸国及地区创造经济奇迹的文化底蕴。

东方崛起——东亚的经济腾飞

东亚由中国与日本两个大国及若干个东亚边缘区的小国和地区组成。因中国的发展有专节论述，在此，所谓东亚，即指除中国之外的其它国家和地区。到二次大战时为止，除日本外，东亚地区都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经济欠发达状态。二战后短短的 40 多年中，东亚地区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高速发展的惊人成就，被世人称之为“经济奇迹”，誉之为“东方的崛起”。

日本经济是在二战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50 年代的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几十美元，其产品在美国只要有“日本制造”的字样就会抑制人们的购买欲。当时尚为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毫不犹豫地给日本经济贴上了“日本人生产不出美国所需要的产品”的封条。80 年代，日本人骄傲地揭下了自家门上的封条并使美国人将封条不情愿地贴在自己的家门上：“美国人生产不出日本所需要的产品。”

经过战争大劫的日本以经济复兴为首要国务，经济第一的施政方针加之日本资源贫乏的状况使日本走上了“贸易立国”之路。甚至在 60 年代初池田首相访法时，法国总统戴高乐讽之为“半导体推销员”。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注意对国内市场的严格保护，进而促进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发展，加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并下大力量开拓国际市场。所以，日本经济实际上是国际贸易的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辩证统一过程。一方面，国际贸易的增长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优厚的资金；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优化又为国际贸易的拓展提供保证领先世界的拳头产品。从战后到本世纪 80 年代，伴随贸易立国向技术立国的战略转换，产业结构也经历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战略（优先发展轻工业和轻机械工业）向资本密集型企业发展战略和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企业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电子工业）的转化过程。

日本经济战略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到 1980 年，日本的小汽车年产量已领先美国和西德，稳居世界汽车业之冠，电视机、收音机、商船等年产量也跃居全球第一。钢和生铁的产量仅次于当时的苏联，为世界第二。其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在 1976—1985 年期间已远远超过美国、西德、英国和苏联。日本名正言顺地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之列，成为世界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

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的经济腾飞是东方崛起的另一重要标志。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均系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扩大的带动。这是由于“四小龙”都是海岛型经济，本国资源匮乏，市场较为狭小，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四小龙”相继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注重对外贸易。该战略使“四小龙”的贸易额惊人增长，很快成为世界上出口贸易发展最为迅速国家和地区，出口贸易的年增长率达到 10%。它们的产品主要销往美国、日本和欧洲，在对美贸易上，与日本一起并列为美国贸易赤字加剧的罪臣。1988 年美国贸易赤字为 1395 亿美元，而对东亚地区的贸易赤字就达 899 亿美元，占美国赤字总额的 64%。出于对国内贸易的保护，美国把日本列为对美贸易“不

公正”的国家，台湾和韩国则被列为“优先观察国”，1989年，美国取消对“四小龙”的普惠制待遇。

贸易的增长即使“四小龙”濒于瘫痪的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又使“四小龙”从贸易增长带来的财富中获得改善或调整其产业结构的前提。到70年代末，“四小龙”已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林，80年代的“四小龙”更以其巨大的潜力与活力为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注入了一针兴奋剂，成为许多落后国家效仿的榜样。9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放慢了速度，“四小龙”仍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从而使其占据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排行榜之首。见表5—1。

表 5-1，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力

国家和地区	年代		国家和地区	年代	
	1993	1992		1993	1992
新加坡	1	1	韩国	6	5
香港	2	3	泰国	7	6
台湾	3	2	墨西哥	8	7
马来西亚	4	4	委内瑞拉	9	9
智利	5		印度尼西亚	10	10

由此可见，在东亚地区，以日本为首，经过韩国，南至台湾、香港、新加坡，形成了西太平洋上一条新工业带，呈现出强烈的经济冲击力，不能不使西方发达国家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且看表5—2。

表 5-2，经济增长比较

人均 GNP*	经济年均增长%		GNP 年均增长%		人均 GNP
	1950 年代	1960 年代	1970 年代	1965-1988 年	
日本 251 美元	6.4	10.5	5.2	4.3	27326 美元
新加坡 434 美元	5.4	8.8	8.4	7.2	15200 美元
香港 222 美元	9.2	10.0	9.4	6.3	16382 美元
台湾 95 美元	8.1	9.3	10.4		10215 美元
韩国 78 美元	4.7	10.1	9.3	6.8	6635 美元
所有工业国	4.2	5.1	3.2		

*按 1964 年美元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罗荣渠《现代化新论》214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版。

在亚洲“四小龙”的带动下，东亚又出现了“新四小龙”或“四小虎”。这是对东盟国家中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四国的雅称。“新四小龙”与“四小龙”不同，有着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但各国经济实力极不平衡，国际竞争力也有显著差异。从表5—1中也可以看到，马来西亚超过韩国在1993年中成为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中的第四位，泰国屈居韩国之后，位到第7，菲律宾则榜上无名。但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言，按世界银行的分类，1990年，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为中等收入国家，印度尼西亚为低收入国家。所以，与“四小龙”同享“小龙”的赞誉，与其说源

自“新四小龙”各国的经济实力，勿宁说出于各国的巨大潜力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有些人将“新四小龙”的崛起归结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促进。实际上，日本及“四小龙”等国家的大量投资在“新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中确实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外国投资对“新四小龙”的崛起并非简单地表现为原因，从某种意义更表现为结果，“新四小龙”以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表现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巨大潜力不能不说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日美贸易摩擦和“四小龙”与美国贸易摩擦使日本和“四小龙”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日本及“四小龙”都面临劳工短缺、工资上涨的压力，相继将目光转向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些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换回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1986—1990年，“四小龙”对东盟四国的直接投资由4亿美元猛增至129亿美元，日本的投资方向自80年代以来也显然移向东南亚诸国。

基于以上优势和机遇，加之“新四小龙”国家经济政策等方面因素造就的外商投资环境，80年代中期以后，“新四小龙”开始显示出较强的发展势头。80年代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经济年增长率分别为7%、5.3%、4.9%、0.7%，1987—1990年的经济增长幅度更猛，他们的工业产品出口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已由1965年的9%增至1990年的21%。

鉴于东亚经济稳定高速增长，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长达390页的调查报告，题为《东亚奇迹》，报告中将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和泰国列为东亚的八大“超级明星”。报告指出，自1965年以来，这8个超级明星的经济年增长率为5.5%，比东亚其他地区快一倍，比拉丁美洲快2倍。

全球有识之士不禁在问：东亚经济奇迹的奥秘是什么？“东亚模式”一时成为世界经济论坛中的热点话题。

世界银行指出，没有简单的东亚成功诀窍，更没有单一的亚洲经济模式。八大超级明星实行的是各种政策的大杂烩，国家干预的程度各不相同。香港实行的市场政策似乎比世界上几乎任何国家都自由。日本和韩国实行的是最严厉的干预政策。而且，它们的政策也时常变化。例如，韩国在60年代是全面促进出口，到70年代则有选择地着重促进重工业。在80年代又改为注重支持技术开发和调整较薄弱的工业。

但是东亚地区的日本、“四小龙”和“新四小龙”在经济发展中也确有不少共同之处。这种共同之处应该就是所谓“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吧。

其一，政府对经济实施积极而灵活的干预，特别是在促进投资和把投资引向重点行业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二，政府执行了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即普遍实施了进口替代战略，并根据时代要求，及时调整产业结构。

其三，政府与企业界紧密合作，政府积极寻求企业发展的空间，企业依赖政府的战略指导。

其四，注重控制通货膨胀率，采取适中的财政政策，具有很高的积累率和居民储蓄率。

其五，政府大量投资于教育，尤其注重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投资，因为初等和中等教育对于培养熟练的劳动力极为重要。

这一系列作法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作法不同，又与诸多发展中国家有较

大差异，可以说是东亚模式的核心。

次生文明——东亚崛起的文化底蕴

令人最感兴趣的是，既然东亚地区曾长期受中国儒学文化的沐浴，那么，儒家文化究竟在东亚经济的腾飞进程中起了什么重要作用呢？这一话题还得从韦伯命题说起。

本世纪初，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和儒教伦理的对比研究，探索了现代东方落后于现代西方的文化基因。尽管韦伯并未完全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构因素，也未认定儒教伦理是阻碍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因素，但世人从此便认定儒学是东方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并处于长期落后地位的深层致因，并将此说法归源于韦伯命题。西方学术界也大部开始集中于儒学文化的消极落后方面，甚至连中国学术界也群起效尤，儒学文化被视为中国长期落后的罪魁祸首。

战后东亚的崛起震惊了世界，更冲击了国际学术界。许多海外学者开始从历史文化背景重新审视儒学文化的组成要素，并思考其中哪些要素有可能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功能。较早从正面剖析儒家伦理对东亚经济奇迹的贡献的是著名学者、“大过渡理论”的创立人赫尔曼·康恩。他认为，东亚社会所共有的儒家伦理是：工作勤奋，敬业乐群，和睦相处，尊敬长上，强调协作，而不是突出个人或利益等等。这一伦理被称之为“新儒教文化”。卡恩断言，这种更新了的儒学文化比西方的新教伦理更加适合于经济增长。

美国波士顿大学宗教与社会学教授彼得·伯格认为，东亚文化因素的作用与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相似，也可能为宏观经济发展提供一种“比较优势”。他指出，尽管中国士大夫的儒学思想有害于现代化，但虽未读过儒家经典而在日常生活中口传身教的道德伦理这种世俗的儒教或“后儒家伦理”是东亚经济活力之源泉。

华人世界的研究者也不甘寂寞，几代新儒学人士都在不断地寻求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结合点，东亚的崛起为他们的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基础。他们几乎都肯定：儒家伦理中蕴含着强烈的成就动机，儒家思想中含纳着许多“实践理性”的东西。台湾学者黄光国先生以台湾的“人治式”家庭企业为研究核心，剖析了企业中儒学伦理的作用，颇具说服力。

对于儒学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何新先生说得好，“至于所谓‘儒家文化’，固然有其优良的一面（正如西方文化也有其优良的一面一样），但如果说儒家文化与现代有什么必然关系，那么正如说西方文化与现代具有某种必然关系……同样是荒谬的！”确实，现代化的实现取决诸种因素的配合，不仅在西方文化基础上可以实现现代化，在儒家文化基础上能实现现代化，在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非洲文化等基础上同样能实现现代化。然而，藉此便说儒学文化与东亚地区的经济腾飞无任何有机关联，便不免有顾头不顾尾之嫌，忘了自己尾骨上还留有祖先的痕迹。作为东亚地区文化底蕴的儒学文明毕竟在该地区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它自身的独特作用，因为由儒学文明长期浸润而形成的民族心理、文化氛围、国家政治风格、社会管理方式等不能不对经济的发展发挥出自己的潜在作用。

据笔者之见，以儒学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在东亚地区经济复兴进程中主要在以下几个宏观方面显示了它的作用和影响。

参见黄光国《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版。

其一，群体本位的民族精神。

有人称西方社会为“契约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都只是一个契约的维系，而契约的本质在于个人本位，契约的前提在于利益或金钱。儒家文化追求以群体为本位，以家族为中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重伦理而非契约，重情谊而非金钱。李约瑟博士在总结欧洲社会的内在不稳定与中国社会的动态平衡性时说：“财富给人以舒适的生活，但不给人以智慧，因而在中国靠富裕带来的威望相当少。”这就是整个东方社会群体本位的伦理学基础，一位日本学者因之而有此说：“与儒家伦理相连的家族集体主义可能是‘儒家文化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整个东方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灾难，除了中国饱尝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痛苦外，北朝鲜、韩国亦伤痕累累；东盟各国损失惨重；日本经济一败涂地，衣衫褴褛者随处可见；台湾本已萧条，蒋军残兵败将的“百万大移军”更使之雪上加霜；香港追随西方，封锁了大陆，也封锁了自己，成为“臭港”；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困窘万千，有人预计她即将崩溃无疑。在如此困境下，经济如何腾飞？日本政府要求国民团结一致，为经济振兴而奉献自身。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得好：新加坡的成功，第一是“争取成功的强烈意志把人民团结起来，第二是人民的刻苦耐劳。”这里所谈的其实就是群体本位观在东方民族心理、民族精神上的体现。正是东方各民族的克勤克俭、居安思危、百折不挠、团结一致的品质使东亚地区顺利渡过难关，摆脱危机，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东亚人民皆以劳动为荣，以为团体奉献为荣。有关资料表明，日本工人以每周40小时的劳动为世人称为“工作狂”、“机器人”，韩国工人每周平均劳动时间比日本工人还高10小时以上。1988年，52个国家和地区的劳工调查表明，世界工人年均工时为1996小时，香港工人竟高达2627小时，香港被视为世界劳工工作最紧张的城市之一。正是如此废寝忘食的劳作为东亚地区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奠定了经济腾飞的基础。

东亚地区的高积累率与人们崇尚俭朴的习惯有着必然的联系。台湾国民储蓄率在1987年达到39.9%，60—80年代的香港一直保持在27—29%的水平上。1988年，新加坡的储蓄率竟高达41.9%，而同年的美国只有6.6%。无怪乎有人称东方社会为积累型社会。

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华夏古代文明养育了东亚人民旺盛的进取精神，培植了艰苦创业的品质，造就了万众一体的性格，从而使他们在山河破碎之时顽强苦干，创造了富有生机的东亚奇迹。台湾学者黄景汉异常感慨地致言：“从各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力量，非常适合促进现代化经济发展。”

群体至上的精神在企业管理中往往体现为公司与个人的二位一体化，企业员工提倡“办公司之事，亦若办自己的事”，企业主一方面推动企业的发展，一方面注重满足员工的利益要求，增强他们的归属感。

在对外竞争方面，东亚诸“明星”也与西方个人经营的个体企业不同，往往形成庞大的由国家支持的企业集团，增强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韩国一位学者认为，这是东亚地区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一种独有形式，人称“东方形式”。日本著名学者界屋大一在《知识价值革命》一书中断言：

日本“官民一体”的企业经营战略是不同于植根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西方工业社会的主要差异之一。

其二，人治型家族式的企业管理方式。

一位韩国学者在 1993 年 11 月 25 日的《汉城经济新闻》上撰文认为，美国的资本基本上是以个人所有为主的，而韩国、台湾、日本的企业则是以家庭或家族为中心的所有制，并认为这种所有制推动了东亚经济的发展。

在这种家族企业中，管理者往往强调人是企业主管者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他们认为，“大公司的行政、小公司的管理，总离不开人。决策者是人，受影响者也是人。”因此以人际关系规范来调节企业员工的关系及利益便成为企业致胜的法宝。在这方面，他们受儒家“孝”的伦理要求影响较深，尤其是领导与决策更是如此。东亚企业中，年纪和资历相当重要，权力与薪金紧密相连，人治比法规重要。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是家长与经理集于一身，即使是大企业的高层领导权一般也掌握在家长、子侄和元老手中，管理手法也相当“家长式”。对待员工的态度有如家长对待子女一样，有专断的一面，也有关心的一面。在决策问题上，往往是最高层一人定夺，有时甚至由公司外的“长者”定夺，组织性的咨询意见很少，下层意见是否影响决策，主要视建议人和负责人的亲近和信任程度而定。

在这种家族式企业中，管理者往往强调道德的力量。认为管理者必须对道德具有清楚的观察，因为德性是操之在我的，我欲仁斯仁至矣。管理的具体知识并不是不重要，而是既多又难，永远难以全部学会。庄子曰：“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既然如此，倒不如提升层次，从德性的修养入手，反而简易、可靠得多。所以，这种“人治式”管理十分重视“修己”，他们相信“己欲立而立人”，“自己要管理好自己，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得成。”他们还相信，管理者的“修己”足以感动人心，追随者一旦发生感应，便容易产生变异，与管理者同化。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是也。

可见，东亚地区的企业管理方式主要从企业员工的社会性、可塑性角度进行管理，与西方管理界将人视为“经济人”、“机器人”的古典理论模式有质的不同，与以行为科学为代表的强调个人激励的现代管理理论也有明显差别。他们既重视制度约束又加强保姆式督导；既强调工作效率，又注重营造和谐气氛；既宣传西方的利益观念和成就感，又重视东方文化中的“诚”、“信”、“义”、“勤”等品质。

日本学者涩泽荣一形象地称此为“论语加算盘”式的管理。台湾巨富王永庆先生称此为“东方式的管理方式”。其效率究竟如何，东亚企业的成功已作出了最有力的回答。

其三，倡学重教、科技在前的国策。

韩国学者指出，儒家经典《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强调教育，建议在今天的世界经济战时代，有必要对国民进行世界经济教育和市场经济教育，也有必要对工人、经营者和企业家进行传统道德教育。

教育是兴国的基石。这是东亚地区政府与学者的共识。

从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到世界最早的教育学专著——《学记》中“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警示，都无一例外地证明儒家对于教育的高度重视。倡学重教因此便成为受儒家文化影响至深的东亚地区的优良传统之一。

1950 年台湾只有 1 所大学，1988 年发展到 16 所。1980 年日本大学生入

学率为 30.5%，高于当时的西德（26.2%）。韩国大学生入学率提高也很快，仅 1980—1984 年间便由 15.7% 上升为 29.4%，超过了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就 1991 年的成人识字率而言，韩国 92.7%，台湾 91.2%，香港 88.1%，新加坡 82.9%，高居世界前列。

东亚地区各政府对教育及科研投资从不吝啬。自 70 年代起，新加坡就实现了从小学到大学免费教育。香港的教育经费占政府开支的比例往往在 20% 左右。日本和韩国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1983 年分别为 2.6%、1.1%，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台湾 1950 年教育经费为 1.5 亿台币，1990 年为 2452.7 亿台币，40 年间增长了 1293 倍。应该说，东亚地区在教育方面的政府开支并不大大高于其他地区，但与众不同，教育开支中用于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比例比高等教育更大一些，其理由前面已提及。80 年代中期，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都把 80% 以上的教育预算用于基础教育，而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用于基础教育的预算还不到 50%。

东亚地区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为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适应该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提供了劳动力素质的保障。

其四，为政唯贤的行政管理之术。

儒家学说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为政之术，尤为强调为政者的基本素质——德贤、才贤两方面，即所谓德才兼备。“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为政之术的核心之一。在儒式政治经典里，对人的描述多于对制度的描述，把政治家的品格看得比制度还重要，“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那个人物必然也就是“天下归心”的那个人物，施行德政的也必然是君子、贤王。翻开《论语》，通篇一幅君子理政的图画。

东亚地区长期奉行“一党独大制”，是“威权政治”的典型表现形式，导致职业官僚在东亚政治结构中的特殊作用，政府的积极干预，高度的政治稳定，等等。韩国金日坤教授认为亚洲儒教文化圈的最大文化特征，是“家族集团主义的社会秩序”。这是东亚传统集权政治与近代西方政体的一个混合体。因此，它非常强调文官的德才兼备，注重选拔的严格程序，设置完备的监察制度等。尤其看重“为政唯贤”原则的贯彻。韩国朴正熙政权、金泳三政权的两次大规模肃贪行动、新加坡廉政机构的震慑、香港廉政公署的铁面无私等等无一不是这一原则的典型体现。他们均认为，“为政唯贤”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只有政贤才能使政府永远掌握民心所向，只有政贤才能保证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对此，李光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不认为日本、台湾、南韩或新加坡以美国或欧洲的政治制度为自己追求的理想模式。社会发展的特性决定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并不是要完全抛弃他们已经实践着的制度而采用某种全新的制度。”

可以说，东亚地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的特点决定了国家的特殊地位，而在儒学浸润之中形成的为政之术从中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推动了经济的腾飞。

总之，以儒学为核心的华夏传统文化对东亚崛起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们不妨解剖一只“麻雀”。

实例剖析——新型儒式国家新加坡

如何评析儒家文化在新加坡成“龙”过程中的作用呢？从新加坡的经验中，我们归纳出两点：一是儒家企业精神；二是一个有秩序、有弹性的儒式政府。

在新加坡国民中，华人占 76%。从 19 世纪初到本世纪 40 年代，中国不断有移民下南洋，新加坡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也是一个最密集的落脚点。新加坡的开发与繁荣与华人的不懈奋斗是分不开的。在民风敦厚散漫的马来人看来，华人如同聚财奴一般。新加坡的早期资本积累，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华人的节俭和创业。他们勤奋、机巧、耐劳，几代人苦苦奋争、锲而不舍，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赚钱吗？实际上，华人拼命挣钱为的是实现儒家为之称道的“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荫及子孙”等人生要则。正因如此，新加坡工人以其勤奋、守纪、聪明被美国《商业周刊》连续 11 年推举为“世界最佳工人”，并赞之谓“儒家企业精神”。

儒家企业精神大体可归结为两点：工作动力论与关系和谐论，这两点又可归结为一点，即家庭所散发的力量。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在申请公共房屋时，如果成年子女仍和父母住一起者，可获得优先权，大家庭不仅是儒家传统的一部分，亦有助于减少国家用于抚养老人的财政支出。李光耀宣称，在维护家庭美德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建立起团队精神、集体精神。每个人都为团队作出最大努力，这团队就是国家。反过来，国家关心个人、公正平等，政府的艺术就是建立团队精神的艺术。”难怪步日本之后尘，新加坡亦被称作 260 万人的“新加坡有限公司”。

但是新加坡的成功并不完全归因于儒式伦理。一个企业经营得好坏，不仅与员工素质有关，而且与经营制度、经营方式有关，还与政府的“服务”态度、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有关。在新加坡，外资走业与华人企业相比，儒家色彩要淡得多，但成功率很高。可见，新加坡成功的最关键因素还不是企业精神，而应是政府的素质和风格。实际上，新加坡在经济体制方面与西方国家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构性，差别较大的是政治观念与政治风格。而儒家文化的影响突出表现在这个岛国有一个“好人政府”或“君子政府”。这个“好人”既是谦谦君子，又是铁腕人物，既“贤”且“王”，这便是儒式政治。

李光耀就是一位坚定的“君子当政主义”者，他公开声称：“任何社会都会有一个最高阶层，其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 5%，德才兼备。正是有了他们，我们才有效地利用了有限的资源，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出类拔萃的地方。”新加坡最宝贵的资源是人，在李光耀看来，精英分子又是宝贝中的宝贝，他常提起新加坡的前途寄托在部长们的人品和素质上。他还说：“如果这 300 人死于飞机失事，那么，新加坡将分崩离析。”为了培养“君子”官员，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政府可谓费尽心机，在高级官员中实行职位轮换制。李光耀说：“高级官员必须熟悉新加坡的一切，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从商业、制造业到工会乃至体育协会。”从小学到大学，实行分流教育制，最杰出者留学美日澳归国后，成为各部门的精英。两个重要的机构由总理署直接领导，一个是人员编制局，另一个是腐败行为调查局，新加坡不仅注重“君子”的培养选拔，亦严厉约束“君子”们以身作则。“君子”之上便是“贤王”。李光耀宛如一位“贤王”，执政 31 年，他威严、清廉、博学、勤奋，具有高度的使命感。

好人政府的另一特点是强硬的政风，严格控制反对党的发展，政府几乎无事不管，社会成员比较尊重和服从权威，社会秩序良好。李光耀对此有自己的见解，他说：所谓民主，并没有固定的标准，不同的文化、历史和民族具有不同的民主。在如此信条指导下，新加坡政府在对经济充分发挥干预、调节和启动作用的同时，把手伸得很长，通过人民协会加强对基层事务的控制；通过法定机构，推动国营企业参与工商业竞争；政府还屡屡发起各类社会运动，如清洁运动、敬老运动、扫黄运动、国民意识运动等，30多年来各种运动数目在200以上。

李光耀如何看待新加坡的儒式政治呢？他否认新加坡政府实行的是传统的独裁能人统治，尽管他承认部分是事实。他认为，在华人传统中，统治者是胜任其职的人，具有某种学识能力的人，是正直的人，但他们是世袭的，而“每五年，我都必须面对选民”。

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性，“好人”政府反复号召保持一个强健的社会，号召国民讲礼、勤劳，注重家庭、爱国，并强调秩序和稳定。1988年李光耀对大学生讲演时说：“华人失去其儒家性格的一天，也就是我们沦为又一个第三世界社会的那一天。”在新加坡政府看来，如果一种有2500年历史的行为道德能够赢得选民，它难道不能塑造一个更好的公民吗？也许一个“好”社会长远来说比一个“富”社会更为重要。

“好人政府”、“好公民”可说是新加坡所弘扬的儒家文化之核心内容。

从东亚的经验看来，该地区的资本主义确实与植根于个人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无怪有人指出：东亚已制造出一种，“非个人主义类型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正因如此，美国学者比尔·鲍威尔在美国《新闻周刊》上撰文声言：“亚洲人的儒教已对西方所坚持的价值观发起挑战。”德国《斯图加特日报》也不由得喊道：“远东呈现出一片觉醒的气氛。”

东亚内部更是一片“醒狮吼声”。新加坡一位官员称，西方的价值观念不适合亚洲。他说：西方价值观念并不是一张天衣无缝的网，其中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必须摆脱西方的角度才能看清楚西方是怎样使自己相对衰落的。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也说：“亚洲文化复兴方兴未艾”。新加坡前驻美大使许通美更直言不讳地说：“亚洲人世世代代一直学习西方，我们还将继续这样做。但我希望，西方人也应当心甘情愿地向东方学习，现在已经是时候了。”

这一轮新“东方热”促使众多的西方人把目光转向东方，学习中文的人愈来愈多。在中文教学的市场上，中国大陆拥有最高的市场占有率，并开始推行针对外国人的“中文水平考试制度”。在台湾9所公私立大学的中文课程中每年都有大约3000人以上的西方学生。美国一些眼光长远的商人开始重视“东方崛起”的机遇，不少英文杂志瞄准了富裕的亚裔美国人，其中《A》和《容颜》已颇具影响。

此外，东方崛起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华人经济带”的兴起，这既是经济的腾飞，又是华夏文明复兴的先兆。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利用这一机遇，构建了以血缘地缘亲缘为依托的华夏文明联结战略。这就是世人所称的“大中华圈”战略或“华人经济圈”战略。

《远东经济观察》1988年5月19日。

《中国论坛》（台北）第222期《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一文。

3. 大中华圈：华夏文明的联接

“大中华圈”包括华人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也包括华裔企业家、贸易家和金融家在其所在国和地区内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地方。大体言之，“大中华圈”分为三个层次：

中国大陆居第一层次；

香港、台湾、澳门地区和新加坡居第二层次；

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居第三层次。

这个超越国界的“竹网”共计有 14 个单位，面积约 1500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16 亿。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之所以被纳入“大中华圈”是因为不仅华侨在这些国家中占很大的比重（印尼 30%、马来西亚 26%、泰国 8%）而且华人公司占这些国家私营部门的 70% 左右。比如，华侨注册企业在印尼、马、泰三国股票市场股票市价总额中分别占至 73%、61% 和 89%。

这个以华人为基础的经济圈正在形成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新中心。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拥有大量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台湾）、杰出的企业经营、产品推销以及提供各种服务的智慧（香港）、优良的通讯网络（新加坡）、巨额的金融资本（上述三处），以及庞大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来源（中国大陆）。

大势所趋——构建“大中华圈”之因

看今日环球，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正显著加强，几乎所有重要国家和地区都有经济集团为依托。其中最为强劲的欧共体正变得愈来愈内向，贸易保护主义走上前台。大洋彼岸的经济巨头美国已精心构筑起了自己的防护篱笆——北美自由贸易区。夹缝中的新兴东方国家若要保持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经济走向进一步联合是大势所趋。东盟性质的日益经济化以及东南亚崭露头角的“经济发展三角”都是这一趋势的本能反映，但这毕竟力孤势单，缺乏内在动力；而中国大陆正着力于国家的现代化，不能不依托于周边的经济强邻。因此，对于中国和东南亚华夏文化圈的国家而言，“大中华圈”的建构乃是客观世界经济政治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在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一片萧条的形势下，“大中华圈”内诸国与地区可谓一枝独秀。在经济增长、工业扩展和产品出口方面，保持了稳定前进的势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一直在 10% 左右。1992 年，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4.5%、6%、6.5%；同期，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8%、8.7%、4.1% 和 6.6%。面对西方贸易壁垒的压力，它们亟需广阔的市场和人力资源。台湾，由于地价上涨和劳力短缺等因素，境内投资环境正在恶化，许多企业不得不进入大陆谋求“生存空间”。香港回归祖国的日期正临近，我们必须提前加强发展各种关系，尤其是经济文化关系，以免使之再度变成“臭港”。就中国大陆而言，对外开放、改革体制的双重深化为外资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具有强烈的投资引力。

可见，构建“大中华圈”既源于“圈”外的压力，又有“圈”内的动力。

于是乎，从中国大陆到东南亚的广大地区，“大中华圈”正悄然兴起，香港、台湾及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企业正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力量相互融合，联为一体。

自 1992 年春起，仅两年半之间，香港的上市企业——中策投资有限公司就取得了中国大陆 65 家国营企业的经营权，在福建省泉州市购入了 40 余家

国营企业 60% 的股票，其活动遍及浙江、山西、辽宁，触角延伸至整个大陆。中策并非单纯的香港企业，而是印度尼西亚颇具影响的华人企业席奈尔玛斯为展开对大陆的投资而收购的战略企业。

泰国最大的稻米出口公司、华人企业沈华升集团于 1992 年 11 月初宣布，它将在广东省汕尾市兴建从植林到造纸的一条龙式生产厂，总投资额为 10 亿美元，为大陆农业相关方面外来投资中规模最大的投资。该集团将租借约 3.2 万公顷土地，为期 50 年。1994 年起开始植林，计划在 10 年后，工厂全年能开工作业时，年产 12 万吨纸张、15 万吨纸浆。

香港、台湾与广东、福建、海南在经济上自然结合而诞生的“华南经济圈”正值兴盛时期，其国内生产总值合计为 2600 亿美元（截至 1989 年底），凌驾于东盟之上。华南的崛起带动了流往东南亚的华人企业大规模转向。

东南亚华人企业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也令人瞩目。泰国 CP 集团以农业经营为主（除生产外，还从事农产品的加工及销售），拥有约 50 家合资、全资的子公司，对大陆的投资可谓首屈一指。同样，泰国曼谷银行、菲律宾发展银行、印尼里宝等有力企业也以香港为据点，展开大陆投资竞争。此举产生了加速港、台企业对大陆投资的相乘效果。1992 年 1—6 月，台湾企业对中国大陆投资达 13 亿美元，首次超过了美、日两国。到 1993 年 10 月，5000 家台湾企业已在大陆设厂，累计投资达 50 亿美元。

中国大陆企业对香港的投资累计已超过 120 亿美元，犹有进一步增加之势。同时，大陆企业透过华人血脉网络，已展开对东南亚的投资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大中华圈”的兴起，华人企业已开始摆脱日本的经济技术制约。正如印度尼西亚里宝集团副董事长李宗所言，日本的经济虽然强大，但只是一个点。而“大中华圈”在亚洲则是面的延展。

港台学者对该趋势亦非常关注，他们称之为“华夏体系”，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和“国际影响”，强调各方应以文化、血缘为基础进行深层次的合作，从而使各地华人构成一个“世界体系”，该体系将是一个“跨越边界、跨越产业、跨越世纪”的发展协作系统，表 5—3 就反映了该系统的作用和关系。

这是港台学者及企业家精心设计的一幅“大中华圈”简图，其范围十分广泛，代声了海外华人重建华夏文明的宏愿。

华南经济圈——“大中华圈”的试验场和辐射源

华南经济圈在狭义上指中国广东与香港在金融、贸易、资本领域的有机结合，面积约 18 万平方公里，人口 6600 万，国民生产总值为 1000 亿美元（为泰国的 1.3 倍），人均 GNP 为 1528 美元（约为印尼的 3 倍，并远远高于东盟的 918 美元）。

从地缘经济角度看，华南经济圈毗邻太平洋贸易航道，是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地区）及发展中国家三大经济力量“历史邂逅”的舞台，也是 90 年代及未来 21 世纪亚太与世界经济活力的策源地。

首先，它成功地在中国大陆创造了一个香港，为上海等大陆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的筹建提供了经验。华南经济圈已成为中国经济“黄金海岸”——拥有 4.5 亿人口的沿海地区——的核心。对中国的整体经济格局而言，它将是联结亚太和西方的重要经济纽带。其一，由于深圳的“香港化”，及粤闽证券市场与港台的衔接，该地区将成为中国沿江、沿边地区通过债券、股票吸收国际间接资本的重要窗口。其二，由于内地科技人才的“南飞”，及台港

科技信息与批量生产工艺的“北移”，华南经济圈将成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基地，形成以高科技、大金融、软系统为主的新经济支柱。而其劳动密集型产业势必因此而向华南边远地区转移。其周边的内陆省份将大受其益。

其次，它实现了两种经济机制的密切吻合与衔接，使香港在“一国两制”方式下回归祖国的同时，能够保证国际金融地位的屹立不动和制造业活力的长盛不衰。

在众多的局部经济圈中，华南经济圈推动了香港经济的“外延式发展”，即通过制造业的北移，建立了“大香港”，进而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自80年代后期始，香港经济的“脱制造业现象”急剧发展，大批制造业工人转向第三产业。经济服务化的结果，致使香港制造业陷于困境。而广东的“加工、生产基地化”，给香港制造业重新注入了活力。目前，香港在粤投资160亿美元，广东省约有200万人（每4个广东人中就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就业于港资企业。

90年代，以港粤为核心的狭义华南经济圈正在发生外延与内涵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主要依据两条经济规律：

一是商品经济“水往低处流”的规律。首先，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商势将加快或扩大对“华南经济圈”地区的投资。亚洲的华侨自不待言，在美洲的华侨资本亦将东进，按更大的经营规模来设计投资计划。台湾和东南亚的华人与华侨企业已陆续进入香港，或在香港扩充并加强了分店和子公司实力，以便把香港变成对华贸易及横跨全亚洲经济活动的枢纽。其次，美国出于加强对日竞争及维持在亚太经济势力的考虑，将积极扩大向华南地区的投资。美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日趋扩大，双边贸易在1991年达到170亿美元，投资总额超过70亿美元。再次，日本预计广东将在与香港的经济融合中获得发展，两地将形成一个“崭新”的、具有“国民经济”规模的经济圈，并成为亚太的经济“热点”。因此，日本在香港的直接投资于80年代中期起迅速增加，截止1990年底，总投资额高达92亿美元。第四，台湾经济界认为，广东是大陆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他们需要华南地区作为其“北上”战略的“试验场”，摸索对大陆投资的经验。为此，台湾经济界已在规划对华南的投资，由此转向内地。迄今关系疏远的香港经济界与台湾经济界，以对华投资为契机，已出现了加强合作的势头。

二是经济发展“阴凉带”欲吸收经济“阳光带”照射的规律。中国大陆的海南、福建、广西、云南通过人、财、物、信息交流，自然而然地被卷入或主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越南、老挝等也在积极增强与“华南经济圈”地区的联系。云南省出于加速对外开放的考虑，提出了“东联沿海省、面向东南亚”的战略。近年来，云南已开通了至厦门、汕头、广州、海口等航线，与广东进行大规模能源建设合作。

从目前亚太一些国家的发展动向看，华南经济圈的外延还将有所拓宽。如越南正争取得到世界银行的援助，发展同中国的铁路联系，从而使海防港能成为通往华南的铁路起点。

在狭义华南经济圈的基础上，一个广义的华南经济圈正应运而生。其成员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广东、福建、海南，总面积达37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国民生产总值合计2769亿美元，人均GNP为2203美元。从某种意义上讲，该经济圈是以陆港台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为纽带的狭义“华人经济圈”。

华南经济圈的战略优势在于综合竞争力的增强：首先，华南经济圈是各国（地区）生产力要素相对优势的最佳结合。大陆方面，具有丰富、廉价、语言同一、具有较高学历的劳动力；丰富且可转让使用权的土地，以及可以依托的科技优势。此外，随着大陆基础设施的完善，香港在粤的商业活动半径正进一步扩大，而香港则是资金、技术与信息的集中点。其次，华南经济圈的综合优势还在于资金周转网络、零件加工网络、劳力雇佣网络、商品产销网络已初步形成。

广义的华南经济圈能否与“华人经济圈”划等号，目前尚难下断语。“华人经济圈”的全面形成尚须时日，但随着台、港、澳与粤、琼、闽之间障碍的逐步减少及经济相互依赖的日趋增强，亚太地区必将形成一个以华人为基础的新型国际经济合作网络，最终为“华人经济圈”的全面形成创造必要前提。

“华人世纪”——“大中华圈”的未来

“大中华圈”内诸单元的发展潜力巨大，内圈（陆台港澳）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 6300 亿美元，占世界 3% 以上；外圈（东南亚）占 2.2%，两者共计 5.3%（1965 年只占 2%）。亚洲海外华人 1990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保守估计为 4500 亿美元，比大陆高出 25%。在国际贸易中，目前内占 7—8%，到 2000 年时预计可达 12%，加上外圈则达 18%。在吸引外资方面，目前在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外资中，“大中华圈”的内圈占到 15%，加上外圈则为 20%。在外汇储备方面，台湾与大陆合计 1200 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潜力，特别是内圈的潜力，对华人经济圈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内圈的相互贸易额仅占其外贸总额的 27—28%，而欧共体则已在 60% 以上，北美自由贸易区约为 40%）。

某些分析家认为，在宏观经济的层次上，“大中华圈”的外汇储备总和目前约为 2000 亿美元，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经济大国或集团。如此巨大潜能肯定会影响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向。1991 年，台湾是马来西亚和越南的最大外来投资者。台湾、香港、新加坡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直接投资总额已超过日本和美国在后三国的直接投资额。前世界银行总裁麦克纳马拉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作了长期性展望。他认为，如果中国在 2000 年实现了预定的经济目标，然后再以满意的但不一定很快的经济增长率继续发展，那么，到 2050 年，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将达到英国 1965 年的水平。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约与美国的经济实力相等。

对“大中华圈”内诸单元未来经济联系之性质，人们进行了种种猜测。有的认为它会是欧共体的翻版，有的认为它将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模式。不过，较多的人倾向于认为，鉴于“大中华圈”内各国（地区）彼此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相殊，对外关系侧重点各异，它们不可能建立一个类似于欧共体或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联合体。她很可能是这样一个体系：既不必有主权国家之间的明文契约，也不必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政府；既没有法律上的地位，也没有一体化的财政和军队；但却以各种重要的方式相互合作，携手共进，与区域外的经济对手进行竞争。尽管如此，它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系统。在这一背景下，1993 年 11 月 22 日，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在香港召开，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1000 名华人实业家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由香港中华总商会主办，口号是：

“华商遍四海，五洲创繁荣。”

与会者就华人经济圈今后的发展战略交换了意见，并表示为推动华人地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共同努力，携手奋斗。

可以肯定，“大中华圈”内诸单元的合作会遇到种种挫折，但联合的力量终将取得胜利，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华人世纪”的到来。

由此观之，战后以来华夏文明在海外重新呈现延伸之势，并显示出与古代延伸迥然不同的特征。如果说，古代华夏文明向海外的延伸主要是文化方面的直接延伸，那么战后华夏文明的再延伸则是通过海外华人及海外华夏文化圈的经济创造力和发展能力体现出华夏文明的延伸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势头将延伸下去，华夏文明必将复兴。

第六章延伸的动力：华夏文明探秘

延伸究竟意味着什么？

延伸，就是一个文明由中心向外界传播其影响；延伸，就是一个文明由中心向外界扩散其光芒。

如果从公元前 21 世纪华夏文明中心形成时算起，华夏文明可以说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久、唯一未曾中断的一个文明中心。它曾向世界各地无私地传递过它的创造结晶，为人类文明的进化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那么，读者不禁会问：为什么华夏文明会成为一个文明传播中心？为什么华夏古代文明会持续不断地向外域扩散其光芒？为什么经过顿挫的华夏文明会重新呈现延伸之势？

也就是说，华夏文明延伸的动力究竟在哪里？

1. 国运强盛：文明延伸的现实底蕴

一个文明，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是一个与外界文明或社会文化系统进行信息交流的系统。但是这种信息交流并不是对等的、均质的。当一个文明遇到弱小文明时，它会以其强劲的能量，将自身的文化信息输入弱小文明，甚至同比弱小文明，尽管它也可能从弱小文明那里吸收一些于自身有价值的信息内容；反之，当一个文明遇到强大文明时，它往往会受到后者的冲击、同化，为对方所影响，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双方接触的程度。

这就是文明延伸的规律之一。

近代以前的华夏文明从未与任何强大的文明中心有长期而深入的接触，它所接触的往往是周边的弱小、落后文明，所以它在周边近邻的延伸之势最为强劲，古代汉唐盛世尤为如此。近代以后，华夏文明遇到了欧洲新文明的空前冲击，延伸之势渐弱。华夏文明的延伸史充分说明：国运强盛是文明向外延伸的现实底蕴。

作为一个强大的文明中心，它一方面应具有难以比拟的综合国力，另一方面又应广泛地吸收其它文明的有益成分。只有这样，它才具有难以抵御的辐射力。汉唐时代的华夏恰恰正是这两者的典范。

汉唐华夏，在当时的世界，尤其是在当时的亚洲，发展程度处于最高水平，从而使之输出的文化信息（包括物质能量、精神能量）在空间和时间上予相邻的文明打下自己的清晰烙印，使对方受到文明中心的某种同化。

汉王朝时代（两汉），欧亚大陆这一文明发源地“几乎在政治上全部被囊括在四大帝国之中。它们的版图，以连绵不断的带状，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穿过大陆向各个方向扩展”，这四个大帝国是中国的汉王朝、印度次大陆的孔雀王朝（后为贵霜王朝）、西亚地区的安息帝国和欧洲的罗马帝国。

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统一帝国，持续繁荣四个世纪。对于周边文明而言，它是一个综合国力难以匹敌的文明中心。

汉王朝不仅疆域辽阔，而且人口众多。据有关材料，公元1年时，汉朝有1220万户人家，总人口为5960万人。而奥古斯都（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估计为：在欧洲有3000—5000万人，在亚洲稍微少一些，在非洲不到2000万。更为重要的是，汉代在技术领域已在当时的文明世界中处于领先地位。水力磨、铸铁木的问世不仅提高了耕畜的利用效率，而且提高了生产工具的技术水平和军事武器的技术水平，改善了人类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质量，从而使汉代社会经济有了一个长期的发展，军事力量呈强盛状态。

从社会经济的层面看，汉代农业经过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逐渐步入了繁荣之路，特别是关中、巴蜀和汉中，几乎成为西汉王朝的谷仓。山东、河北、河南一带，农业亦极为兴盛。而且，由于技术的突破，西汉农民能够克服以前所未能克服的自然条件对于农业的种种限制，他们不但已能充分发挥土地的更大生产潜能，从而提高了土地生产的报酬；而且还能耕种以前不能耕种的茫茫荒岭和干燥之地，扩大了耕地面积。结果，不但中原一带的荒地渐次得以开垦，就连西北一带的许多穷荒不毛之地也变成了良田。据《汉书·地理志》所说，西汉平帝二年，已有“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群不可垦。……定

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六顷”。像这样一个庞大的垦田数字，无疑是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的结果。

归纳言之，汉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铁器的广泛使用；铁犁构造更趋精细；出现耦犁二牛三人法，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耒犁的发明；“代田法”的推广；“区种”法的出现；耕地面积的扩大。

手工业也有了突破性进展。冶铁、冶铜、纺织成为汉代手工业的三大支柱，漆器、造船、酿酒等行业更是经久不衰。

商品货币经济自汉武帝之后迅猛发展，以致《史记·货殖列传》言道：“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除了长安、洛阳外，汉宣帝时在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又涌现出一批“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

西汉王朝一个重要特点是非常重视军事力量的作用，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军事制度，积极发展新式武器、研究新式军事技术，一方面以充足的经费保证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保管，发明了威慑力极强的弩箭，一方面以骑兵取代车兵，使之成为汉代军队的主力兵种，加强了军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标志着我国军事史上骑兵时代的到来。

空前的生产力发展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使汉王朝不仅获得了较长的统治时间，而且奠定了使华夏文明向外延伸的现实基础。

一方面，汉王朝以空前的经济繁荣和高超的技术水平吸引了重多的外国商人和旅行者来到华夏，尽情地吸取汉王朝的文明乳汁；另一方面，汉王朝以强劲的武功拓展了疆域，开辟了一条条通往邻近文明的道路，使中外商人及游人踏着士兵的血迹往返于中外之境，为文明信息的传播奔忙不息。

就华夏文明的延伸而言，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到了汉代，中国的文字基本上固定下来，并以“汉字”的形式通行华夏大地。西方一位史学家就此评论道：“汉字不仅为中国建成一个帝国而且也为东南亚形成一个文化统一体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这一文字体系不仅成为汉王朝统一华夏大陆的手段，而且成为同化周边文明的工具。

在这样的基础上，华夏文明出现了向外延伸的第一次高潮，也展示了对对外开放的第一次高潮，汉王朝不仅在同化的前提下与周边文明建立起持续而坚固的关系，而且将华夏的影响延展到中、西亚的广大地区，并开始与遥远的欧洲霸主——罗马帝国发展商品贸易直接往来。据《后汉书》卷86记载，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曾派使节来华朝贡。尽管朝贡与否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罗马人来到过汉代中国。汉代的丝织品则早已成为罗马贵族的日常服饰。

公元7世纪诞生的唐王朝是华夏文明向外延伸的又一关键时期，也是华夏文明圈在亚洲的形成期。尽管华夏文明从发轫、形成之时起，便开始了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交流，也开始了向外延伸之行，到了汉代，不仅造成了东方世界的汉化兆头，而且令西域各国震惊不已，甚至引起了罗马帝国的关注，但是，以古代华夏文明杰出代表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还是大唐王朝。唐王朝使东亚（含东南亚诸国）各国的社会文化诸层面毫无例外地打上了唐文明的深刻烙印。唐王朝的强大感染力不能不归源于它拥有的强盛国力。

唐王朝建立了一个空前强大而完备的集权制度，既避免了汉代那种地方巨族坐大成势的弊端，又遏制了佛寺拓展对国家政权的威胁。解决这一政治

分裂难题的首要办法是实施“均田制”，一度中止了大地产的增长，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其次是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构造了一种完备的军制。唐政权以隋以前的府兵制度为基础进行数次改革，形成了比以往严密得多的府兵组织。唐代府兵的中央领导机构主要是十二卫，一小部分归东宫六率。府兵的基本单位是设在各地的折冲府，由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统领。全国设置的折冲府最多时达 634 个，总兵力达 68 万人。三是培养了一支能管理全国的精干行政官员队伍，以严格的科举制加以筛选。四是设立严密的行政管理机构。中央为三省六部制，地方上为州县两级制（唐玄宗时一度改州为郡）。为了进一步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唐太宗根据山川形势，把全国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唐玄宗时又改为 15 道，以便监察地方官员。

严密而完备的中央集权体制提高了唐王朝的行政管理效率，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保证了对外延伸的力度。

唐自统一全国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公元 713—741 年）发展到高峰。一贯以抨击社会时政的诗圣杜甫也不禁慨叹而赋诗一首——《忆昔》：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首诗虽不乏夸张之词，但在当时的官仓和地主仓廩里堆满了粮食已为后代历史学家所证实。就连曾经是“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的伊、洛之东到开元之时都已“耒耜亦满”，甚至在河湟、河套、桂州、天山南路等边远地带，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有的学者估计，唐天宝年间实有耕地面积约在 800 万顷至 850 万顷之间，略高于两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与之相映成辉的是，唐代手工业也有了历史性进展。在唐前期，纺织、冶铸、烧瓷等部门的生产率都增长迅速。当时的丝织品种和花样都很多，争奇斗艳，精美绝伦，高级绫绢类的花式，有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卐字、双胜、透背等。还有一种轻绢，长四丈，据说才重半两。以往生产数量极少的染织物到唐玄宗时已是“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冶铸业更是进步非凡。据载，唐前期有银铜铁锡之冶所 168 处。这只是一个相对粗略的统计，要比实有数少得多。唐宣宗时曾一次增铁山 71，全国产铁处之多可见一斑。瓷器生产则发展成唐代手工艺水平的代表，景德镇瓷器自此时蜚声世界，它烧制的白瓷和青瓷有“假玉器”之称。也就在这一时期，我国出现了施黄、绿、白、赭、蓝等彩釉的陶瓷，即“唐三彩”。用这种方式烧制的人像和马、骆驼等动物像，色泽鲜丽、造型生动，成为华夏文明艺术领域中的珍品。

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唐代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前提。城市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长安、洛阳、扬州、杭州、广州、泉州、明州、汴州、幽州相继成为国内外贸易的中心，而且每个城市又都有各自的特点。

长安：“四方珍奇，皆所积集。”

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

杭州：“骈衢二十里，开肆三万室。”

唐代商业繁荣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对外商务，标志着中外贸易的飞跃性拓展。

二是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汇兑制度——飞钱，标志着我国商业跨入一个历史新时期。

政治局势的相对长期稳定、经济的空前繁荣使唐代文化也达到了古代华夏文明的顶峰。

哲学界流派林立，百家争鸣，各畅所言。在儒、道、佛三大势力长期竞争的壮观背景下，出现了玄奘、智谿、法藏、惠能、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一大批学问家。

经史学界丰富多彩，一派生机。经学经过唐初一再修订，结束了东汉以来的混乱状态，开辟了宋儒自由解经的学风。史学著作大量问世，二十四史中，唐朝编修的就有8部。此外，刘知几的《史通》、杜佑的《通典》、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都已成为华夏文明史学领域之最。

文学界更是百花齐放，象征着唐代文化的高度繁荣。其中以诗歌最为光彩夺目。清人所编的《全唐诗》收集了2300多个诗人的49000多首诗，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风格之多样，远远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朝代，也令唐以后历朝顶礼膜拜。李白、杜甫、白居易已成为唐诗的代名词，甚至也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代名词。唐朝的散文、小说同样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唐代的艺术领域精品迭出，如洛阳龙门石窟、敦煌千佛洞及各种画品、书法作品、音乐作品等，且艺术大师不胜枚举，如雕塑大师杨惠之，时人称之为“塑圣”；韩干画马堪称一绝，韩愈、戴嵩画牛名传千古；吴道子的人物画和山水画造诣至极，人称“画圣”。书法界更是名家辈出：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怀素、柳公权都成为后世书法家的模仿之本。

此外，唐朝在音乐、舞蹈、天文学、医学、建筑都为后世留下了不可磨灭之经典印迹。

正是由于如此繁华的社会、如此强盛的国运，唐王朝在当时的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望。亚非欧许多国家的使节、贵族、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来华访问和贸易。唐朝派往国外的使臣、僧侣，到外国经商的商人亦不绝于途。那时与唐朝通使交好的国家主要有20多个，有往来关系的也有几十个。唐政府设置鸿胪寺负责接待各国使节和宾客，在不少地方设置商馆以招待外商，设互市监、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

因此，“唐朝作为当时最大的帝国受到许多邻近民族的极力仿效。人类中有如此大比例的人注意中国，不仅把它视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而且视为政治和文化的楷模，这在唐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曾再有。”

7世纪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藏族政府以及740年左右在云南由傣人部落建立的南诏国都直接受到唐朝统治制度的影响。东面的民族几乎全面接受了唐朝的政治和文化模式，朝鲜半岛上的几个国家在几个世纪中深受唐朝影响，668年统一朝鲜的新罗成了唐朝的微型翻版。713—926年间兴起于中

国东北的渤海王国也完全模仿唐代的制度。7—8 世纪的日本人在其一系列岛屿上创建了另一个小的唐帝国。

此外，唐王朝以旺盛的武功进行了一系列开拓边疆活动。630 年，唐太宗降伏了一直伺机入侵的东突厥，并经过 639—640 年和 647—648 年的战争从西突厥手中夺取了塔里木盆地，促使西突厥帝国于 657 年最终瓦解。607 年，唐王朝将统一的西藏纳入自己的附属国之列。唐高宗出兵东海，加强了与高句丽、百济和日本的联系，使新罗统治下的朝鲜成为忠实的藩属国。结果，唐帝国的力量扩展到了一个广阔的地区，从西伯利亚南部直至东南亚，向西经过西藏和中亚直抵里海。

自唐代盛世之后，华夏文明的向外延伸之势有所减弱，尽管延伸并未中断，但已无唐朝之劲力，更无唐文化影响之深刻。

无疑，国力强盛是华夏文明延伸的现实底蕴。

2. 人杰性灵：文明延伸的精神源泉

一个有趣而引人深思的历史现象是，即使华夏文明遭受异族的入侵和破坏，它仍然保持了连绵不断的延续性；即使在华夏文明中心国势衰弱时，海外华人以及受华夏文明浸润至深的东亚地区仍创造出以华夏文明为基因的当代奇迹，使华夏文明的延伸之势得以维持。这一历史之谜可以在华夏精神宝库中找到答案。

首先，积极入世的精神，强化了华人的主体能动性，赋予中华民族以顽强的再生能力。

众所周知，华夏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是一种强调入世精神的哲学。所谓入世精神就是关心社会现实，注重今世之奋斗的人生态度。学术界有人曾归纳说，西方基督教文化是“天学”，印度佛教文化是“鬼学”，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人学”。这一“人学”文化是积极入世的，而不是消极出世的。中国民族文化形成这一特质，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同西方、印度相比，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教势力相对薄弱，从而不会使人们把致思的中心紧紧盯在“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而是瞩目于今生的现实社会。第二，中国古代哲人大都有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可以外化为一种对于民族兴灭继绝的感情，以社稷国家为重，以民生民疾为怀的抱负，以及面向现实、面向人生的入世态度。这一态度的理论根据是，人生在天地之间，是天地的精华，应该“与天地合其德”，体现天地的德性和特点。“天”的德性是健行不已，日月星辰有规律的运行，从不歇止；人也应该尊重这一律条，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地”的德性是顺育万物，天地以博大的胸怀包孕万物，以丰富的养料哺育万物；人也应该效法这一行为，兼容并包，顽强奋争，“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是永远努力向上，绝不自暴自弃，要有不向任何恶劣环境屈服的强大生命力。“厚德载物”则是要求包容万物，兼容并蓄。这一切无疑都内在包含了人的“自由、自主活动”的本质，其突出特征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之生命律动中，个人应该勇于开拓、奋争不已，天天向上，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

正是这种内在的能动性使华夏文明在内忧外患之中，一次又一次表现出来顽强的再生能力。这种再生能力表现为它能不断地从“原生文化”转化为“次生文化”，以适应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该演化过程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文明中心本身的适应性嬗变，华夏文明史中依次出现的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其间既有一脉相承的基本内涵，又呈现出彼此各异的形态。在一国范围内，文化发展序列如此连续、完整而又不断变化更新，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特例。二是延伸到海外的华夏文明也以顽强的生存能力不断繁衍出适应所处时代、所在国（地区）发展的次生文明。

这就是华夏文明延伸的精神之根。华夏文明在历史的旷野中几遭磨难，曾风雨飘摇、伤痕累累；海外华人在异国的逆境中历尽排斥、虐待；异国他乡的华夏文明的受益者曾遭西方文明的强劲冲击、“西化”之声不断，然而，华夏文明仍得以延伸，21世纪行将到来之际，延伸势力更为强劲。

从华夏文明的历史看，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存意识，不懈的发展努力确实体现了上述民族精神的动力。

从1840年到1919年，从1919年到1949年，华夏文明经历了数不清的天灾人祸：无休无止的战争，频频而至的天灾。中华民族在极大的痛苦和耻

辱中重新崛起，这难道不是对一个民族顽强不息、百折不挠的能动性的最高奖赏吗？

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后，立即被那里的沟壑纵横、黄土连天的险恶地势所慑服。他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这些景色造成了变化无穷的奇特、森严的形象——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有的像成队的猛犸，有的像滚圆的大馒头，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岗峦，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这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世界。”在这样一片土地上，你很难找到一块平坦、肥沃、适合耕种的土地，但是你也可以惊奇地发现，凡是在有人居住的地方，一切生物又都是那么郁郁葱葱，富于生命力。农民们为了向大自然索取生存的食粮，吃力地躬着腰，昼夜勤耕不息。就是在这样一片土地上，本世纪40年代造就了一支精悍的军队，他们依靠黄土高原孕育出来的特有的顽强精神，走出了绝境并夺取了全国政权，成立了新中国。

50年代，当新生的共和国还在满目疮痍中蹒跚行路时，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要把刚刚爬起的“东方红色巨人”扼杀在摇篮中。“美孚”石油撤退，留下了一纸“中国无油”的诊断书。然而，中国人并未因此而折腰屈就，硬是在百里荒原上寻求石油，建成了世界闻名的大庆油田。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号称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悍然将战火引向鸭绿江边。美军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依然叼着玉米芯烟斗，保持着当年征服日本的翩翩风度，欲图再展“将军风采”，结果被劣等装备的中国人赶回美国。麦克阿瑟继而做出了“核封锁”的威胁，不仅没有使当年的“土八路”望而却步，反而激励了从不肯屈服的中国人在10年后研制出了第一颗原子弹。

60年代，曾经亲密无间的友好邻邦突然抽回了友谊之手，中止援助，撤走专家，停止交货，致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中国人再次“求助于”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节衣缩食，努力工作，不仅还清了全部债务，而且稳定了经济。中国人的壮举，令全球诸国无不称奇，以致于成为今天某些西方政治家否决所谓“对华制裁”的公理。有远见的西方人士一再提醒当局：“不要忘了，中国靠自力更生整整生存了1/4世纪！”

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提出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原则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表达。

再看那些远涉重洋、奔向异域的华夏子孙们。他们曾身受疯狂的排华逆流冲击，曾领略非人的剥削和压迫，但他们凭借对自由的酷爱、凭借顽强的自信，不懈地奋争，为华夏文明赢得了荣誉。

16—17世纪的东南亚地区腥风血雨不断，西方殖民统治者一再发起残酷的排华事件，屠杀华侨数万人。1740年，印度尼西亚的荷兰殖民者以搜查军火为名在雅加达地区杀害华人10,000人。许多死难者（包括妇孺）被投入河中，鲜血将河水染赤，故名“红溪事件”。

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掀起疯狂的排华浪潮，连年发生残害华人、掠夺华人财产事件。1882年5月，美国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第一个排华法令，规定暂时停止华工进入美国十年。此后，从1882年至1913年间，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令，前后凡十数次之多，其排华范围更加扩大，排华法网更加细密严酷。严密的排华法网、苛刻的居留条件和令人窒息的种族歧视与迫害

导致美国华侨数量的急剧下降，从最多时的 25 万人锐减到 1920 年的 6 万多人。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群起效尤，相继发生不同程度的排华事件。

极端恶劣的环境、恐怖异常的气氛激发了海外华人强烈的自强信念，锻造了炎黄子孙坚韧的斗争意志。他们在苦难中奋发不已，互相扶植，不断抗争，于逆境中创造了震惊环球的社会财富，赢得了世人的交口称赞。

一位在东南亚殖民政府供职的英国人认为，“华人构成我们居民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华人是很优秀的种族，如果没有他们那种蓬勃焕发的表现，东方国家就显得太可怜了。”

连美国的白人资本家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所修建的这条铁路所以能早日完工，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功于那些被称作华工的……劳工阶级，归功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和勤奋精神。”

1943 年 10 月 11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向美国国会发出咨文，不得不承认美国排华是“一项历史性错误”。经两院通过，取消排华法律的法案于同年 12 月 17 日由罗斯福签署。在美国的影响下，加拿大于 1947 年、澳大利亚于 1959 年、新西兰于 1944 年也分别废除了排华法律。

海外华人以其特有的自强不息之根，摆脱了强加于自己身上的屈辱，成为所在地区或国家的优秀公民。

其次，悠久的文明哺育了华夏子孙的优秀智慧，从而使之以性灵之光普照环宇。

千万年来，中华民族以龙之胸怀培育出一种执掌乾坤的天下精神，使华夏文明具有了一种特有的包容性。

自从华夏文明诞生以来，一直不停地吸吮着、融合着各种有益的文化成分。5000 年前，华夏大地出现了炎、黄、黎、夷等文化部落，形成了黄河文明、炎黄文明、黎夷文明等中心，三大中心几经融合、冲突、碰撞，创造了华夏文明的初始形态。尔后，华夏文明中心以文明大熔炉的形式统一了一系列文明，如新疆的哈密文化、北方草原的小河沿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珠江上游的百越文化、西藏地区的卡若文化等等，构成了华夏文明中心区的雏型，这一中心区是高原文化、大河文化、海洋文化的融合体，集人类文明类型的精华于一身，从而孕育出了一个优秀、睿智、深沉的民族。

这个优秀的民族为人类文明的演进作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8000 年前，中国启始了第一次知识革命，创造了文字，4000 年前，中国已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完整的文字体系——甲骨文体系。2000 年前，华夏文明又率先启动了第二次知识革命，向世人奉献出造纸术，推动了人类文明真正进入知识文明时代。1000 年后，中国人又掀起新一轮知识革命浪潮，由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这一次次的知识革命浪潮不仅使华夏文明成为古代文明中最为发达的文明中心之一，也使中华民族以睿智、聪明而闻名遐迩。华夏子孙正是凭借自

陈碧笙《华侨华人问题论文集》，223 页，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杨国标等《美国华侨史》，67 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身特有的智慧在古代中国奉献出一个个世界之最。即使在西方文明已然风行世界舞台时，华夏子孙头脑中的东方智慧仍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美国华人历经艰辛，遭尽排斥，到 20 世纪下半叶已一跃成为美国社会的“模范少数民族”，组成了占美国科技精英总数 1/3 的华人科技大师群落，也成为占世界科技精英总数 1/4 的华人世界级科技人才群体。世界华人资本被称为与犹太资本、阿拉伯资本并驾齐驱的三大金融力量。

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华智慧，已然走向世界并开始形成一系列新兴学科群和知识学科群；以超常少年为代表的中华智慧更是震惊全球，令人感受到华夏民族的深层潜力。

一位西方学者感慨道：中国是世界的一座超级人力库和人才库，不仅有 10 多亿人力大军，而且有无数的天才精英。人力、人才是中国的绝对优势。

据北京“国际 21 世纪教育研讨会”披露的资料，目前中国有 22 万天才“神童”。他们是华夏文明的优秀新生代，构成了冠绝全球的中国天才神童大军。

国际奥林匹克中学智力竞赛是人类未来科技能力与综合智力水平的检测，也是民族智慧的大比武。自 80 年代后期中国人开始加入比赛后，在短短的几年内，中华少年夺得了 20 枚金牌、12 枚银牌、14 枚铜牌。如此短时间内的如此成就，可谓天下无匹！

1992 年 7 月，在俄罗斯的莫斯科举行第 33 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有 68 个国家和地区的 360 名选手参加竞争，中国队以金牌总数 6 枚、总分 240 分的优异成绩再次夺魁，比获第 2 名的美国队多 59 分。在 4 个满分中，中国少年就占了 3 个。

1992 年 7 月，在美国举办的第 24 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共有 3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2 名选手参加竞争，中国队获得 3 枚金牌、1 枚银牌，总分位列第一，而且是囊括了全部 3 枚金牌。

同年，中国少年还获得了第 3 届国际信息学竞赛的冠军。

一时间，中国少年名冠全球。

身居海外的华夏少年同样显示了超常的智慧。笔者已在第五章中列举多例，在此不作赘述。

华人少年的智慧引起许多世界知名人士的关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心理学教授朱利安·斯坦利，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专门研究和寻找科技天才。1986 年，他用美国学生能力测验的数学试题在中国测验，对上海 300 名初中一年级学生进行测验的结果令其咋舌不已，有 70% 的学生得分在 700 分以上（800 分为满分），而美国高中学生的平均得分只有 500 分，以致不少世界著名学者断言：世界上将会出现一个华人科技时代。李约瑟、贝尔纳、陈省身、李政道、杨振宁等大师无不肯定，下一个世纪华人将会成为世界科技大舞台无可争议的主角。

李政道教授认为，21 世纪的世界科技领袖大部分将是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他的主要依据是，目前世界的科技领袖主要集中于美国，而在美国就有数万中国留学生和高级科学家，他们在世界科技领袖中占 1/4。在美国的每一个研究院中，中国人的成就都名列前茅，而且，美国最优秀的研究生中有 1/4 是华人，他们无疑会成为 21 世纪的世界科技领袖。

华夏文明以民族的顽强斗志、睿智聪慧为精神源泉一再显示出其优秀的内涵，从而使华夏文明得以连绵不断地向海外延伸开去，令整个世界不断感

受到华夏文明的冲击波和辐射力。

3. 无势地缘：文明延伸的推动器

一种文明的强力传播既取决于文明中心的强大国力、难以抵御的精神魅力，也取决于中心具有的天时地利之优势。华夏文明之所以能保持连续不断的文明延续、保持长久的向外延伸之势、保持强大的传播力度，正是得益于其先天的地缘之利。

首先，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华夏大地成为东方的文明中心，培育了强大无匹的文明优势。

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大洲的文明进步之途是极不平衡的，这与各区域的地理形势密切相关。南半球往往被地理学家称为“水半球”，陆地面积只占其总面积的 19%，而且各大陆的海岸线比较平直，沿海岛屿稀疏，大陆内部以高原、沙漠为主，少有大河横贯其间，自然条件相对恶劣，文明进步的速度不能不受到影响，文明发育较晚。反观北半球，陆地面积占到 39%，而且相互毗连，海岸曲折，多港湾、内海，整个陆地系统又主要位于北半球温带范围内，气候宜人，因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典文明都出现在北半球的温带大陆上，形成了人们所称的“中纬度文明带”，如华夏文明、印度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地中海文明、墨西哥文明。更为突出的是，华夏文明因中国地域辽阔，形成了比任何其它文明中心都强大得多的文明优势。如果与古典文明中心十分密集的地中海文明区进行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华夏文明的覆盖区域是多么的辽阔。在地中海沿岸，罗马、雅典、巴格达和开罗相互之间的直线距离均在 1000—2000 公里左右。换言之，在东西 3000 公里、南北 1000 公里的范围内，密集分布着 4 个举世闻名的文明中心。然而，这种文明中心分布的地理格局与华夏文明相比，只相当于我国的轮台、嘉峪关、旅大和西安相互之间的直线距离及其所构成的地理格局。华夏文明之幅原辽阔是举世唯一的，从而形成了向外延伸的坚实后盾。

其次，特殊的地理环境培育了悠久的华夏文明，形成了文明延伸的持续优势。

一种文明在环球文明中的相对位置及其本身所处地理位置的相对隔离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文明与其他文明相互交往关系的密切程度，也决定着文明之间相互侵扰、摧残乃至毁灭的程度。由于地中海地区聚集着众多的文明中心，相互往来比较密切，文明之间既可以从交往中吸取营养、促进自身的发育，同时又因文明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利益冲突而导致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斗争。所以，那里的文明中心此起彼伏，令人眼花缭乱；而且，由于那里缺乏高山峻岭的天然屏障，北方游牧民族常常风卷而至，将发达的文明中心洗劫一空，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地中海地区文明的动荡性和复杂性。

公元前 4000 年代到公元前 3000 年代，世界文明史上相继诞生了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克里特岛上的爱琴海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公元前 2000 年代，小亚细亚地区又出现了赫梯文明、希腊半岛上出现了迈锡尼文明。然而，就在这一时期，文明之间的剧烈冲突、自然环境的突变湮没了克里特文明、毁灭了印度河文明、摧残了迈锡尼文明。到公元前 1000 年代，世界文明史上帝国迭出，波斯和罗马帝国相继崛起，古老文明接连沉落：埃及文明臣服于波斯，两河文明已成波斯帝国属地，希腊、罗马文明受到波斯的屡屡摧残。公元前后，世界文明更是动荡不定，猖獗一时的波斯帝国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一举灭掉；安息帝国随之突起，统治中亚；罗马帝国在日耳曼人的一再冲击下，于

5 世纪灭亡。

然而，当我们把视线投向东方的华夏文明时，却意外地发现，其它文明变幻无常、动荡不定之时，它却保持了罕见的连续性，自夏、商、周至明、清，华夏文明传统始终未中断，尽管也发生过数次异族入侵和暂时的分裂，这不能不得益于中华的地缘形势。地处亚欧大陆东端的华夏大地，西北为一系列的高山峻岭包围，形成了相对于华夏的“入”字型围合之势，那些侵略性极强的邻近文明很难翻越险岭而攻入华夏；而华夏东面是茫茫海洋，海洋之上只有一些小小的岛屿文明，无法对华夏文明构成致命威胁。因此，华夏文明在古代面临的唯一真正威胁基本上是北方游牧部落的偶然南下。例如，汉魏之后的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基本上已被游牧民族控制，建立了一系列的国家，但其统治阶层中大量启用汉人，而且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往往一如汉制。可见，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只是影响了华夏的王朝更迭和政治统治，并未影响华夏文明的道统和华夏文明的延续方向。

直到 19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华夏文明才受到来自海洋的威胁，东部大洋由天然屏障转化为易攻难守的门户，但因地理环境的保护性反应机制，华夏文明终未沦为完全的殖民地。印度及东南亚诸国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它们无法以地形优势抵御西方列强的攻击。

特殊的地势养育了悠久而连续的文明，从而也构成了文明延伸的持续优势，使延伸之势不至于因文明中心的毁灭（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而中止。

第三，特殊的地理环境，哺育了一个具有优厚文化底蕴的文明中心，从而确立了文明延伸的内在优势。

一种文明之所以能够以强有力的优势向外延伸，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该文明的文化底蕴。一个吸取和容纳了诸多文明信息的文明会比信息量单一的文明具有更大的传播优势。华夏文明因优越的地形而成为各民族文化的熔炉，提炼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华夏文明诞生之时，因中华大地地形迥异，故而出现了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荆楚文化和黄河流域以谷物文化为基础成长起来的中原文化。两种文化交互汇流，构造了统一的华夏文明之主架，其政治标志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华夏文明的核心区——黄河、长江流域开始不断遭受毗邻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而且，无论是冲击的力量、冲击的规模还是冲击的范围，都一次比一次来得更大更广。如果说秦汉时期的游牧民族只限于搔扰中原帝国边境的话，那么，从南北朝到两宋时期就已发展到游牧民族可以直插中原腹地并形成与南方汉民族政权的长期对峙了。到了元明清之际，北方游牧民族则已可入主中原并建立起长期稳定的中央政权了。其它文明中心正是在这样的冲击下遭致灭顶之灾，文明道统随之中断（印度文明、西罗马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之毁灭便是例证）。

然而，华夏文明却一花独秀，其文明道统不仅未被摧毁，反而在文明的如此冲突、碰撞中不断吸收游牧民族的文明精华、强固自己的道统，形成了更为气势磅礴、反映南北民族共同特点的东方文明。这不能不归因于中华特定的自然条件。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黄河流域诞生了华夏的原初文明，培养了辉煌的文明发达状态。而当时的北方沙漠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尚无法摆脱其野蛮状态，且力量分散，不足以与逐步走向统一的华夏文明相抗衡。此外，由于华夏文明的偏居位置，她可以全力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而不至于因其它文明中心的虎视眈眈而分心。因而，游牧部落的周期性侵扰并未影响

华夏文明的正常演化，只是在汉魏以后、两宋以后、明代以后，华夏文明核心区国势衰微时，游牧部落才得以有较大的作为，但此时的华夏文明已形成牢固难移的道统，入侵的游牧民族也早已显示出汉化的迹象。所以，他们入主中原并不能中断华夏文明，反而令自身的民族文化为华夏文明所融汇，推动华夏文明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华夏文明核心之所以能够以强大的吸力同化北方游牧民族，还由于华夏文明具有多元一体化特征。尽管华夏文明连续性强，但内部并不是纯粹单一的文明形态，它是华夏大地多种文化的集合体，这是因为中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各方差异相当悬殊，民族分布十分复杂，各地经济、社会、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背景各不相同，文明形态五彩缤纷不足为怪，其中有：

以豪爽、坦直为特征的具有游猎民族色彩的关东文化；

以粗犷、慷慨为特征的具有辽阔中原色彩的燕赵文化；

以朴素、激越为特征的具有黄土高原色彩的三秦文化；

以淳朴、沉勇为特征的具有黄河流域色彩的中原文化；

以古朴典雅为特征的具有东海之滨色彩的齐鲁文化；

以敏慧、风雅为特征的具有西南民族色彩的巴蜀文化；

以清新、秀丽为特征的具有荆湘区域色彩的楚文化；

此外，还有吴越文化、岭南文化、蒙古草原文化、新疆文化、西藏文化等。

如此丰富多采的文化组合是任何一个文明中心都难以比拟的，它们在漫长的历史交流中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文明主体，从而培植了一种对周边文明加以同化、融合的机制，使华夏文明在对外延伸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第四，特定的地理环境使华夏文明能够应付环境变迁的挑战，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从而使华夏文明在向外延伸时具有一种特殊的渗透力。

辽阔的腹地是华夏文明独有的一种地理优势。同样是面对环境恶劣的挑战，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是否具有辽阔的腹地几乎可以成为文明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因素之一。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和印度河文明均因腹地狭小而环境突然变化之后缺乏回旋的余地，沦于灭亡。

以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为例。约在公元前 9000—7000 年间，达罗毗荼人在气候潮湿、水势充足的印度河流域创造了以哈拉帕为中心的文化，该文化到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开始走向衰落，原因是印度河流域的气候骤然呈现干冷趋势，沙漠迅速蔓延了哈拉帕地区，一个本可光辉灿烂的文明湮灭了，其悲剧正在于她的范围仅限于狭小的哈拉帕地区，缺乏辽阔而多样化的腹地，一旦环境突变便难逃厄运。

华夏文明是环境竞争中的幸运儿。尽管她历尽天灾人祸，但由于青藏高原的保护和季风气候的保护而免于沙漠化的劫难；尽管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经受了一次又一次气候上的干冷与温暖的波动性变化，却未出现致命的环境威胁。

面对二次比一次更凶猛的北方游牧民族侵扰，华夏中原的汉族专制帝国可以南迁，而成“偏安”之势，尽管这种政权在感情上令人难以接受，但却保护了华夏文明道统免遭灭绝，推动了江南大地的开发。否则，一旦强敌压境，当年印度河流域土著达罗毗荼人的悲剧便会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正是由于中国的腹地辽阔，华夏文明才具有充分的回旋和发展空间。唐

宋以前，北方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优越，华夏文明便由此破土而生，并成长为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此后，北方的自然环境出现恶化征兆，尤其是经过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和唐代中期“安史之乱”的浩劫，黄河流域更是遍地荒芜，长期作为帝国都城的长安水源减少，漕运转难，气候渐趋干冷，洛阳、开封等地也有同样症状；但南方的长江流域所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比较小，而且随着历代对江南的不断开发，那里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其繁荣程度超过了北方，于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乃至政治中心出现南移趋势，显示出了因地势辽阔而导致的“西方不亮东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的文化特征。可以设想，如果哈拉帕文化有足够辽阔的地域和多样化的自然屏障，其沙漠化的命运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再设想，如果埃及文明不是仅仅局限于狭长的尼罗河谷地入海口处的三角洲，如果不是近邻强大的马其顿帝国，它很可能不会被亚历山大一举击垮或者不会因遭受外力的强烈冲击而长存下去。

显而易见，中国地形的辽阔和自然条件的多样性，培育了华夏文明应付环境变化的能力，锻造了华夏文明顽强的生存、拓展能力，从而使其在向异域延伸的进程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渗透力和再生力。

当然，制约文明延伸的原因及动力有许多，但其要者不外乎以上三类。纵观华夏文明之延伸轨迹，我们可以看出，它凭借强盛的国运划出了一道道向外延展的强劲光芒；它依靠非凡的精神魅力在国势衰弱时仍持续不断地在海外生根发芽，征服着越来越多的人心；它的特殊地理优势赋予其一种顽强的生存能力和罕见的延伸能力。

华夏文明向外延伸的历史之谜就在于此！

第七章延伸的未来：华夏文明新时代

1. 银星·月亮·太阳：华夏文明延伸三时代

华夏文明自诞生以来不断地向外延伸，延伸的特点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笔者将华夏文明延伸过程的总特征概括为银星、月亮、太阳三个阶段。

银星阶段——华夏文明延伸的古典时代

所谓银星阶段，是指在这一时期中华文明向外延伸的方式比较分散、途径多样、力度变化不定。

由于古代交通路线、自然环境的局限，华夏文明主要通过人际接触的方式向外扩散，因而显得方式零散、时间漫长、力度变化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朝代的军人、外交官、商人、学者、教徒和旅行者等成了文明传播的主要媒体。他们陆陆续续地将华夏民族精神和所产物品传递于其它文明。归纳言之，他们主要通过下列几种方式进行文明传播的活动：

一是军事活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外广施武功，带动了大规模的文化输出，如北伐匈奴，收河套之地数百里；南服百越等。汉代替秦后，汉武帝派遣张骞打通西域三十六国，由长安向西，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向东则征服了朝鲜半岛北部，将汉文化输入高丽国。唐代，太宗皇帝以武力统一海内，凭借强盛的军力建立对四邻文明的宗主国地位，加深了文明的延伸力度。

二是贸易活动。自汉朝始，中外贸易与日俱增。“丝绸之路”的开通更使大宗华夏产品远销欧洲。到唐、宋之时，中外海上贸易已相当发达，北起高丽、南抵南洋、西达欧洲、东至日本。商业贸易的频繁使越来越多的其它文明感受到了华夏文明的风采。

三是外交活动。西汉张骞通西域，东汉甘英使大秦，以及明朝郑和下西洋，目的是宣扬华夏国威，征服域外，也推动了华夏文明的延伸。

四是移民活动。如前所述，在远古时期，华夏子孙就开始走向海外，唐宋以近，移民规模渐大，19世纪以后，华人移民已遍及欧、美、澳、非、亚各大洲，中国人的足迹以亚洲为中心遍行全球，为华夏文明的延伸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当然，在考察古代华夏文明的延伸渠道时，我们还不能忽视外国使节、商人和留学生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其中尤中亚商人和东亚留学生的作用最为突出。

总而言之，古代华夏文明的延伸显得零散、断续，尽管有时势头强劲，总而言之“银星式”特征为：（1）传播方式以人际交往为主，零星而无规律；（2）传播范围以东亚为主，呈中心向四邻辐射，力度时弱时强；（3）传播载体多为私人身分的各阶层人士；（4）传播内容庞杂，从体制、思想到器物、工艺、无一不包。如此传播就像银星点点，向域外放射出分散而又时断时续的光芒。

月亮阶段——华夏文明延伸的现代

近代，华夏文明的延伸骤遇顿挫。但经历了血与火洗礼的华夏文明却在海外异域结出了璀璨的花果，正如月亮通过折射太阳之光而放射出诱人的柔光。这种月亮式的延伸主要指两个层面：

一是海外华人以华夏文化为根本在异国他乡创造了令全球惊叹不已的经济奇迹，显示了卓然超群的智慧。

二是曾经受华夏文明辐射、浸润至深的东亚地区战后崛起，成为生气勃

勃的亚太新兴工业国。

两个层面的交相辉映令世人深切感受到了华夏文明的永恒魅力。他们由衷地认识到，东方文明并未因西方文明的冲击而黯淡下去，短暂的挫折后重新展现出奇异的光芒。而这种“月亮式”延伸的成因大体有二：首先，经过几千年的向外延伸历程，华夏文明已在异域扎下了根，播撒下无数的种子，这些根与种经过长期的发育，终于长成参天大树。其次，近代以来华夏文明中心受到极大冲击，国势积弱，民生纷乱，阻碍了文明中心的直接延伸，致使异域的华夏文明之种造就了一幅“红杏出墙”的独特景观。

然而，这种延伸态势毕竟不能成为华夏文明复兴的终极象征。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的进程表明，华夏文明中心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再次充满了生命的活力，预示着华夏文明延伸新时代的到来。

太阳阶段——华夏文明延伸的新曙光

太阳阶段意味着，未来的华夏文明延伸将依靠自身强劲、灿烂的光芒照亮四周，照亮全球。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经受过长期风云变幻的华夏文明重新显示出自身强大的魅力，一个和平、安定、繁荣、发展的中国在世界东方崛起。人们对中国已刮目相看，1993年5月10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的系列文章；5月11日日本《读卖新闻》刊登题为《觉醒的雄狮》的系列文章；5月17日美国《商业周刊》刊登题为《一个经济巨人——中国的崛起》的文章；5月20日《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

全球看好中国，正是由于中国显示了一个古老文明的再生能力和它享有的国际地位，华夏文明将以此为契机重新向世界各地延伸其强劲的光芒：

首先，中国以其地大物博始终享有崇高的世界威望。尽管1840年后的中国坎坷重重，积贫积弱，但它以罕见的奋争精神挡住了全盘殖民化的狂潮，维系了华夏文明统一体的生存，尤其是1949年中国解放以来，中国人威武不屈、自力更生的美德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佩，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地大物博、综合国力日益增长的中国始终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热爱和平，不搞军备竞赛，不谋求势力范围，致力于世界反霸斗争，坚持与国际强权政治作斗争，从而使中国享有了崇高的国际威望，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一个独特而又举足轻重的国度。

其次，中国势将成为世界工厂，1992年，世界经济组织提出了一项长期世界经济前景评论，指出世界经济重心每年以5~6%的增长率向亚太地区转移，亚洲已成为世界工厂，到2040年，亚洲的生产将成为全球生产的1/2。而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生产能力更是增长迅速，钢铁、电视、棉花及肉类的产量已保持了惊人的发展速度。世界众多知名公司纷纷闯入中国，寻求合作伙伴，“抢占”生产车间。日本松下集团不仅在北京设有独资的彩色显像管生产基地，而且与中国最大的民办科技产业集团——四通集团联合起来，共同开发电子产品。美国苹果计算机集团与中国的联想集团达成合作协议。立足上海和长春的大众汽车集团、立足华中武汉的雪铁龙汽车公司、立足广州的标致汽车公司、立足北京的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市场都已抢占了有利的位置。福特汽车公司也决定在中国建立几个生产汽车零件的转包厂。鉴于此，法国《费加罗报》称中国为世界经济的“氧气瓶”，台湾的《中国周刊》于1994年6月12日发表文章，乐观地称中国大陆将成为带动亚洲经

济增长的火车头。

第三，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直达到12.8%，1993年升为13%，中国一举成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1981—1990年，中国GNP人均增长率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日本前首相宫泽曾说：“展望21世纪，中国经济规模会更大，对亚洲和世界经济的影响不可估量。”依照90年代初的发展速度，21世纪的中国势必成为国际经济增长的中心。

第四，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开发中心区域。到20世纪80年代，世界的环大西洋经济圈已开发殆尽，太平洋西部的日本也已达到开发顶峰。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亟需新的、更广阔的投资开发空间，中国则是其最理想的目标：（1）中国市场容量大且最富潜力；（2）中国政治稳定，投资开发环境大为改观；（3）中国经济领域蕴含着大量没有转化为社会财富的劳动。因此，自1979年中国颁布合资法以来，海外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连年大幅度增长。加之1984年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外国企业来华投资更趋踊跃。到1992年，投资项目达48764项，比1991年增加近4倍，超过往年的累计数；投资项目总额为581.2亿美元，实施的投资项目总额为110.1亿美元，分别比1991年增加4.8亿元和2.5倍，截至1993年10月底，投资项目达158557项，投资项目总额为2019.4亿美元。在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中，中国吸收外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居世界榜首。中国的开放之窗上海市逐渐成为国外企业投资的又一片热土。1993年1—11月，有42家著名跨国公司在沪投资66个项目，协议投资9.5亿美元。它们中有美国的3M公司、福特公司和电话电报公司，日本的日立、索尼、三菱、松下、夏普等公司，德国的西门子、拜尔、巴士富公司，英国的联合利华公司。截至1993年底，累计已有126个国际性大公司“投资上海”，项目202个，协议投资23.9亿美元。

这种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引进外资预示着：中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投资中心。

拥有上述一系列经济优势的中国势必在以经济竞争为主题的21世纪成为一个新的、强大的文明中心。

华夏文明大延伸，将是21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景致。

2. 大变迁：华夏文明面临新时代

华夏文明面临着新的时代，新的时代既孕育着复兴的胚胎又蕴含着新的挑战。这个新时代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世界文明中心在变移

世界历史是在文明中心迭兴中起伏发展的，文明中心的位移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宏伟景观。所谓文明中心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处于人类文明发展顶峰的某种文明。就发展程度而言，它处于最高水平，从而在人类文明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其所输出的文明信息量也较多（物质产品、文化能量等）。

关于文明中心兴衰的历程和法则，诸多国外学者予以了精彩的分析。

1982年，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指出了著名的“汤浅现象”。他通过对科学成果数目及其分布统计，认为在近代历史中存在科学中心5次转移的周期现象，这一周期的大致程序如下：

意大利：公元1540—1610年。

英国：公元1660—1730年。

法国：公元1770—1830年。

德国：公元1810—1920年。

美国：公元1920—现在。

汤浅先生指出，每个科学中心保持科学兴盛的平均周期为80年。因此，他断言，到2000年，美国将逐步衰落，世界科学中心将再次转到东亚地区（主要是日本和中国）。

另一位日本学者岸根卓郎在其著作《文明论》一书中根据宇宙节律的变动，从宏观的历史视角阐述了文明中心位移的节律。他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明可以划分为东西方两种文明，它们既是两极对立关系，同时又以800年为一周期互相交替。他进一步声称，东西方两文明按照公元前3600年、2800年、2000年、1200年、400年、公元后400年、1200年、2000年即每隔800年为一周期准确无误地重复交替。例如，公元400—1200年之间，中国的3—13世纪的古典文明和西亚、北非的萨珊王朝、伊斯兰文明与日本的飞鸟奈良文明同步，创造了当时的东方文明。之后，出现大规模的动荡，东方各地区发生了混乱，西方文明逐步进入高峰。

岸根先生还声称，包括两大文明在内，将高峰期和低潮期合在一起的周期为1600年。换言之，包括两大文明在内，白昼（活动期）与夜间（休眠期）合在一起的一个昼夜为1600年，即东西文明的波动以1600年为一周期，每800年交替一次，每次交替的时间约为100年。

根据这一学说，目前处于白昼活动期的西方文明从20世纪后半叶起到21世纪前半叶的100年，将迅速进入夜间，与到现在为止尚处于休眠期的东方文明交替，也就是说，历经了800年活动期的西方文明将进入下一个800年的休眠期，而沉睡了800年的东方文明将苏醒，进入未来800年的长久活动期。

谈到这一学说的根据时，岸根先生认为，只要人的生物节律受着宇宙能量节律的控制，那么在作为人的集合体的人类活动里，也会存在着为宇宙节律所控制、作为人类群体生物节律的“文化节律”。他指出，在人类文明中也存在着能量积蓄与发散的两极对立的“能量集散节律”，这个集散节律形成了与个人生物节律相同的文明节律，重要的是，文明节律的低潮波期因为是文明能量的积蓄期，所以不会产生新的文明。但如果没有这个文明休眠期，

作为新的文明能量发散期的文明创造期，即文明节律的高潮期就不可能出现。这就像没有寂静之夜的休息，就没有白昼的充沛精力一样。

他兴奋地宣布：东亚已显露出苏醒的兆头，基本上表现为经济的飞速发展。他认为：亚洲的经济好比一行飞行的大雁，日本率先，亚洲新兴工业国（地区）紧随其后，东盟诸国也跟了上来。而支撑这队大雁，使其飞得更高的强大上升气流，就是中国。他预言，这条东方巨龙将支撑起整个东方经济，掀起东方文明的大波。

美国学者安德烈·冈德·费兰克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也指出了类似的论点。他认为，经济和政治霸权中心的位移之动力在于资本积累过程。他将 1492 年作为一个分界线，并指出在千年的历史周期进程中，在所形成的世界体系结构框架内，“霸权中心”有从东方向西方不断位移的趋势（欧洲向西移到美国，美国向西移向亚洲）。他说：

“这些中心从未越出北半球，而是在多极时期沿着亚洲和近东向南，而后向西北欧位移。后来，霸权中心转移到了北美的东海岸，然后，又位移到它的西海岸。目前统一的政治和经济霸权中心，如果这样的中心将出现的话，将继续越过太平洋往西位移，再次返回到中国。”

他进一步论证道，世界体系至少在 5000 年前就已开始形成，资本积累过程看来在它的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世界体系经济周期可以定义为分别为大约 200—300 年的高涨阶段和衰落阶段的交替以及与其相适应的霸权中心的变化。例如，公元前 100—公元 200 年期间的中国汉王朝、印度贵霜王朝、波斯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同时兴盛以及它们在公元 200—500 年期间的同时衰亡，是长达近 500 年的亚欧大经济周期的证明。公元 492—992 年周期内的世界体系经济扩张时期，一直持续到 8 世纪的下半叶。第 9—10 世纪是经济衰退和“霸权”变化的时期。中国的唐王朝走向衰败，欧洲的法兰克王国沦于灭亡。第 10 世纪，哈里发国家解体。

在此期间，欧亚大陆几经政治与经济中心的位移，到 17 世纪以后，东方国家的中心地位消失，西北欧逐渐成为世界文明的最高体现者，后来又向北美洲移动。而这种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心地区的经济扩张和贸易革命。因此，随着 20 世纪下半叶东亚经济的惊人发展使其有可能重振雄风，从欧美人手中接过中心的王冠。

上述三位学者的观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别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构造了文明中心位移的理论。实际上，古代哲人早已开始察觉到文明演进的中心位移现象。比如，中国孔子的“三代”循环周期、西方基督教的 1000 年周期、德国黑格尔的“精神运动”周期，等等。

那么，文明中心位移的内在原因究竟是什么？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是源于文明的内在结构。一定时代产生的文明都有一定的结构，一种文明结构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果没有外部巨大的打击和内部严重的动荡，它是不会有本质改变的。根据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有什么样的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功能，从而也就会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因此，某种文明信息的传递是受到文明之特定结构制约的。然而，文明信息传递的本质要求其发展应该是无限的，但在文明某一阶段，它就会受到相对不变的结构阻滞。这时，如果原有文明结构不变，那么文明信息就会逐渐发生方向变化，流向更有活力、更适合于其传递、发展的文明系统中去。结果，旧文明

结构因信息的匮乏而导致营养衰竭，最后造成文明本身的沉寂甚至死亡。换言之，一定的文明结构是有寿命的，它有诞生，也有死亡，有高峰，有低谷。正如生物一样，待一定的生物信息展现完毕后，它自身就会萎缩甚至死亡，从而转化为另一种结构。

文明中心位移现象的出现还由于文明演进的不平衡性。不平衡性是文明中心形成发展的根本特征，其根源在于文明中心内部发展的不平衡。随着看一种文明内在结构的被老化和新文明中心的内部的勃勃生机，原有的文明格局势必被打破，从而实现新旧文明中心的交替。假若文明的发展是平衡的，文明中心就永远也不会出现位移的现象。

二是源于文明演进的自然地理环境。在一定的时期内，一种文明依赖于一定的自然物质基础。一般来说，物质基础的较充分的地区容易形成文明中心。物质基础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则很难形成文明中心。比如，人类最初的文明中心多处于河流或海岸边，古埃及文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华夏文明、印度文明、爱琴海文明就是如此。所以，最早的文明实质是河畔或海岸文明，以水量的充足为决定性的物质基础。因为河畔一般都具有肥沃的土地，适宜人类的生存，从而决定了最早的文明往往是农业的文明。随着文明之间交往的增多，环球文明的日益发达，尤其是海上交通的拓展，一些充分利用海洋进行贸易的文明中心发展起来。这些新的文明中心依据其海上优势，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先是由东而西于15—16世纪转移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继而沿大西洋欧洲海岸北上，于17世纪到达英伦三岛，18世纪扩展到欧洲中部，后又延伸到北美洲，形成了文明史中的“大西洋时代”。不过，这种新兴的文明及文明中心仍然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资源的丰富与开发的程度是这一限制的关键因素。英国能够成为最早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及确立自己的霸权与此密切相关。

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逐步跨入经济大竞争时代，经济与科技的发展程度成为制约文明中心兴衰的最重要因素。随着日本以及整个东亚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及科技实力的增强，以及欧美经济的相对衰落，世界文明中心呈东移兆头，“太平洋时代”正向我们走来，亚大地区已具备了新的文明中心的雏型：

（1）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

战后以来，亚太地区以惊人的经济增长震动全球，以东亚“新月带”地区最为明显。这一地区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它们自北而南分布于西太平洋沿岸，大致组成半月形状。由于这一地区连年繁荣，增长率远远高于世界其它地区，宛如一轮初升的新月，蕴含着无限的生机，因而被喻为西太平洋的“新月带”或“繁荣弧线”。该地区是亚洲工业化浪潮的发源地，自60年代以来，一个又一个工业化国家（地区）从这里脱颖而出，亚洲的，甚至也是世界的经济奇迹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这里。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四小龙”、80年代中后期的东盟之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及90年代的中国大陆，便是这一地区先后出现的经济增长主角及工业化浪潮的主力。1965—1980年，中、日、韩、新、港、台等国家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比欧美快一倍，到1980—1985年，竟比西方快3倍。1990年以后，西方处于经济衰退之中，经济萧条，复苏维艰。据统计，1992年西方24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仅为1.5%，而亚大地区仍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

1992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率超过6%，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超过7%，印尼、新加坡和越南等国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经济增长率也都在10%以上，而中国大陆1992、1993两年的经济增长率更是高达两位数。

可见，亚太地区，尤其东亚地区，已成为当之无愧的经济发展主角，日益成长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西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世界经济发展前途在亚洲，预计2010年亚太地区产值将占世界总值的1/3。

(2) 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贸易中心。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亚洲的贸易额也在逐年激增。早在1980年，世界经济强国美国与东亚地区之间的贸易额就达1176亿美元，首次超过了美国与大西洋欧洲之间的贸易额1159亿美元。到1990年，东亚地区进口总额高达6100亿美元，超过了美国与欧洲。1980—1991年，仅中国、泰国、香港、台湾、韩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额在世界的比重已由8%猛升到14%，1980—1990年，东亚贸易额增加了400%，为世界贸易增长幅度的10倍。到1993年，东亚贸易总额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再增为20%，仅次于欧洲。据英国《经济学家》分析，截至1994年，亚太地区的贸易又有了飞速发展。欧共体、美国、亚太三方贸易额如下(美元单位)

亚太对美国：出口2150亿，进口1280亿。

亚太对欧洲：出口1530亿，进口997亿。

美国对欧洲：出口1110亿，进口950亿。

上述统计数字显示，就实力而言，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区域。美国的地位次之，欧洲则排在第三。世界银行预计，在下一个10年里，仅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经济加在一起，就会超过美国经济，可见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贸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牵引力和驱动轴。

(3) 亚太地区正成为新的金融中心。

资产拥有量是衡量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黄金储备量居世界之冠，从而使其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美元也因此成为环球经济的通用货币。随着东西经济增长率的相对变化，美国金融霸主的地位受到挑战。1984年，日本的海外资产首次超过美国，日本开始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债权中心，成为新的金融强国。1985—1986年，日本输出资本高达1300亿美元，首次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资本输出国。继日本之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向金融大国迈进。在全球资讯中，香港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新加坡则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而且，中国台北、韩国汉城和泰国曼谷也日益向区域中心挺进。亚太地区还成为全球最大的黄金市场和交易中心。据世界黄金协会最新统计，1985—1991年，亚洲9大黄金市场的黄金吸收量增加了300吨，高居世界第一。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曾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重新显示出勃勃生机，中国人民银行、建设银行等中国主要大型金融机构均已在那里设立分支机构，一些老牌的外国银行已开始陆陆续续地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上海市领导人信心十足地说：“要把那里建设成东方的曼哈顿”，日本共同社记者于1994年2月看到上海的发展时不禁惊呼：

“上海将建成东方的华尔街。”

东亚地区的金融发展趋势已显示出一个新的金融中心轮廓。

（4）亚太地区正发展成全球的科技中心。

世界历史表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未来的竞争是经济实力的竞争，经济实力的竞争取决于科学技术的竞争，尤其是高技术的竞争，因为高技术已覆盖了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它的发展程度直接影响着综合国力的提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亚太地区加紧了发展科技的步伐，并日益成为全球科技发展的中心。1975—1984年东亚的高科技产品在商品输出的比例中由16.2%猛增至31.4%。1985年，除中国之外的其它东亚国家和地区在高科技出口额上首次超过美国和加拿大，达到了13亿美元。以世界高科技霸主自居的美国终于在80年代后期开始丧失其优势，成为高科技的主要接受国。1987年，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长21.7%，而进口却增长26.7%，尤其是东亚的日本和中国已成为东方高科技的源泉。日本从80年代以来就已经在微电子等高科技领域居世界领袖地位。如今，它正成为一个技术出口国，它的专利收入从1970年的5900万美元增加到12亿美元。而90年代的中国经过文革后的恢复和发展，在许多尖端科技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世界上仅有的掌握脉冲核反应堆超新尖端的国家，中国的航空航天技术在总体水平上已可以与美、俄三足鼎立，中国的超导研究、生物工程及海洋科学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总而言之，以东亚日本、中国等国家形成的高科技集群以及由环太平洋华人科技精英构成的科技人材库使亚太地区注定在21世纪成为新的科技中心。

（5）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的能源中心。

许多科学家认为，在新能源日趋紧张和匮乏的时代，热带海洋地区能源的消费较低，所以经济上发展所受限制较少，在能源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未来太阳能利用技术必然会大为发展，而太阳能之利用自然以热带地区及海洋有利。太平洋地区却占有这一有利条件。日本因其能源紧张而领先一步，首先普及了太阳能热水器达200座。1974年以后制定了所谓“阳光计划”，以控制太阳能开发。除此之外，一些科学家还认为，亚太地区仍有许多能源优势，比如粮食、石油、天然气、含铀之非铁金属等都是亚太地区所富有的。当然，如是再将中国和俄罗斯的能源加在一起，亚太的能源优势就更是其它区域难以匹敌的。

综上所述，亚太地区已显示出一个新的文明中心的雏型，沉寂了几个世纪的东方将重新升起耀目的太阳。

其二，新的产业革命已露端倪

如果说文明中心的大位移是华夏文明在人文层面遇到的最严峻挑战的话，那么，新的产业革命正在来临则是华夏文明技术层面上遇到的最严峻挑战。

在远古时代，当人们还是靠采集和狩猎为生时，是谈不上物质资料生产的，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次产业革命大约发生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即农牧业出现。第二次产业革命是开始出现商品经济，即人们不再单纯为个人的生存和享用而生产，而是开始为交换而生产。第三次产业革命是18世纪末由于蒸汽机的出现，大工业生产由此诞生。第四次产业革命则出现在19世纪末，即生产不再是以一个一个的工厂为单位，而是出现了跨全行业的垄断公司。我们认为，目前正在发生的由信息革命所推动的经济的形态的巨变就是新的产业革命的标志，也就是第五

次产业革命的标志。

从第一次产业革命到第四次产业革命，划分社会生产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结构革命的核心是结构性的劳动资料（可控制的机械加工机），它能加工任何形状的工件，在本世纪中叶，出现了数字电子技术的基本特征，是以完美的控制和离散方式快速处理信息，从而产生信息革命。

面对这一崭新的变化，人们发明了许多新概念加以形容和概括，除了新产业革命一说外，还有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空间时代等。处于这一革命中心区域的西方学者对此有许多的预测和描述。

1973年，美国学者贝尔写了一本书，名叫《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在这本书中贝尔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所谓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他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可以从技术发展的角度化分为“前工业革命”、“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大阶段，而前工业社会以传统主义为轴心，考虑土地和资源方面的局限性，工业社会以经济增长为轴心，强调国家或私人对资产投资决策的控制，后工业社会则以理论知识的集中与具体化为轴心，国家对科学支持的性质和种类、科学的政治化、科学队伍的组织工作中的社会学问题都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中心政策问题。与此相适应的技术状况是，前工业社会的主要技术是利用原料的技术；工业社会的主要技术是能源技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技术则是信息技术。

1978年，法国当时的内政部长米切尔·波利亚科夫斯基写了一本名叫《变化莫测的未来世界》的书，把人类化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科技社会三大阶段。他断言，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种种新变化标志着人类正在跨入科技社会。

继此之后，美国出版了阿·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书。该书以观点新颖、论据丰富而一举成为预测未来新趋势的典型。托氏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浪潮分析”理论，他把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归结为“三个浪潮”。大约一万年产生了农业，导致了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变革，这是第一次浪潮。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生产力低下，主要靠人力和畜力，知识和技术极不发达，土地成为人们经济、生活、文化、家庭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大约在200—300年前，工业革命发生了，此乃人类历史的第二次浪潮，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的特点是技术高度发达，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都建立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目前的人类正面临着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信息社会是个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社会。1990年，托夫勒在他的新著《权力的转移》中进一步描述了信息社会的特征。他认为新纪元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知识的急剧膨胀与迅速传播，成为可以支配他人的一种主要力量。工业、商业、金融业更大程度地依赖于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谁握有大量知识（信息）谁就能在未来的世纪获胜。而随着对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大，计算机网络、电视媒介、电话通信空前繁荣，及时传输信息，从而加速经济的运转。这种经济可以称之为“超级信息符号经济”。1993年9月1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美国将实施一项“永远改变美国人生活、工作和互相沟通的方式”的全国信息网络建设计划，即“信息高速公路”计划。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日子。

克林顿的计划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以往未来学家们声称的“信息社会”似乎已经筑基，信息社会再也不是未来学家著作中的一个名词，而已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了。

所谓“信息高速公路”是一个通俗的称呼，是一个便于理解的概念，是指一个大容量、高速度的信息传输网络。它的正式名称应该是“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简称 NII，在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有明确的定义：

“国家信息基础结构是一个能给用户提供大量信息的，由通信网络、计算机、数据库以及日用电子产品组成的完备网络。”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能使所有美国人享用信息，并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通过声音、数据、图像或影像相互传递信息。

不仅如此，NII 还有更为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了广泛和不断发展的设备种类，其信息源内容多种多样，具有大量的应用多统和软件，有系统的网络标准和传输编码，以及参与开发其潜力的人们。

克林顿声称，该计划将耗资 4000 亿美元。

一石激起千层浪。

美国提出“高速公路”计划以后不久，世界上许多国家也纷纷提出自己的高速信息公路计划。

英国：英国电信局已打算投资 100 多亿英镑建设英国的 NII，向英国家庭提供相互作用式录像、银行业务和购物等多项服务。电信局的网络全部实现光纤化。

欧共体：欧共体官员计划在 10 年内投资 1200 亿美元建设遍布欧洲的宽频带信息通道——“神经网络计划”。

法国：当局决定将大规模采用光缆。到 1993 年底，法国已建设 82 公里光缆，到本世纪末，将达到 200 万公里。到 1995 年中，所有法国城市都将用光缆连起来。到本世纪末，法国电信公司将每年为光缆工程投资 2000 万法郎。

德国：远程通信和市内通信已全部采用光缆。到 1995 年底，仅在德国新联邦州就将有 125 万户装上光纤系统。这一网络首先提供的是普通服务：电话、有线电视、图文电视等。德国还大力建立传输能力为每秒 155 兆比特，因而可用于任何用途的多媒体，它在德国的核心是现已部分建成的环形信息高速公路。

日本：日本已经制定了一个名叫“省际研究信息网络”的新计划，以便建立一个将政府各实验室的超级计算机同其它国家的政府实验室的用户联系起来的高速数据网络。该网络于 1994 年 10 月开始在全日本 40 或 50 个研究机构运行。

新加坡：新加坡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已经完成，该项计划使新加坡变成一个“智能”岛。它将把新加坡所有家庭、办公室、工厂和学校的计算机联在一起。

南美洲：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南锥体共同市场国家，目前正加紧实施该地区光纤电缆传输网络的铺设工程。这项工程全长 1700 公里，计划投资 7500 万美元。

第五次产业革命已然来临。

这一革命将使未来社会与经济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发达的信息网络。信息网络是使许多同时工作的不同计算机之间能方便的交换信息的通路。利用这种网络，人们可以在数秒钟内实现与数千公里以外的联系，或者在世界范围内发送传真，或者在全国范围网络内实现计

计算机对计算机的通信。可以说，这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通信奇迹之一。正在发展中的宽频带综合业务数字网络（BISDN），使信息传输在数量与质量方面均有大幅度的提高，并很可能在 21 世纪取代传统的电话网络。与目前用于声音、数据和图像等不同业务的专用网络不同，它使实现适用于所有信息和通信服务的通用网络成为可能。到下个世纪初期，单个电话机、电视机和计算机的数量将不会再大幅度增长，取而代之的是集三种功能为一体的多媒体信息处理装置。

这种新式的信息网络包括建立信息网、巨型计算机站、资料图书库（图书入磁带盘片）以及卫星定位和软件等工作。

与以往的处理和传送信息相比，新的网络系统将能够处理复杂的数据类型的信息的计算机为重要工具。这就是当前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研制各式各样的智能化计算机系统的原因。当然，智能计算机系统和智能信息系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智能化”是一个不断逼近的目标。一旦人们所追求的某个目标可以用严格的形式化方法来描述并可以用每提高一步，计算机和用户之间的鸿沟就会被缩小一点，人类利用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也就提高了一步。

总之，信息网络系统是一种带有多维化、智能化特征的广域信息处理系统，是一种庞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也是新工业革命的基本特征。

二是经济信息化。如果说工业时代的经济是以物质生产为主的话，那么信息时代的经济则是把物质生产和意识生产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资源，大幅度提高产品的知识含量和高附加值，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集约化程度，一些学者称此种经济为信息经济，信息经济的突出特点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将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

信息经济是一种“低耗高效”型经济。由于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等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生产中的物耗和能耗。在工业时代的经济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是与能源、原材料等消耗呈同步增长的。但在信息时代的经济中，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的同时，单位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都是下降的，从而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经济信息化还将导致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第四产业（科技业、咨询业、信息业）将崛起，第五产业（文化业）将日益走向发达，科学技术逐步上升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进入物质生产过程而为决定性因素。与此同时，经济信息化还将改变企业的生产方式和工作方式。工业经济中企业围绕物流和资金流来组织生产；而在信息经济中，企业则围绕信息流来组织生产。市场信息技术不仅可以使企业清楚了解现实需要，如在什么地方需要什么产品及要多少，而且还能使潜在需要明朗化，与多种高新技术互相结合使之产品化并进入市场。为了能迅速、灵活地跟上市场的变化需求变动，企业必须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采用灵活的“柔性”生产方式。一些西方大公司已经开始实行“灵活创造”战略，利用小型职员组合，通过计算机所编程序，同时制造多种产品，以适应不同顾客的要求。这种新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从掌握市场需求信息确定商品概念，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是同步进行的，这大大缩短了周期，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

总而言之，在信息经济时代，一切经济活动都依赖于信息的处理，信息技术可以为实现经济信息的采集、传输、存储、共享、调用、处理、分析和综合等提供全新的技术手段，从而推动经济迅速持久的发展。

我们可以断言，信息革命就是第五次产业革命，西方国家已为此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将引起 21 世纪全球经济主导权的变化。

3. 延伸的未来：华夏复兴大战略

面对日益严峻的挑战，华夏文明该向何处去，她怎样才能赢得新时代的主动权，这直接影响着华夏文明的复兴，影响着华夏文明延伸的未来。为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复兴大战略的雏型。

复兴大战略的核心：确立市场体制，实现国民经济信息化

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兴衰，一种文明的起伏，都取决于其经济实力的强弱，而经济实力的强弱又往往取决于是否拥有一种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现代国家或文明的兴衰更是如此，所以建设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是国家昌盛、文明复兴的核心。

建国初期，我国在计划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依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严格的指令性计划制度，并在“一五”期间，几乎消灭了一切非公有制成分，使国有制和准国有的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公有制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唯一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均由中央计划机关通过指令性计划进行行政性协调。这一体制的弊端可谓有目共睹。从1956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央尽管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改革，但并未找到正确方向，以致出现了所谓“放乱——收死”的恶性循环：旧体制管的太紧，大家怨言很多，于是就下放权力；下放权力以后，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出现了混乱；于是收权，收权以后经济经过调整恢复，又觉得过死，于是再下放权力，如此循环往复，难见成效，国民经济不仅停滞，而且出现滑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走上了改革之路，这时改革的指导思想有了一定的进步，开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强调职工的物质刺激。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拟定了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初步意见》的文件，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该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应用经济规律”，“把单一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从1981年到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主张一直受到限制，国有企业的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然而，“体制外”的商品和市场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激发了城乡经济的活力。事实使越来越多的人懂得，商品经济和市场力量和发展是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陈旧的体制非改不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是：从基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1987年，“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商品经济目标模式写进了党的十三大报告。

随着改革的推进，一系列新旧体制摩擦引起的矛盾相继暴露。1989—1991年，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我国经济学界重开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论战，甚至已演变成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路线问题。

1992年春，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针对经济发展的停滞，体制改革的迟缓，国外挑战的严峻，发表南巡讲话，再次重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不

搞市场经济，就等于自甘落后，就会丧失历史机遇。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一发表，就得到了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热切响应，迅速汇成了所向披靡的深化改革浪潮。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次开创性的伟大事业，它将推动国民经济走向新的繁荣，从而加快现代化进程。

这一体制的基本构成包括：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决定》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其基本特征，一是产权关系明晰。二是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三是出资者按其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四是企业按照市场要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五是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

这一制度的确立将使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其核心就是把现有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从而发展一批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产权联结为主要纽带的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发挥其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统一的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像一部大的资源配置机器，通过各个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这首先需要有一个统一而有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它一方面包括竞争性价格体制的建立，由国家规定价格变为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另一方面包括新型商品流通体系的建立，推动功能完备的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实现流通现代化，而培育市场的重点是，发展金融市场、劳动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

宏观调控体系的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宏观调控与之相适应，这种宏观调控体系，首先必须摒弃传统的指令性计划手段，其次就是要建立以政策体系为主体的，以市场机制为手段的间接的宏观调控体制。因此，政府职能的转换势在必行。《决定》中明确指出：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此外，还要保护市场正常运行，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国民经济。等等。

社会保障体系的确立。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深化改革，保持社会稳定，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一环，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目前的重点是抓紧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制度，制订统一政策，加紧管理监督，使社会保障管理制度化，形成社会保险基金筹集、运营的良好循环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既是深化改革、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宏伟纲领，又是华夏文明大战略核心的关键软件。硬件便是国民经济体系的科技底蕴，具体的说就是国民经济的信息技术。

如上所述，世界经济的发展正在由工业化向信息化阶段过渡。由于电子技术、尤其是软件技术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正进一步引起社会经济乃至人们生活方式的急剧变革。

我国最高决策层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国际大趋势，非常重视我国信息化的发展，并于 1994 年成立了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统筹规划全国经济信息化建设。

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更是华夏文明复兴的核心硬件，而信息化的根本任务则是建立一个庞大的先进的国家信息网络，这就是“中国高速信息网络计划”，即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

据有关专家介绍，该计划至少包括技术目标、实施方略两项内容。技术目标，就是要研制大量的适合于各种用途的高性能的感测系统（传感、遥感等系统）、智能系统（计算机、知识库系统）、控制与显示系统等，建设和发展一个覆盖全国的（即所谓“无缝”的）能把大量上述技术信息技术系统网络融合有机整体的发达的国家通信网络（即所谓“网络的网络”）。我国的实施方略，从技术经济和效能的观点看，只能在现有国家通信网的基础上积极采用高新技术，令人振奋的是，我国已具备了研究和建设信息基础的能力。一方面，通信业发展迅速，年发展速度达 40%，而且由于 1994 年上半年启动的金桥工程，我国目前已拥有一个完善的中低速信息网通信平台，“八五”期间将建成 22 条国家一级光缆干线，“九五”期间将完成“八纵八横”光缆网，它将覆盖我国主要大中城市，从而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高速传输网络。另一方面，我国在信息领域的高技术研究计划（即国家 863 计划）也已全面展开，其中包含了先进的感测（主要是雷达）系统，智能计算机自动化技术，现代通信技术等主要题目。就 863 通信主题而言，它的战略目标是通过超高速光纤通信系统技术，宽带综合交换（ATM）技术、个人通信技术、多媒体通信终端与系统技术、先进智能网技术等关键技术的掌握，建立：“宽带化、智能化、个人化的综合业务数字网”的技术基础。

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发展：（1）必将大大提高我国国民素质，使经济完成由粗放型向效益型的转轨。大幅度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极大地提高生产附加值和劳动生产率，使“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2）将有力的推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因为它能大幅度提高金融、财政、税收、贸易、生产等各种经济信息的高速而准确的传递和综合处理。（3）将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使信息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激活”、“诱发”与“倍增”的效应，成为现代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4）有利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效益。

总之，实现国民经济信息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战略措施，它与新型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构成了华夏文明复兴的核心。

华夏复兴大战略的构架：加强与亚太地区的一体化，通过关贸总协定与世界经济接轨

华夏文明的复兴取决于华夏经济的振兴，也就是取决于一个充满生机的经济体制和以高新技术为依据的经济，但也取决于华夏经济的对外合作，这是因为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趋势已显著增强，而对这一新型贸易堡垒的严重压力，加强区域合作是摆脱孤立、维持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

中国是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寻求合作伙伴时，理所当然的要把重点放在亚太地区，这是因为：（1）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金融、产业、科技合作对象都在太平洋地区，该地区的经济繁荣对中国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同时中国庞大的潜在市场、低廉的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已具有相当基础的产业和科技开发能力，同样也会对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产生积极影

响。(2)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薄弱环节是交通、能源、原材料落后、生产力不足、供需差额较大,亚太地区的美国、日本生产能力已然过剩,双方合作可谓互惠互利。(3)中国希望借助太平洋地区正在发展中的水平型分工协作生产的机会,参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地区在加工组装型产业项目上的合作,如汽车、机械、电子工业、家用电器等零部件、元器件及国外生产设备的合作生产。

总之,中国与亚太、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各成员国在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产业结构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互补性,因此,加强双方合作是促进中国及该地区发展的必由之路,鉴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多层次性、技术的多梯度性,中国与东亚地区和经济合作可以在不同层次、不同区域以不同形式展开。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与该地区成员的合作出现了一种规模较小但成效显著的次地区合作形式——“经济发展三角”,其中有南中国“经济发展三角”,包括广东、福建、香港和台湾;图们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三角”,包括中国吉林省、俄国西伯利亚部分和朝鲜北部;黄海“经济发展三角”,包括中国、日本、韩国。

然而,中国并不满足于这种分散的、小范围的亚太合作方式,他把目光投向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这一组织成立于1989年,被亚太许多国家视为本区域“最具希望”、“最有活力”的经济组织。1991年1月,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了APEC部长级会议,自此之后,中国在APEC中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中国对亚太经济合作的原则和APEC的性质提出了许多重要主张。在西雅图会议上,江泽民主席归纳了“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彼此开放、共同繁荣”四项合作原则。中国还认为APEC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灵活的、讲求实际的经济合作论坛和磋商机构,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机制化的经济集团”。

APEC的建立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心的一个重要发展,中国将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其中,寻求与成员国的多边合作,特别是与东亚地区成员的合作。简而言之,在未来的十年中,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大致包括:

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合作。日本和中国是亚洲经济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是开拓“亚洲纪元”的中坚力量,中日的经济合作完全是互惠互利的。一方面,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资金援助国和伙伴,其资金、技术和设备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前一个时期日本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一些产业都由于向中国出口大幅度增长而出现了“中国支持下的日本景气”,到1993年底,日本对华出口额达232.5亿美元,中日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正在确立,中日合作的体制障碍已基本消除,而日本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需要中国的市场和资源。另外,上海浦东的开发以及以上海为基点的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即显示出中国与日本合作大有前景。

中国与韩国等东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东北亚包括俄罗斯的远东部分、蒙古、南北朝鲜、日本及中国东北、华北地区,这里资源丰富,各国的生产要素各有所长,互补性较强,引人注目的图们江开发计划正是中国与东北亚各国加强合作的一种努力。韩国是东北亚的一个新兴工业国,中国十分重视与韩国的经济合作。中韩建交后,双方贸易额剧增,中国已成为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韩国则成为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双方在黄渤海湾地区的经济合作前景看好。

中国大陆与港、澳、台的经济合作。80年代以来,“华南黄金带”的崛

起尤为令人瞩目。进入 90 年代，大陆东南沿海地区与香港、台湾的经济融合趋势愈益明显。大陆与台湾的贸易额在 1993 年达到了 143.9 亿美元，大陆与香港的贸易额则高达 325.4 亿美元。显然，对大陆的贸易已成为港台近几年经济增长的重要牵引力，而港、台对大陆的投资，对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起了火车头的作用，陆、港、台三地在经济上已结成了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融合关系。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 90 年代，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得到全面改善和恢复，双方进入前所未有的和睦相处时代，从而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同时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与东南亚各国不但地理位置接近，而且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也显现出多层次性，从而为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便利的地缘条件。双方可以在扩大贸易的基础上，开展投资、技术、劳务及资源开发等内容的合作。

可见，中国与东亚的经济合作，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性时刻，这种合作不仅会推动华夏文明的复兴，而且将促进“亚洲纪元”的来临。

我们可以将中国与东亚的合作简略概括为“五东出嫁”即：

广东嫁香港

闽东嫁台湾

浦东嫁日本

胶东嫁韩国

辽东嫁东北亚

当然，这种描述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实际合作伙伴则是一种多元关系。到 90 年代中前期，我国已形成了针对亚太地区的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网络型的开放格局。

中国人在把经济合作的视野投向亚太的同时，也开始注意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这一接轨的方式便是力争加入关贸总协定。

关贸总协定（GATT）作为全球最大的多边经济贸易组织，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中国在一定原则和条件下重返关贸总协定的要求也就越来越迫切。这是因为：（1）当代世界发展的历史趋势决定了我国决不能游离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洪流之外。20 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越来越强烈，独立于世界体系之外的发展是一种毫无前途的倒退。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必须加入全球性经济组织，才能获得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入场券”，从而实现我国的经济现代化。（2）关贸总协定是调节国际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它在全球贸易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经济上的联合国”之称。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已由成立时的 23 个增加到了目前的 104 个，总协定缔约方的贸易额已占当前世界贸易总额的 90% 以上，它在事实上已成为全球性的经贸活动的规范。中国若想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协调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重返 GATT 便是必然的选择。（3）争取和维护我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发言权和利益。自 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关贸总协定成员国的发展中国家更是深受其害，我国也不例外。关贸总协定作为维护全球贸易自由化、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有力武器，在保卫多边规则的自由贸易体制方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只有加入关贸总协定，我国才能以此为依据维护经济权益，扩大贸易范围，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4）国内改

革与经济发展需要外部推动力。重返 GATT，会使我国经济改革获得强大的推动力和机遇，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加入国际分工和发展体系，是当代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必要前提。我国长期游离于国际惯例之外，缺乏国际规范化意识，严重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深入进行，重返 GATT 成为推动我国经济上台级的必要手段。

可见，重返 GATT 已成为中国深化改革，推动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的确，“复关”后的中国可以享受一些 GATT 的优惠权利：

- (1) 最惠国待遇权利。
- (2) 国民待遇权利，即不劣于本国产品的待遇。
- (3) 减少或取消歧视性数量限制的权利。
- (4) 发达国家给与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待遇。
- (5) 参与谈判和制定总协定规则的权利。
- (6) 利用总协定机制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权利。
- (7) 各成员国经贸政策、统计方面的信息资料。

因而，中国重返 GATT 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第一，利用世界经济的有利环境，快速引进技术，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加速工业化进程。第二，以重返总协定为契机，迅速建立和完善国内市场机制特别是市场竞争机制，进一步规范经济行为，从根本上促动和尽快解决经济效益低下的问题。第三，重返 GATT 可以成为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动力，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彻底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真正成为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第四，利用 GATT 缔约国享有的一切权利，努力扩大出口规模，既可改善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又可以充分发挥对外贸、体制。关贸易带动经济全面增长的“发动机”作用。第五，重返 GATT 还可以为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极好的机会。

然而，GATT 是一柄双刃剑，既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严峻的挑战：

挑战一：外贸体制。关贸总协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准，以自由贸易为目标来评估中国外贸体制的。现行外贸体制中的行政性干预、关税的制定等不得不得受到冲击。

挑战二：国内产业和市场多年以来由于体制上的隔绝和经济政策的导向，国内许多商业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与国外产品的竞争，主要靠关税许可证制度来保护。一旦如此堡垒消除，企业和市场所受的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挑战三：国内社会经济法律等综合承受能力。我国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已达 40 年之久，一旦重返，我国要适应国际市场敏捷的反应机制。国家对有关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政策及法规建设都会面临深刻的变革。

面对来势凶猛的 GATT 冲击波，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如何？企业的出路何在？

体制对策：建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对接国际市场，遵循国际惯例，改革外贸体制。

政府对策：有效运用经济杠杆，保持宏观总量平衡，优化产业结构，增加竞争能力；研究利用“例外条款”，保护发展国民经济。

企业对策：确立相对优势，及时捕捉市场信息；加强内部管理，提高产品质量，转换经营思想，灵活运用经营手段；加强技术开发，增强自身实力；加强企业联合，形成规模效应。

总之，重返 GATT 带给中国经济的将是体制到企业、从政府到社会的一场“历史性革命”。在这一痛苦的嬗变过程中，中国经济尽管会遇到艰巨而莫测的挑战，但这将会推动中国经济的迅速起飞。

复兴大战略的支柱：充分利用独特优势，吸收海外华人资本

以东南亚为核心，遍布全世界的海外华人及其雄厚的资本是华夏文明所拥有的独特优势。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是华夏文明复兴的一个重要支柱。

自 1979 年以来，中国吸收海外华人资本取得了很大发展。据统计资料，13 年来，外商在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 268.95 亿美元中，海外华人投资额约为 179.32 亿美元，占 2/3。其具体数额分配如下：香港、澳门资本为 39.32 亿美元，台湾资本为 25 亿美元，华侨资本为 15 亿美元。这个数字与近代华侨在中国大陆投资长达 87 年（1862—1949 年）仅投资 1.28 亿美元相比，增加了 140 倍，与新大陆成立后至 1966 年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大陆投资 1 亿美元相比，则增加了 180 倍。

多么巨大的变化，多么迅速的发展。

13 年来，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之所以迅速增加，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状况，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完善及各级侨务部门的积极工作分不开的。此外，战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地区经济的巨大发展也为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投资提供了前提和良好的时机。

与近代华侨在中国的投资相比，1979 年以来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投资区域广泛。近代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投资以广东、福建、上海三地为主，约占全国华侨投资的 90%。而在闽粤两省，华侨投资也只限于沿海港口。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华人投资区域已是十分广泛，从 80 年代以东部沿海为主至目前已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地区和以各省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内地地区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投资新格局。

当然，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仍是海外华人青睐不已的投资目标，但一些富有远见和魄力的海外华人已开始大规模向内陆投资，菲律宾华人富豪郑国敏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郑氏于 1992 年 6—7 月在厦门投资占地 3 平方公里的亚洲工业城，之后又在河南洛阳签定包括一系列开发项目的长期合作和 20 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合同，总投资规模约 20 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海外华人在中国内陆投资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开发项目。

二是资金主要来自港澳地区。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投资总额中，来自港澳地区的资本比较大。据调查，近代华侨在大陆投资，主要以海外华侨（东南亚、美国、澳大利亚）为主，约占投资总额的 85—90%，而港澳地区所占比重不大，只占 10—15% 左右。据统计自 1979—1991 年底为止，海外华侨在华直接投资和其它投资的 268.85 亿美元中，来自港澳地区的就有 139.32 亿美元，约占外商投资的 51.82%，纯粹华侨资本很少。当然，在港澳资本中也有海外华人以及中国资本掺杂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这是香港资本在大陆投资急剧增加的先决条件。应该指出，在中国大陆三资企业中，也有不少海外华人（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的资本融合在一起的，有的分不清是海外华人还是港澳台资本，这是近年来海外华人在大陆投资的另一个特点。

三是东南亚华人在大陆投资少。东南亚地区是海外华侨、华人最集中的一个地区，过去和现在该地区华侨、华人约占全世界华侨和华人的 85—90

%，与中国经济关系向来密切。据统计，近代华侨在中国投资的1.28亿美元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投资的1亿美元中，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投资约占70%。可是自1979年以来，东南亚华人在中国大陆投资所占的比例已大为下降，不及外商在华投资总额的5%。这种情况的改变，最主要原因是由于战后东南亚华侨90%已加入居住国国籍，成为外籍华人，与他们的生存密切相关的不是中国，而是居住国；同时，东南亚地区本身也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资金发展本民族经济；有些国家对外汇出口还进行限制；此外，中国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措施，对东南亚华人企业家来说，有的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比不上在当地投资好。

四是投资企业结构以宾馆服务业和工业为主。据调查，近来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部门结构几乎遍及工业、农业、矿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等各方面。但从全国范围看，投资比重以投资房地产居第一位，占总投资的42.24%；其次是商业，占15.6%；再次为工业，占15.05%。

海外华人在大陆的投资对中国经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务院外资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何椿霖与外商企业代表进行会谈时曾概括地指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外籍华人是投资中国大陆的先驱，是联系中国与外国经贸关系的‘红娘’”，“中国引进的307亿美元外资中，有70%是由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外籍华人投资的。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中国要打开走向世界的局面是很难的。”

归纳而言，海外华人投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是弥补了中国建设资金的不足。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资金短少，吸引外资和海外华人投资，可缓解中国建设资金的不足。

据广东外经部门统计，至1991年底，全省实际利用外资148亿美元，约占全国利用外资额的55%，其中华侨、港澳台资占80%。由于外商和海外华人的直接投资，使广东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显著增强。1990年全省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占全国的7.8%和8.3%，此两项指标在大陆各省市的名次排列，分别从1978年的第六位跃居第三位和第一位，广东省国民收入1990年达到132.2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了12倍多，平均每年增长7.2%。近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12.4%，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小康水平。

再看一下福建。

自1979至1991年底，福建累计签订利用外资合同4970项，实际利用外资24.3亿美元，其中60—70%以上是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商投资的，投资地区遍及全省60多个市县，投资领域包括轻工、电子、机械、化工、建材、能源、农业、交通、房地产以及旅游宾馆等行业。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20%以上，“三资”企业已成为振兴福建经济的一支生力军。福建的经济实力也因此大大增加，1991年福建省国民生产总值比1978年增长2.7倍，财政收入也较1978年增长了3.2倍。

二是加快了企业的技术改造。

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加快了工业改造的步伐，给企业技术进步带来了生机。据报道，目前全国引进先进技术3万项，投入生产后，已发挥出显著的经济效益。

据广东省调查统计，从 1979—1987 年底，全省共投入外汇 40 多亿美元，其中利用外资 25.93 亿美元，引进各种技术设备 90 多万台（套），生产装配线 2.4 万条。在引进的技术设备中，有 7 成以上属国外七八十年代实用的先进技术设备，从而使全省半数以上的技术设备得以“脱胎换骨”，轻纺、电子、塑料、家电、食品、机械、建筑、陶瓷等行业基本实行了全行业的技术改造，成为广东具有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全省引进的设备投产后，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据估算，每引进 1 美元外资，可增产值 7 元和税利 2.5 元（人民币）以上。那么，广东每年新增的工业产值中约有 60% 左右是靠技术更新和改造取得的。

在全国其他省市中，也积极引进外资利用老企业现有空闲厂房和设备，兴办“嫁接”型企业。如浙江省杭州市，1991 年新创办 95 家此类企业，占全部新批准的 104 家外商投资企业中的 91.3%。杭州兴办外资“嫁接”型企业，缓解了企业技术改造和资金不足，加速了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有些企业还因此扭转了亏损局面。1991 年，杭州约有 20 多家“二空一闲”（空厂房、空设备和闲置劳力）企业走出困境。外商也因此获得良好的效益。

三是推动了能源、交通、工业的发展。

十多年来，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商在大陆也投资和合作兴办一批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项目。一些省份把能源、交通、通讯等方面作为利用外资的重点，建设了大型企业。

在能源方面，由深圳特区电力开发公司和香港合和电力（中国）有限公司合作兴建的沙头角发电厂 B 厂，注册资本 3 亿港元。从 1987 年该厂建成以来，为缓和广东和深圳电力供应的紧张局面，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交通方面，也是海外华人投资的一项重要内容。1979 年以来，各地采取合作经营方式创办的城市出租汽车公司很多。仅广州一地，就有出租小汽车 6800 辆。在许多城市，海外华人投资的出租汽车公司，缓和了各地城市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满足了旅客和当地群众的需求；同时各地还以合作经营方式，合办内地至港澳直通货物汽车和客车运输。目前这类企业，仅广东一省就有各种类型货车 5000 辆，有力地推动了对外贸易、“三来一补”及“三资”企业生产。

此外，沿海地区还与海外华人采用合资合作等方式兴建了一批码头和桥梁。诸如：珠海的九州港，投资 6500 万美元；深圳的星海港，投资 4800 万美元；中山港投资 1160 万美元；台山广海港投资 690 万美元；江门外海大桥，全长 1700 米，投资 2500 万美元等等。香港胡文瀚集团 1992 年 3 月取得 8 亿美元贷款，兴建一条香港至广州长达 76 公里的公路，这条公路将大为改善珠江三角洲数千家企业的对外联系。

四是促进了旅游观光业的崛起。

中国旅游业从无到有，今天已成为建国以来引人瞩目的一个行业。据国家旅游局提供的数字，十多年来大陆对外开放城市已有 626 个，历史文化名城 62 座，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 84 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有可接待海外游客的宾馆 2130 家，客房 32 万间。

1978 年中国旅游业开始发展，全国入境旅游者 180.9 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 2.62 亿美元。到了 1988 年入境旅游者 3169.43 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 22.46 亿美元。1990 年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增至 28.4 亿美元，为 1978 年

的 10.74 倍。从 1978—1991 年的 13 年间，旅游业为国家累计创汇达 188.4 亿美元，成为中国非贸易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入境旅游业和旅游外汇收入的不断上升，与港澳台商和海外华人投资宾馆、饭店的作用密切相关。

1987 年以来，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走向，虽遍及各行各业，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却以投资宾馆、饭店的服务业为主。据官方提供的资料，约占外商在华投资总额的 85.5 亿美元中的 43%。其中海外华人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占 70—80%。

十多年来，海外华人在各地兴建和合作经营的宾馆、饭店及娱乐设施已取得了巨大进展，尤以广东最为突出。

除广东省外，海外华人在各地兴建的宾馆、饭店还很多，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如北京的华侨大厦、香格里拉饭店、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建国饭店、长城饭店、京伦饭店，上海的联谊大厦、白玉兰大饭店、电视国际交流中心、喜临门大酒店，桂林的漓苑宾馆、七星大酒店、桂林旅游宾馆以及厦门的华侨大厦、海景大酒店等等，都是海外华人投资兴建的。这些宾馆饭店，经营客房、公寓、中西餐厅、酒吧、商业服务中心、舞厅、游泳池、康乐设施、多功能展厅、会议厅以及提供有关旅游服务设施，便利了国内外观光游客吃、住、购物、娱乐和交通，对发展中国旅游业发挥了很大作用。

五是为中国增加了外汇收入。

由于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商投资“三资”企业，引进了先进技术，提高了产品档次，或利用了外商原有销售网点和商标，增加了竞争能力，扩大了出口创汇。

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全国约 1.7 万家已投产的“三资”企业，陆续进入收获期，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一支生力军，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起的作用日趋显著。

据中国海关的统计资料，1988 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产品创汇为 24.4 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6.05%；1989 年为 36.3 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8.35%；1990 年则上升为 60.21 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11.56%；到 1991 年，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出口额又骤升至 120 亿美元，为 1990 年的一倍，比 1985 年的 3 亿美元增长近 40 倍，占全国出口商品总额的 16.7%。

六是扩大了劳动就业，改善了人民生活。

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解决了城市和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从而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据不完全统计，开放改革十多年来，“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容纳了约 400 万人（其中三资企业达 300 万人）以上的就业机会。据有关方面提供的资料显示，单广东一省在外资企业就业的人数就达 200 万人以上，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侨乡城镇待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并安排了部分山区和邻近省份的多余劳动力。

十多年的开放改革，使深圳市沙头角区以令人瞩目的成就崛起于南海之滨，是人均收入提高，生活改善具有说服力一个证据。1979 年以前，这里的人均年收入仅 100 元左右，住的是土木结构的旧房子，温饱都成问题。至 1989 年，沙头角区人均年收入已达 4070 元，95% 以上的居民盖起了别墅式的小楼房，人均住房面积 48 平方米，居民普遍有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等。不少家庭还购置了高级组合音响、空调，有的家庭还存款数十万元。沙头角

区人民已开始进入小康生活。据调查，解放后的30年间，当地有2400多人前往香港谋生，近十年却一反常态，有200多人从海外回来定居。香港《东方日报》曾就沙头角区的巨变叹道：“华界日千里，英界牛步伐”。

据最近“全国百家明星乡镇”的评比结果表明，在广州市81个镇中，1991年工农业总产值亿元以上的镇有41个，这些乡镇“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业务多，因此，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目前这些乡镇已步入小康水平。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人均纯收入1720元，即达到小康的最低水平标准，广州市农业委最近对79个镇的2000户农户调查表明：人均纯收入千元以上的占53.7%，新建楼房的占76.9%，新添彩电或录放机、高级音响、照相机的占68.5%，新添摩托车或运输汽车及自行车等的占69.1%，新添电冰箱或洗衣机、空调的占37.4%。

综上所述，海外华人对大陆的投资已成为我国经济中一支举足轻重的生力军。但应该看到，大量海外华人资本仍与中国大陆保持着距离，尤其是东南亚华人资本。为了进一步利用这一优势，实现中国经济的振兴，我们建议：

(1) 灵活地做好华人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引进工作。在对待华人资本的投资上，应当适当采取灵活政策。华人资本与华侨资本虽有本质区别，但毕竟是华侨资本演变而来，它与纯粹的外国资本还有所区别。在吸收华人资本投资时，只要投资者愿意以华侨资本身份出现，不妨给予与华侨资本同等的优惠待遇。

在对待大、中、小华人资本投资上，应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无论其资本大小、投资多寡，都一律欢迎。广东近十年的实践证明，做好华人中小资本的吸收利用工作，对团结广大华人，振兴侨乡经济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引进利用华人资金上，要慎重注意和处理好三个问题：第一，要确定引进资金的适当规模。在考虑国民经济需要的同时，也要考虑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包括国内配套资金和原材料供应、项目技术的掌握、设备的充分利用等。第二，保持使用外资的合理结构。以广东为例，过去引进的资金用于酒店、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的比重偏大，今后应使生产性、外向型或高新技术项目占较大比重。第三，既要考虑偿还能力，又要考虑在一定时期内能取得合理的经济效益。

在引进技术和人才上，可根据各地的需要，物色和选聘华人专家直接参与企业管理，为我们培养科技和管理人才，进行合作研究，开展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咨询，帮助开发新产品等。

(2) 下大力气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对华人资本的吸引力。国际资本对投资环境非常重视，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看是否政局稳定、法制健全、经济秩序有效；二看市场是否对外开放；三看是否具有相应的服务设施。我国对外开放十几年来，改善投资环境方面虽然已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无论是硬环境还是软环境都还存在不少缺陷，尤其是法制不健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低，交通、电讯、能源短缺等问题，常常使外商感到为难。因此，改善投资环境，首先要在稳定政局的基础上，结合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健全一整套涉外经济法规，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提供税务优惠待遇，简化办事手续，提高涉外经济部门的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其次，要致力于各种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投入，包括港口、码头、机场、道路、仓储、厂房、通讯以及供电、供水、供气、排污和各种生活服务设施的配套等。有了这些齐备的基础设施，才能保证外商进得来、住得下、出得去，投

资经营正常运转。再次，要注意软硬投资环境的配套完善。近年来，各地为吸引外资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改善投资环境，但人们往往重视改善硬环境，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软环境的进一步完善。广东的深圳、汕头、东莞等地近几年来引进外资、港资、华资之所以较多、较快、较好，主要是在重视改善硬环境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完善投资的软环境。它们首先考虑的是投资者的利益，然后才考虑本身的利益，办事机构精干，手续简便，效率高，讲信用，深受投资者的信任。

(3) 利用华侨、华人的广泛国际联系，全方位走向国际市场。根据中央的发展战略，沿海地区要首先全方位走向国际市场，靠国际市场养活自己，发展自己。实施这一战略，需要产品、资金、技术的大进大出。但我国目前仍缺乏这种力量。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事商业活动，熟悉国际商业业务、商业网络和各种法规，信息灵，关系广，并有商会和同业组织，有着丰富的推销经营经验，利用他们遍布世界各地的销售渠道和网络，有利于我国商品更好地打进国际市场。

总之，华夏文明的复兴是全世界所有华人的心愿，更是全世界所有华人的义务。华夏文明必将在所有炎黄子孙的努力奋争下重新以强者的姿态屹立于东方。

主 编 后 记

读者朋友们，当您步入中华文明那金碧辉煌的千年古殿时，您一定会梦回秦时月、汉时关，感慨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但当您暮然回首，放眼世界之际，您会在猛醒后看见，一个个优秀民族正巍然挺立于五洲之上，以强劲的生产力创造着崭新的现代文明和人间奇迹。这时，您不禁惊叹：我们要向世界学习！

向世界学习，这正是《环球人类文明探秘》丛书的要旨。

也许您会问，我们为什么要编著这套丛书呢？这还要从一个故事说起。清末年间，一个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考察，他走遍了中国的乡村，看到的全是衣衫褴褛、神情憨直、无知无识的国人，他极为失望地说，“中国没有文化！”后来，法国传教士来到京城，受到文人雅士的热情款待。当他走进朱廊画壁、匾额高悬、古色古香的豪华餐厅，品尝着精美绝伦、丰盛无比的中国菜肴，听着士大夫们引经据典、妙语连珠般的高谈阔论，他又感叹说，“中国太有文化了！”这个故事看似平凡，却寓意深刻。它说明，一方面，中国的文化教育在一个小圈子里高度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教育没有普及开来，广大民众的文化素质得不到提高。可见，中国的文化分配是极不平衡的，这种二元文化结构至今也没有改变。在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世界，民族素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的文化教育还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发展，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得不到普遍提高，中国是很难真正强大起来的。

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做一点实事，这正是我们编著这套丛书的目的。

我们是学子，不是先知，但沉甸甸的民族责任心告诉我们，经世致用是学问的根本。用我们所学的知识向社会推出适应不同层次读者需要的有益读物，这也是我们的时代责任。

这套丛书承蒙学界泰斗、著名东方学学者学大师季羨林先生欣然题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及丛书编辑部主任吴振录老师的大力帮助，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初出茅庐，可谓鹰隼试翼，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乞读者见谅。

张 晓

